

王凡 东平 著

共和国第一支
便衣保卫队纪实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人民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层等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党和国家领导层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这支便衣保卫队的大多成员早已入白发暮年，还有不少人已然告别了人世。

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便衣保卫队的真实故事，将永远留存于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之中。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49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群贤云集，共同为筹建新中国谋划。

古都北平，满目疮痍，特务潜伏，伺机而动……

为保证中共中央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安全，保障各项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一支由军人组建的“特殊保卫队”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

领导人身边，有他们的身影；

重大活动中，有他们警惕的目光；

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

他们的故事，充满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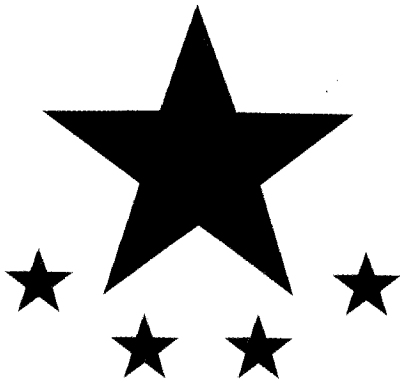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纪实／人物

ISBN 978-7-5034-2466-3

9 787503 424663 >

定价：36.00元



王凡 东平 著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 王凡，刘东平著 .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5034-2466-3

Ⅰ. 领… Ⅱ. ①王…②刘… Ⅲ.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0598号

责任编辑：陈海滨　刘　夏

封面设计：Seacloud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20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引言 / 1

上篇

一 从黄泥洼到北平城 / 4

以和平方式解放的北平，敌特的存在很难一下肃清/李克农向周恩来提议组建便衣队/李克农对高富有说：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

二 毛泽东进京的日子 / 34

3月23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晴朗日子/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陆定一家人坐的吉普车翻到了路坎下

三 为党中央秘密守卫香山沿线 / 52

对以职业为掩护的便衣队队员有很高要求/邬吉成到听鹂馆改名换姓"赵永谦"/"小老弟"被安排在颐和园北宫门口摆小摊

四 颐和园内外的故事 / 83

“毛主席不是让我来碰你们钉子的！”/几件事都让柳亚子感到备受冷落/武装警卫的一句询问，把柳亚子惹火了/李克农看望被打的警卫战士

五 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 113

特务们盯上了进出中南海的小轿车/中南海里的上厕所难题/被锅炉房里的巨响吵醒，毛泽东发了火/“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

六 从政协会议到开国大典 / 121

政协会议前夕突击查捕敌特/毛泽东进入会场，代表们欢声雷动/便衣队区队长刘忠接受秘密任务，怀仁堂以身挡“刺客”

下篇

一 发生在北京饭店里的故事 / 140

余心清“玉华台”调名厨/郑连福成为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总指挥/朱德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三军总司令了。”/“开国第一宴”菜谱

二 离京出行中的警卫 / 175

毛泽东坐上美国送给老蒋的专列/天津铁路线上发现了一枚手榴弹/毛泽东冻得缩拢双手直哈热气/毛泽东忽然感到头晕目眩大汗淋漓

三 护卫在开国领袖身边 / 201

特殊的登山队/聂荣臻说："我在前面给大家开道！"/彭老总打破了沉寂，情绪有些激动/朱总司令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

四 参与破获重大案件 / 217

毛泽东限期侦破"北平潜伏台"大案/顺藤摸瓜就能抓住狐狸的尾巴/聚餐中"0409"好像发现了什么,迅速离开了御膳厅/曹纯之仰头看见《牡丹图》,顿时发现可疑之处/李克农给毛人凤发去一封"劝降书"

五 执行特殊任务 / 236

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保密任务/他被毛泽东誉为红色"福尔摩斯"/识破受命刺杀毛泽东的假新四军旅长/既然上级认定有"中统特务集团"，就必须尽全力把它挖出来

六 在外交活动与国际会议中 / 252

便衣警卫成了外交使团的三等秘书/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紧急约见正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以洛甫担任为适宜/组成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高规格的代表团

七 在与苏联如兄弟般的日子里 / 285

中方希望苏方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人来华/毛泽东从此对尤金刮目相看/未到3点钟，尤金已经又是一身大汗/赫鲁晓夫的任命大大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料

引言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人民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层等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党和国家领导层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这支便衣保卫队的大多数成员早已入白发暮年，还有不少人已然告别了人世。

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便衣保卫队的真实故事，将永远留存于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之中。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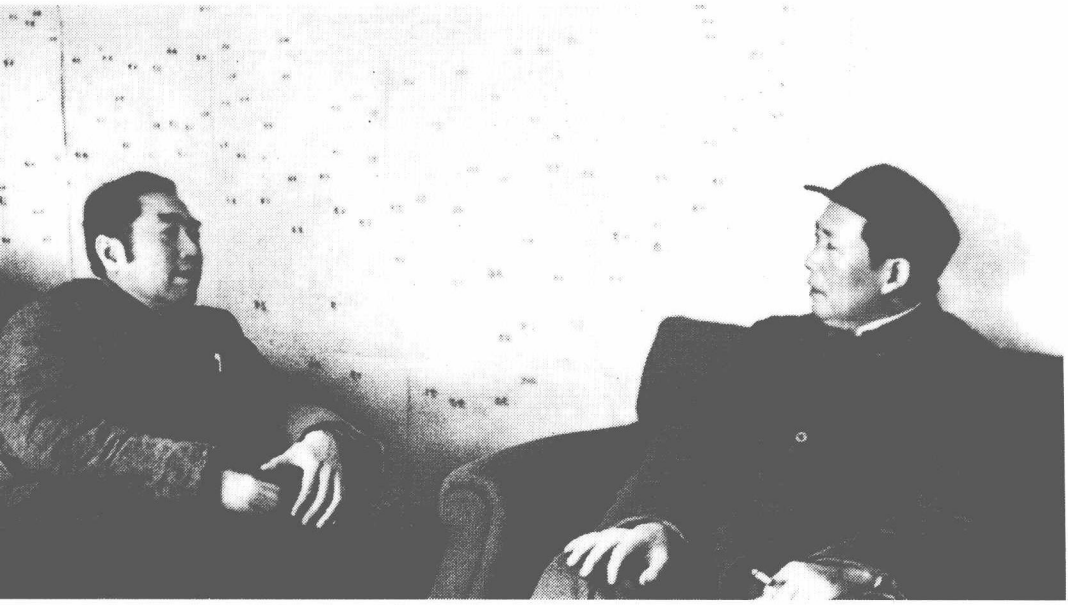
（上篇）



一 从黄泥洼到北平城

以和平方式解放的北平，敌特的存在很难一下肃清 / 李克农向周恩来提议组建便衣队 / 李克农对高富有说：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

1948年初秋，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三大关键战役将全面摧毁国民党精锐部队和主要军事力量，至此，蒋家王朝的灭亡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之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早已在思考和绘制新中国的蓝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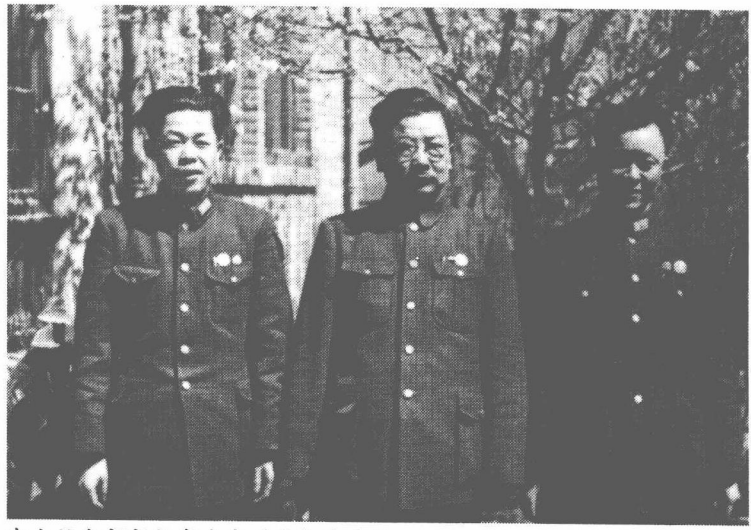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

还在平津战役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就已经在酝酿：待北平解放后，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迁入北平，新中国首都将设于此，北平改名为北京。

当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搬迁。搬迁工作在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具体负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通过他领导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有多达八个系统的特务。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即将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这些敌特的存在就更难一下肃清。

鉴于上述情况，肃清敌特的工作将与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工程相伴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敌特分子一定会更隐秘和狡猾地进行破坏、暗害、刺杀、投毒等活动。因此，进城后的保卫工作不但不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中）在北平

能有丝毫放松，而且更要千方百计地去加强。

针对这种前所未遇的情况，李克农意识到保卫工作要及时予以调整，在与有关人员议论时李克农说："以前在城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地下），今后正好翻过来，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因此，仅靠公开的保卫工作就不行了，必须建立一支便衣保卫队，把公开和秘密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李克农向中央搬迁北平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提出建议：应尽快组建一支有力的便衣保卫队，经过强化训练后，适应大城市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李克农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他曾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中共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对李克农提出建立便衣保卫队的建议完全同意，并指示说"便衣保卫队的成员，要由经过斗争考验，思想觉悟高，对党忠诚，机智勇敢，遵守纪律，能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的人组成"。

在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后，李克农于194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担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谈了话。

据高富有回忆，李克农对他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北平就要解放了。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很快要迁到北平办公。北平的敌情很复杂，和农村情况不一样，那里不但需要公开的保卫，还需要另一种隐蔽形式的保卫。为此中央决定，组织一支150人左右的便衣保卫队，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

李克农还告诉高富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便衣保卫队，中央领导同志对便衣队的组建很关心。便衣保卫队的领导成员，除你之外，准备让焦万有同志担任指导员，沈平同志任副指导员。由你们三人组成领导班子，我是放心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赶快把队伍组织起来。今天谈话以后，你就抓紧去落实。北平解放的时间很可能还要提前，我们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但还要看傅作义的态度。不管用什么方式解决，都不容我们有丝毫松懈，争取时间把工作做好。"

自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支便衣保卫队正式着手组建。

被任命为队长的高富有是山西石楼县人。他17岁就担任了乡苏维埃副主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后，到山西准备攻打白军占守的石楼县城时，他第一次见到红军领袖毛泽东。从此，他下决心跟着红军，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不久，他就正式参加红军，被编入彭德怀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连。由于作战机智、勇敢，很快当上了机枪班的副班长、班长、排长，后又调到中央警备团手枪连当连长。此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的任务。


便衣队队长高富有

任命为便衣保卫队指导员的焦万有，是陕北的老红军。他赤胆忠心，长期在中央警备团做保

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和高富有是多年共事的战友。

副指导员沈平，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曾在承德、张家口等城市做过地下工作，处事老练、机智，有着丰富的在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政治和业务能力都很强。

组成便衣保卫队的人员，除少数来自中央社会部，原来在敌占区有城市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外，从中央警备团和华北军大调来的各占一半。每个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对党无限忠诚，机智勇敢，又能吃苦耐劳的忠诚战士，全部是共产党员和营、连、排级干部。

大家急切想知道是什么“光荣”任务/
这不是让我们当“特务”吗？/毛泽东
对李克农女儿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
周恩来是中共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人

接到组织通知的便衣队队员们，迅速向中央社会部所在的河北省建屏县滹沱河西岸黄泥村集中。

当年的便衣队队员高福禄回忆说：那是在1949年的1月中旬，他还是华北军大参谋大队第五队的学员。当时他们全队正在靠近获鹿县的一个村庄进行测绘实习，实习刚刚进行了一小半，就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回西兵营到大队部报到。命令没有说明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但大家都猜想是要提前毕业，要去参加平津或太原战役，所以每个人都十分兴奋。

在七班班长、队党支部委员孙有光和三班班长张文健带领下，高福禄和崔清澍、刘满昌、刘建华、施文兴等约20名学员步行赶回了西兵营。他们刚到兵营大门口，就有人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大礼堂。

进入大礼堂，参谋大队的学员看到政治大队、军事大队的李广仁、王成仁、刘忠、李瑞祥、李福贵、王耀华、张忠良等约50名学员都已坐在了那里。政治大队和军事大队的学员都是从前线的营、连级优秀指挥员中选调到军大深造的。

张文健、孙有光见到李广仁，便急着向他打听要去执行什么任务。但李广仁也是“一头雾水”，说不清楚。他们猜来想去认为可能是要提前进行毕业分配，因在这以前，已经有一些学员，提前分配上了前线。

几个人正做着这样那样的猜想，华北军大政治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礼堂，给大家讲话。这位领导说：“同志们，我首先向你们祝贺，因为你们有幸被选中要去执行一项最光荣的任务……”

大家都屏住呼吸，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光荣”任务。只听那位领导说：“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和华北野战军共同作战，在华北境内的国民党傅作义和阎锡山部队，很快就要被我们消灭了。北平就要解放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要不择手段地做垂死挣扎。蒋介石曾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现在是他没有消灭了共产党，而自己反要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消灭掉，试想他能够甘心吗？于是他便想以暗杀我们党的领导人，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北平解放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要搬到那里去。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中央决定建立一支便衣保



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在西柏坡

卫队，你们都是这支队伍成员的入选者。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你们的重托，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华北军大的光荣！你们都是华北军大的优秀学员，相信你们不会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作为革命战士，都渴望能见到毛主席，大家听说自己要被分配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直接保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心中顿时充满幸福感和使命感。这时，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坚决听从党安排，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当口号声平息下来之后，大家推选政治大队的李广仁做代表，向党组织表示决心。他在这些学员中年龄最大，又是抗战一爆发就参加了八路军的老同志。他在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人民立功，为母校争光。随后，华北军大领导指定由李广仁担任抽调到便衣队人员的总带队。

1949年1月17日午后，70余名华北军大的学员便从石家庄西兵营出发，于次日下午赶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建屏县。

在华北军大选调的队员从石家庄出发前往建屏县的同时，中央警备团内也有六七十名警卫官兵，被召集到一起。这部分官兵，都是由高富有、焦万有点名准备带到便衣保卫队去的。

他们都是长期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身边执行保卫任务的忠诚卫士，如苗占海、孔祥惠、马春田、乔喜和、马云海、吴耀文等。他们之中，有的是张思德的战友；有的在周恩来劳山遇险的时候，为保卫周恩来的安全立过功；大部分人曾在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经常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

当他们听说调到便衣警卫队后，要脱下军装，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礼帽、墨镜，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去开展工作时，心情并不太舒畅。因为这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很自然的和国民党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他们不能理解的是：我们胜利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这不是让我们当“特务”吗？在他们眼里，当“特务”是不光彩的，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流露出不愿意离开中央警备团的情绪。

从华北军大抽调的队员到达建屏县，与来自中央警备团的队员会合

后，也有少数人受到了当“特务”是不光彩情绪的感染，认为做便衣工作不如上前线和敌人拼杀痛快，个别队员向领导强调自己没有做秘密工作的经验，要求分配到前方去。

对刚刚组建起来的便衣保卫队的思想状况，李克农非常重视，专门听取了高富有和焦万有的汇报。当他了解到有些队员感到做便衣工作不光彩的时候，指示高富有和焦万有，要认真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

李克农说：“我们的同志都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有些同志觉得做便衣工作不光彩，主要是对隐蔽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他们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岗位产生光荣感，并全身心投入战斗。你们一定要把便衣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向大家讲清楚……‘特务’这个词并无贬义，顾名思义就是肩负特殊任务的人，光荣不光荣，就看你是肩负了哪个阶级的特殊任务，为什么人服务的。国民党的特务无恶不作，人民憎恶他们是应该的。我们隐蔽战线上的同志，是负有特殊任务的革命者，是红色特务，所以是无上光荣的。1941年我由白区回到延安时，毛主席专门请我们全家吃饭，席间他曾对我的女儿李冰说：‘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我觉得这是毛主席对我工作的肯定和褒奖，终身引以为荣。”

高富有和焦万有，把李克农说的这一番话原原本本向全体队员做了传达。并组织大家就“中央为什么要组建便衣保卫队”这个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大家真正明了便衣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在此期间，李克农又委托中社部办公厅主任方志纯，专门作了一次关于便衣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辅导讲话。方志纯告诉便衣队员：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历来就是在公开和隐蔽的两条战线上进行的。其实这都是在敌人那里学来的。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我们党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作隐蔽工作准备。国民党叛变革命后，运用其掌握的军队和庞大的特务组织，镇压我们，使我们吃了大亏。因此，我们才学得聪明了点，于是才有了南昌起义，我们党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副主席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方志

纯提高了嗓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我们党隐蔽战线上工作的策划者，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人。1927年至1931年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为了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我们的血腥镇压作斗争，保卫我们党，在周恩来同志的策划下，建立了中央特科，如果说这是特务的话，它便是我们党最早的特务组织。周副主席就是这个组织的总管，现在还是我党中央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我们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过重大作用，例如1931年，在党中央工作的顾顺章叛变革命，出卖了整个党的组织，党中央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是我们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抢在敌人大搜捕之前，把情报送到了周恩来同志手中，使党中央得以迅速转移，避免了党中央遭到破坏的重大损失；在长征途中，也是因为我们打在敌特机关内部的同志，智取了敌人



便衣队队员守卫在颐和园东宫门

的电报密码，使我们能够及时破译蒋介石下达的指令和内部来往文电，使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作战得到重要的保证；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作战命令，也常常是在他下达到其军长、师长之前，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就看到了。所有这些，对于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隐蔽战线和公开战线的配合作战，革命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周恩来同志把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同志称为无名英雄。”

在简单介绍了北平城市的特点和敌情后，方志纯指出：“组建便衣保卫队就是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你们肩负着光荣的重要任务。周恩来副主席要求每个便衣保卫队员，都要有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希望同志们不辱使命……”

李克农的语重心长、方志纯的悉心讲解，使便衣队员们心胸豁然开朗。在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做一名合格的红色“特务”，甘当无名英雄，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毛泽东要大家“熟悉城市”/高富有带中央警备团人员到石家庄开眼界/李克农亲自教高富有抽水马桶用法

便衣保卫队成立时，总共有150余人，建制为三个区队，十二个分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分队。便衣保卫队组建起来以后，根据李克农指示，全队集中在黄泥村进行专业培训。

除了从中社部调来的几个同志，在敌占区的城市里做过地下工作外，绝大多数便衣队队员都来自农村，长期战斗在山沟里，缺乏在隐蔽战线上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有的人甚至连大城市是什么样子都未听说过，更不曾见过，大城市生活的基本知识，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片空白。例如，不少人从来还没有见过自来水和电灯是什么样子，可以说完全是“土包子”。让他们到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并要战胜敌人，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当他们真正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就

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

当队员们在改变了“做便衣工作不光彩”的错误认识之后，面临的新工作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困难，成了队员们学习的动力。“学习新本领，迎接新任务”，成为大家的行动口号。

在培训期间，李克农、方志纯、罗青长等人，都到集训地亲自给便衣队员们授课，学习的内容大致分四个方面：

其一，是掌握敌情。解放前的北平，是华北地区各种反动组织的大本营。这里不但有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以及傅（作义）特、阎（锡山）特，三青团、国民党宪兵和逃亡地主；还有美、英、日等国的间谍组织，特别是日本投降以后，日本和美国的间谍组织相互勾结起来，成为帮助国民党刺探我军情报和其他破坏活动的力量。再加上他们众多的外围组织，就形成了我们安全保卫工作的严峻形势。

在培训过程中，通过在北平、天津等城市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介绍情况，教员的讲课，阅看《敌特组织和反动组织介绍》等资料，队员们对北平敌特组织的情况及其活动特点，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并通过对敌情的掌握，进一步认识了便衣保卫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二，是熟悉城市的社情。这包括北平的民风民俗，城市生活知识。早在1948年春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袖由陕北到达西柏坡的时候，就曾指示中央警备团要到石家庄进行城市生活的实地体验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中央警备团的干部说：“打仗是不成问题的了，我们已经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但是我们的部队长期在农村，没有一点城市工作的经验，而要学会在城市中工作也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战士到城市中去实习，学好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知识，学会管理城市的办法。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好城市，管理好城市，保卫好我们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在那之后，高富有就带着一部分警卫人员到石家庄实习过。他们临出发的时候，毛泽东还嘱咐说：“不但要帮助地方的同志搞好城市治安，更要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熟悉城市，为我们以后进城工作做好准备。”

一年前，高富有带领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跟随毛泽东从陕北来到西柏坡。当时的他们听了毛泽东要大家“熟悉城市”的指示，还觉得这与自己

的关系还并不是那么紧密。可如今，跟随党中央进北平似乎就在近前了，此刻再重温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容易理解了，更加感到领袖的高瞻远瞩。队员们都说："过去我们是钻山沟的'土包子'，如今我们也要进大城市，革命需要我们戴礼帽、穿洋装，做'洋包子'了，这体现了革命的进程。不管是'土包子'还是'洋包子'，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李克农几次听取了高富有的汇报，他对队员训练情况询问得很细，如大家知道自来水和电灯怎么用吗？还亲自教给高富有抽水马桶的使用方法。他说："不学会这些东西，在城市里就无法待下去，闹笑话不说，还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保密。"

经过培训和刻苦学习，以及《北平概况》一类小册子的阅读，队员们对于北平的特点、民风民俗，有了较好的了解，也学到在城市生活的基础知识，连北平人见面习惯用什么语言打招呼、主要的街道、胡同名称、怎么样乘公共汽车和电车、交通规则等等也是培训的学习内容，这就为进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三，是学习便衣保卫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内容包括化装、职业掩护、侦察、盯梢、守候、擒拿、射击和执行任务的方式方法，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变方法等；通过《警卫工作须知》等教材，学习有关治安、情报、侦察、审讯以及防止敌特投毒、放火、暗杀、爆炸等公安业务工作的知识；以及便衣保卫工作应该遵守的纪律和注意的事项。

学习方法是先由老师讲课，遇到有不懂和疑难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提问。然后由老师出题大家讨论，或者进行实际演练。对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和认真，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是很丰富的，原来认为便衣工作不好做，有畏难情绪的同志，经过学习，对做好工作也有了信心。

其四，是有关思想政治和时事的教育。据便衣保卫队第二区队第一分队分队长孙有光回忆，他们在集训期间学习了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

针对要进入大城市工作的现实，便衣队员们还学习了毛泽东在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使队员们对拒腐防变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要保持警钟长鸣，准备经受胜利后的新考验。他们曾经是战争的英雄，在进城以后，在和平的环境下，仍然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经过深入的时事政治教育，使每个队员都在思想上为拒腐防变提高了警惕，大家纷纷表示进城后，不管穿什么服装，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在胜利面前不骄傲，革命红心永不变。

提前结束训练赶赴北平/共产党的“特务”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公馆里聚餐/李克农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

1949年3月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召开，高富有就接到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命令，要便衣保卫队赶快结束学习，赶赴北平接受任务。本来，培训的计划是要搞三个多月，但由于形势发展得比较快，北平和平解放比原来预计的时间有所提前，培训不得不提前结束。

接到进驻北平的命令后，每个队员都向组织写了决心书。李克农得知这一情况，传话勉励大家说：“尽管你们经过培训，学到了不少东西，但那仅仅是一些基本知识，还未经实践。进城后要一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

在出发之前，便衣队每位队员都发了一套用卡其布做成的黄色军装，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最好料子了。换上新军装以后，队员们显得精神格外抖擞。

3月8日清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口的开阔地上，一支150多人的队伍整装列队，等待出发。

队长高富有在宣布了队伍将前往北平，并将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神圣使命后，高声问道：“同志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队员们举起右臂高呼：“誓以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绝不辜

负党的信任！”震天的口号连呼了三遍，这是年轻忠诚的队员们发自内心的誓言。

负责运送便衣队的四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已经开到西黄泥村。为了中央机关的这次北平大搬迁，一共从第四野战军调来了100辆美制卡车。不少便衣队员昔日行军打仗向来都是靠11号（两条腿）的，这回第一次有汽车代步，脸上挂着说不出的兴奋。

队长高富有挥挥手臂，发出“上车、出发”的命令后，队员们随即登上了卡车。满载着肩负特殊使命队伍的四辆卡车徐徐起动，继而向北平方向进发。

3月初的天气，乍暖还寒，滹沱河的冰，已开始溶化了。河两岸的田地里，农民已经下田整地，准备春耕、播种。乘坐在第一辆卡车上的李广仁，指挥队员们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卡车轮子的轰鸣伴随着嘹亮的歌声前行。

快到石家庄时，路过一座用圆木和高粱秆搭成的临时浮桥，由于天气转暖，冻土松动，第一辆车通过时，连车带人都翻到河里。幸亏这座桥不算高，车上的人未发生重伤，卡车也没有损坏。在高富有指挥下，大家先把车扶正，然后又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在河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受到北平人民夹道欢迎

边赶修了一条坡道，四辆大卡车才顺利通过。

这一晚，队伍在石家庄宿营。第二晚，赶到了河北涿县。3月10日下午，便衣队如期进入北平。

便衣队队员们乘坐的卡车从永定门进入北平城，城内街道上往来的汽车不多，倒是时不时能看见些骑自行车的人。在春天尘土飞扬的便道上，行走着身穿黑棉衣的行人。

卡车穿过天桥、珠市口，来到王府井中心地带，就看到了路口树立的高大牌楼，街两边的高楼洋房商铺林立，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让卡车上第一次进城的队员感到十分新奇。

此时在北平大街上值勤的警察，大都是国民党旧警察局留用人员。大概他们看到车上的军人着装都是卡其布干部服，整齐威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解放军军官，便双腿一并，对着他们肃立致敬。

在前门附近的一个交通岗前，队员们向一名值勤警察打听行车路线时，他开口便以“长官”相称，但随即意识到叫错了，连忙改称“同志”，弄得站在车上的队员忍俊不禁，又不好笑出声来。

便衣队员乘坐的卡车缓慢地开到市中心一个胡同里停下，大家下车后，来到一处三进的大套院中。院子里面的房屋十分高大，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色的灰砖铺地。在院子里，不时可以看到穿军装或便服的人出入。这样气派的院落是便衣队的队员们在陕北根据地，在建屏西柏坡，甚至在河北石家庄都从未见过的。大家一边休息，一边猜想着，这是哪儿？这大宅院的主人肯定不同一般。

这座院落确实不太一般，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北平的住所，弓弦胡同15号院，人称“戴公馆”，位于今天中国美术馆的后身。

在中央机关进北平前，就内定整个机关入城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因此为中央入城做准备而先行进入北平的部门和机构，都与“劳大”有关。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这些机构分为三个点：

第一个点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区内的弓弦胡同15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李克农负责的社会部机关也在这里；

第二个点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个点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里，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修缮、布置等事宜。

弓弦胡同15号，这座当年戴笠的逍遥之所，如今成了中央直属机关在北平城内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凡进驻北平的机关单位都要首先到这里报到，办理有关手续。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国民党大特务戴笠死后不到一两年，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社会部的指挥机关搬进了这里。所以便衣队员们开玩笑说：如果戴笠活着，知道他的公馆成为中共的“特务”机关，这里进出的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的克星，不知作何感想。

先期到达北平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进行准备的李克农，在“戴公馆”迎接了刚踏进京城的便衣队，他与队长高富有等人紧紧握手，并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情况。接着，他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

第一，便衣队暂时住西郊颐和园附近，用三天时间休整和熟悉周边环境，然后安排警卫工作；第二，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现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第三，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全部换发小号的自卫手枪。

任务交代后，李克农把便衣队几位领导介绍给了“劳动大学”收发处的负责人、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并告诉他们，便衣队一行的食宿等具体安排，由收发处负责。

在“戴公馆”，便衣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吃了进入北平的第一顿美餐。大米饭，白馒头，大碗的猪肉炖粉条，外加鸡蛋汤，李克农等负责人也和大家一起进餐。让这些以往在延安、西柏坡、石家庄吃惯了小米、咸菜、窝窝头的年轻战士们美美地打了一回牙祭。

因为这是便衣队进入北平的第一餐，后来大家就把这一餐称为进京的“首餐式”，这是每个便衣队员都难忘的典故。

根据李克农的安排，“劳大”收发处负责人王范为便衣队派了带路的向导。在向导引领下，便衣队途经西安门、西四等地前往西郊。一路走去，他们对北平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市区内的秩序井然，市民看到便衣队员乘坐的车辆通过，都面带微笑，显出他们对北平解放的喜悦。出了西直门以后，情况就有点乱哄哄了，傅作义的起义部队，刚刚开出城外，正等待改编。在海淀地区，到处可以看到傅作义部队的官兵三五成群的在一起活动；在道路的旁边，不时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炮弹片或弹壳未经清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便衣队责任区范围内的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

到青龙桥之后，大部分队员被安排在一个叫“圆通庵”的姑子庙住下。这里房屋虽然很破旧，但院子打扫得很干净。“圆通庵”坐落在青龙桥南边，距离大街约有百米，十分安静，便衣队到来前由四野第41军占用。

住这里虽然是打地铺，但铺了很厚的一层稻草，队员对此已经很满意。还有几个分队因为“圆通庵”住不下，便分散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部队被安置在颐和园，从通往香山的马路上的一个侧门进去，是一个独立小院，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进到颐和园内。

从这一晚开始，便衣保卫队就在青龙桥安营扎寨了。

三天后,李克农给高富有打来电话/中共领袖与核心机关为什么选择进驻香山/筹划组合起四方面结合的保卫体系/为工作，部分队员去给老板提尿壶和侍候老板娘

依照李克农的安排，便衣队进驻北平后有三天的休息时间。但因为任务紧迫，实际上便衣队到青龙桥一带安顿住下后，队员们只在第一个休息日洗洗衣服，拾掇了一下房间，就算休息了。

第二个休息日吃完早饭后，便衣队在高富有和焦万有分批带领下，去

察看警卫责任区的地形、熟悉环境了。

他们从青龙桥徒步走到香山，爬上主峰“鬼见愁”，整个香山地区尽在眼底。“鬼见愁”的北面和西南面各有一座略低的山峰：一个叫“万人愁”，一个叫“千人愁”。这两座小山峰和“鬼见愁”基本处在一条线上，这是控制香山地区的三个制高点，高富有随即在这里设了观察情况的警戒岗。后来警卫部队到达后，换下便衣队的队员，派了一个班在这里驻守。

看过香山的地形，他们又去了碧云寺、卧佛寺，然后顺着玉泉山、颐和园、海淀，一直走到西直门。转悠了整整一天，警卫责任区内哪个地方是枢纽，哪个部位是要害，什么地方便于隐藏等等，都细细察看了一遍。每个队员对责任区的情况，都有了基本的了解。设防、布点，应该选在哪里，高富有和焦万有心中也有了数。

直至深夜，大家才回到青龙桥，高富有和不少队员发现自己的鞋底都磨透了。虽然都很累，但大家感到这一天的收获非常大。

翌日早饭后，便衣队队员们又乘汽车进了城。到天安门、故宫、前门、王府井等处转了一天，这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单纯地逛景或购物，目的是让队员们在领略古都风貌特点中，把在培训中学到的城市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

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只能是走马观花，但置身于城市的现实中，课堂学过的东西，才能真正消化。譬如在城市的马路是右上左下，行人要走便道，过街或遇到红绿灯该怎么办等，这些在培训时虽然都讲过，但这些普通知识，对从未到城市的人，也还得有个熟悉的过程，这一天就是大家对城市生活的集体实践，对以后开展工作是很有用的。

三天过后，李克农打电话给高富有询问进城后队员们的情绪，是否能适应城市环境。高富有将两天来的活动告诉他以后，说：“队员们个个都不怕艰苦，精神饱满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李克农高兴地说：“好！便衣保卫队就要有这种精神，难不倒，拖不垮，打不烂。”之后便指示高富有说：“任务紧迫，时不我待，你要很快把人派下去，根据需要改换服装，把工作网点建起来。”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上篇）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袖的安危，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中央决定核心机关和领袖们迁移北平后，如何保证进驻后核心机关与领袖们的安全，就摆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平津战役还未结束的时候，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和刘达等人，就受中央指派，于1949年1月19日前往北平西郊，为中央进北平选择驻地。范离等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中央驻地选址的初步意见，并向当时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作了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给中央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中央做了汇报。叶剑英在给中央的信中说："范、刘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要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

随后，中央又派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13人赴北平进行全面调查。李克农一行于2月5日到达北平。2月7日，李克农等就与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勘查了香山。

2月8日，李克农给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昨日（7日）与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驻地，已决定驻该地。林总（林彪）已允许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到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两个连帮助修理工作……"中共领袖和中央核心机关进北平后，先在香山安营扎寨的建议随之被采纳。

香山，位于北平西部，距西直门约20公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风景名胜区。因该山有大石似香炉而得名。山中林木茂盛，松柏参天，峰峦叠翠，环境优美秀丽。中秋过后，满山红叶，更显得风景独好。香山主峰（鬼见愁）海拔557米，站在峰巅远眺，西部美景尽收眼底。在中央进驻香山之前，为了防备敌机空袭，曾在后山设了高射炮阵地。

香山一带，有很多唐、辽、金、元和明代的名胜古迹。清朝康熙十六年（1677），在香山寺、宏光寺一带营建了香山行宫。乾隆十年（1745）秋，又在旧行宫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营建，并命名为"静宜园"。1860年、1900年，静宜园曾两次被英法侵略军和八国联军焚烧，其中珍宝文物被掠夺一空，园内建筑也遭到破坏，遍体鳞伤，破烂不堪。园中树木被大量盗伐，景区被达官贵人、军阀、恶霸抢占。1920年，熊希龄以济贫扶孤



香山双清别墅

为名，在静宜园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园内约有三千余间房子，中央迁至香山后，就在这些房子里办公住宿。

在香山静宜园附近的山石中有两股清泉潺潺流出，乾隆皇帝在这里的石壁上题了“双清”两字。熊希龄开办慈幼院时，在这里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称“双清别墅”。这是一座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还有一池泉水，池边建有八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毛泽东到北平后就将住在这里。在毛泽东到达前，工兵连在院边的南山脚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施工的战士出于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在防空洞的上方写上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到这里后，让工作人员把这些口号涂掉了。

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是“来青轩”。这里后来成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的住所。刘少奇一家住东房；

朱德和任弼时住在北边的一排房子里；再往西不远，就是周恩来的住房。

党中央核心机关、解放军总部及领袖们进北平后，先在香山落脚，是有多种原因的，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为确保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因为北平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在战场上失败后，东北、华北等地的特务大都集中于此潜伏起来，敌情非常复杂。香山距城较远，宜于警卫，便于防空。1949年3月，北方的青岛还未解放，那里驻有美国、英国的军舰，因此不能排除美、英插手干涉的可能；北平处在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的作战半径之内，敌机随时有来北平轰炸的可能。为防止情况突变和敌机轰炸，中央核心驻扎香山的选择无疑是最合适的。

其次，先驻扎香山有利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因为我们党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城市的生活环境不习惯，也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在由农村转到城市的时候，从思想上到生活上，都需要个过渡、适应和熟悉的过程。香山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从这个意义考虑，也是最合适的地方。

再有，就是考虑到办公和住宿用房的问题。因北平是以和平方式解放的，城里的傅作义军事机关，完全撤离需要有个过程。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办公，在城内一下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用房，而香山慈幼院有三千多间房子，加以适当修缮就可以使用。

因此，香山就成为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筹建新中国成立最后一个指挥部的所在地。而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北平后的地址确定以后，同时也就确定了便衣保卫队进城后的工作区域。

为了把保卫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在北平负责中央大搬迁的几位领导，筹划组建了内卫、外围警戒、社会治安和便衣保卫四方面结合的保卫体系，联合作战。

内卫负责香山内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由中央警备团和后来建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此时，负责内卫的人员除少数打前站的提前到达香山外，大部分都随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

外围警戒部署在香山周围地区，由第四野战军的207师，即专门调吴烈来任师长的那个师，该师后改为中央警卫二师。

社会治安由北平市公安局负责，为了加强西郊地区的治安力量，市公安局在海淀地区设了第五、第六两个公安分局，局长分别由中央社会部派来的徐守身、张锋担任。

便衣保卫队作为一支特殊的队伍，主要活动在香山、颐和园地区以及香山到西直门沿线（包括新北京地区）。实际上便衣保卫队是内卫、外围、社会治安的补充，内卫和外围、社会治安工作都参与了，是保卫工作的总预备队和机动队，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这几方面的力量，都由李克农总管，统一部署和领导。在党中央、毛泽东等到达北平前，根据李克农指示，西郊第五、第六公安分局下设的分驻所、派出所，在业务上受公安局和便衣保卫队双层领导，主要的分驻所和派出所，便衣保卫队都派人担任了副所长，并在青龙桥、海淀、西直门地区，同郊五、郊六公安分局、四野207师，共同组成设立了三个检查站，站长分别由便衣队的李广仁、李福贵等担任。

三个检查站对外的名义是土改工作组，实际上是这三个地区处理治安保卫工作的指挥点。平时检查站的成员以土改工作组的身份，到群众中搞调查，了解敌情动态，发现可疑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处理；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以公安警察或解放军的身份，对来往车辆和行人进行检查，以防患于未然。

为了工作方便，每个便衣队的队员，都有三套服装，一是解放军的军装，是在公开场合下执行任务穿的；二是傅作义军队的军装（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很长一段时间穿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服装），这也是为了工作方便配备的，例如到娱乐场所工作，就可以穿傅作义军队的服装；三是为职业掩护或侦察需要穿用的便衣。

便衣队的人，除了穿便衣执行机动任务外，更多的时候是在香山、青龙桥、颐和园、海淀、西直门等处，以各种职业，例如当商贩、开茶馆、修理自行车或到要害地方的餐馆、商店任经理、做伙计、当学徒，开展工作。

这些便衣队队员，为了党的事业，不怕艰难，忍辱负重。从解放军战士，转而去适应小商小贩的职业，其中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去扮演学

徒角色的便衣队员，不但每天要干扫地、打水这些杂活，还要为老板提尿壶，侍候老板娘，心理上更要经历一番磨砺调适。当然这都是后话。

便衣队和工兵们对香山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难道中共中央进北平后驻地的秘密泄露了/焦万有说："我心里时刻都捏着一把汗啊。"

北平和平解放后，首先进入香山驻守的是四野的部队。当时在香山慈幼院和双清别墅一带，住着大约250多保定来的流亡学生；在香山寺那边也有一些东北来的流亡学生。后来四野的部队撤走，但那些学生依然留在那里。

这些学生都是因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误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于北平解放前跑来的。他们刚到时，国民党还管他们饭吃，虽然吃不饱，但总还有吃的。平津战役开始不久，北平西北郊就被解放军占据了，国民党的军队缩进了城内，学生们遂陷入了饥饿的绝境。有些人想返回保定或东北，但不知道已经解放了的保定和东北，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他们，于是仍在北平西郊一带逗留着。

在做出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和中共领袖迁移北平并进驻香山的决策后，便开始对香山内部的住户进行清理，这项工作是由北平市军管会平西工作组的冯挚带队进行的。便衣队到北平后，李克农指示便衣队协助平西工作组，一起把现在住的人清理走以后，由便衣队负责监控看守。

在指导员焦万有带领下，由20多名便衣队队员组成便衣队一区队，住进了香山。不久，中央警备团的先遣部队也到达北平，他们随即开赴香山，对香山内外，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进行彻底清查，以排除一切不安全隐患。接着，207师的工兵扫雷人员也被派到香山，参与安全排查工作。

驻扎香山的便衣队接到来自李克农的指示，要把香山山上山下，院内和每个房间，仔仔细细检查一遍，不能留下任何死角，必须排除一切不安

全的隐患。焦万有即带领20多名便衣队员，与中央警备团的先遣部队、携带扫雷器的工兵部队协同工作，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办公住宿地展开地毯式的排查。

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他们从香山山顶到山下，进行了反复的检查。从毛泽东将要进住的双清别墅，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将要住的来青轩等院落，从别墅室内、室外，到院内、院外的每一个角落，都像梳头发似的，进行了多次搜索探察。

隐患果然存在，当扫雷器探测到毛泽东将入住的双清别墅附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后来又发现了炮弹和被埋藏着的几箱炸药。

这让大家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起初有人认为是中央住地的秘密泄露，敌特分子精心预谋暗害所为，否则为什么手榴弹偏偏埋在毛泽东的住处下面。接着，每个人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一个个排查所接触过的人和可疑线索，工兵和便衣队也马上把这一险情向上报告。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分析，认为手榴弹和炸药，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动因。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工兵部队及其配合工作的便衣队员把经过扫雷检查的住房和安全区域，整体移交给了便衣保卫队进驻香山的一区队，由一区队和警卫部队联合布岗守卫。

在清查不安全隐患的任务完成后，便衣队一区队又马上转入了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将入住的房屋进行修缮，协助布置办公和住宿用具的工作。

当时的汽车都主要用于中央从西柏坡到北平的搬迁运输了，因此香山驻地领袖们办公需要的那些桌椅、沙发、床铺等大小家具和生活用具，都是由便衣队队员们肩扛、手抬，从香山脚下一批批搬上山的。

由于距离党中央进京的时间日益临近，便衣队队员们既要负责驻地安全警卫，又要参与各项准备工作，不少队员由于昼夜连续加班，以致在工作中稍有一点停顿就打起盹来，不得不用湿毛巾抹把脸，继续干。

中共领袖住所的办公住宿用具布置好后，队员们将全部精力投入驻地的看守警卫工作，这是中共领袖及核心机关第一次进入大城市，因此队员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疏忽。

队员们都牢记着李克农同志的话："不能发生一点问题，如果因为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正像指导员焦万有后来回忆时说："在党中央、毛主席进驻香山之前的那些日日夜夜，我心里时刻都捏着一把汗啊。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辜负党的信任，香山驻地的安全没发生任何问题。"

长枪与便衣队的工作是格格不入的/陈赓曾经要给警备团手枪连换枪，遭到毛泽东拒绝/队员手里的那支左轮手枪，还飘着蓝烟/高富有火了，大声命令："停止选枪！"

便衣队进入北平已有一段时日，可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等人使用的还是原来中央警卫团配发的旧枪；有的队员还在使用"三八式"长杆步枪，而从华北军大调来的队员们，一直还没有配发枪支。

此情安全部的领导李克农完全明了也早有考虑，他非常理解便衣队员们渴望有一支好手枪的心情，况且城市便衣保卫工作也的确需要配备适于隐蔽保卫工作需要的武器，所以便衣队一到北平，李克农就和高富有说到换枪的事。他特意指示刚被任命为北平监狱长的安林，为便衣队队员解决配备性能良好、便于携带的轻型手枪的问题。

一天，李克农找到高富有说："我知道你还有一件心事没有了结，现在我就来满足你的心愿怎样？"

高富有对李克农猛然这么一说没能立刻反应过来，有些疑惑地说："我有什么心事？如果说我有什么心事，那就是觉得责任重大，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代。"

"对，是要有这种责任感。其实，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不过现在我

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你不是早就想要一支好的手枪吗？现在我给你们全队都换好枪，每人一支美制左轮手枪，怎么样？”李克农说。

一听说是要给全队换好的手枪，高富有很高兴，因为用长枪与便衣队的工作是格格不入的，何况李克农早就提起过换枪的事，于是说道：“还是李部长最了解我，这些年我连做梦都想要一支好枪，这下真的如愿了！”

高富有早就盼望有一支好枪，而且为此还引发出一段故事。

那还是在1947年的7月，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在靖边县小河口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赓司令也来参会。

闲谈时，陈赓司令问起了负责直接保卫毛泽东及其他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高连长，你们手枪连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有一百多人，四挺机枪，24支冲锋枪，其余就是每人一支有时打不响或没有多少子弹的短枪。不过，我们每人还配有一把大刀，走到哪里都挎着。”

陈赓一听笑了：“嗨！原来你们一连人马，还要靠耍大刀呀！光靠耍大刀，怎么能保证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呢？这样吧，我们缴获了许多美国造的卡宾枪，给你们150支，再给你们连干部每人配备一支好手枪，你看够不够？”

高富有一听激动万分，紧紧握住陈赓的手，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你了！”可是转念一想，又担心地说：“陈司令员，我们连做梦都想要一支卡宾枪，可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谁能做主？”陈司令关切地说，“和你们团长讲一下可以吗？”

“我们团长肯定同意。就怕我们昆仑纵队（党中央代号）司令部的首长（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允许。”

高富有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后，陈司令员将双手往腰间一插，又一次开怀大笑，充满自信地说：“这好办，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一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和参加小河口会议的陈赓等几位战区首长在院子里兴高采烈地谈事。正巧高富有走进来。陈赓抓住这机会，与几位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与高连长谈妥了，我们给手枪连每人

一支卡宾枪，很快就让他们送来。”

毛泽东听了陈赓的话，不紧不慢地冲着高富有说：“高富有，他给你，你要吗？”

高富有本来想说：“我们要这些枪，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半天没敢吭声。

毛泽东看出了高富有的心思，便说：“你想要枪，这并不是坏事。但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前方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你们需要枪，前方战士打仗更需要枪啊。”

接着，毛泽东又转身对陈赓说：“你们在前方天天打仗，好武器会派上好用场的。”接着又对高富有说：“咱们这里又不打仗，你要人家的枪干什么？更不能从人家缴获的武器中要！”

陈赓在旁仍在帮助高富有争取说：“我已发了电报，枪很快就送来了。”他显然是想用既成事实，让毛泽东批准。

然而毛泽东却更认真起来，大声说：“你敢！”

这下陈赓不好再坚持了。毛泽东又冲着高富有严肃地说：“你要敢要一支枪，我就撤了你的职！”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任弼时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显然是和毛泽东意见一致的。高富有一看，这事再没有什么周旋余地了，只好赶快表示：“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尽管后来陈赓司令员仍惦记着此事，也想了不少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手枪连的武器始终没换成。高富有和他的战友一直用着那些陈旧的枪支，背着大片刀，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又从西柏坡到了北平。

今天，高富有梦寐以求的换枪愿望就要实现了，他怎能不打心眼里高兴呢。

当天夜晚，高富有带着一队人，从炮局监狱把100多支左轮手枪悄悄运回了便衣队队部。那都是从国民党特务队缴获来的，如今却成了共产党便衣队的武装。

“呀，崭新的美制左轮手枪，好让人眼馋！”几个指定来选枪的队员兴奋地喊着，扑在枪堆上开始检查，挑选枪支。

队长高富有也与那几名队员在一起选枪。他参加革命后，历经大小战斗无数次，英勇无畏，可这一次选枪，却险些丢掉了性命。

那时已是夜阑人静，便衣队队部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到屋内“哗啦、哗啦”拉动枪栓和放枪的声音。高富有正一门心思地撅着屁股在枪堆里挑枪，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枪响，全屋顿时像死一般沉寂，几个挑枪队员迅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立即站起来，神情极为紧张，一个队员双眼惊恐，木呆呆的，手里的那支左轮手枪，还飘着蓝烟。

“怎么回事？”高富有问。

几个队员如梦方醒，大喊一声：“队长别动！”随即扑上来，把高富有按倒，并在他身上仔细摸找开来，嘴里还嘀咕着：“真怪了！枪响时分明枪口正对着队长，怎没见他身上有血？”几个人在高富有身上和他背后的墙上细细察看了半天，也未发现被枪击中的痕迹。

“这是怎么搞的？”这时，一个队员抓起肇事者手中的枪，仔细一看才明白了。

“老天！真侥幸啊！”

原来选枪时，一个队员想试试扳机灵不灵，不想左轮中有一颗子弹未退出来，一扣扳机，枪便响了。凑巧的是，这颗子弹和枪的型号不匹配，子弹大于枪的口径，弹头被卡在了枪管里没射出来。

“高队长真是有神灵在暗中护佑，不然就要出师未捷身先亡了。”

这会儿，满屋子的人才松了一大口气，继而捧腹大笑起来。

一场虚惊过去了，高富有自己打趣说：“不是我命大，而是我还没完成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的任务，怎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呢？”

大家一阵哄笑后，又继续埋头选枪了。

不料过了一会儿工夫，又是“啪！”的一声清脆枪响。这回子弹冲出了枪膛，带着一道寒光，擦着刚进门的一位女队员的头皮飞过，在对面的墙上留下了黑色的弹洞。女队员一下子便瘫坐在了地上，差点吓昏了过去，幸亏她的身材矮小些，若再高出一点儿的话，就真要出人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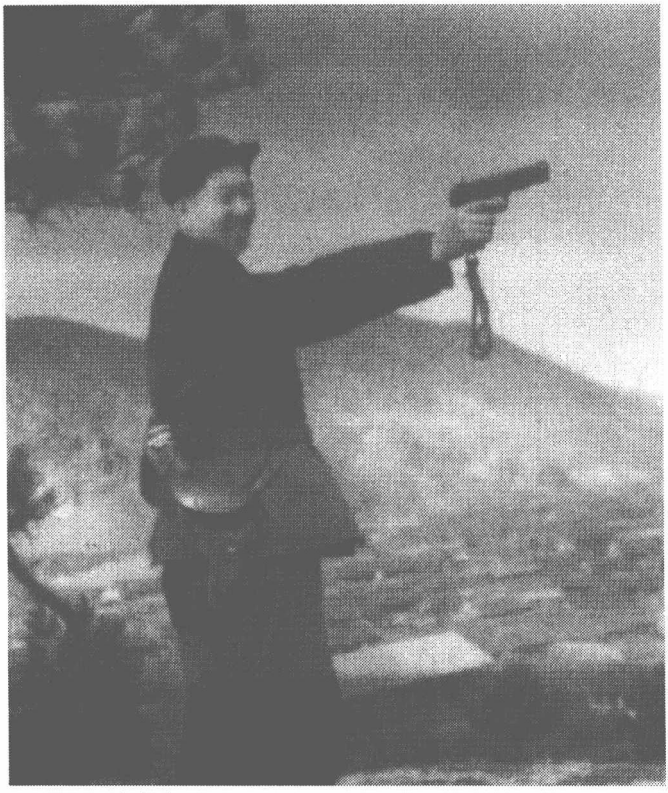
连续两次走火，高富有真有点火了，谁知这第三发子弹会从哪支枪里蹦出来呢？“停止选枪！”他大声命令道。

看来这批枪接收时未经仔细检查就入库了，高富有这样想。随后他吩咐大家："先验枪，再选枪。"

其实，这批枪出库时是经公安局的同志检验过的，但由于是左轮枪，枪的左转轮盘上有六个弹膛，需要一个个弹膛依次检查，稍不经意，就有可能落在枪膛里一颗子弹。而其他的手枪，枪膛内有没有子弹，拉开枪膛便一目了然。

在战争年代，这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在便衣保卫工作中如稍有大意，就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政治后果。有了两次走火的教训，大家对摆弄这批左轮枪愈发小心起来。待把这批左轮手枪全部验完、选好，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李克农接到报告了选枪险情，生气地责备道："你们怎么搞



便衣队队员在香山试枪

的？为什么不先验枪？”

“公安局说已经验过，我们就相信了，谁知还有漏网的。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这太危险了，要是真把咱便衣队长报销了，还谈什么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组队时交给你们的任务怎么完成？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杜绝任何疏漏，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一次让人兴奋的“鸟枪换炮”竟然弄得惊心动魄，是大家怎么也没想到的。

在配备了新的武器后，便衣队员们摩拳擦掌，对完成保卫红色政权的光荣使命更充满期待。他们随即开始了刻苦的射击训练，因为左轮枪与过去部队上常见的短枪性能不太一样，要很好地掌握和使用还得下一番功夫。

二　毛泽东进京的日子

**3月23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晴朗日子/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陆定一家人坐的吉普车翻到了路坎下**

1949年3月23日。

这天凌晨三点多钟，毛泽东刚工作完，临睡前交代卫士长李银桥：“九点以前叫我起来。”周恩来悄声嘱咐李银桥说：“晚点没有关系，让主席多睡一会儿。”

所以李银桥到上午十点多才叫醒了毛泽东。

起床后一看钟点，毛泽东责怪地说：“让你九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

“周副主席说让您多休息会儿，说休息不好，路上会疲劳。”听李银桥这么说，毛泽东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晴朗日子，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新闻公报在这一天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毛泽东听完广播，吃完早饭，已经快11点钟了。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11辆吉普车和小轿车，以及四野送来的10多辆大卡车，都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待命出发。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先上了车，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等也相继来到，说说笑笑地登上了汽车。



建国前夕的毛泽东

毛主席坐的是一辆吉普车，他一只脚踏在车上，一边回过头来，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这是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深思了一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等挥手向前来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随后，他的吉普车和进京车队启动了。

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车。毛主席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卫士长李银桥坐在由司机周西林驾驶的第二辆车上，这是一辆美国制造的军

用中吉普。第三辆车也是警卫车。第四辆车坐的是刘少奇，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轿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乘两辆吉普车，跟在刘少奇车子的后面，之后依次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各家的中吉普。

阳春三月，汽车行驶在华北大平原上，毛泽东的心情格外好，一路和警卫战士们聊着天。

毛泽东问："北平我们总是要进的，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

警卫战士们说："您说三年到五年打败蒋介石，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刚刚两年就进北平。"

大家正谈议着，一名警卫战士前来报告说，陆定一家人坐的吉普车翻到了路坎下了。

"人怎么样了？"毛泽东问。

前来报告的警卫战士说不清楚，毛泽东让车上的警卫战士跑步去察看。回来报告说："还好，没有人受伤，只是大人孩子都受了场惊吓，还算平安。翻下去的车也已经拉上来了。"

毛泽东这才放下心。

周恩来又一次嘱咐司机："平地上开车更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大意，以免出问题。"

这些情况，便衣队的队员们并没有看到，但他们中间许多人是从中央警备团里出来的，同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老熟人，所以能知道一些外人了解不到的内部消息。

叶剑英和滕代远到涿县接毛泽东/有人提议毛泽东进北平时组织市民夹道欢迎/3月25日凌晨三点，队员们就早早起身

3月24日，北平市新任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中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从河北涿县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

式，并邀请了北平各界人士前往机场欢迎。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乘坐给毛泽东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叶剑英一进门，就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中共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周恩来主管。根据周恩来的具体指示，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少不了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他们对中共中央在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入城庆祝等等都作了极严密的部署，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考虑到了。

事前，叶剑英、李克农联名将研究和部署结果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达涿县后改乘火车到北平。

他们还专就铁路警卫情况致电周恩来称"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共12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每站派两人负责，一人守电话，一人盯道岔和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时，为保证安全起见，编为三个列车，第一列挂八节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为开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汽车送他们到香山；第二列挂八节卧铺和一节餐车，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挂五节客车和三节行李车，开到前门火车站。"

叶剑英和李克农一再强调，如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飞机场，必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再到西直门才能到达，无好公路可走，所以以乘火车为妥。

组织委员会在专门研究了中央到达北平后的阅兵问题后，决定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任总指挥，由第四野战军出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车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接受检阅。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到场时，以36门礼炮各鸣四响演习弹，共144响，以示庆祝。

当时还有人提议毛泽东进城时要组织北平市民夹道欢迎，以便对外扩大革命胜利的宣传和影响。中央否决了这一提议。毛泽东说："形式简单为好，场面不要过大，到全国胜利时再组织隆重庆祝。"

毛泽东一行23日夜住在唐县的淑同村，24日下午到深县，夜宿42军司令部大院。根据周恩来与叶剑英的最后商议，毛泽东等一行于3月25日凌晨乘专列出发进京。凌晨二时，在涿县休息后的毛泽东等人，精神焕发地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3月25日前一天，李克农给便衣保卫队布置的任务是：在清华园火车站、颐和园和西苑飞机场内执行便衣保卫任务，由市公安局配合。外部警卫由四野的207师担任，市公安局和便衣保卫队紧密配合。

出于保密纪律，便衣保卫队领导只吩咐队员们“明天执行的是最重要的保卫任务”。但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么多天的辛苦忙碌，就是为的这一天早点到来。此前，队长高富有召集各区队长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之后，队员们个个兴奋不已。

第二天，即3月25日，不到三点钟队员们就都起床了，简单洗漱之后便各就各位。

住在同庆街10号院的队员高福禄起床后，按高队长的布置，对颐和园宫门前以及颐和园通往清华园火车站的线路，每个角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在确信没有问题之后，于天亮前赶到清华园火车站向高队长汇报。

这时，队长高富有带领孔祥惠等十多名队员，已经在车站布岗就位。高福禄看到高队长正陪李克农对站内环境和布岗情况做最后的检查。

等他们回到车站入口处的时候，高福禄向高富有汇报了沿途检查的情况，并说：“207师也开始在沿线布岗了，但还没有戒严。未发现异常情况。”高队长满意地点了点头，问小高：“知道今天是什么任务吗？”小高笑着说：“这还用问吗？我们到北平来就是为了迎接这庄严的时刻嘛！”高富有拍了拍小高的肩膀说：“行啊，小老弟。”随后分配小高在车站入口处值勤。

当天色大亮，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时，一辆火车徐徐开进了清华园火车站。车停稳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叶剑英市长的陪同下依次走下了火车，受到了等候在月台上的聂荣臻、彭真、罗荣桓和林彪等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仍穿着冬装，大衣领子上的绒毛，在春风吹拂下，微微翻动

着，那厚厚的棉裤、棉鞋虽显得与北平城的融融春意不太协调，但却真实刻画了一位从山野农村走向中心城市，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形象。

周恩来有些不放心："不会指挥错吧？"/轻易不发脾气的李克农一见他就急了/王范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在便衣队员的记忆中，毛泽东发火并不是在颐和园

毛泽东等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调到北平负责警卫工作的207师师长吴烈护卫下，分别乘汽车到颐和园景佛阁聚齐，按预先的安排，就在那里吃饭和午休。

周恩来心中始终挂记着毛泽东等中央书记到北平后的行止安排，他到颐和园后就让高富有立即把李克农找来。

见到李克农，周恩来便问起了下午活动的具体安排和相关事宜。李克农讲述得十分详细，但周恩来的问题还是一个接一个。问完了李克农，又问高富有："动物园往机场转弯处，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从颐和园到西苑飞机场的距离并不远，但那时候这两处之间还没有一条顺当的路相连，从颐和园去西苑机场，要经动物园再西折呈一锐角V字形，那里南来北往几条干线相交，交通情况复杂，是事故多发地段。细心的周恩来询问的就是这一段。

高富有说："那里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负责指挥交通。"

"能指挥得了吗？"周恩来关切地问道。

"能。"高富有看上去胸有成竹，因为他知道今天在那个位置担任指挥的，是便衣队的队员李新。李新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就曾经做过交通警察，受过专门的训练。此外，便衣队进入北平后，就有一部分队员被安排从事在路口指挥交通的工作，他们随后就接受了专门的训练，学习交通规则和指挥知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岗位实习后，已经能够胜任道路交通的指挥工作。这些情况，高富有都很清楚。

但周恩来还是有些不放心："不会指挥错吧？"

高富有十分肯定地答道："不会的。"

"便衣队的警卫地段你检查过了吗？"李克农又追问了一句。

"检查过了。我们的队员凌晨三点就上岗了，除我们负责的地段外，颐和园到机场、机场到香山沿途还派出了流动人员配合207师进行警戒。"高富有如实地说。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就好。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好，使中央放心。"接着又问："王范同志怎么不见呢？找他来谈谈。"

可是人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负责接应联络的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到哪里去了。直到开饭时，人们才见王范系着围裙，笑眯眯地从厨房里走出来。

轻易不发脾气的李克农一见他就急了，拉着他走到外屋，压低嗓子说："王范，你干什么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

王范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小声辩解说："我担心食品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到厨房盯做饭去了。"

原来王范觉得，这个饭馆从前是资本家开的，现在虽派进了便衣队的同志去当经理，但饭馆里人员都是留用的，情况还不是很摸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有人在食物中下毒。所以他就到厨房，一边帮着干活，一边盯着大厨师做菜，以防不测。

王范此前是东北社会部的部长，平津战役后期，临时调到北平协助李克农搞警卫工作。他朴实无华，工作认真负责，忠诚党的事业，但对中央领袖身边的工作还不是很熟悉。

其实，王范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1940年在延安时，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去前方视察，老警卫李树槐跟随护卫。朱德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担心总司令的安全，于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

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原来茶水里果然有毒。这并不是李树槐侥幸，而是已经习惯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绝对安全。由于李

树槐的工作出色，在延安还被评为保卫工作的模范。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更使李树槐一度成为延安名人。

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到河北后，又发生过敌特投毒，致使数十名警卫人员中毒的事件。此后，高度关注饮食安全也就成了警卫工作人员的重要责任。因此，作为香山一带警卫负责人的王范，要亲自到厨房去监督厨师的烹调。

据一些当时在颐和园内负责警卫工作的便衣队员回忆，那天中午饭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由北平市长叶剑英、聂荣臻陪同进餐，餐桌上气氛轻松愉快。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问：“这鱼很好吃，是什么地方养的？”

叶剑英说：“是昆明湖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过去想吃昆明湖的鱼是不可能的，今天终于吃上了。”



1949年毛泽东同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叶剑英举起酒杯说："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请主席喝杯酒吧。"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咱们大家一起干杯吧！"

于是大家热烈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以上是当年的便衣队队员们对毛泽东一行来到颐和园后的情形做的追忆。然而，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采访叶子龙时，他对当时情形所做的描述，却与之有较大的出入。现将当年采访后所写文章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先到预先安排的颐和园。谁知一到颐和园，园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来是因为怕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社会部的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结果已过午饭时间，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而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里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你们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把水都排干了，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

那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赶快和社会部的人到颐和园外面，四处寻觅，总算找到了个小饭馆，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对付了一顿。"

杨尚昆对那天的回忆是这样的："中午，叶子龙来电话，让我立刻去颐和园益寿堂。我赶到益寿堂时，只见空荡荡的冷屋子里，没有床铺，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铺上被褥，供他们午休。"杨尚昆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发脾气的一幕，但他叙述的颐和园内冷冷清清，毛泽东等领导人凑合着休息的场面，与叶子龙所说十分相近。

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日常十分倚靠的身边工作人员。他又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毛泽东一起前往北平的，因此他的回忆是不容忽略的。而杨尚昆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回忆大都有日记的依凭，也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在笔者向便衣队的几位老人讲述了叶子龙和杨尚昆的回忆后，几位老

人依然认为他们的记忆并无偏差，坚持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在颐和园内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他们还说在那一天，毛泽东确实发过一次火，但不是在颐和园内，而是在出了颐和园之后，毛泽东看到了让他十分不满的情况。关于他们对毛泽东发火的追忆，本书在后面将会说到。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原先布置在各地段的便衣队队员都不见了踪影/“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毛泽东等在颐和园吃过午饭，就地休息时，周恩来仍在不停地忙碌。他先是叫来在香山部署领袖驻地工作的杨尚昆，要他前往西苑机场，对下午的检阅工作做最后的现场检查。随后又找李克农、王范等部署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事宜。

交谈中周恩来问起：“从颐和园到飞机场这段路要走多长时间？”对周恩来的提问，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后来去问司机，司机也说不出确切的时间。

于是，王范和高富有赶紧乘车去作实地勘察。一趟走下来，手表显示这段路要行车一个半小时。但考虑到路窄人多，还有马车、人力车都在这一条路上走，可能会造成堵塞，耽误时间，因此要留出一定的时间余地。这是中共领袖进城第一天，安排的活动无论如何一定要按时进行，不能有任何延误。

回到颐和园，他们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受到周恩来对工作的严谨和精细的感染和提示，高富有随后又上了吉普车，去对颐和园到西苑机场沿线的警卫工作再做最后的巡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他在完成任务前总是忐忑不安，生怕有任何遗漏和疏忽。

在巡查中，高富有发现，沿途只看到四野207师的武装战士在警卫，而原先布置在一些重点地段的便衣队队员却不见了踪影。中央领导路经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自己安排在这里的部下到哪里去了呢？他下了车步行察看，在一个十字路口，见这里有两名武装的战士，刚想向他们询问，不

料那两名战士却先喊了起来："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我有任务，和你们一样！"高富有回答。

"什么任务？"

"我不能告诉你们。"

高富有心想，没有时间和他们纠缠，便转身要离开，可两名战士不但不放他，反要将他带走。

眼前发生的事情让高富有立刻联想到，派在外面的流动便衣队员，是不是也被这些武装警卫给扣留了呢？他一生气，把皮夹克大襟一甩，露出两把左轮手枪，强硬地说："我有证件！耽误了执行任务你们负得了责任？"

原来两名警卫战士看到高富有在马路上溜达，而且哪里重要他往哪里走，就感到他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准备抓起来讯问。见到高富有亮出了枪，两个战士也不示弱，对高富有说道："什么证件不证件，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说着就要对高富有动手。

高富有高喊："你们这是胡闹，耽误了大事负得起责任吗？赶快把你们师长吴烈找来，我有事同他讲。"

高富有这两句话把战士给震住了。他们只得赶快向连长报告，正好207师参谋长古远兴在这一带检查布岗情况，便同连长一起来了。

古远兴是高富有的老战友，在延安时就一起在中央警备团搞警卫工作。他远远就认出了高富有，赶快走过来，对高富有连声说："啊呀，对不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向下布置任务时，只强调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要求严格保密，却忽略了向战士交代要和便衣警卫相互配合，才造成了这场误会。我刚才检查岗哨时，发现了你们的队员被扣留，双方还发生了争执，现已下令全部放人了，我已紧急通知部队，凡持有劳动大学证件的人一律放行。"

高富有本来憋着一肚子气，正要发作，经古远兴这么一说，也没有了脾气，只好说："老古啊！你们搞的什么名堂？刚布置好的工作让你们给搞乱了。你们今天要把我抓了，我倒是能舒坦一天了，出了事情可就全由

你们兜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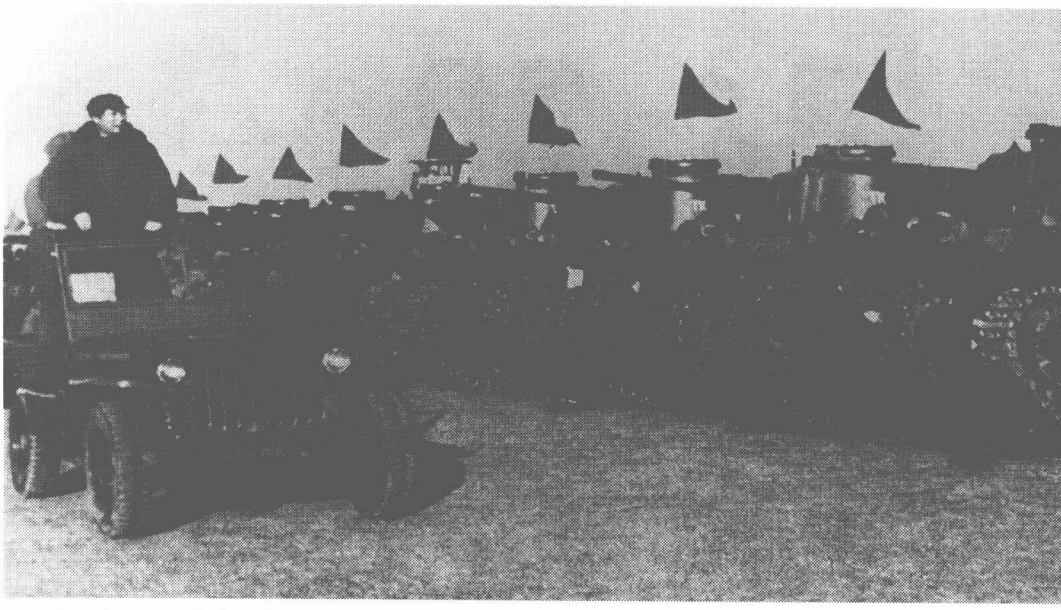
“谁敢把你便衣队长抓起来呢？”古远兴笑着表示了歉意，“实在对不起了！你们的人都恢复了岗位，现在我再陪你检查一次，怎么样？”

高富有笑了，和古远兴握手言和，两人一起投入到沿途警卫的巡查中。

毛泽东等也举起右手向官兵们行军礼/上午在颐和园遇到的不快都烟消云散

按照周恩来的精心测算安排，下午三点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分乘几辆小轿车，由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飞机场，到达机场入口处时，叶剑英、聂荣臻等已在那里迎候。

毛泽东一行下了轿车，换乘上事先准备好的阅兵吉普车，准时进入机场内的阅兵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乘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点整，机场上空升起了四颗照明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着吉普车，在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徐徐开进机场，开始检阅部队。

随着一声响亮的“立正”口令，整齐排列在机场上的受阅部队威严正立，显示出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的气势。站在前排的指挥员齐刷刷地举手向领袖们敬礼。

毛泽东等也举起右手行军礼，向全体受阅部队指战员致意。

车过之处欢呼声如雷。每行驶到一个方队前，毛泽东总要朗声高呼：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队列里立刻爆响震天的回应：

“首长好！”

“为人民服务！”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图为毛泽东同到机场欢迎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影。从右至左：马叙伦、林伯渠、毛泽东、黄炎培、郭沫若、陈其瑗、李济深、董必武、朱德、沈钧儒

“毛主席万岁！”

在受阅部队的队列中，飘扬着40多面英雄团英雄连的旗帜。毛主席经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稍稍停了一下，两眼注视着这面用鲜血染红的战旗，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啊。”

正因有了这支英雄团队的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才赢得了锦州的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当检阅车行至群众代表的队伍前时，队伍顿然沸腾起来，人群鼓掌、欢呼、雀跃，前呼后拥……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

当检阅车来到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面前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都走下车来，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在艰难困苦中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相互支持的老朋友，在此重逢，分外喜悦。

时间转眼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眼见得天色渐暗。周恩来看了看腕上的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这里欢迎毛主席。天快黑了，请诸位先回去休息，以后我们还有许多见面的机会。”

西苑阅兵仪式至此圆满告结，跟随毛泽东的叶子龙回忆说，检阅后的毛泽东等兴致勃勃，上午在颐和园遇到的不快都烟消云散。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分乘多辆轿车，驶往党中央的新驻地——香山。

毛泽东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眉头紧蹙/
终于忍不住了，朝着高富有发起火来/
对毛泽东3月25日下午活动后的去向一
直有两种说法

通往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路况较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颠簸得厉害，车轮碾过，扬起一片尘埃，司机只好把车灯全部打开快速向前驶进。

毛泽东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眉头紧蹙，显得有点不高兴。

周恩来也生气了，一路连声说道："太快了，不要太快了……"

车队进入香山大门后停了下来。周恩来一下车就发起火来，冲着从领头车上下来的王范说："你想干什么，车开得那么快！"

王范正满心喜悦，庆幸一路顺利，没出什么故障。不想一下车，就受到了周恩来迎头痛批。

他壮着胆子解释说："我是想，和后边的车拉开一定距离，这样万一遇到炸弹，我被炸死了，后面的车还不至于发生危险。"

"可你想没想，天已经黑了，后边的车又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边的车使劲追你，万一翻了车怎么办？"周恩来从另一个角度的分析，也颇有道理。

其实，从警卫角度来看，王范的想法其出发点很好，必要时舍身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是保卫战士的素养和天职。但周恩来的考虑则更加细致、周密。

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因与王范不熟悉，没对他说什么，却冲着便衣保卫队队长严厉说道："高富有，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搞的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要厉害，这还了得！共产党怎么那么怕群众呢？"

原来毛泽东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到沿途警备森严，有的警卫武装战士甚至把枪口直接对着路上的行人，心中感到很不舒服。但因要赶往机场阅兵，当时并没有发作。但憋在毛泽东心头的气愤并没有消逝，到香山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朝着高富有发起火来。

周恩来也随之批评道："我们和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你们却断了交通，警戒枪口朝着群众，警卫方式过于机械、生硬，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进城呢？"

尽管高富有默默听着批评，但心里感到有些委屈，因为沿途武装警戒是由四野207师担负的，断绝交通也是市公安局布置的，并没有他的责任。但他没作丝毫辩解，因长期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他内心很清楚，不能辩解，就只好代人受过了。

汽车继续开动后不久，就遇上一个70度左右的大爬坡。司机狠踩一脚

油门，弄得汽车发动机轰轰作响，可车轮只在原地打滑，就是上不去坡。

毛泽东说："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他一面说着就和周恩来他们再次下了车，踏着夜色，顺着高坡慢慢走到了香山慈幼院的后门。

那里停着一辆吉普车，是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平乘坐的吉普车，司机周西林已守候在驾驶座上。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为什么还要上车？"

周恩来说："这路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果然，越野吉普又开了一阵子，才到了一个开阔的大院子前。这回真的到了目的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是北洋政府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于1917年在香山修建的私人别墅。取名双清，是因为这里有两股清清的泉水，清代乾隆皇帝在泉边的石崖上题过"双清"的字样。后来，熊希龄又用这处房产创办过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

在相当一部分回忆作品中，对毛泽东3月25日下午活动之后的去向，作了与便衣队队员的回忆完全不同的描述，说毛泽东在活动后又回到颐和园，在那里度过了到北平的第一夜，第二天才住进香山。持这一说法的，甚至包括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在《汪东兴：在西柏坡的日子》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们乘专列于25日清晨到达清华园，随后到益寿堂休息，下午在西苑机场检阅了部队，当晚就住在颐和园佛香阁。

我们的车队是晚上到的香山。我们一到了主席住地双清别墅，叶子龙和卫士正在部署。我和李树槐、毛崇横、高富有、阎长林一起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布置了岗哨……

3月26日，周西林同志开来一辆吉普车，我和主席的卫士李银桥、马武义一起坐上车去接主席到香山，阎长林、孙勇等同志也一起上了香山。"

有人说，在某党史部门保存的民主人士柳亚子的日记中，也有毛泽东

到北平当晚在颐和园小住的记载。

但持毛泽东在西苑机场阅兵仪式后直接去了香山说法的人，似乎更多也可互为印证。当时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说，那一晚“毛主席没有住颐和园，直接奔香山了”。从延安时期就不离毛泽东左右的叶子龙也说，由于中午在颐和园感觉准备不充分，所以当晚上了香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在其回忆中说：他就是为了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而专程去对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因此连毛泽东检阅部队和与民主党派知名人士见面这样重要而有意义的活动都未能参加。

原便衣队队员高彤更是言之凿凿：“我那天的任务就是在颐和园门口附近担任警卫任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毛泽东等下午离开颐和园前往西苑机场后，当晚没有返回。否则，车队回来进颐和园，守卫在那里的我应该看到的。”

担任便衣队队长的高富有，在他的回忆录《共和国元勋轶事》一书中，还对毛泽东等在西苑机场阅兵后去香山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其中就包括毛泽东一进香山就对他发火的那段文字。

从3月25日那天起，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住了下来。这一栋房屋，除了毛泽东住宿办公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等。

毛泽东对他的清幽、安静的香山住地由衷地喜爱。他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问题，还在这里会见了不少民主人士，一直住到了1949年8月搬进中南海。在此前一段时间，他虽然白天常进城里到中南海办公，但晚上大多数情况都是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休息。

25日的任务完成后，高富有回到便衣队队部已经很晚了。李广仁、孔祥惠等十几名老队员以及两名女同志刘秀英和高桐等，还在队部兴奋地议论着。所有的人都是凌晨即起，忙了一天，有的人午饭都没有顾上吃，但谁也没有感到疲劳。

谈到一天来执行任务的感受，大家都说：“以前我们钻山沟，天天盼望胜利，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胜利是什么滋味。”

高富有虽然刚才代人受过挨了批评，但心里还很高兴，心想第一次在大城市执行这样的重要任务，平平安安，没有出什么问题，批评就批评

呗，反正这些事以后我们也都得注意。

看大家议论得起劲，高富有便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原原本本向大家讲了，并说："今天大家都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然而敌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放弃对我们的破坏。过去我们长期在农村，习惯了农村的一套工作方法，现在到了城市，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认识，需重新学习，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今天发生的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李广仁和孔祥惠都说："高队长这事应该向领导反映一下，207师也是搞得太紧张了，开始他们把我们人也给扣了，有证件也不让通过。不光我们应当接受教训，以后在香山地区执行任务，总发生这样的事情怎能行？"

"用不着我来反映，"高富有笑着说，"李克农部长一定会管的。207师的老底子也是中央警备团的，不过他们到大城市执行这样的任务，和我们一样，也是第一次，怕发生问题，搞得严了点，也情有可原。"

谈论之间，焦万有也来到了队部。他带领一区队一直守卫在香山中共领袖们的住所，不敢离开一步，直到领袖们进住后才撤离。焦万有一进门便说："老高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生问题，这颗脑袋就算保住了。我们这是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蒋介石的较量，我们胜利了，不知道蒋介石这时候想什么，在干什么？"

"正在他的老家掉眼泪呢！"有人接茬说道。

焦万有一本正经地说："蒋介石曾发誓'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现在他反要被共产党消灭了，他能够甘心吗？进城以后如何把保卫工作搞好，是对我们新的考验。"

高富有笑着说："指导员给大家做工作了，他是要大家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好！我们听指导员的话。"

说到这儿，高富有让刘秀英把他存的一瓶洋酒拿来："这是一个朋友从前方带回送给我的，是缴获的蒋介石的战利品，我不会喝酒，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现在我们就拿它来庆祝胜利吧，明天还要投入新的战斗。"

现场也没有酒杯，更没有菜吃，高富有把酒倒在大碗里，大家轮着喝了起来。喝完了，大家都说不好喝，"没有咱解放区的老白干喝着痛快。"

三　为党中央秘密守卫香山沿线

对以职业为掩护的便衣队队员有很高要求/邬吉成到听鹂馆改名换姓“赵永谦”/“小老弟”被安排在颐和园北宫门口摆小摊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不久，为了工作方便和隐蔽真实身份，许多干部和队员都有了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如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就兼任了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副指导员沈平进北平后不久即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副经理。

在香山到西直门这条中央首长们经常出入的沿线，有不少便衣队员在各监控点上当起了小商贩、商店学徒、修鞋匠、三轮车夫等。在颐和园后山开设的照相馆、茶馆里，一些跑堂和照相师傅，也是由便衣队队员装扮的。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餐厅里，也有由便衣队队员担当的经理和伙计。

颐和园内的听鹂馆，是当时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刚进北平后频繁举行活动的场所。馆内的环境优雅，厅堂、厢房、御膳房精致讲究，小戏台雕梁画栋，玲珑秀巧。自民国以来，这里经常是达官显宦社会名流设局宴筵的场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香山后，附近只有这么一处比较讲究的宴客场所，而且从香山前往颐和园也比较方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还有中央军委、北平市委等领导，都经常在听鹂馆宴请客人，举办活动。例如后来西藏地方和谈代表团到北京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在听鹂馆宴请过他们。听鹂馆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有时活动从上午一直排到了晚上10点。

听鹂馆的经理，是进北平后参与接收的原中央城市工作部的王子甲，

听鹂馆的食品、饮料的进货和质量，都由他严格把关。便衣队员邬吉成也一度被派到这里扮演了餐馆副经理的角色，协助经理工作。

由于这个餐馆的重要，还有一位城工部的大老李也被安排在这里工作。大老李的公开身份是餐馆的普通杂役，整天就干刷盘子、洗碗的活儿，其实他担负着厨房烹饪制作菜肴点心的安全监督的重任。

在听鹂馆掌勺的高级厨师、财务会计和一些伙计，都是原留用人员。有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甚至还有个别敌特嫌疑对象。因此，秘密保卫人员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邬吉成被派到这里时，改名换姓叫“赵永谦”。后来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工作，在隔了较长时间后他又到颐和园公干，认识他的人见面就“老赵”、“老赵”地叫起来，可他却早已忘了自己曾在这里使用过“赵永谦”的名字，以为人家认错了人。

那时，中央领导人到此处宴客，一般都把车子开到颐和园东宫门外，然后从东宫门步行到听鹂馆。只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有少数领导人乘车从北宫门进颐和园，把车子停在石舫边空场上。

一般领导人到此设宴活动时，要事先通知便衣队。如有特别重要的活动，便衣队要提前开专门会议布置保卫安全工作。每逢这时，颐和园园内园外，摆摊儿走卖的人便显得多一些。此时邬吉成就承担起内卫工作，在听鹂馆院里各厅和走廊间，频繁地转悠。如有情况，随时和便衣队队长联系，及时处理解决。

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颐和园活动的安全，颐和园公园的派出所也是由便衣保卫队管理的，以便于协同作战。

便衣保卫队对这些以职业掩护，派出去做秘密保卫工作的队员提出的要求是：一要职业化，干什么像什么，不许轻易暴露身份；二是要能吃苦，忍受委屈，在单独作战，没有组织监督的情况下，遵守纪律，不受花花世界的引诱。

在被派出去单独执行任务的便衣队队员中，除了安排在颐和园内某照相馆当学徒的一名年轻队员，因为对伺候老板和老板娘感到委屈，认为革命胜利了，自己却落了个给资本家提夜壶、打洗脚水的角色，想不通不告而别回了老家以外，其他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并在自己的岗位上立下了不

可磨灭的功绩。

高福禄是便衣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刚进入便衣队时只有17岁。他自幼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当过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还为抗日部队引路、护送过伤员。他1947年在华北军大学习，后调入便衣保卫队。因他和队长高富有都是山西人，名字中的“富”和“福”又谐音，所以其他队员都开玩笑说他俩是一家的，高富有也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弟”。

便衣队刚进北平时，高福禄被安排在颐和园门口一带做流动暗哨。但没过多久，高富有便找这位“小老弟”谈了一次话，说要派他在颐和园北宫门口当小商贩，将流动哨变为固定哨。“那里的位置很重要，可以监控从西苑通往香山这条路发生的情况。”

高福禄一听，急的连声说：“不行，不行！我是个土包子，城里的事什么都不懂，做买卖的事可干不了。”

高富有也认真起来，“‘小老弟’，进城前你不是向组织写过决心书，说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怎么让你去摆个小摊，就胆怯了呢！干革命可不兴讲价钱。”

见小高急得快要哭了，高富有耐心开导说：“我参加革命时比你还小，开始也胆怯，可一干上了就不怕了。不会没关系，革命就是在干中学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好的。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我。”

看来是推不掉了，小高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当小贩的任务。

高队长给了小高一百元钱，告诉他这是做生意的本钱，又给了他一件棉袍，一身便衣裤和一顶礼帽，让他穿起来。随后，高富有带着他认识了中介人“梁先生”，这位梁先生实际上是曾经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的老地下工作者。

小高跟着梁先生来到西苑的同庆街10号大院。这大院的住户，大都在颐和园一带开店摆摊，梁先生是这个院几家住户的房东。住户们听说梁先生来了，都出来看他。梁先生便趁机把小高介绍给大家，他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托我在这里帮他在宫门前摆个摊儿，谋口饭吃。他年纪还小，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住在这个院里的刘大妈，丈夫早年曾和梁先生在一个商号当伙计，后因病死亡，留下她和一个女儿。刘大妈在颐和园北宫门前摆了一个摊，以卖香烟、食品、饮料为生。

刘大妈笃信佛教，心地善良，听梁先生介绍后，就关切地问小高："你小小年纪，你哥怎么把你一个人打发到这里来了？"小高按预先编好的说辞回答说："大妈不瞒您说，我老家在山西，自幼丧母，是父亲把我拉扯大的，一年多前，父亲又病故了。我只好到北平来投奔哥哥，原想让他也给我找个地方学徒，可眼下局势不稳，不少店的生意都不好做，事情也就不好找了。时间一长，嫂嫂就不能容我了，每天指桑骂槐，嫌我在家吃闲饭，哥哥不愿让我受那份气，就凑了点钱，托梁先生给谋个生路。我从乡下来，什么也



便衣队队员高福禄（后左）在颐和园门前化装当小贩时和前来探望的家人合影



便衣队队员在颐和园东宫门合影

不懂，在北平除哥哥外，举目无亲，还要靠大妈照顾。”

小高这一番诉说，博得了刘大妈的同情，她说：“我看你也是苦孩子，如不嫌弃的话，就跟大妈一起干得了，反正我有一碗饭吃，就不会让你饿着。”

就这样，小高顺利地跟刘大妈当上了小贩。每天早晨在颐和园北宫门前出摊。他还把50元钱交给了刘大妈，要她拿去添货。

小高手脚勤快，颇得刘大妈喜爱，没干多久，小高就把在颐和园北宫门前摆摊的商贩情况摸熟了，还能对同院住户中的可疑对象实施监控。

在同庆街10号院内，住有一对夫妇，男的60多岁，称病赋闲在

家，女的30多岁，在颐和园北宫门口摆茶摊养家。后通过公安机关调查，男的是东北的一个大地主，参加过还乡团，还曾带国民党军杀害过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和翻身农民。东北临近解放时，他带着其二姨太太潜来北平。后来，根据当地政府要求，他被遣返回原籍处理。

还有些小商贩，原先当过国民党宪兵或曾是一方恶霸，解放后变身在颐和园宫门前做起了小买卖。小高将了解到的各种细情，及时向高富有作了汇报。颐和园公安分驻所随后就根据小高提供的情况，对这些人进行了清理或监控。

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干部董峻岭突然失踪/高福禄听说圆明园三仙洞发现一具尸体/董峻岭和李克勤是要好同学，但却选择了不同人生

就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住进香山双清别墅后的第五天，守卫在香山、西苑一带的中央警备团突然接到通报：说北平十八区(现海淀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干部董峻岭在西苑失踪了。与董峻岭一起失踪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德国造“枪”牌手枪。这个情况同时也被报到了北平市公安局、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立即引起了各方面高度重视。

4月7日，中央社会部组织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警卫工作会议，研究布防和各部门的责任等。会议是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主持的，地点在颐和园。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第207师等单位的领导，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西郊治安会议”。

在这个会上，与会者们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如警卫任务的分工、香山地区的防空、武装警卫、颐和园是否开放等四个问题，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组成了“西郊治安委员会”，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为主任，207师师长吴烈为副主任。

两天后，“西郊治安委员会”即在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汪东兴、吴烈、207师政委邹衍、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中央社会部的王范、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科长李树槐、北平市公安局西郊六分局局长张峰等。

与会者们共同对武装警戒区域划分及兵力部署，地方治安情况的掌握，防空和联络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

会议做出了如下具体分工：一、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卫士选派仍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负责；二、香山公园的控制和内部警卫由中央警备团负责；三、由第207师派出两个团六个营的兵力，负责从香山经青龙桥、海淀、西直门到城内和中南海的路线警卫，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行车途中安全；四、华北军区高炮二团一营三个连的12门高炮和12挺高射机枪，保卫香山上空，以防敌机袭扰；五、北平市公安局负责香山周围的控制和香山至颐和园、西直门的便衣警卫。

失踪多天仍没有音讯的董峻岭，也成为西郊治安会议上的一个议题。与会者们分析了董峻岭失踪的原因和可能发生的情况，感到他恐怕是凶多吉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住在香山，而就在这一带工作的董峻岭若真是遭遇了不测，手枪落到敌人手里，将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据查：董峻岭是西苑当地的人，22岁，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到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工作。

就在董峻岭失踪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以小商贩作掩护的高福禄，在到同庆街东头小桥边的水井打水时，听到有人在嘀嘀咕咕地议论，说有几个小学生到圆明园三仙洞里玩，在里边发现了一具死尸……

得知这一讯息，小高立即跑到现场去察看。他到三仙洞时见死者已被移出洞外，身上穿的是解放区干部服。他当时并没有得知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干部董峻岭失踪的信息，但从死者着装推测，他认为很可能是被敌特分子或坏人杀害的我方干部，遂立即返回向便衣队派在颐和园分驻所的魏副所长报告，并请他赶紧转告高富有。

消息立刻就被通报给了有关部门，公安局西郊六分局局长张峰闻讯后，马上就带领分局干警，会同住在西苑的几名中央社会部干部、便衣队队员赶往圆明园。

双鹤斋三仙洞里寒气逼人。张峰掀起尸体头上的大石板，翻过尸体查看，认定死者就是已失踪了多日的董峻岭！只见他的头脑后部留有一个弹孔，弹壳落在其脚边，手枪及子弹不翼而飞！

经过尸体解剖判断，董峻岭应死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他失踪的当天。技术鉴定结论证明：杀死董峻岭的那颗子弹，是从董峻岭的手枪里发出的。案情研究会上，大家做了分析，董峻岭后脑中枪，并且身上其他部位无捆绑，凶手应是董峻岭的熟人。

经过几番充分讨论，张峰等确定了侦查范围和具体步骤：第一，广泛访问当地群众，了解董峻岭在西苑、海淀一带有哪些朋友；第二，案发前什么人到过双鹤斋三仙洞；第三，询问附近有无群众听到三仙洞方向传出的枪声；第四，三仙洞附近的农田归谁家所有。

沿着这些线索深入追查，家住海淀三角地一带的李克勤逐渐浮出水面。经过调查得知：董峻岭与李克勤一起长大，李家是小地主，双鹤斋三仙洞附近的农田大部分是他家的，他对那里的地形很熟悉，有杀人藏尸的条件，并且他会使用枪支。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张峰等人摸清了李克勤曾经是国民党208师谍报组特工人员的底细。董峻岭和李克勤是同学，关系非同一般，还结为拜把兄弟。但是后来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董峻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李克勤则成为国民党特工人员。

发现董峻岭尸体的当天，李克勤并未随着人们去现场观看，而是径直跑到董峻岭的家中，对董峻岭的母亲说："我弟弟找到了，在双鹤斋三仙洞里，被人打死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为了防止李克勤逃走，张峰决定立即拘捕李克勤。鉴于案情重大，张峰亲自参与了审讯工作。受过特工训练的李克勤非常镇静，他承认与董峻岭拜把兄弟的关系，也承认董峻岭失踪的前一天，两人曾一起吃饭聊天。但是他说董峻岭失踪的那天，自己离开当地进城了，并提出了一个证明人。那位证明人也说，李克勤那天上午确实与他一起进了城，但进城之后他俩就分手了。

根据审讯的情况，张峰等经过充分推理和思考，感觉难以通过正常的

审讯让李克勤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遂决定采用监所侦查的手段，获取李克勤作案的证据。于是，李克勤被关进了拘留所。

在拘留所的监号里，李克勤发现和他关在同一个号子里的人他认识，是个名叫唐三儿的惯偷。李克勤跟唐三儿东拉西扯了一阵，得知唐三是因为偷东西被抓进来的，但属于小偷小摸，所以顶多关一两天就可能被释放。

就在唐三儿要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李克勤悄悄地对唐三儿说："三儿，你明天就出去了，能不能给我妈捎个信，我妈还不知道我给关在这儿了呢。"唐三儿一口答应了下来。李克勤便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在唐三儿离开监号前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

李克勤做梦也没想到，唐三儿揣着他的纸条前脚出了号子，后手就将纸条交给了公安人员。原来，他们在监号里的巧遇都是张峰一手导演出来的。张峰了解到李克勤和惯偷唐三儿熟悉，便把他和李克勤关在了一起，还故意在监号里留下写交代用的笔和纸。在唐三儿进监号前，张峰向他交代说，如果李克勤托他带什么东西出去，就答应下来，并交给公安人员。张峰要他对此严守秘密，拿到李克勤交予的东西后，就放他回家。

李克勤这么容易就上了钩，这让公安人员喜出望外。张峰打开李克勤写的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妈，九条的东西一定放好。"张峰顿时兴奋起来，破案有线索了。

张峰顺着"九条"这个线索寻查，得知西城区宫门口九条内有一户与李克勤家相熟的人家。他随后带民警来到这户人家，要他们把受李克勤之托藏匿在这儿的东西交出来。

那户人家的一位年轻姑娘见到这样的阵势十分害怕，交出了李克勤放在她家的两个箱子，并指着院子里的一个大花盆说："那个花盆下面还有李克勤拿来的东西。"

几个民警立即移动了花盆，用铁锹在地下挖出了一支手枪。经验证，这支枪正是董峻岭佩带的。铁证拿到手了，张峰的心也踏实了。他们把在宫门口九条起获的物证带到拘留所，并马上提审李克勤。

李克勤一进审讯室，先是看见了他的两个箱子，脸色立刻灰了，但

他还是沉默不语。张峰他们就这样同李克勤对峙，眼见得李克勤越来越紧张，汗流浃背，浑身哆嗦，一个小时后他终于如实供出了作案经过。

北平解放前夕，大批特务有计划地外逃了，李克勤因为是本地人，过去也没有血债，没有暴露，便于隐藏，国民党208师谍报组遂命令他潜伏下来。交给他的任务是制造谣言、破坏社会治安、搜集重要情报、暗杀革命干部，在“国军”反攻时予以策应。

董峻岭因曾经和李克勤是同学、好友，北平解放后，他来到西郊工作，在见到李克勤后几次动员李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立功赎罪。但心理阴暗的李克勤，一来对踌躇满志的董峻岭心生嫉妒；二来怕董峻岭告发他，破坏其潜伏阴谋，于是暗下狠心，杀死董峻岭灭口。

3月里的一天，李克勤把董峻岭邀到自己家中。俩人吃过饭后，李克勤提议一起去圆明园遗址转转，就把董峻岭骗到了双鹤斋三仙洞一带。当两人在双鹤斋三仙洞口休息时，李克勤提出看看董峻岭的手枪。拿到枪后李克勤把玩了一会儿说：“这洞里有狐狸，我以前见过，咱们进去看看，说不定能碰上狐狸，就用这支枪打。”说着就起身进了三仙洞，董峻岭只好也跟着进去了。

进洞后走了一段，董峻岭说：“哪有狐狸呀？咱们回去吧！”说着想拿回自己的手枪。李克勤闪开董峻岭的手说：“你在前面走，一会儿准看见。”说完退到董峻岭身后，董峻岭毫无察觉地在前面走，李克勤在背后向董峻岭开了一枪。

董峻岭被谋杀后，李克勤想方设法消除罪证。他用一块大石板从董峻岭的头部盖住尸体，使得一般人从洞口外边很难发现洞内的尸体；拿走了董峻岭佩带的手枪，回家用剪刀一点一点剪碎了皮枪套扔掉，又将手枪藏匿到城内宫门口九条熟人家。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就在董峻岭的尸体发现后的第三天，他就被抓捕，犯罪的铁证也随即被找到。

董峻岭一案的迅速成功破获，铲除了一个安全隐患。李克勤被军管会判处死刑并执行公开枪决，对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警卫回到房间时，发现毛泽东不见了/
调了一个骑兵连，撒出去寻找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把我锁在柜子里

毛泽东在香山期间，有时也去附近的玉泉山小住。1949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天还算凉快。依往日夜间工作，上午睡眠的习惯，毛泽东又于黄昏前去散步。

也许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着什么事情，也许是由于他一向不习惯外出时向什么人交代，没跟任何人打声招呼，便独自一人往西去了。他喜欢自己独自走走，在延安、在西柏坡他也随便惯了。

带班的警卫这时恰巧不在，等回来时，看到毛泽东的房间空无一人，他清楚毛泽东身边没有警卫跟随着，顿时着急起来。他跑去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香山住所读报

问门岗警卫，警卫说只看到毛泽东往西方向去了。究竟去哪不太清楚。

带班报告了警卫科长李树槐，李树槐也着急起来。他随即把海淀分局的公安人员叫来，同时又调了一个骑兵连人马，撒出去大海捞针似的去找毛泽东。在这一带守护的便衣队队员们也参与到找寻的队伍中。

在保卫人员看来，毛泽东单枪匹马出行，危险系数太大了。不马上把人找到，这个责任谁也担待不起。但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一路往西进了路南的果园，搜找的人们盲目寻觅了很长时间，也没见毛泽东的踪影。

毛泽东轻松、惬意地从果园里溜达出来，被一脸焦急的李树槐和跟随搜找的战士撞见，他才感到自己的出行给警卫们制造了大麻烦，遂带着几分歉意地对李树槐说："哎呀，很对不起，我犯了错误，没有请假。"

李树槐从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给中共领袖们当警卫员，长期负责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工作，从未出过纰漏，被评为模范警卫，他的事迹还上了中央的报纸，因此他同中共各位领袖都很熟悉。他看见毛泽东安然无恙，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了地，紧绷着的脸也舒展开了，悄声嘀咕道："哎，真没办法。"

1949年7月下旬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常常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返回香山休息。

有一天，在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大约一小时后，周恩来有事请示，打电话给香山，而得到的回答是："毛主席还没有到。"

"是中途车出毛病了吗？"周恩来又打电话找负责路线警卫的吴烈。

吴烈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坐车去寻找，追到动物园，岗哨说专车已经过去了。追到海淀，这里的岗哨也说专车过去了。随后与颐和园的岗哨联系，那里的人都说没见到毛泽东的专车。

吴烈又追，终于在北京大学到西苑的弯路上看到了专车。

车没出毛病，是毛泽东看到庄稼黄了，就到路边的田里去了。吴烈赶到时，见毛泽东和一位手拿镰刀的老农聊得正热乎。

毛泽东问："几时开镰啊？"

老农说："这就可以割了，想让庄稼再晒透点。"

毛泽东问："能打多少？"



毛泽东在北京近郊访问农民

老农说："几百斤吧。"

"家里几口人？"

"六口子。"

"够吃吗？日子宽不宽？"

"够吃，除了这一片庄稼外，我在那边还有一片小麦，已经收了，还有果树。"

面前的老农年老眼花，没有认清跟他聊了大半天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身后的警卫员看着老农挥着明晃晃的镰刀，吓得脸都有些白了，但见毛泽东谈兴正浓，又不好干预。恰在此刻吴烈赶到了。

吴烈见此景，灵机一动，对毛泽东说："家里有事情。"毛泽东这才兴犹未尽地与老农告别，随吴烈等返回香山。

建国前夕，毛泽东还保持着早年的习惯，说走就走，或只带上一两个贴身警卫。因此常常是到了某个地方后，贴身警卫才立即找电话通知有关方面："'1号'出来了，布置警卫。"

刚进城，电话网还不普及，有时就得在毛泽东所到之处的附近借电话打。好在有代号掩护，不至于泄密。那时，毛泽东的代号是“1号”，其他中央领导人依次排下去。只要说几号出来了，警卫部门马上明白，立即布置沿线警卫。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去堂子胡同看望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他轻车简从，仅带了贴身警卫。等到了徐老那里，贴身警卫赶忙打电话通知相关警卫部门。线路警卫赶紧出动，按规定站好位置，各把一方，执行路线警卫任务。

这样的临时行动不止一次两次，有时还是在半夜时分。因为毛泽东常在夜里十一二点出门，带班人员即使睡了，也要紧急跟随出动。因为都认识毛泽东的车，一接到交通警通知，马上跟踪过去执行警卫。

进入北平后的这种情形，使毛泽东感觉到他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在一次散步中，他对警卫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锁在柜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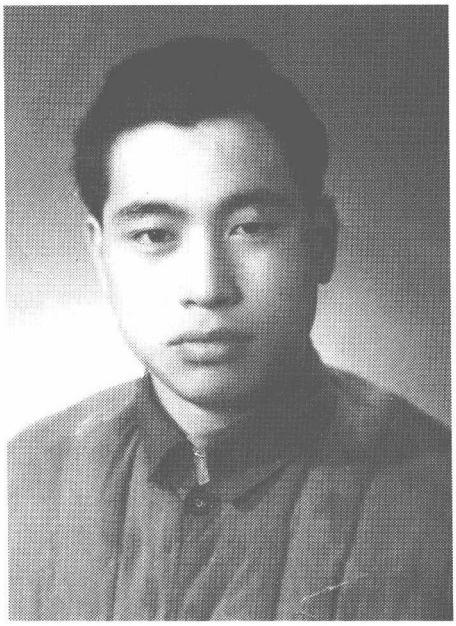
便衣队队部迁进颐和园，只安了一部电话/“要有辆自行车就好了。” 刘忠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办公室突然给便衣队打来了电话

便衣保卫队进驻北平后，队部先是设在青龙桥，很快又迁到了颐和园内，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兼任颐和园管理处主任。这一方面是为了身份掩护，再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协调颐和园内的各种关系，以利于保卫工作。

便衣队当时有150多人，除少数人留在队部作机动力量外，大多数都分布在香山至西直门沿线以及新北京地区。其中西直门、海淀、青龙桥三个检查站的人员较多，其它各点，包括派到各个公安分驻所、派出所、沿线设立的摊商等处，都只有一两个人，不少人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

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有限。全队只有在颐和园的队部里安了一部电话，而且由于战争原因，郊区的所有旅游景点早就关闭了，根本没有公

交汽车。因此，在西直门外沿线及整个西郊地区分散布点的百多号便衣队员日常的工作联系，队部向下布置工作，下面同志有情况向队部汇报，只能靠大家的两条腿走路。队员们辛苦且不说，特别是遇到中央领导临时外出，需要紧急布置沿线的便衣保卫，任务的布置和人员迅速到位就显得非常紧张。


建国前夕年轻的便衣队员孔祥惠

当时驻扎在青龙桥检查站的便衣队队员孔祥惠，常常担任传达“急令”的传令兵，尽管他办事稳妥，吃苦耐劳，但双腿再快，也赶不上车呀！因此，每当他看到街上有人骑自行车而行的时候，就常常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骑上自行车去传递上级指示和执行任务，那该有多好。

谁知不久，他就“心想事成”了。

那是1949年4月的中旬，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前夕。

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卫士长的陪伴下在院内散步。散了一会儿，毛泽东忽然起意走出双清别墅，信步朝香山大门外走去。

按当时警卫工作规定，毛泽东到香山院外的区域活动，要事先通知有关部门，包括便衣保卫队，以便布置安全保卫措施。可是此时已经来不及通知了，卫士长知道，这时要想劝阻毛泽东不出院子，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紧紧跟随他一起走出去。

好在便衣保卫队在香山大院外围的布岗站点都处于常备不懈状态，遇到紧急情况，都能迅速加入警戒。那天在香山门口值班的便衣队员是刘忠，他也是老八路，在参加便衣队前曾在部队上当过指

导员，处理问题机敏果断。

他一见毛泽东已步出了香山大院外，又没备车，断定毛泽东是出来散步的。为了免于毛泽东被外人认出，发生意外，刘忠便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毛泽东一起散步，并密切注意着周围情况。

此时天色已晚，附近居民也大都回家吃饭去了，加之香山自中央机关进驻前就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游客来，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没有人看到毛泽东和陪同他散步的卫兵。

走出香山大门不远，毛泽东就发现了尾随其后的刘忠，看到他不即不离地总跟在身后，便明白他是在做什么了。

快走到山下煤厂街时，毛泽东突然停住了脚步，刘忠也来不及收住腿了，他们便自然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毛泽东明知故问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总跟着我呀？"

刘忠也没隐瞒自己的身份，笑着说："主席，我不是跟着您，我是在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啊。"

"呃，还蛮有理由的嘛！"毛泽东边说边笑了。

未等刘忠再说什么，身边的卫士长便向毛泽东介绍说："他是高富有那个便衣队的人。"

"噢，高富有那里的呀！"毛泽东说，"不过你要告诉他，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也得给我一点接近群众的机会嘛！"

刘忠正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呢，毛泽东又开始向他询问道："你们进城后生活苦不苦。有没有肉吃？工作有什么困难？"

"我们平常吃的是小米饭，进城后还没有吃过肉。不过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员住得太分散，又没有交通工具，传达任务都要步行跑路，苦一点倒不怕，就是怕耽误事情，要有辆自行车就好了。"刘忠如实说。

"自行车，这要求不高嘛。你们为什么不找汪东兴要呢？"

"我们队长说国家还有困难，便衣队不能搞特殊。"

"工作需要就不算特殊。这事就找汪东兴去解决，回去告诉你们队长。"

他们边走边说走到了买卖街，这里人也不多。所谓的买卖街其实没有

什么大的商店，并不热闹，只是白天有些摆摊的商贩，卖一些衣服或日用杂品、食品之类的东西，傍晚时分都已收摊了。

有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大爷，刚收好自己的摊子，正推着装货的排子车往香山方向走。因为是上坡路，推起来显得很吃力，毛泽东走过去要帮他推车，刘忠等抢先一步，一边一个帮他往上推。老大爷见有人帮忙，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老先生，生意还好吗？”毛泽东问道。

“挣不了多少钱，能混上有棒子面吃，这就算不错了。”老大爷只顾照看车上货物，并没有抬头：“以前出来摆摊，那些警察和国民党兵，买东西不给钱不说，弄不好还得挨顿揍，我就被他们揣过好几脚。解放军来了对人都很和气，那些旧警察也突换了个人似的，变得规矩了，老百姓扬眉吐气，真是改天换地了。”

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政府欺压老百姓，不得人心，所以他们失败了。老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大爷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了，儿子在海淀一家粮店当伙计，挣不上钱，家里穷，快30岁了还说不上个媳妇。”

“以后会好的，你儿子也一定能找到好媳妇。”

“那就要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了。”

“光靠他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行，要靠全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把国家建设好，使老百姓都富裕起来。”

“老百姓都是听话的，国家总得有个好的领导人才行。像蒋介石那样残害老百姓就不行。”

这位老大爷并不知道，眼前和他说话的就是毛泽东。上了一段比较陡的坡，就是老大爷的家了，他再三道谢，便相互作别了。

当晚，刘忠便把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和他谈话的情况向队长高富有作了汇报，他高兴地说：“毛主席答应给我们解决自行车了，让我们去找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的警卫处长汪东兴办理此事。”

高富有听了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毛主席那么忙，不见得马上有时间去向汪东兴交代，还是过几天等见到汪东兴时，顺便问问这件事为好。



便衣队员孔祥惠骑自行车在香山北辛村执行任务

然而，还没有等高富有见到汪东兴，便接到了汪东兴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告诉他说毛主席已交代，给你们队添两辆自行车，还有二百斤的食用油、面粉和猪肉，让他马上派人过去领。

便衣队队员孔祥惠清楚地记得，食用油、面粉、猪肉，还有自行车，都是他带人去领来的。猪肉领来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吃才好，就把一整块儿的肉下锅用油炸了，结果吃到嘴里硬邦邦的，这事每想来就让人禁不住笑起来。

便衣队受到了领袖的亲自关怀，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也得到便利，有人作了一首打油诗表达了大家当时对领袖的感激之情：主席关怀润心田，工作虽苦亦感甜。待得红旗遍中华，革命战士笑开颜。

自行车领来后，使用最频繁的是孔祥惠。每当他骑着自行车去传达任务时，一路上，他常会情不自禁地哼起那首打油诗。

毛泽东称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跟踪抓捕神秘养蜂人毛晋臣/韩福太等清理国民党文件查到中统特务在青龙桥活动的线索/邬吉成不小心把30多页的社情材料弄丢了

北平解放之前，不仅是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活动的中心。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和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以及美、英、日帝国主义间谍等八大系统的很多特务云集在这里，共有约110多个单位，一万多名特务。还有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六千余人。加上北平解放前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逃到这里的敌特人员，总共达到近两万人。

当时北平的总人口仅有160万左右，平均80个人中就有一个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和特务。尽管解放军围城时，这些人都感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就有时间比较从容地作“应变准备”，以“整退零进”、“多层次多战线潜伏”等策略，潜伏下来，伺机进行破坏，其中有的是专门搞暗害刺杀活动的。

除此之外，北平郊区还集中了一些流氓恶霸、土匪盗贼、逃亡的地主还乡团人员，以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等。他们会合在一起，在乡里横行，造谣煽动，时不时制造事端，也成为威胁党中央安全的因素。

为了消除这些威胁，李克农在平津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就作了准备，调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和中央社会部干部尚山雨等，组成工作组，先期到北平西郊开展社会调查，进行摸底。经过摸排，他们先后向李克农上交了《北平西郊概况》、《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海淀区工作报告》、《青龙桥情况调查》等工作报告。为后来开展肃特反霸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便衣保卫队到达北平后，在李克农和社会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参与了一系列肃特反霸斗争。李克农虽然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但他在看不到

硝烟的隐蔽战线上，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所建立的功勋，起到了党和军队领导机关守护神的特殊作用，因此毛泽东夸奖他“是立了大功的”。

在党中央机关进城前后，便衣队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先后破获了九个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织，同时还开展了政策攻心战，要求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向政府进行登记自首。3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秘密向我公安机关自首，并影响了一大批敌特骨干相继登记自首。就这样，北平敌特组织土崩瓦解，其“应变潜伏”和破坏计划也遭到了致命打击。

便衣保卫队在这场肃特反霸斗争中，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入到附近乡村去做社会调查。了解了周围一带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一贯道”、“九宫道”、“天仙道”等反动会道门成员的情况。

在香山检查站工作的孔祥惠、刘忠、张贻文等几名便衣队队员，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当中，听到当地居民说，有一个叫毛晋臣的人。他在解放前夕来到这里，自称来自河北清远县，是养蜜蜂的，可是并没见他养过蜂，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找他，但这些天突然不知去向，很可能是到这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然而孔祥惠翻遍了香山地区的户籍档案，也没有发现有毛晋臣这个人。之后，他又在已经登记自首的国民党、三青团、敌特人员中认真做工作，逐个询问是否有毛晋臣这个人。

有一个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告诉孔祥惠说这个人他认识，并说那人有特务身份，以养蜂为掩护，在便衣队来到之前，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说是到别的地方养蜂去了。

便衣队的队员们经一起分析，认为他可能是到门头沟一带躲避起来了，因为在这以前，他曾几次去过门头沟。

于是，孔祥惠跟踪追击，化装成挑担的货郎，到门头沟一带卖货。几天后，他果然在一个小村庄看到了毛晋臣，便回来作了报告。孔祥惠和刘忠、张贻文商量后，带了两名民警，由那位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引路，步行两三天到门头沟，将毛晋臣抓获。

经突击审讯才弄清，此人是清远人，系日本特务，后又投靠国民党，杀害过我村干部和群众，是个有血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清远县解放时，曾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在押解途中，跳车逃跑，潜来北平的香山地区。

在青龙桥联合检查工作的韩福太等队员，在清理敌伪文件中，发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活动的一些线索，立即提供给西郊五分局。西郊五分局按他提供的线索，有针对性地对已抓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摸清情况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对这一中统特务组织的首恶和顽固分子，依法抓捕惩办，对其组织中的一般成员，逐一登记，教育后加以控制管理，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

当时也在便衣队工作的邬吉成记得，一天，他到西苑机场附近的北乌村搞社会调查，整理出30多页的社情材料，其中还有防范对象名单。当时也没有什么装东西的包包，他就把这些材料一卷，揣在口袋里，赶回分队驻地。那天他穿了一身列宁装外套，口袋是斜的，材料一半露在外头。

骑车走了没多久，他忽然感到肚子疼起来。为了减轻疼痛，邬吉成就趴在车把上继续往前骑，材料就在他不经意间，一张一张地从口袋里飘落出去，撒了一路。等回到了驻地，他才发现口袋里的材料没有了，赶快返回沿途寻找。结果找回来一些，但大部分没有找回来。后来附近的群众又捡到了一些，送到了派出所，但仍有部分遗失了。就这样，他受到了严肃的通报批评。

经过肃特反霸，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使香山地区，包括香山到西直门这条路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外，便衣保卫队还与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侦查，及时破获了多起敌特分子妄图制造的暗杀恐怖活动。例如柴氏兄弟案。

柴氏两兄弟皆为国民党用重金雇佣的职业杀手，他们利用跟踪侦察手段，发现了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的家庭住址。董必武当时住在西城区西皮市胡同，即人民大会堂西侧，因董必武家离办公处很近，为节约开销，他每天下班后就徒步回家。柴氏兄弟暗中跟踪，摸准了董老上下班的活动规律，正准备实施暗杀时，被公安部门迅速查获，柴氏兄弟一

举被抓捕。

又如段云鹏案。段云鹏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华北特派员，身负刺杀中共高层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段云鹏利用手下小特务，采取了各种手段，如拿报纸对照片，在会场外停车场按图索骥，或骑自行车、步行跟踪等，辗转找到了郭沫若家的地址。郭家当时在西四附近的大院胡同(即原雍亲王府)，当他们正准备实施暗害行动时，被早已盯住他们的公安人员抓捕归案。段云鹏被抓获后，从他身上搜出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等20多人。

在北平公安部门相继破获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图谋行刺张治中、傅作义、陈嘉庚、沈钧儒等人的案件中，便衣保卫队都派人参与配合了侦查抓捕工作。

凡临时没有人管的地段和场所，都能看到便衣队队员的身影/执勤的便衣队队员都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一身行头

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胜利之师，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而便衣队由于工作需要，经常要以不同的身份、以各种不同面目，被派到各种需要的场合工作；所以凡遇紧急、临时、突击事件，凡临时没有人管的地段和场所，都会出现便衣队队员的身影，便衣队实际成为一支保卫中央的机动力量，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共产党接收了国民党政权的全部人员，包括伪警察局人员。因此解放后北平街头值勤的交警，还由旧警察担任。只有在香山地区的公安分驻所、派出所、交警队，配备了较多的便衣保卫队队员，要害地方均由便衣队的人值勤。同时由便衣队与公安局、207师共同组成，还在西直门、海淀、青龙桥、香山设立了几个检查站，实际上担负着该地段保卫工作指挥分部的责任。

青龙桥是当时从香山到市区的必经之地，这里道路较狭窄，仅能勉强

对开两辆车，街道两侧是住户和商店，镇中有一道小石桥，下桥往西南便是通往玉泉山、香山的公路，向西北侧是青龙桥镇的商业街。

在狭窄的街道桥头，摆摊的、卖货的，还有来往汇集的自行车、三轮车、马车等十分拥挤，致使过往汽车经常走走停停，行驶速度极慢。这就给首长的行车安全带来了不安全因素和威胁。

为了加强青龙桥路段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确保首长车辆安全通过，便衣队对沿街住户和商店进行了摸底调查和维护交通秩序的安全教育，对马车进街实行了限时禁入，并增设了流动交通警以疏导车辆，维护交通秩序。

有一天上午11点左右，一名女精神病患者突然出现在青龙桥桥头，她又是抢食品，又是打人骂街，闹得街市一片混乱，围观群众站在桥上围观，却无人近身劝阻，严重阻塞了交通秩序。便衣队队员于江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费了很大劲才把这个女精神病人劝到了分驻所，同时疏散了围观的群众，才又恢复了道路的畅通。

西直门检查站设在动物园，检查人员是由几位便衣队员和西直门分驻派出所的留用警察担当的。便衣队一区队副队长李福贵被任命为西直门分驻派出所的所长，他也是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的老同志。检查站的执勤人员通常是一面手拿红旗，指挥来往车辆，一面盘查可疑的行人和车辆。在去往清华、燕京大学班车上，他们曾查出不少违规携带的物品，如银元、黄金、大烟等。

据李福贵回忆，在西直门北面的火车站，是便衣队队员特别注意的重点地段。车站人来人往流动量很大，人员复杂。公安系统其他部门的人员也常到这里查案情，后又从便衣队调来几位新同志，专门负责火车站的检查，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能从旅客身上检查出携带易燃物品和其他违规物品。李福贵清楚地记得，当时还专门从公安系统派了一位女同志到火车站工作，混在人群里摸情况，因为男便衣队队员容易暴露，而女性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

除白天正常工作外，便衣队队员还要在夜晚协助有关部门外出查案情。西直门黄土坑一带原有24家小妓院，解放军刚刚进城时没有马上查封

这些妓院，嫖客多是拉车的、赶马的和商贩等人。

当时北平附近被解放的部分城市，例如保定等城市已经取缔了妓院，因此许多妓女都流落到了北平。当时黄土坑一带的妓院很乱，而便衣队几次夜查却并没有发现妓女和嫖客，原来这些妓院有专人负责放哨，看见警察来了，便立即通风报信，妓女和嫖客就跑了或躲避起来。

一天下午5点，分驻派出所的人员集中人力，全部穿便衣分路包围了黄土坑的妓院。这次突然袭击让妓女们丑态百出，有的还在床上，有的躲进了柜子里，有的还上了房，不少还没有穿上衣服，一下子查出了10多个没有户口的妓女，经查问都是从保定来的，便衣队在院子内看守了她们一晚上，第二天即交给有关方面处理。

后来经了解得知，这里多数妓女都是被逼无奈才走这一步的。她们的身世悲惨，不接客就没饭吃，十分可怜。新中国建立后，这里的妓院才被取缔，这些妓女大多被送进工厂做工去了。

在香山山前设立的交通检查站，是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和分流、疏导来往车辆的。由于位置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通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至晚上10点，无论严寒酷暑天天如此。

但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而根据工作的需要，在这里执勤的便衣队队员也不能穿人民解放军的军服，都一律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那身行头，即一身黑制服，头戴黑色大盖帽。就是因为穿着这身行头，让队员们挨了不少辱骂和奚落。

不仅当地老百姓不了解便衣队员的真实身份，骂他们是“黑狗子”，就连当时频繁进出香山的党中央各部门的司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对“黑狗子”们冷言冷语不说，有时还故意把车贴着执勤战士的身体开过去，形成对人身的威胁。

有一次，一位姓郭的便衣队队员在执勤指挥车辆时，就被一位司机轧到了脚。那位司机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还回过头来向老郭作了个鬼脸，显示出他是故意而为之。

还有一次，解放军华北军区某高炮部队的参谋长，带着三辆卡车要强

行通过香山检查站，被拦了下来。他看见指挥交通的人都穿着国民党警察的黑衣服，便不屑地下车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态度很蛮横。

几句话不对付，参谋长骂了起来："妈的，黑狗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后来不仅动手打了人，还把一个便衣队队员抓上了车。车开到半路，便衣队队员说明了身份，才被放下了车。

这时，接到闯关报告的高富有乘小车追上了卡车。一问，得知卡车上拉的竟然是报废的炮弹，是要到香山脚下去销毁的。高富有一听急了，这还了得，香山上住着中共中央的领袖与核心机关，把这三车废炮弹弄过去，不得出大事！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人随后赶到，急令卡车返回，避免了一场大祸。

又有一天，便衣队队员在青龙桥检查站值勤时，从颐和园方向开来一辆拉灵柩的大卡车。检查站便衣队队员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开车的司机不听招呼，还欲强行通过。青龙桥是城内通往香山的咽喉要道，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因此便衣队队员不顾自身安危，用身体挡住去路，把这辆车拦了下来。

司机下车后便火冒三丈地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国民党'黑狗子'，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现在解放了还想欺负人！我又没有违法章，你们凭什么无故拦车？现在不是解放以前了……"说着就朝便衣队队员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那位队员遵照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自己不是旧警察，而是有理有节地说："解放前国民党军、警、宪、特欺压老百姓，那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现在我是人民的警察，执行的是人民政府给我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检查，否则就是不遵守人民政府的规定。"

司机一听这话，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鲁莽过了头，虽没有向执勤战士道歉，但还是被迫接受了检查。

事情过后，这个便衣队队员向队长高富有诉说了心中的委屈，并将车号告之，要求查清司机的单位，予以适当处理。高队长给队员做工作说："司机打你当然不对，但他也是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痛恨。这也使我

们更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因此，我们大家更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然我们也会失去群众的支持。”那个队员连连点头，再没有为此事闹情绪。

后来，汪东兴等领导了解了此事，协同有关部门很快查清了那位打人司机的情况，原来那个人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的亲属。李克农知道此事后，还特意表扬了这个队员，说他能够忍辱负重，处理问题冷静得当，每个便衣保卫队员都应当有这种政治素质。

之后，李克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要他责成中办的那位工作人员领着那位司机和自家的亲属，向被打的便衣队队员道了歉。

北平纠察总队与便衣队有些相似之处/看到有轨电车道怕被电着/进门先“磕头”的笑话/第一次吃鱼被刺卡了喉咙/毛泽东说：“你应该是执金吾。”

从北平解放到党中央从香山移驻中南海之前，中央警备团和便衣保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所在地香山，警卫布防也都是围绕香山展开的。而其时北平城内、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等重要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直是由北平纠察总队和北京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完成的。

党中央和中共领袖们进入北平以后，大量的工作是在城内进行的，周恩来等常常在城里紧张工作到次日凌晨，因此很多时候就不返回香山，而是留在城里栖身。鉴于这种情况，担负警卫工作的便衣队就分出部分人员，进入城内，在北京饭店、中南海等区域工作，时不时要与纠察总队的人员协同作战。后来，他们又共同担负起政协会议、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

这里说到的北平纠察总队，不仅在工作内容上有与便衣队相近相重叠的，而且在许多场合，他们也是穿便衣执行任务的。因此可以说，他们也是便衣警卫人员。纠察总队的队员大多也是从各大军校学员中抽调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像高富有率领的便衣队那样受过专门的培训，而且进驻北

平的时间也比便衣保卫队早，加之是驻守内城，他们所感受到的城乡反差也更为明显，闹出的笑话比便衣队保卫队还大。

1949年2月初，北平刚迎来和平解放不久，华北步兵学校第一大队就接到命令：新北平急需充实大批安全保卫力量，抽调他们大队学员迅速进入北平，编入北平纠察总队。

步校第一大队学员傅发家，当年23岁。在接到命令后，他和战友们一道乘坐火车，从良乡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他还清晰地记得，一下车，就看见北平警察们在列队欢迎解放军。

随后，他们便整队进城。队员们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喊着响亮口号，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引来了不少好奇的北平市民驻足观望。

这支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土八路”队伍，从未进过大城市，因此队员们对城里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无比新奇。

“马路怎么这么宽？”有人悄声议论。

“街道上怎么还铺铁轨？”路过长安街时，队员们对路上横躺的一条“轨道”感到纳闷。这时队伍前面传来了口头指令，告诉大家这是一条电车道。

一听说是“电”车道，大家都不由得“警惕”起来，一个个把脚抬得老高，小心翼翼地迈过去。他们以为电车道是带电的，怕脚碰到上面就会被电击倒。这是“土八路”进城闹的第一个笑话。

傅发家等步校第一大队学员进入北平后，就被编入北平纠察总队。他们或在马路上执勤，或在戏院里维持秩序，或到饭店内检查住客情况，担负起维持北平市内社会治安的重任。

在一些繁华路段执勤上岗的纠察总队队员，为了隐蔽身份，不引起注意，要穿北平老百姓常穿的便服——长袍马褂。可穿惯了军装，扎惯了绑腿的纠察便衣队队员，对便服化装最初很不适应。

在上大街巡逻时，虽然穿戴已改换为长袍马褂，但走起路来仍然是军人的姿态，挺胸昂头甩臂像齐步走。特别是腰间还别着一把鼓鼓囊囊的手枪，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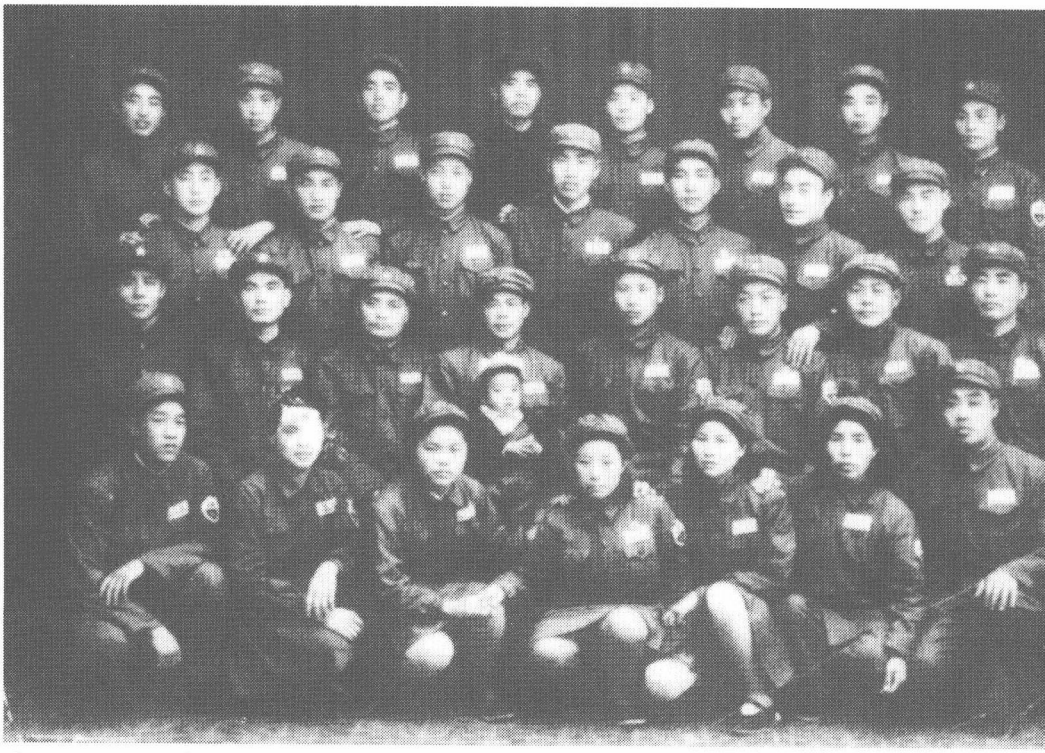
有一回，刚派出去上街值勤的小王发现了情况，赶忙回家报告。可一

推门还未来得及说话，就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队友们见状开玩笑说："你这小子，怎么进门就磕头呢？"原来小王迈门槛时，忘记了自己穿的是长袍，没撩起长袍的下摆，结果踩在了袍边上，被门槛绊倒了。

1949年3月初，新政协筹备会议举行前夕，很多来到北平的民主党派领袖、知名人士住进了北京饭店。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北平纠察纵队也奉命派人进驻北京饭店，参与执行保卫任务。

傅发家带着六名身着便衣的纠察队员来到了北京饭店，面对这座西洋式高档大饭店，长期在农村山沟里摸爬滚打的"土八路"队员们，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不感到陌生好奇，又闹出一系列笑话。

有一天，队员小吴去饭店东楼执行任务，突然感觉内急。可他



建国前夕北平纠察总队部分队员合影

在楼道里转来转去，也没找到一间像厕所的房间，只好去问服务员："同志，厕所在哪儿？"

服务员给他指了指卫生间。小吴推门进去，见屋内还有一排紧闭着的"小门"，他不敢随便去开门，就在外面东瞧西看，怎么也找不到"便坑"。这时，他看到墙边有个白瓷盆子，上边还有个洞，心想这也许就是"便坑"了，就爬上去"方便"。

可盆子太高太滑了，爬上去也蹲不住。恰好这时服务员进来了，见状大吃一惊，"你在洗脸盆上干啥？"

小吴这才不好意思地下来问："我怎么找不到便坑呀？"

服务员一听哭笑不得，赶快拉开"小门"说："这里就是呀。"说完还不放心地告诉小吴："你用完厕所后，把上边的绳子一拉，水就自动流出来冲干净了。"

小吴便后按服务员的交代，拉了一下绳子，流水果然哗哗出来了。但看到水一直流个不停，小吴又着急了，急忙跑出去对服务员说："同志，真对不起，我把厕所弄坏了。"

服务员跟进去一看，水已经停了，就笑笑说："水停了，没事了。"小吴被自己的大惊小怪弄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走了。

北京饭店的大小宴会厅里，每天都有宴会举行。宴会中的便衣警卫，也就成了纠察队的常事，可这些纠察队的官兵从来没见过大饭店的宴会，宴会上的那些佳肴美食和洋玩意儿，对他们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稀罕物。

有一天，指导员李才身穿呢料制服，三节头皮鞋，精神抖擞地走进了宴会厅。可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土包子"身份就露了馅。他拿起一支吕宋烟想抽，可连划了几根火柴，也没点着，急得满头大汗。

他先找到队友傅发家，询问烟该怎么点，可傅发家也不知所以然。只好一同去找宴会厅的服务员。服务员一看，噗哧笑了："同志，你点倒了，你点的是烟嘴，调过来点就点着了。"李才一听，闹了个大红脸。

宴会结束后，忙了半天的傅发家才和服务员们一道用餐。餐桌上有鱼有肉，十分丰盛。大家有说有笑地吃着，可傅发家对摆在面前的鱼始终没有动一筷子。

一位服务员指着鱼盘对傅发家说："这鱼很好吃，你怎么不吃呀？"

傅发家不好意思地说："我从来没有吃过鱼，不太敢吃，怕鱼刺卡着喉咙。"

"没关系的，你慢一点吃就行了。"服务员们好言劝说。

在大家的"怂恿"下，傅发家夹了一小块鱼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嚼便咽了下去。不料，他还是被鱼刺卡住了。

"赶快吃口米饭，吃口花卷压压。"大伙你一嘴我一句地帮他出点子。

傅发家连咽了三口花卷，总算把鱼刺压了下去，结果被噎得满面通红。

经这么一折腾，傅发家在以后的好长时间里都没敢再碰鱼。

虽然"土八路"初进大城市，闹出一连串笑话尴尬，但队员们执行起任务来，却是一丝不苟，极端认真。他们的严密工作，也为整顿北平解放初时的混乱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一次，已是北平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区队长的傅发家，带领两名队员去国际饭店执行任务。两名队员中有一名是清华大学学生，懂外语，是领导专门配备给纠察总队执行涉外任务的。

到了国际饭店的办公室后，有一位华籍职员接待了傅发家一行三人。傅发家提出，要查看一下住店客人的登记簿。那位华籍职员用轻蔑的眼光打量了一下他们，然后说："客人登记簿都是用英文写的。"言外之意是说，你们这些"大老粗"，还能看得懂英文吗？

傅发家没跟他多啰嗦，执意要他把登记簿拿来，华籍职员只好照办了。当"清华"队员从登记簿上迅速搜索到了一位需要重点调查询问的客人姓名时，就要那位职员把这位客人找来谈话。

华籍职员看了看登记簿，傲慢地说道："他是个外国人，你们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

傅发家一听生了气，心想要好好教训一下他的洋奴习气，于是就严肃地说："你马上去把客人找来，听不听得懂他的话不用你管！"职员见来人不"客气"了，便老老实实地去请客人。

客人请到后，年轻的“清华”队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在一旁观察的职员听着，不得不佩服，再也不敢“目中无人”了。

由于北平纠察总队的出色工作，不仅使北平城内的社会治安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一些原来常在街头游荡骚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们也很快销声匿迹了。北京饭店、中南海等一些重要地区的安全警卫也井然有序了。

北平市纠察总队在当时的北平市民中也出了名。市民们有事不找派出所，而愿意去找纠察总队解决。市民们说：“毛泽东从延安派来了更有能耐的宪兵，让我们百姓信得过。”

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后，也听说了这事情。有一天，毛泽东特意请周恩来把纠察总队队长张明河找来。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张明河说：“你这个部队是怎么训练得这么整齐的？你是黄埔军校哪一期毕业的啊？”

张明河回答说：“报告主席，我是抗大三期的。”

毛泽东说：“原来你是个土家伙，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官？”

张明河说：“主席，我是纠察总队队长。”

毛泽东说：“不对，按中国古代的说法，你可是九门提督啊。”后来毛泽东又纠正说：“你应该是执金吾。”执金吾是秦代就设置的官名，汉代以后，执金吾是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的官员。

四　颐和园内外的故事

“毛主席不是让我来碰你们钉子的！”/几件事都让柳亚子感到备受冷落/武装警卫的一句询问，把柳亚子惹火了/李克农看望被打的警卫战士

1949年4月以后，柳亚子先生曾在颐和园里的益寿堂住了一段时日。

柳亚子是著名诗人，曾与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组织了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06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称帝后，他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反袁斗争。1926年他以同盟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后又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他因指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遭到通缉，亡命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分裂、破坏抗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他与毛泽东私人交往很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常与毛泽东一起品茶交谈，纵论国事。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时，曾在雾都与柳亚子相见。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此举是“弥天大勇”，毛泽东将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回赠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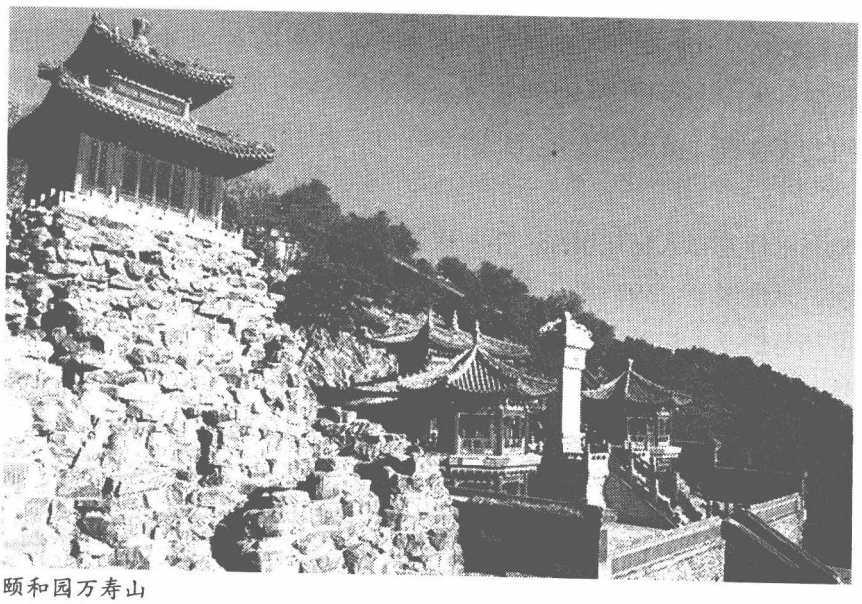
内战爆发后，柳亚子历尽坎坷，颠沛流离，被迫避难于香港。1947年他与李济深等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柳亚子是共产党的朋友，1948年5月，中共中央拟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到已是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拟邀请名单中，柳亚子

在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之后名列第五。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63岁的柳亚子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和毛泽东之邀，于2月离开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先是在六国饭店下榻，4月下旬，又被安排移住颐和园内的益寿堂。

益寿堂是一座别致的小庭院，优雅静谧，风光宜人。驻足远眺，昆明湖上，游船点点；南湖十七孔桥，倒影如画；龙王庙亦尽收眼底。向东穿过繁花盛开的桃林，即可到达著名的园中之园——谐趣园；向上一段缓坡就能登上气势雄伟的万寿山顶峰。

根据柳亚子日记记载：4月22日，他到陈叔通处，见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和时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告诉柳亚子，毛泽东出于对他身体关心，建议他迁入颐和园休养。柳亚子即于次日下午专门到颐和园益寿堂院子探看，感“其圆满超出意外”，遂在25日入住。

在柳亚子入住之前，高富有就接到指示，要他为柳亚子安排随



颐和园万寿山

身警卫、医生、炊事员、公务员等。高富有特意安排了两名便衣队队员，负责柳亚子的安全和生活，其中负责警卫工作的是便衣队队员刘桂雄。

对柳亚子如此优厚的待遇，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异议，但毛泽东出面说："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可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多年来与我党生死与共，是我们久经考验的朋友；他写的文章像飞进敌人营垒里的一发发重型炮弹，所以蒋介石既恨他，又怕他！"

虽说柳亚子对住在益寿堂十分满意，他在给儿子柳无忌的信中说："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好环境好房子来住也。"然而在此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引起的心中不快，并未因环境的变化而消解。

一是在到北平当天，柳亚子就提出要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但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小车而未能成行。

一是3月全国文协筹委会组建时，将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的柳亚子这位南社盟主摈于文协筹委会常委之外。还在1945年，毛泽东曾给柳亚子写信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那以后，柳亚子便以"一代文豪应属我"自况，认为"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

一是在到北平的前两星期，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新政协代表，把作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柳亚子排除在外，因此使他失去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资格，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为代表……

这些事都让柳亚子感到备受冷落，心情极为不爽。

柳亚子是1906年即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他对自己一直有着过高的定位。1947年年底他曾写下《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很不客气地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而且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曾几度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比之其他与共产党建立亲近关系的国民党人，他理应得到超乎其他人的礼遇。可是在他到北平后的4月初，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李济

深等民主人士，甚至在此前还接见了刚刚与共产党合作的傅作义，却始终没有安排和他见面，这不能不让他感觉郁闷。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袖刚进北平的第三天，柳亚子便写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借用“说项依刘”、“夺席谈经”、“无车弹铗”、“子陵滩”等典故，向毛泽东发牢骚，大吐心中块垒，并流露出归隐之念。

正是由于心中的忿忿不断郁积，致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心情烦躁，脾气也大起来，甚至因一些生活琐事和身边的警卫战士、生活管理人员发生矛盾。

4月里的一天，柳亚子到西苑逛市场，买了一尊孙中山的小型石膏像。在回颐和园进东宫门的时候，被门前执勤的武装警卫拦住。因为当时东宫门内和知春亭东侧住有十多家市民，武装警卫以为他是住户的亲友来串门，就问他是来找谁的。

就这一问，把老先生惹火了，说：“我住在这里好几天了，你还不认识我？毛主席让我住这里，可不是让我来碰你们钉子的！”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拐杖顺势打了下去。武装警卫躲闪不及，头上、身上重重地挨了几下。挨打的武装警卫叫张勇，挨打后的他仍坚守职责，不让生人进门。结果引来了住在东宫门内的居民，围了一圈看热闹。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负责柳亚子警卫的刘桂雄及时赶到了，这才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原来他发现柳亚子不在房间里，便四下寻找，远远看见了这场误会匆匆赶过去解围。柳亚子悻悻地走了，但张勇事后对此怎么也想不通，委屈地痛哭失声。刘桂雄安慰他说：“柳先生也对我发过脾气，他总认为我们是多余的，妨碍他的自由。你阻拦他是因为不认识他，是误

会，有些委屈我们就承担了吧。”

便衣队队员们把柳亚子发牢骚、打门岗的情况反映到便衣队队部，队长高富有也只好劝慰有关人员说：“柳亚子先生是高级民主人士，还是毛主席的老朋友，我们要尊重他。因此，在他发脾气时，大家要尽量忍耐。”

柳亚子打战士的事件，很快传到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耳朵里，他在见到便衣队的刘满昌时便询问起挨打警卫的情况。刘满昌说：“听说正在闹情绪，要求回前方。”李克农遂让刘满昌带他到张勇所在的警卫连队。

连长向李克农汇报说：张勇要求回前方，谁的劝告也不听，还说不批准他回前方就不干了。刘满昌从连长的介绍得知，张勇是黑龙江人，父母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15岁就参了军，作战非常勇敢，曾多次立过战功。调来做警卫前是班长，他的脾气一直比较倔，认准了的事别人很难说服。

张勇来到连部，见到李克农仍然请求回前方。李克农耐心地说服道：“你要求回前方，不能说不对，不过当前这里更需要你。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很光荣吗？你受了委屈，大家很同情。柳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受过蒋介石的迫害。但他不是共产党，没搞过武装斗争，所以不懂得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样去爱护革命战士。今后他和我们共产党人在一起，会慢慢改变过来的。”

听李克农推心置腹的一席话，张勇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表示不回前方了，并说：“请首长放心，我今后一定努力做好这里的工作，以报答中央首长对我的关心爱护。”

他一怒之下出手打了管理员一记耳光/
高富有说：“有委屈回来家里诉。”/
“柳先生有几件事你做得有些过分了。”

由于柳亚子的心结未解，打警卫的事情没过多少天，他又与身边的生活管理人员闹了一场不愉快。

入夏之后，有着南方生活习惯的柳亚子很想吃点炒青豆、鲜黄瓜。可生活管理员跑遍了西苑、东宫门、青龙桥一带菜市场也没买到。这个季节，北平地区的这类蔬菜还没有成熟上市，而南方的蔬菜在当时运往北京还很困难。

吃饭时，饭菜端上桌来，柳亚子见没有他所要求的蔬菜，就生了气。询问之间，管理员耐心地向他解释，可柳亚子认为管理员是在找客观理由搪塞，没有尽心尽职，一怒之下又出手打了管理员一记耳光。

管理员是便衣队里派出的一位参军多年的干部，在华北军政大学期间曾任副指导员。他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受党的教育培养多年，习惯于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一律平等的关系，而对旧社会那种以势压人的军阀作风深恶痛绝。

于是，他就委屈地去找高富有诉说："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可以批评、处分，凭什么动手打人呢？要论打架，他哪里是我的对手！我是为了党的事业，才忍了呢！"

作为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对此也很为难，只能劝慰说："为了党的事业，你能忍辱负重，这很好，有委屈回来家里诉。柳亚子先生长期和我们党合作，是支持革命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很尊重他。对民主人士不能和我们党内的同志一样要求，努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也是对革命的贡献。为了革命大局，咱们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听了高富有的这番话，管理员的怨气渐渐消了，他对高富有说："柳先生打人固然不对，但他的心情和生活习惯，我也不甚了解，应该体谅他。我一定会顾全大局，正确对待。通过这件事情，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进城以后，很多事情我们还得从头学起。"

发生在柳亚子身边的一些不愉快事情陆续汇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尽管当时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指挥，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筹备工作，新解放城市正常秩序的建立、生产的恢复发展，新国家政权的构建等一系列工作头绪繁多而紧张异常，周恩来处于宵衣旰食夜以继日忙碌的状态，但他还是抽时间询问了解了有关情况，并表示："我要去见柳先生，还要批评他。"

几天后，周恩来决定和邓颖超在颐和园听鹂馆设便宴请柳亚子夫妇吃饭。

吃饭那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提前来到颐和园。他们利用在休息室等候的时间，又向高富有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细节，对情况加以核实。最后，他对高富有说："这事我要说一说，因为工作忙，我就不能陪柳先生把饭吃完了。这里有邓大姐在，你们一起陪柳先生，饭后送他回寓所，保证安全，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柳亚子和夫人到了之后，大家热情寒暄，依次入座。周恩来首先举杯，为柳亚子和柳夫人愉快健康干杯。在举箸品尝菜肴之际，话题转到了柳亚子与身边工作人员发生的不愉快事情。

周恩来说："我们的同志刚进城，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把事情办好，惹柳先生生气了，这可以理解。不过，柳先生有几件事你做得有些过分了。我们朱德总司令，在党内的影响那么大，地位那么高，可是他对任何同志，无论是警卫员、管理员还是司机，都非常尊重，对战士都相当和气，从没动过一个指头！打人，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

针对柳亚子在住到颐和园后心绪烦躁，屡有牢骚，并一再与周围工作人员发生摩擦的现象，周恩来很动情也很郑重地说："柳先生，你这还是旧社会封建思想残留的那一套，现在使不得了。"

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柳亚子一直仔细听着，中间没插一句话。

随后，周恩来简洁地讲述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表明在新的全国政权建设筹建中，有很多事情要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来办，大家会在这个过程中各得其所，发挥重要作用。他诚恳地对柳亚子说："我们刚进城不久，百废待举，百事待兴。建设新中国的许多大事正待筹划、安排，但不可操之过急，希望你多保重身体，今后我们有的是工作要请你来做！"

说到这儿，周恩来站起身来，举起酒杯："柳先生、郑女士，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就由颖超陪你们进餐。"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告辞出来。

临走前，周恩来又叮嘱高富有说："柳先生夫妇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你们可以到城里的大市场去采购蔬菜和水果……"

柳亚子在当天的日记里，对周恩来的宴请之事做了极为简略的记载，但并没有就周恩来的言谈和自己的感受做什么议论。然而在几天后，柳亚子在给老朋友宋云彬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心境："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

在柳亚子身边工作的便衣队队员们，亲眼目睹了周恩来请柳亚子吃饭的过程，听到了关于如何照顾好柳亚子的指点，对周恩来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的艺术感到十分钦佩，同时对做好警卫服务工作，也更心中有底了。

高富有从青龙桥、海淀急调便衣队队员/毛泽东发现了高富有的小动作/柳亚子在给毛泽东的和诗中表示放弃回江南隐居的念头/"你看怎么办？"汪东兴问高富有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由于平津战役战事的缘故，北京西郊的颐和园、碧云寺、卧佛寺等风景游览景点，已关闭了很长时间。然而从"五一"始，除香山之外，西郊的风景游览景点就要对普通游人开放。

这些即将对外开放的景点，都在便衣保卫队一进北平就负责保卫的责任区内，便衣队的指挥所就设在颐和园。为了确保景区在节日期间的安全，高富有队长专门做了安排，在各景区加设了警卫网点。

为庆祝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北平市特意组织在颐和园举行盛大的群众游园活动。北平工农商学各界的劳动群众，还有驻北平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将会聚在此，共同欢庆人民的胜利。这座昔日的皇家独享的御苑，终于真正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了广大劳动者度假欢娱的乐园，这的确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五一"节当天，颐和园彩旗招展，装扮一新，一大清早，游园的群众和解放军官兵便从四面八方涌来，颐和园内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就在这时，高富有接到了一个通知：毛泽东今天要来这里游园。

高富有了解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凌晨开始睡眠，因此一般不会太早



便衣队员们扮作游客在颐和园昆明湖划船执行任务

来游园的，这正好给了他布置准备的时间。

平日里，除了队长高富有兼任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在颐和园外，便衣队的王光甲担任着听鹂馆的经理；李成章、曹建光、张茂萱、任正忠等在后山开设了一个茶馆；园内的照相馆也是由便衣队队员经营的……而在颐和园大门外的广场上、东宫门外的商摊群里，一些拉人力车的车夫和小贩，也是由便衣队队员装扮的，那是他们常备不懈的哨位。

为了使毛泽东游园的保卫工作万无一失，高富有又临时从青龙桥和海淀两个检查站紧急抽调了一部分便衣队队员，连同颐和园内外原有的常设人员，共20多人共同执行这次任务。

队员们一接到高队长布置的重要任务，便以游客身份散布到了颐和园内的几个毛泽东可能经过的路径附近，各司其责，密切观察

注视各自地段的情况，以防可能发生的不测。

高富有还专门挑选了几名会游泳的队员，让他们划着船在昆明湖湖面上实施监控。谁知这几个队员从来没划过船，船桨在他们手里根本不听使唤，弄得游船在湖面上直打转转，还溅得浑身是水。

见到如此情况，高富有赶紧请来几名船工当老师，让队员现学现练。在船工们的指教下，不到半小时工夫，几名队员便基本掌握了划船的要领，可以划行自如了。一切都安排布置妥当之后，高富有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将近中午时分，毛泽东乘车到达了颐和园。随毛泽东一道来的还有江青和他们的女儿李讷，后面还跟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等几位随员。

在这喜悦欢庆的节日里，毛泽东携家人游园，神情显得轻松愉快，他下了车，与前来迎接的高富有亲切握手。高富有随后引领毛泽东等从颐和园东门一侧的小门入园。

由于大门人多拥挤，走小门更安全便捷，可毛泽东在步入小门时突然问道："高富有，你搞的什么名堂，为什么让我走这里，不走大门呢？"

高富有知道毛泽东最怕给他搞特殊，脱离群众，连忙解释说："这是为游园划分的，大门走北平群众，小门走中央机关和军队，这样好管理。"

这么解释也合乎逻辑，既是划归中央机关走的，毛泽东也是其中一员，自然也该走这个门，至于这样安排是否合适，毛泽东并没挑剔，点头表示理解。

一进园内，迎面是大大小小的花坛，各色各样的花卉盆景，组成花的海洋，姹紫嫣红，绚丽多姿，象征着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美好未来。毛泽东被这美好的景致所吸引，驻足久久地端详品评。

"高富有，这是什么花？"毛主席指着一盆花突然问道。

"仙客来。"高富有顺口答出。毛泽东来了兴致，又问了他另几种花的名字，还问这些花什么时候栽种、插枝、花期多长等。这下可把高富有问住了，尽管他是庄稼人出身，但花木和庄稼毕竟有所区别，他只好如实说自己不知道了。

毛泽东并没责怪他，仍饶有兴趣地沿着花坛观赏，不时问这问那。看了一阵花儿，毛泽东一行又去游览长廊，登上了万寿山、佛香阁。

从佛香阁往下走，毛泽东忽然问高富有："你知道柳亚子住在哪里？""就住在佛香阁下边的益寿堂。他是我们的保卫对象，警卫员、管理员都是我们派去的。"高富有答道。"那好，我们去看看。"毛泽东又说。

一行人到了益寿堂，已是过午时分。柳亚子生活很规律，这是他午睡的时间。院里静悄悄的，只有警卫刘桂雄在门口值班。高富有对刘桂雄说："请你告诉柳先生，毛主席看他来了。"

当时天气燥热，烈日当头，院内既没树荫，也没廊檐，毛泽东等人就站在没有遮挡、热烘烘的院子里等候。不一会儿，值班员出来报告说："柳先生很快就出来。"

然而，又等了许久仍不见动静。毛主席日理万机，每天那么多军机大事等着他处理，可现在却长久地干站着，还不知道要等候多久。高富有有些着急，不时地看手表。最后，他示意刘桂雄再去催一下。

毛泽东发现了高富有的小动作，连忙摆手制止说："你不懂，人家是高级民主人士，见客人要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再在镜子面前照一照。"说着还做出在镜子前左右端详的样子，动作好笑又有趣，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我们等着，不要急嘛！"毛泽东边说边让随行的警卫人员在西厢房的台阶坐下耐心等。

又过了好一阵，柳亚子和夫人郑佩宜终于从房间出来。他们果然穿戴整齐，柳先生西装革履，大热天还扎着领带；他夫人身着旗袍，略施脂粉，端庄大方。他们来到毛泽东面前，彬彬有礼地并排一同向毛泽东鞠躬行礼，腰弯足有九十度，显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特别尊崇和敬意。

毛泽东也和他们夫妇握手，亲切问候。柳夫人看到江青也来了，特意与她寒暄，并亲热地抚摸着李讷的脸庞，发出赞赏。毛泽东和柳亚子站在院里就攀谈起来，然后又挽手走进客厅。

就在前一天，柳亚子偕夫人郑佩宜游览了颐和园内的仁寿殿、玉兰

堂、排云殿等处，至中午乘画舫渡昆明湖回到住处益寿堂时，见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了。

田家英递给柳亚子一个信封，柳亚子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是对柳亚子3月28日所赠《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的酬唱之作。柳亚子当场就朗读起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据当时在场的人员回忆，柳亚子读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时，稍停了片刻。田家英在临离开时，告诉柳亚子说：“毛主席说，请你多保重身体，他抽时间来看望你。”

田家英走后，柳亚子回味着毛泽东的和诗，心潮久久难以平抑。他和毛泽东交往始于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的广州，那时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并兼任代理宣传部长，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都做出过努力。抗日战争中发生了皖南事变，柳亚子和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发表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并拒绝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因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柳亚子非常敬佩毛泽东不畏艰险、大智大勇的气魄，故在其《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一诗中，有“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等语。毛泽东曾邀柳亚子到红岩村促膝长谈，离重庆前以手书《沁园春·雪》相赠。

他们对这段历史都十分珍视，所以毛泽东的诗以友情忆旧起始，说“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继而，毛泽东以朋

友的身份对柳亚子进行规劝和批评，指出牢骚太多了会妨碍身体健康的，所以不要再发牢骚了；对待世上的一切事物要放开眼界从长远去看；劝他从建国大业出发考虑问题，留在北京还是大有可为的，胜过回到家乡去隐居。

柳亚子被毛泽东的诚挚中肯感动了，于当日展纸挥毫连写《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两诗，说“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放弃了回江南隐居的念头。

正因为此前时有诗词唱和来往，所以当毛泽东到益寿堂拜访之时，柳亚子与他没说几句，话题便转到了谈诗论词上。在柳亚子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午餐后假寐，二时即醒，忽毛泽东偕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略谈，旋来余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

在益寿堂里饮茶交谈了一阵子后，毛泽东建议一起游园。于是，毛泽东与柳亚子边走边谈，从益寿堂出来后，沿昆明湖边的长廊前行。

那天也在颐和园担任警卫任务的刘满昌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担负毛泽东的警卫任务，所以心情特别激动。他清楚地记得身着黄呢制服的毛泽东，与拄着拐杖的柳亚子一路边走边谈，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刘满昌依照警卫的规范，若即若离地在不远处警惕地跟随着。走着走着，看到一位前后由两个警卫员护卫着的军队首长向毛泽东和柳亚子走来。那位军队首长在20米开外认出了毛泽东，立刻小跑过来向毛泽东行礼问好。



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看望柳亚子

毛泽东随即对柳亚子介绍说："这位是林彪同志。"柳亚子高兴地上前拉住林彪的双手说："林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林彪亦向柳亚子行礼问好。随后让在一边，恭敬地目送毛泽东和柳亚子离去。

终于，游人中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抑制不住激动高喊起来："毛主席游园来了！"

消息一传开，许多群众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毛泽东无拘无束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又引来更多的群众围观，人们前拥后挤，争相一睹伟人毛泽东的风采尊容。

高富有和几名随行便衣警卫根本无法应付这样人群拥挤的场面，散布在园内各处的便衣队员也迅速集中到这边来，帮助劝阻群众散开，不要拥挤。

毛泽东被热情的群众簇拥着，既不能前行，也没法后退，警卫人员们更是心急如火，唯恐出现安全问题。汪东兴也担忧起来，"你看怎么办？"他问高富有。

幸好他们所在之地挨近石舫，岸边系有几条游船，高富有指挥随行警卫和便衣队队员密切配合，因势利导地使围观群众让开一条路，引领毛泽东和柳亚子上了游船。在这里放置几条游船，是高富有准备作应急之用的，没有想到这回真派上了重要用场。

毛泽东在游船上和柳亚子依旧谈笑风生，而汪东兴、高富有他们却出于职业敏感，始终捏着一把汗，唯恐会发生什么意外。

游船在湖上兜了一圈，毛泽东依然游兴未尽，又提出要去看仁寿殿。毛泽东一向对庙宇、殿堂等古代建筑怀有浓厚的兴趣，即使在战争岁月，只要有机会，都会前去观瞻。

仁寿殿建筑群由大小数十间房屋，几个大型四合院构成。它前临昆明湖，背靠万寿山，与长廊相连，和大戏楼相通。殿前庭院宽阔，松柏苍翠，奇石假山点缀其间，是颐和园内一处独具风采的景点。

这里在晚清年间是皇室活动的一处重要场所，慈禧和光绪皇帝曾在这里面见朝臣，处理国事。对于这段近代历史，毛泽东和柳亚子都十分熟悉，而观遗访古，也是两人的共同雅兴。

"可惜，仁寿殿还没有准备好，请主席下次再来看吧。" 高富有解

释道。“这次我们去看龙王庙，怎样？”“也好。”毛泽东同意了。

两只游船一前一后，很快划到昆明湖南侧的龙王庙。毛泽东等刚上岸，这边的岸上立时又聚集起众多游人。其实，毛泽东所乘的游船，一直吸引着游人的目光，人们追逐着游船，游船划向哪里，人潮便朝哪里涌动。

围观的游人越来越多了，为防止发生意外，高富有只好劝说毛泽东放弃参观龙王庙，从颐和园的南边小门出去，毛泽东遂与柳亚子夫妇就地告别。

在颐和园南门外与高富有分手时，毛泽东有点遗憾地说：“今天没看好，下次我再来。”高富有说：“主席，下次来看，我们一定会好好安排的。”毛泽东点点头：“一定来，一定来。”

5月5日，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也是马克思的诞辰日。这天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接柳亚子夫妇到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中午，“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

那天，柳亚子兴奋异常，一气赋诗四首。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面，他写道：“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那一晚，柳亚子依然亢奋不已，虽“倦极不堪”，却写信数封，到半夜才睡。

6月17日，毛泽东又一次派秘书田家英、警卫员郭安奇来到颐和园益寿堂，接柳亚子到香山双清别墅畅谈。

毛泽东的拜访、邀请，以及和诗、致信，周恩来的宴请和细致说服，使柳亚子心中郁积的被冷落的不快有所消解，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协商筹建事宜。他与身边警卫、服务人员的相处，也由冷眼相向转而变得较为融洽。

和谈代表团到京看戏，如坐针毡/周恩来斥责“兄弟说”/毛泽东三言两语化解了僵局/张治中说周恩来抽杠子，被不软不硬挡了回去

就在柳亚子先生住进幽静的颐和园前后，一系列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都在北平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其中就包括4月初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北京饭店两处举行的国共和平谈判。

其时，北平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区队长傅发家已经调驻北京饭店执行安全警卫工作多时了。因此，在和平谈判期间，傅发家按照中央警卫局的指示，带领驻北京饭店的区队担负起保卫参与谈判的中央首长安全的任务。

国共和平谈判的主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椭圆形大厅内。大厅正中摆一张长桌，是用五张方桌并成的，上面铺绿色毛毯（绿色寓意和平），北面坐北朝南设五把椅子，是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的座位；南面坐南朝北设五把椅子，是国民党政府代表章士钊、刘斐、黄绍竑、邵力子、李蒸等人的座位；东面的一端是中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座位；西面的一端是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座位。

4月1日上午，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这天，国民党的立法院，正值例会期间。为了欢送代表团启程，特休会半天。当时不少记者在机场围着张治中询问“和谈前途如何？”张治中说：“此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专机飞经青岛稍事休息、加油后，当日下午抵达北平西郊机场。

下机时，欢迎的人寥寥无几。时为中央社会部秘书长的齐燕铭代表迎接，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照管接待事务。下机后，机场警卫曾前来要求检查所携行李，经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交涉后，才勉强同意免检。这样的气氛，使代表团成员感到好像掉进了冰窖里。

离开机场后，代表团一行被送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一进去，迎面映入眼帘的大标语是“反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这表明了中共对此次谈判实质的定性，挑明了谈判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前景。

当晚，中共方面在西长安街大戏院举行欢迎晚会，演出内容似乎都与饭店的标语暗暗相合。虽然招待热情，代表们在前排就座，并奉有糕点果品，然而看戏的代表们却显然如坐针毡，心神不定。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的第二天，谈判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始。据当时亲历了会场布置和参与了国共和谈的具体工作的钟灵回忆，在

主会场勤政殿除了正式的五六次会议外，其余开会都是在北京饭店的会场，以及会外单独活动和分别协商的。

正式谈判开始前，摄影记者可参加拍摄，真正开始会谈时，记者就退席了，钟灵和卫士长在殿内东面墙边侍立。钟灵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倒像是国民党受降的仪式。"

每次谈判时中共方面都是义正辞严，而张治中则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谈时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都不讲话，顶多插言一两句。钟灵清楚地记得，谈判中周恩来发了一次脾气，张治中随之再三道歉。

缘起是因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大意是说，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

周恩来听了这些话，当即拍案而起，严正地斥责说："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1949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平和谈

当时会场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张治中在周恩来的威严面前，只好连连道歉，说自己用词不当。

而在北京饭店负责警卫的傅发家则清楚地记得，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到北京饭店，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会见并进行谈判。

那天，傅发家接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要来的通知，马上带人对会场内外进行了严密检查。作为会场的房间，用探雷器上下探测检查了一遍。然后，傅发家又派人对室内所有用具，包括桌椅、花盆、茶杯等逐一进行了细致检查。

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袖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分别到达。

在会议室内，双方代表们落座后，毛主席开始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开会吧。我们两党又坐在一起了，不容易，希望把会开好。现在我们要讨论建立一个新国家。"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一听，说道："我们不是有国家嘛，为什么还要建立国家？"

"我们要建一个新国家！"毛泽东强调说。

"什么样的新国家？"邵力子继续追问。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研究，建立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如果你们同意，大家统一了认识，咱们就来共同讨论。"

接下来，刘少奇作了发言，他对国共两党历史上合作与斗争的历次事件进行了回顾，当他谈到共产党已解放了北平，即将消灭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时，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又气急了，插言道："我这个国民党是谁也消灭不了的。"双方的对话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

这时，毛泽东不慌不忙地开口说："邵力子先生，我们将来要走向世界大同，你同意吗？"

邵力子哼了一声，点头表示同意。

毛泽东继续说道："到那时，不要说你们国民党，就是我们共产党也不存在了。"邵力子不置可否，僵局就这样被毛主席三言两语化解了。

交谈中，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曾在发言中半开玩笑地说："我和恩来先生抬了一辈子杠，到头来他把杠子抽过去了，还打我一杠。"

周恩来微微一笑，回应道："张治中先生，这话不对嘛。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抽你的杠，更不想打你一杠，我们还要共同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嘛！"不软不硬地将张治中的话挡了回去。

经过会上会下近半个月的磋商谈判，国共双方于4月15日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八条二十四款，交由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黄绍竑带回南京，并限南京方面在4月20日之前表态。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遂在4月21日凌晨下达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

4月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5月27日，上海也宣告解放。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全国解放已成定局。

朱德讲话一再被雷鸣般掌声打断/与会代表听任弼时讲到这里，先是哄堂大笑/周恩来作报告说要搞大圈子/任弼时问刘满昌，你怎么还明知故犯？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如果是按照建国前共青团代表大会总的排列顺序的话，这次大会应该是共青团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共340人，他们代表着全国19万团员。中共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派代表列席了会议。此外，苏联共青团也派代表团前来祝贺。大会由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等组成大会主席团主持。

为了这次在革命接近胜利之际召开的全国青年大会顺利而安全地进

行，便衣保卫队派出30余人，在区队长王成义率领下，到会上执行保卫任务。


任弼时在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朱德总司令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致词。这位率领中国人民子弟兵，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老英雄，早已成为广大青年心中仰止的高山。人们崇敬他，热爱他，当他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立即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在现场担任保卫工作的便衣队员们，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讲话一再被雷鸣般掌声打断的热烈场面。

中共中央负责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经三年留学于1924年从苏联回国后，任弼时就长期在中央担负青年工作的领导之责，因而他非常熟悉中国各阶层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和脉搏，再加上他工作深入细致，讲问题实事求是，所以深受青年人的欢迎。

由任弼时所作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政治形势，对30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做了正确的总结，对青年团的成绩和偏向做了正确的分析评价，强调党对团的领导是青年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指出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整个青年一代。

在作政治报告之后，任弼时又即席解答了当时青年人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诸如，什么工作最重要和最光荣；脑力劳动是否比体力劳动高尚；领导者是否比被领导者高尚，等等。

“在我们革命阵营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同样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没有贵贱之分。但是，有的人却不恰当地将其比喻成人体，说什么‘人的头脑是高贵的，下肢是卑贱的’。试想，一个人假如只有脑袋没有肢体，那就不是人形，还有什么高贵可言？”与会代表听任弼时讲到这里，先是哄堂大笑，接着报以热烈鼓掌。

大会通过了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章程，选出了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冯文彬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并一致通过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最后，大会宣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国青年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给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做了《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强调青年团要有一个好作风，要谦虚，要搞大圈子，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作为分管青年工作的中共领袖任弼时，对前来参会和访问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十分重视。不仅在会间多次代表中共中央接见他们；会后又亲自前往代表团驻地——北京饭店看望。这几次接见看望活动，都由便衣保卫队的刘满昌、王增福随车护卫。

那天，任弼时前往北京饭店，又是刘满昌、王增福随行。他们到达时，苏联的青年代表团团长等已守在门口迎候。

任弼时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他的谈话还是通过翻译进行的。任弼时说：“中国人民和各级干部还不太熟悉苏联，特别是不太了解苏联人民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今后，我们要陆续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察、访问，还要增派留苏学生；同时也希望贵国派团来中国访问。通过互访增进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代表团团长高兴地说：“来华前，斯大林同志嘱咐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给中国同志带来苏联人民的友情和敬意；二是让我们很好地向伟大、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学习。”说着，他捧出一个带有苏联共青团旗图案的盒子，双手递给任弼时说：“这是我们特制的‘苏联共青团纪念章’，送给中国同志，表示对‘中国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贺！”

任弼时十分珍惜苏联朋友赠送的礼品，指示立即分发给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大家把制作精美的纪念章佩戴在胸前，情不自禁地和来访苏联客人挽手唱起国际歌，边唱边跳，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友好。

也是在全国青年大会期间，任弼时在前门外烤鸭店设宴招待苏联青年代表团。任弼时乘车到烤鸭店后，司机老王拉住执行护卫任务的便衣队员刘满昌的手问："全聚德的烤鸭最有名，可惜我们司机不能进去，你帮我弄出点好吃的行吗？"

"不行，这是违反纪律！"刘满昌一脸严肃地说。随后还叮嘱老王："把车维护好，别在首长用车时发生问题。""这你放心，没问题。"老王说。在刘满昌要离开的当儿，司机老王又嘟囔了一句："我求你办的事可别忘了！"老王对刘满昌的脾气已经摸透了，凡别人求办的事，他通常会千方百计尽力而为。

刘满昌虽然嘴里说不行，心里却在暗暗想着怎样满足老王的心愿。因为他深深了解这些在首长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为保证首长的需要，他们工作任劳任怨，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再有当时刚进北平，生活条件有限，多数时间只能吃小米、粗粮，所以特别馋肉。

宴会在全聚德饭馆的楼上举行，这里虽不如北京饭店气派，但它是个闻名遐迩的北京百年老字号，环境整齐干净，烤鸭酥脆香嫩。

刘满昌是头一次吃烤鸭，但他顾不上细细品味烤鸭的美味，因心里总惦着老王拜托的事。他匆匆结束了"战斗"，顺手抓了几张小饼卷了些鸭肉，悄悄地溜了出来。

等在门口的老王，从刘满昌手里接过卷肉饼就往嘴里填，看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刘满昌笑起来，"慌什么？又没有人抢你的！"老王大口吃着，顾不上搭话，油顺着嘴角往下流，也顾不上去擦，边吃还边冲刘满昌翘大拇指。

老王吃得正香，就见任弼时等领导陪同苏联客人出现在了大门口。老王急忙将滴着油的卷饼往衣兜里一塞，随即跑去发动自己驾驶的车。他没想到这一幕滑稽剧已被眼明心细的任弼时看见了。

其实，任弼时在下车时就听到老王对刘满昌的嘱咐，故而问刘满昌：

“你不是知道不能私自往外拿东西吗？你怎么还明知故犯？”“我是警卫，他是司机，我们的工作需要相互配合。再说，老王的开车技术好，工作也很卖力。所以我想帮帮他。可这样帮忙是违反纪律的，回去我一定检讨。”

“不，这件事你做得对！我们在里面吃饭，司机在外面干等，很不合理！这是沿用旧政府的那一套做法，今后必须纠正过来。”任弼时温和地说道。

事后，任弼时立即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要解决司机的工作和宴会用餐问题。从此，中央机关开会或其他场合用车就多了一条规矩，在首长用餐时，也一定给司机再另外准备一份饭菜。

他见到高富有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再动，鱼就不上钩了。”/任弼时说：“你们为什么穿这样一身衣服呀？”

为了筹备和召开青年团代表大会，长期身体欠佳的任弼时日夜辛劳，主持会议，起草文件报告，接待外宾，面面俱到。由于过于耗费心力和过度劳累，大会一结束，他的身体就垮了下来。中共中央随即作出决定，要任弼时停止工作，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早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叛徒告密，任弼时曾两度被捕入狱，身体遭受了极其严酷的摧残。此外他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严重病症。然而，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他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工作。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的病情加重，所以一进北平，党中央就要求他减轻工作。

中央决定让任弼时停止工作专心治疗和休养后，他被安排常住在幽静且空气清新的西山一带。负责治疗的医生建议他可以经常钓钓鱼，以调养身心。故而任弼时身肩鱼竿的身影，便时不时会出现在颐和园内。

任弼时第一次到颐和园钓鱼那天，便衣队队长高富有一早就接到了通知。一听说任弼时要来，高富有十分高兴。从延安到西柏坡，他和任弼时

一直处于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在转战陕北期间，手枪连守护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所在的前委，更是不离左右。

任弼时那两撇颇像斯大林的短胡须，常给人以一种威严、神秘的感觉；而和他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很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非常平易近人，有时就像一位令人敬重的兄长。他身上的忠诚、负责、坚忍和律己精神，也让人感到钦佩。

接到通知后不多时，任弼时就来了，他左肩扛着鱼竿，右手提着小桶，很轻松的样子。他和高富有见面时，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亲切握手，问长问短。随后，高富有为任弼时引路，沿一条小路穿过后山，来到了颐和园的园中之园——谐趣园。

谐趣园内一池碧水，碧绿的睡莲花苞刚刚露出尖尖角，薄薄的叶片平静地浮在水面。池边屋前有一个宽阔的大平台，园内四周回廊环绕，周围是假山翠竹掩映。青山绿水，搭配古色古香的亭台楼榭，宛如一幅幽静、秀美的图画。据说这里早年也是慈禧流连垂钓之地。

任弼时环顾四周的优雅环境，顿时来了兴致，他顺手拿出几根鱼竿，递给高富有一根说："来，高富有，咱们一起钓鱼。"

钓鱼对高富有来说，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他学着任弼时的样子，挂饵、撒竿，和他一起钓了起来。

但高富有生性好动，撒下竿子没多久，就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站着不是，坐下也难受，他不时来回动弹着，调换姿势。

"富有啊，钓鱼要静心。老动可不行啊！再动，鱼就不上钩了。"任弼时看出高富有钓鱼还是个外行，老坐不住，就用手比划着，轻声地予以指导。

又过了几分钟，高富有觉得钓鱼实在难耐，另外他还要去检查一下中午准备的饭菜，便把鱼竿交给任弼时，说："我还有事，中午您就在听鹂馆吃点便饭……"

"不用了，午饭我自己带来了。瞧，这是水，还有饼干。这足够了。"任弼时说着拿出了他带来的一只军用水壶和一包饼干。"其他人（指秘书、司机和警卫员）到你们食堂吃饭就行了。"

“那不好。您应注意身体健康，都去听鹂馆吃饭，我已经安排好了。”高富有坚持说。

“不行。我现在是休息养病，不是工作，怎能到那里吃饭呢？不要再多说了，就这样定了。”任弼时说得很认真。

高富有知道任弼时一贯要求自己严格，公私分明，毫不马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其实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薪金，只有几个零花钱。按说首长们在听鹂馆吃顿便饭，不算什么，更何况任弼时身体又有病……可高富有清楚，再劝说也是不起作用的。

下午，任弼时钓完鱼准备回家时，高富有又到谐趣园来相送。他顺势往鱼桶里一看，见桶里只有几尾小鱼，总共也超不过半斤。这也许是由于战乱，公园的管理和喂养不善，水里的鱼自然不多，大鱼就更少了。

“就钓了这么几条小鱼？”高富有说。“这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任弼时哈哈笑着说，“医生建议我钓钓鱼，休养活动，我在遵照执行呢。这次钓的不多，下次再来钓嘛。”他显出很满足、高兴的样子。

这以后，任弼时果然隔几天就来颐和园谐趣园，每次来都显得心情愉快，很开心。不久，颐和园就向群众开放了，游人渐渐增多，每逢任弼时来，高富有总要照例进行布置，以保证安全，并经常到现场去看望任弼时。

后来任弼时说：“高富有啊，你工作忙，以后就不要管我了。这地方我熟悉了，自己也能行。”“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再说也想来看看你呀。”高富有说。

“你主要要照顾好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这里没有什么关系。”任弼时一再说。

在闲谈的时候，高富有向任弼时讲了便衣队最近的一些情况。他告诉任弼时，便衣队不少队员，现在分派到各点上做起了小商贩，卖香烟瓜籽，还有的开茶馆、在照相馆或粮店当学徒，也有的当起了三轮车夫。任弼时听了问：“他们会干吗？愿意去吗？”

“大家懂得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都在努力学着去做，没有怨言。”高富有说。“当然干起来困难也不少，就说当三轮车夫吧，不怕吃苦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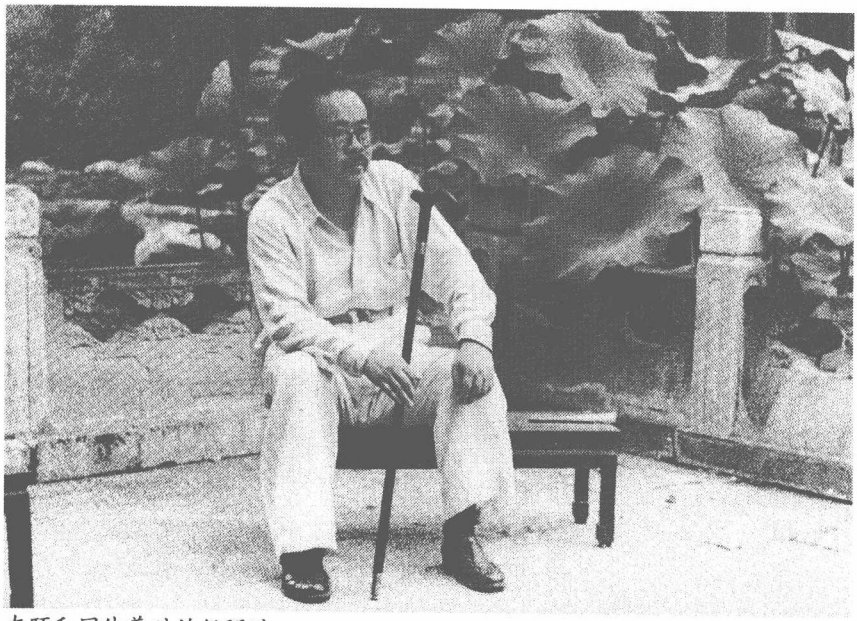
行，还要熟悉北平的街道、胡同和道路。做小商贩学徒也不易，不仅要干杂活累活，有的还得给老板娘端尿盆、洗脚水。”

“请转告同志们，我们刚刚解放，绝不会永远这样的！同志们还年轻，国家的建设事业很需要人，只要大家在工作中注意抓紧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及各种技能，必然会给国家作出新贡献的。”

任弼时的话语重心长，高富有听了也不住地点头，“我一定转告大家，一定做好工作。”

任弼时又打量了一下高富有，看见他没穿解放军的军装，而是穿了一套傅作义军队的军官服，便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穿这样一身衣服呀？”

高富有说：“穿我军发的制服，走在街上常会被误认为是劳动大学（中央机关的代号）的工作人员，学生们常会围上来询问‘劳动大学招不招生，什么时候招生’，我觉得不好回答，就穿了这身衣服，现在街上穿这种衣服的人很多，这样便可省许多麻烦。”



在颐和园休养时的任弼时

“啊，原来是这样。”任弼时边说边点头，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工作忙，忙你的事去吧。我现在是休息，不是工作，不需要你们照顾。你这样为我跑前跑后，我心里反而不安了。”

高富有知道任弼时惯于从严律己，也就不再为自己的工作而辩解了。

而令高富有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年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就因病重不治而与世长辞。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视任弼时同志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执绋前导，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这位“人民的骆驼”举行了两天祭悼。1951年7月8日，任弼时的灵柩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亲自为墓碑题名。

开国前夕的中秋月夜，邓颖超来到了昆明湖上/一边与战士们品尝南方荔枝，一边聊起了家乡的土改

1949年的农历八月“中秋”，颐和园的昆明湖上，秋高气爽，月朗风清。这是共和国成立前夕的最后一个传统佳节，是夜，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来到了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和便衣保卫队员们一起过节，她与这些对党无限忠诚的普通战士分享了革命成功在即的喜悦。

那晚，便衣队员张文健接到了指令，他和五名战友一道，在北京颐和园东宫门外，等候即将到来的邓颖超大姐。

傍晚时分，邓大姐走下了汽车，面对这座古雅、优美，刚回到人民手中的皇家御园，她很有感慨地说：“上次来这里时，还是20年前呢，那次是为欢送赴欧勤工俭学的同志们。”

年轻的警卫战士听了很是惊讶，不仅因邓大姐丰富的阅历，还因20年前，他们都还没有出世呢。

邓大姐中等稍胖的身材，虽然只有45岁年纪，但因长期为革命事业操劳已显得有些苍老；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一天是周末，又是中国人

民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跟邓大姐同来的还有全国妇联的同志，周恩来却由于忙于公务，虽近在咫尺，却没有时间陪她共度这良宵佳节。

不过这天夜晚，邓大姐的情绪很好，她在昆明湖码头上船后说：“今天是八月十五，夜色这么清朗，月亮这么浑圆，我们大家就在昆明湖上一起过节吧。”

几名便衣队队员登上了另外一条游船，紧随邓大姐的船后护卫。

邓大姐看到便衣警卫的船只在后，就一定要将两只船连在一起。开始队员们有点不愿意，因为和中央首长坐在一起会感到拘束，同时对安全保卫工作也有些不便。

邓大姐看出了便衣警卫们面有难色，便说：“咱们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分两处呢？还是大家坐在一起说话方便，也更热闹些。”

既然邓大姐发话了，战士们就遵命照办。



1949年春，部分驻守颐和园的便衣保卫队队员在昆明湖畔合影

两只画舫游船连在了一起，而当便衣队队员们与邓大姐和妇联领导们面对面时，大家却显得有几分不自然，脸上直冒汗，一时也不知说什么话好。

邓大姐猜透了战士们的心思，就让人搬过来一筐南方来的荔枝，再三请大家一起品尝。这荔枝是刚上任的广州市长叶剑英托人给总理和邓大姐捎来过节的。战士们哪里好意思吃呢！

于是，张文健主动站起身来，找了个理由说："报告首长，我们是军人，不能在外边随便吃东西。"

邓大姐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不对！刚才我说过了，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说是在外边呢？"

"你们不动手，还要让我给你们送到手上才吃啊！"说着，她果真站起来，给大家分送开荔枝了。

游船在水里划行，一摇一晃的，人在船上行走，不小心就会摔跟头的，更何况邓大姐人到中年，身体还很虚弱。

警卫战士们这下可为难了。吃吧，不好意思；不吃吧，邓大姐的盛情难却。

这时，邓大姐倒有几分生气的样子，说："我给你们提一点抗议了，我是来休息的，可不是来侍候你们的，为什么还要我一个个给你们送呢？"

张文健看邓大姐真生气了，赶紧说："大姐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听您的话，吃就是了。"

于是他对身边几个战友说："大伙快吃吧，别再让大姐生气了。"

广东荔枝的味道的确鲜美，真不愧是中国南方的名产。在解放前夕的北平，是很难吃到的。警卫战士们大多也是第一次品尝。

这会儿，大家谁也不再客气了，高高兴兴地吃起了新鲜荔枝。一会儿工夫，多半筐荔枝就下去了。邓大姐见状，这才高兴地笑了。

邓大姐和战士们一边吃荔枝，一边拉起了家常。

她逐个问了便衣队队员们的姓名、年龄、参军时间以及家庭情况等。战士们一一作了回答。

张文健还特别向邓大姐报告了自己的家乡在土改中有“左”倾现象，错斗中农，乱杀无辜等等。

邓大姐说：“这种现象是违反党中央土改政策的，我想一定会很快得到纠正的。”

邓大姐说的话果然很准。不久后张文健家乡的人就来信说：土改中的一些错误现象已经得到了纠正。坏人受到了惩治，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秋季获得了好收成。

在邓大姐的热情感染下，船上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陪伴邓大姐来的两位女同志，还情不自禁地和邓大姐一道，轻轻地唱起了“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流行的革命歌曲。

此时，月挂碧霄，银辉满天。岸上的一亭一榭、一木一石依稀可辨；倒映在水中的月亮，恰如水面上衔含的一颗玉珠，微风一吹，波光闪闪；船水激荡，浮光跃金。

一船人都陶醉在这美妙夜影之中……

五　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特务们盯上了进出中南海的小轿车/中南海里的上厕所难题/被锅炉房里的巨响吵醒，毛泽东发了火/“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

随着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北平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改善，同时又因为新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纷繁，中共中央的领袖们经常在市内活动到很晚，中央决定毛泽东从香山移驻中南海。而毛泽东搬迁中南海的话，中共中央和军委核心机关也要随之而动。

大约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因为从6月15日后，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从此逐渐就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方面了。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小汽车队一出现，进进出出中南海，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

车多了起来，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西单长安大戏院前，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便衣队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都身着便衣，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位，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由于长期生活战斗在山乡农村，搬进中南海之后，毛泽东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而且人们事先也没有预料到，住在皇帝的禁苑里，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不方便。

搬进中南海后，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上厕所。中南海里的许多院子里没有厕所，有的大院子里只有一个厕所，上厕所很不方便。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住进中南海后就是因为夜里起来上厕所，被绊了个跟头摔断了腿。

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办公住宿的颐年堂东院菊香书屋，虽然院子里有卫生间，但与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不挨着。因此，毛泽东的盥洗、解手等生活问题解决起来都有些不方便，都要从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里走出来。

毛泽东身边负责内卫的李银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都曾建议挨着毛泽东的卧室加修一个卫生间，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趁毛泽东离京到外地的机会，才安排中直修办处第一施工所，在菊香书屋园内给毛泽东和江青各自的卧室边上修了一个卫生间。

除了上厕所的问题，还有喝水、洗澡、取暖的问题。菊香书屋是老平房四合院，没有锅炉烧水，冬天是烧地炉取暖的，但因年久失修，地炉的管道也不通了。考虑到喝水和冬天取暖的需要，警卫们提出在平房院和屋内安装锅炉和暖气片。锅炉最后选定在靠近毛泽东办公房间的一块空地上。小锅炉安装后，毛泽东喝水、洗澡和取暖都方便多了。为了能让毛泽

东洗上盆浴，警卫员还特地在锅炉房里安装了一个大浴缸。

一天，毛泽东工作到了凌晨，刚回卧室睡下不久，就听锅炉房内发出咣当一声响，他一下被惊醒了。

原来，是锅炉坏了，工人们趁毛泽东休息时，抓紧时间在抢修锅炉。哨兵怕修锅炉的动静大影响毛泽东休息，特地要工人暂时停工。可师傅们急于修理锅炉，没听哨兵的劝告。结果在施工中，不小心把水管砸在了浴缸上。

毛泽东被惊醒后，披上衣服出来，不高兴地对哨兵说："你们知道我睡觉了，还弄出那么大声响吵我，还不赶快出去立正站着！"

见毛泽东发了脾气，哨兵非常紧张，赶快规矩地在外面罚站。毛泽东又补了一句："你就在这儿站着，等我起床后才能走。"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朝屋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里立正罚站，就大声说："不要站着了，你回去吧。不过要写一份检讨，以后不能再弄出那么大声音了！"

事后，警卫长阎长林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做了详细汇报和自我批评。警卫班还为此专门召集了会议。会后，阎长林向毛泽东汇报了相关情况。毛泽东笑了笑说："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正式迁居中南海后，毛泽东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就是感觉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叶子龙报告，身边还得带一大帮警卫随员。

毛泽东在中南海没住几天，就有点憋不住了。

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卫士李家骥说："小李，咱俩儿去北平郊区走走，怎么样？"

李家骥为难地说："不能去，会出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 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想出其不意地"冲出"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这下子让李家骥陷入两难，他既不能违反中南海的警卫规矩，又不好

不服从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呢？

迟疑有顷，李家骥无奈地说："主席，我和您不一样，我必须执行规定的纪律，不然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处分了。"

听李家骥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沉默了，继而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人民还算什么主席、领袖呢？我们共产党人，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了。"

过了片刻，毛泽东又感慨地对李家骥说："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特务崔铎奉刺杀令秘密潜入北平/炸弹爆炸致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六人死伤/庆祝活动的保卫安排更加缜密/某部的一位军长违反规定硬要带枪进入会场

1949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的先农坛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都将出席这个纪念大会，毛泽东还将在会上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参加这次集会的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和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600多人，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北平集体亮相。

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了这一消息后，随即指派原保密局外勤北平站的特务崔铎，秘密潜往北平，利用中共领袖出席纪念活动公开露面的机会，寻机实施谋刺。

崔铎是保密局外勤北平站特务段云鹏一手培养的。段云鹏曾师从清末有名的武侠"燕子李三"，因此经他调教的崔铎武艺高强，会飞檐走壁，能双手打枪，且百发百中，有"飞贼"、"赛金豹"的绰号。

就是这个崔铎，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曾参与制造过一起震动北平的事

件——暗杀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由于何思源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使得蒋介石必欲置其于死地。保密局长毛人凤派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往北平部署谋刺。段云鹏、崔铎等遂被保密局外勤北平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选为杀手。他们原计划在何思源寓所附近用手枪射杀，后由于担心难以逃离现场，改用在何思源住房上安放炸弹。然而炸弹爆炸后虽导致何家六人死伤，何思源却幸免于难。

让崔铎想象不到的是，他刚刚潜入北平，北平的公安部门就接到天津市公安局传来的消息，说通过间接情报获悉，“七一”前夕将有国民党特务潜入北平，很可能会利用庆祝活动谋刺中共领袖。

在得知这一消息时，距离庆祝活动举行只剩三天了。北平的公安机关闻风而动，主动出击展开侦查。就在这时，天津方面又传来消息，说潜入北平的特务住在前外大街。北平方面根据这个线索，通过前外街道办事处的临时户口登记，认定刺客就是近期从香港来北平做丝绸生意的登记者，随即对之实施逮捕。经过审讯，证实此人正是奉命来北平谋刺中共领袖的保密局特务崔铎。

崔铎的落网，不仅没有让“七一”庆祝大会的保卫者们感到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反而促使他们对庆祝活动的保卫安排更加缜密。对大会会场，对中共领袖前往会场的路线，都做了严密的布控。同时对参加庆祝会议的人员，也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要求，例如绝不允许与会者带枪进入会场。

7月1日那天，奉命负责保卫出席大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便衣队队员们，按时来到了先农坛的庆祝会现场，并迅速站到了各自岗位上。庆祝会的主席台就设在体育场坐西向东的位置，在与会代表大都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来到了会场。

就在这时，担任会场内警卫的便衣队队员接到大会门卫打来一个电话，报告说：某部一位军长违反规定带枪进入会场，因不听劝阻而被门卫下了枪。但那位军长不服气，和门卫发生了激烈争执。

因此事直接关系大会的安全纪律，便衣队队员们立即通过秘书处工作人员向主持大会的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接过电话直接与那位军长通了话，在询问他的单位和姓名后，周恩来严肃地说：“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

是中央的规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每个参会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为什么要违反？”

那位军长得知与他通话的是周副主席，知道闯了大祸，赶快向周恩来检讨并承认错误。周恩来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若不是看在你是刚从前方回来的，认错态度比较好，今天不但要下你的枪，还要将你扣起来呢。现在，我准许你回单位继续检讨，听候处理！”

周恩来放下电话，还特地走到便衣队队员们面前，夸奖道：“好啊，你们这种认真、负责执行中央规定的精神，值得表扬。”

会前的一场风波刚刚平息，老天又发起了脾气。一时间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前来参会的许多干部、战士都没有带雨具，结果淋成了落汤鸡。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也和大家一道挨了淋。

但是，庆祝会的会场并没有发生混乱，与会者们也没有离开会场，而是秩序井然地等待大会开幕。

这时，毛泽东的汽车开来了。他在警卫战士的护卫下，刚刚走出汽车，瓢泼大雨居然奇迹般地停下了。

毛泽东健步走上主席台，和全场的同志们一道欢呼：

“庆祝党的28岁生日！”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与会者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挥了挥手，高声回应道：“同志们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先农坛体育场都沸腾了。

庆祝大会宣布开始，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周恩来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会场内外，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豪迈的精神，唱出了从艰苦卓绝中走向胜利的英雄气概。

大会由刘少奇作主题演讲，他用深沉的语气回顾了党走过的28年战斗历程：“28年来，党在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犯过错误，失败过。但是，自从遵义会议树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后，党便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解放全中国。”

他还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大会上吟咏了他的新诗作《新华颂》：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这是一个热烈的、隆重的、庆贺胜利的、激情洋溢的大会。大会圆满告结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陆续离开了会场。

细心的周恩来却没有忘记刚才受到批评的那位军长，他拉过便衣队员刘满昌，对他说：“请你把刚才那位在门口闹事的军长张振武找来。”

张振武军长一路小跑而来。他40岁上下，身材魁梧，面带威严，在长征时期他就是红军营长了，因作战勇猛，后升任为某部军长。不久前，他才从湖南前线调回北京。

因为刚刚在电话里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张军长感到很郁闷，开会时就站在会场一个角落，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此刻，他听便衣队队员来说周副主席找他，神情更加紧张。他跑到周恩来跟前，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

周恩来伸出手来和张军长握了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他询问了前线的一些情况，继而问他对刚才的事有什么想法？

张军长激动地说：“报告周副主席！是我错了。向您承认错误后，我也向负责门卫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我原来片面地认为军人应该枪不离身，对中央规定开会不许带武器的安全考虑并不理解。所以犯了错误，我再次向您检讨。”

周恩来说：“你能很快认识错误这很好。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希望你回到部队也以这个事件来教育

广大干部和战士，使我们的部队成为既能打仗，又会建设，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今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需要这样的军队来捍卫。”

周恩来的话，让张军长的紧张情绪逐渐松弛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周恩来保证：“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周恩来满意地笑了，同他一起乘车离开了体育场。

六　从政协会议到开国大典

政协会议前夕突击查捕敌特/毛泽东进入会场,代表们欢声雷动/便衣队区队长刘忠接受秘密任务,怀仁堂以身挡“刺客”

1949年下半年，前后有三个重要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相继召开，这就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还有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商讨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另两个会议则是人民政权建立初期首次召开的世界区域性大会。

特别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安全警卫工作是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也是为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

为了保证三大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作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了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对保卫政协大会实行统一领导。

按照联合指挥所的部署：由公安中央纵队负责中南海会场内部的警卫和会场周围的警戒，北平纠察总队负责会场外围、代表住所和代表行车路线的警卫，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方面的安全控制，便衣保卫队直接负责与会的中央首长的人身安全。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各个安全保卫单位都分头采取了行动。北平市纠察总队警卫营配合公安局，包围了原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获了前来北平刺探军政情报、盗窃政协文件、调查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情况的中统特务赵冰谷；中央公安纵队也协同公安部门查获了7名反革命分

子，发现了36名嫌疑分子，还查获了一批隐匿的枪支弹药。

就在政协会议开幕的前夜，北平纠察总队还采取了突击行动，一举抓获潜藏在市内的反革命罪犯王风岗所属匪特175人，给敌特势力以沉重打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人士75人，总共662人。

在人民政协的宏大代表阵容中，不但有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从国民党营垒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前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全部代表。

怀仁堂会场内布置得庄严而又喜庆。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孙中山先生画像，画像中间是人民政协徽章被金黄的绸布衬托得熠熠发光。画像两边竖立着四面解放军军旗，代表四大野战军。横幅上书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会议大厅内，宫灯



中南海怀仁堂

和日光灯交相辉映。主席台下，座位像各国议会一样，成半弧形围绕着主席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早已入座的代表们心情异常地激动。他们一边愉快地交谈着，一边等待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到来。下午7时整，当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手持代表证，走进中南海怀仁堂时，全体代表起立，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还情不自禁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顿时，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会场。

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正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代表们对毛主席的致辞一再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然而，与会议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怀仁堂会场内外，警卫战士们百倍警惕，严阵以待。

中南海警卫营是负责中南海内党中央驻地内卫任务的，是中共中央领袖们的贴身警卫部队。此时此刻，他们除了每天在会场内外的33个固定哨位警戒外，还在重要和复杂地点增加了多个游动哨和固定哨，以保证会场内外的安全环境。

在会议召开期间，警卫营几乎全部出动，日夜执勤巡逻，即使轮换下哨后，战士们也主动在防区内巡逻、游动，以防有什么漏洞。工兵班则要在每天开会前对会场内进行一次安全探雷检查，防止敌特分子在会场内埋藏地雷、炸药等。

在会场的入口处、停车场等部署了警卫和便衣；在会场东、西门分设单、双号验证人员，代表一律凭证入场，防止无证人员混入；在会场的盥洗室处也设有便衣警卫，以防坏人潜入藏身，贵宾休息室的便衣人员，更是要时刻保证首长休息时的安全；在会场外围也各设一两个警卫。

中南海警卫营还派了一个班兵力，短短数天之内，在会场四周指定的

防空地带，开挖了200米的防空壕，以防敌人的空袭破坏。

与此同时，驻守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的个别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绝对保密的政治任务。

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找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李福坤的话，让刘忠想起了一个多月前，他和李广仁带领便衣队一个分队刚进入中南海，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报到时，李福坤处长表情严肃地对便衣队员们的一段训话。

"你们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担负便衣警卫，任务光荣，责任重大。"

"只要中央首长在勤政殿、怀仁堂，一切安全保障就统由你们负责！"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图为大会主席团就位的情景

“各项工作只能做好，不许出一点纰漏。”

接下来，李福坤又向便衣队队员交代了注意事项和纪律。

“你们自进入中南海之日起，一律不许对外通信；也不许在海内高声喧哗。”

“有事外出中南海，必须经分队长批准，凭假条按指定门口出入，不得超时……”

这些纪律和要求，随即牢牢地印在了便衣队队员们脑海。他们对在中南海举行的每次会议和活动，都精心安排安全保卫，不敢有丝毫马虎。每当会议或活动圆满结束后，刘忠望着远去的首长车辆和人群，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心想：这一天总算平安地度过了。

按便衣队队员们的说法：每一次任务一下达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任务完成后，才把心放回肚子里去，正所谓“提心吊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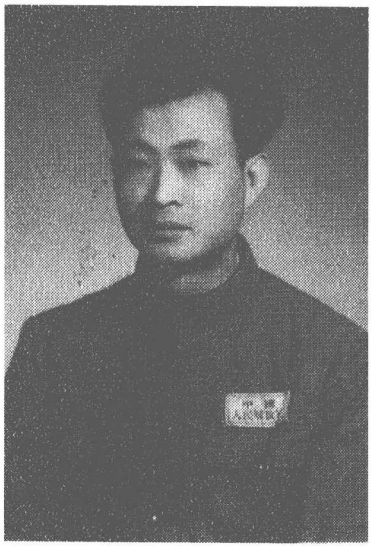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等曾专门召集刘忠等人，在中南海瀛台开了一个会。刘少奇在会上说：“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左中右各派都有，情况十分复杂。好人是多数，中间派不少，坏人也肯定有，但人人有代表证，很难分辨出来。所以，抽调你们来，就是要保卫毛主席、中央首长和代表们的绝对安全，不准出任何差错。保卫这次会议的任务完成好，就给你们打100分。”

而此时刘忠听着李福坤的交代，心中不禁有点疑惑地问道：“李处长，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就是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接着说道：“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一回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任务交代完后，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



便衣队队长刘忠为保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竭尽全力。

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我会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领受了任务的刘忠，内心再难平抑下来。他担心可疑对象身上携带了手枪，那样制服的难度就会增加。因领导交代，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能轻易动枪，那会危及其他代表和领导人的安全，给大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刘忠想，一切都豁出去了，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一切行动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也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他发现那人40岁左右，身材高大，一身西服革履，很有派头。刘忠看了心想，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这一重任，大概也与自己的个头比较高有关系。

当会休时间，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休息。刘忠见毛主席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此刻，毛泽东下了主席台往会场外走。刘忠发现那人也想朝毛泽东出去的方向往前挤，刘忠遂抢前一步，挤在他的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当那人试图从他左面超过时，刘忠就在左边挡住他；他想往右绕，刘忠就也把身体移向右边。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他靠近毛泽东。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

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持有代表证的非代表。

菜农的胳膊不可能那么白！/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10月1日，周恩来到天安门检查安全

距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为了确保这一开国盛典的安全举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安、安全警卫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协同作战，共同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当时公安中央纵队刚刚成立，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开国大典。部队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控制，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警卫营担负了天安门城楼

上下及周围地区的警卫，北平纠察总队负责对御河、金水桥和天安门周围各角落进行检查，以严密警戒控制了会场周围的各制高点。

即将举行新中国成立盛大庆典的消息传出，也使台湾国民党敌对势力十分震惊。他们迅速布置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庆典活动进行破坏。

当时的亚洲饭店（现前门饭店），是为前来参加开国大典代表准备的住宿饭店之一，台湾方面得知这一情报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伺机混入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他挑着一担新鲜蔬菜，看得出来，蔬菜水灵灵的，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菜农来店后，执勤哨兵都会让他们把菜送到指定的位置。

吴瑞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头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他送来的。哨兵认识饭店有个采购员叫王强，于是就准备放这个菜农进饭店。正在这时，吴瑞金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他抬头擦汗时，露出了又白又胖的胳膊，哨兵顿时心生疑惑：菜农天天在田里干活，风吹日晒，胳膊不可能这么白，这人肯定不是菜农。于是，哨兵把吴瑞金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

审讯中，吴瑞金的破绽越来越多，他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就企图服毒自杀，但被执勤战士迅速制服了，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

在饭店制造爆炸事件的计划破产后，台湾特务机构又启动了第二套方案，直接在天安门等重要地段实施破坏行动，以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一天，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巡视。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

夜幕降临时分，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一般人是吸不起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

他立刻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到了第五天，他预

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拿笔画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人画的好像是一张线路图，便上前查问。

那个人一惊，见自己暴露了，便立即掏出匕首，负隅顽抗。刘拴虎上前与之搏斗，几个回合下来，刘拴虎便将那人擒获。

经审讯查清，此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出天安门的地形图，准备在10月1日开国大典这一天，用炸弹袭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车队。

这个北平特务的落网，为开国大典的安全铲除了又一隐患。

天安门城楼一带，是开国大典安全保卫的重中之重。公安中央纵队早就派了专人对城楼进行全面清理，并重点实施安全保卫措施。

公安中央纵队战士赵太和，在大典前一个月就上了天安门进行清理检查。城楼的木梁上鸽子很多，由于长时间没有人清理，鸽子粪堆积了有一尺多厚。赵太和他们将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打扫，仅清理鸽子粪就用了十多天。随后，又用探雷器对城楼各部位进行了安全检查。探雷器是苏联有关部门提供的，这种探雷器前面是一个盘子，顺着盘子出来一根线，这根线接到耳机上，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为了给开国大典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安中央纵队还积极行动，对天安门附近的每一条街道、胡同进行了拉网式清理排查，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这些行动都为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奠定了安全基础。

高富有带领的便衣保卫队部分队员，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据李福贵回忆，他带领的部分便衣队队员在9月30日当晚就到了天安门，开始了警卫布置。为此，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件大衣，北方的仲秋之夜还是很冷。李福贵他们负责警卫的地段，是天安门东边第二观礼台，翌日在这里观看开国大典的，是被邀请的各国高级外宾。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实施了戒严。各路口严禁任何车辆行

人通行。

天刚蒙蒙亮，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周恩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此负责警戒任务的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队长吕展，一见周恩来就要向他汇报。

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了，我们还是到现场看一下吧。"

周恩来沿警卫路线查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详细过问。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内，周恩来在主席休息时要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然后他又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声音是否失真，最后还沿着散会后毛主席要走的天安门城墙，一步一步实地勘察。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边新搭起了两座临时观礼台时，就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是否经过了试验？如果站上去的人多，是不是牢固？"



开国大典上，步兵方队迈着雄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

一大队副政委骆骥在一旁接着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周恩来随后还交代，下午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贵宾中，有几位年纪大了，爬城楼坡道会很吃力，要派几个战士搀扶他们上去。

那一天，古老的天安门装饰一新。城墙上第一次挂起了由著名画家周令钊夫妇新画的毛主席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城楼内还悬挂了八只大红灯笼。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整个天安门城楼和广场显得绚丽夺目、光彩照人。

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的电线杆上，都临时安装了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给开国大典增添了浓重的节日气氛。

孔祥惠带毛泽东的客人去观礼/特殊的队伍被安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观礼台/团员们激动得不吃也不喝

1949年10月1日这天清早，天还没亮，便衣队队员孔祥惠带领着一支特殊队伍从香山出发了。这支队伍有十多个人，中老年人居多，全是一色的农民装束打扮，其中还有几位裹过小脚的大妈，他们一路向东南方向行走，途经海淀区区委拿取了介绍信后，又继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行进。大家一路精神饱满，时而还在孔祥惠的指挥下唱起歌。

孔祥惠怎会去带领这样一支队伍？这些农民装扮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解答这个疑问，还要从十多天前说起。

9月下旬的一天，海淀区区委、海淀区开国大典工作组组长杨华，来到了便衣队驻守的青龙桥检查站，他找到站长孔祥惠说："小孔，交给你

一个任务，怎么样？”

性格爽快的孔祥惠问：“什么任务？你就说吧。”

杨华说：“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他说咱们党中央机关在香山住了这么长时间，给香山一带的群众带来了不少麻烦和不方便，这次举行开国大典的庆祝仪式，一定要邀请香山的群众派代表参加。现在，就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你来完成，负责带领毛主席邀请的客人——香山群众代表去参加开国大典。”

“都带哪些人去呢？”孔祥惠又问。

“咱们马上开始选派群众代表，原则是选派当地有威望的贫下中农代表和村干部代表。”杨华说。

杨华还向孔祥惠交代说：“你的主要任务：一是要保证这些代表的人身安全，不要有人丢失或生病；二是要保证这些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礼时不发生任何意外，确保开国庆典活动顺利成功。”

“我们到了天安门找谁接应呀？”孔祥惠还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到了那里肯定会有人接待你的。”杨华说。

没过几天，由各村推荐出来的群众代表名单就确定下来了。他们是从香山地区的十多个自然村中选派出来的群众代表，一共有十多位，其中除了两位年轻一些，多数都是上了些年纪的大爷和大妈。他们或是常年为村民群众服务的村干部，或是在当地百姓中享有威望的贫下中农。

孔祥惠还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特殊任务，是否能完成好心里也没有底。为了协助孔祥惠完成任务，海淀区区委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干部助手。

9月30日下午，孔祥惠召集香山群众代表观礼团的全体成员开了个会，他向代表们说明了纪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第二天行前准备些干粮和水。

10月1日上午9点多，孔祥惠带的香山群众代表观礼团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到处彩旗飞舞，人流如潮，一支支来自各单位的队伍在广场内会聚。

孔祥惠正琢磨着到哪里去找人接应呢，一眼看见广场中央有一个高挂的大喇叭正在广播，好像是个指挥部门，他就带队伍朝那大喇叭走了过去。当他把海淀区区委的介绍信递给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后，那人马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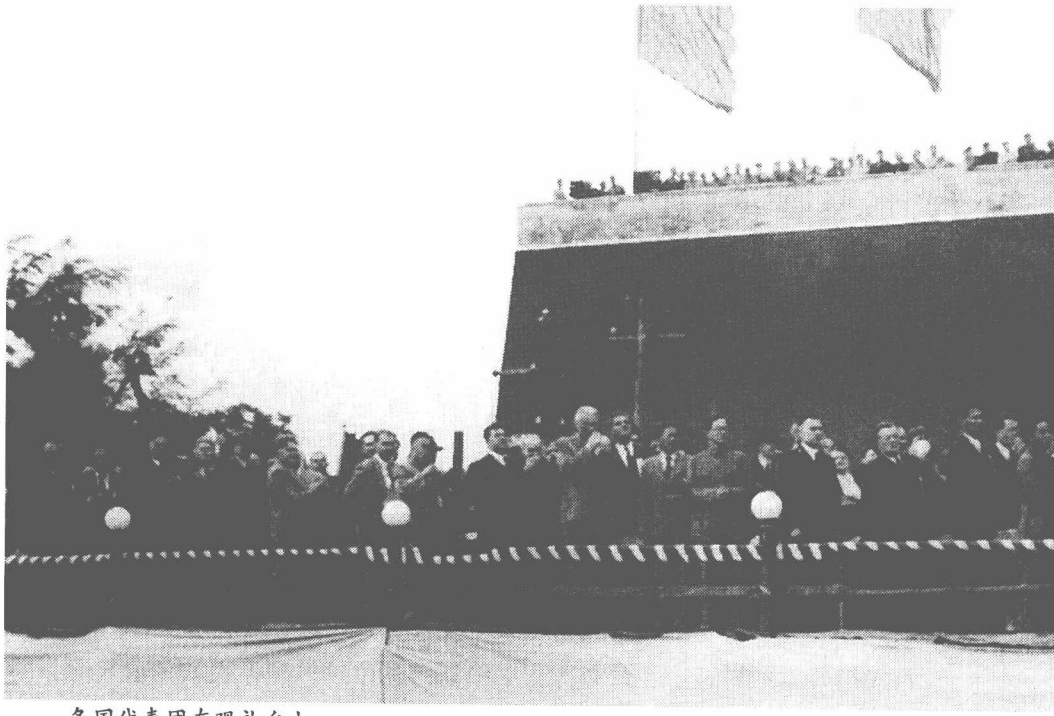
“好，你们跟我来。”

在那人的前引下，孔祥惠带领的这支群众观礼团来到了金水桥东面，劳动人民文化宫下面的观礼台位置上。

那观礼台十分简陋，是用木板临时搭建成的。到了观礼台已近中午，孔祥惠招呼大家吃点东西，喝点水。可团员们个个情绪激昂，都说不饿，也不渴，站在观礼台急切地等待着庆典的开始。

这时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伏，许多队伍都汇集在一起，互相地拉歌、唱歌，“解放区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解放军进行曲”等是大家最爱唱的歌曲，这成了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主旋律。

靠近孔祥惠他们观礼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队伍，他们那边的气氛非常活跃，一曲接一曲地唱着新歌，把观礼台上的农民群众代表们也感染了。几个代表说，我们也唱一个农民的



各国代表团在观礼台上

歌子吧，于是大家就唱起了几天前刚跟孔祥惠学会的“斗地主”歌。“你拿去了我们的土地，你夺去了我们的财产……”农民兄弟的歌，博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喝彩。

周恩来总理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旁若无人地直闯天安门/罗瑞卿接到报告说“照章办事”/孔祥惠带的几位农民大妈嗓子都喊哑了

下午2点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林伯渠、董必武、赛福鼎、郭沫若等的车依次停下，下车后大家相互致意握手，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的人行坡道走上城楼。

这时，城楼休息大厅外的东西两侧，有两位身穿崭新军装，臂佩“戍”字袖章，腰别驳壳枪，胸前还挎握卡宾枪的战士在守卫着，这即是为开国大典特设的礼宾哨位，这两个战士，是北平公安纠察总队一大队派出的傅发家和赵文生。

他们的形象和军容，赢得了城楼上诸多领导人和中外嘉宾的注目。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走出大厅，来到城楼中央检阅台前时，两位礼宾哨兵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笔直站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军威，时刻护卫着人民最高领袖的安全。

想起两天前，两位战士赶往设在北京饭店的纠察纵队队部，由领导正式向他们布置了这一光荣任务时，他俩的心情激动万分，对于这两个农民子弟来说，能在开国庆典之时登上天安门，守卫在毛主席身边，他们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荣耀。

警卫战士赵太和和他的几个战友，在那天执行了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由于当时天安门城楼上还没有安电梯，赵太和和战友就临时找来担架，把吴玉章、董必武、李济深等几位年长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用担架一位一位抬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几位坐着担架上天安门的长者也十分客气，一上了城楼，他们就跟抬担架的战士紧紧握手，表示感谢。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中共五老”里最年长的，年龄比吴玉章还大一岁。但当赵太和摆开担架，要抬他上天安门时，徐老却怎么也不同意，他执意自己能上，说着就迈开稳健的步履，一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近3点时分，周恩来请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了城楼中间的主席台位置上。毛泽东的出现，使整个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鼓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泽东亲自按下了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缓缓升起。

礼炮声一落，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翩飞的和平鸽在天安门上空环绕，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抬头仰望。

这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顿时如同欢腾的海洋，热烈的掌声、激昂的口号声经久不息。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人民自己的政府，千百年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梦想，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时，朱德总司令乘检阅车，沿着东长安街缓缓行驶，检阅由1.9万解放军官兵组成的受阅部队。

阅兵结束后，朱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守卫在那里的警卫战士忽然发现有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正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

由于这个入口处是直通天安门观礼台的，而她既没佩戴观礼证，也没有代表证，警卫战士就不客气地将她拦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她自称是中南海里某机关的主任，要到毛主席那里去。

这位女士确实身份不同一般，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她的自我介绍也不错，建国初期她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然而现场的警卫战士并不认识她，再说当天上级曾下了死命令：凡是证件不全的人，不管是谁，都不准进入，警卫工作“认证不认人”。因此，警卫战士坚决不放江青进入。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去，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级汇报，说有一个女同志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上级也感到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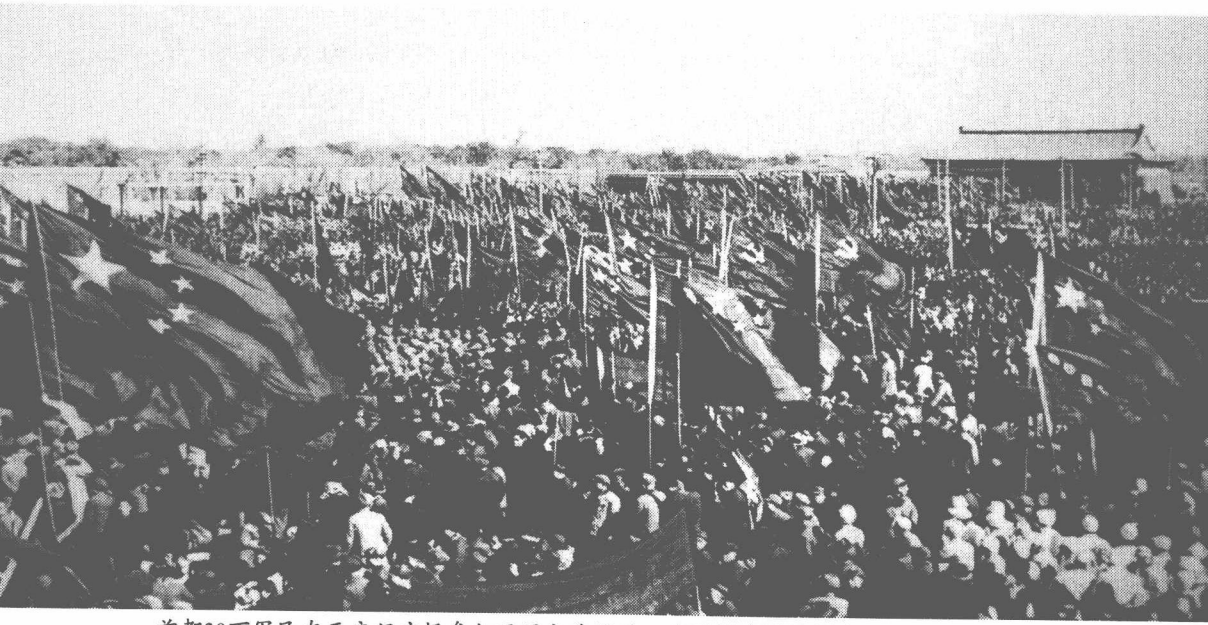
不好处置，又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的总指挥罗瑞卿请示。罗瑞卿回答很干脆："一切按规定办。"

接到罗瑞卿电话指示的，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骆骥。他随后急忙赶到现场，向现场负责的一大队保卫股长张殿章传达了罗瑞卿的指示。张殿章随之去给来人做解释工作。就在这当儿，骆骥认出与士兵争论的女士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骆骥见江青指着中南海对张殿章说："那边我都可以随便出入，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张殿章说："各有各的任务，我们照章办事，没有证件不让进。"江青见无可通融，只好悻悻而去。

朱总司令宣读完命令，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整理队伍，依次顺序通过了广场东侧的三座门，以正方形列队，走到天安门前接受检阅。

最前面是五星红旗开道，80多面红旗随风飘扬。接着是陆、海、空三军战士护卫的"八一"军旗作先导。第一方队是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官们，行注目礼正



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活动，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步走过天安门广场；后边紧接的是步兵和刚成立的年轻空军和海军方队；用汽车牵引的地面炮兵队和高射炮兵队紧随其后。

当受阅的飞机第二次飞过广场后，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便像潮水一般通过天安门。这时，军乐队方阵也向天安门金水桥走来，后边的少先队员队伍挥动双手，高呼着“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向天安门前拥过来。

这时，城楼上的毛泽东举起自己的帽子，一边挥动着向广场上和城楼下观礼台上的人们致意，一边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城楼上下的欢呼声、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领袖和人民的心声交相呼应。

孔祥惠和他带领的农民代表们也激动万分，好几位大妈都跳着小脚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一直喊到嗓子都嘶哑了。四周围什么都听不见了，都被震天撼地的欢呼口号声所淹没。

直到天都暗了下来，30万人参加的隆重的开国大典盛会才圆满结束。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离开天安门城楼前挥手向群众告别时，广场上的激动和热烈气氛再次达到了高潮。千百万群众一齐拥向了天安门金水桥，争相目睹城楼上人民领袖和开国元勋们的风采。

在天安门前执行警卫的战士们也无不激动。但他们依然严守职责，尽力维护着广场上的安全秩序，他们也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安全保卫工作的总指挥罗瑞卿部长，以及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汪东兴、便衣队长高富有等人都站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身后，时刻警惕地注视四周，一丝不苟地保卫领袖安全。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下篇）



一　发生在北京饭店里的故事

余心清“玉华台”调名厨/郑连福成为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总指挥/朱德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三军总司令了。”/“开国第一宴”菜谱

1949年10月1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当天的下午3时，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才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同时进行了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就在这一天，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新中国的领袖、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又聚集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庆祝贺。

世界上的著名饭店不少，而能在开国之际举办开国大宴的并不多。对北京饭店来说，举办如此隆重的大型中餐国宴也是头一回。而在此前受命到北京饭店执行保卫任务的便衣队员们，得以饭店服务员的身份，目睹了“开国第一宴”的盛况。

为了筹办这次开国第一宴，最忙碌的人，就数刚刚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了。他原是冯玉祥军中的随军牧师，30年代主张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内战遭国民党囚禁，经中共地下党大力营救才出狱。他非常熟悉礼宾的仪规，而且对北京饮食业了如指

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哪几位名厨，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因此，这史无前例的盛会就由余心清亲自统领操办。

北京饭店虽说是京城第一名饭店。但以往为适应洋人口味，多经营西餐，以法式大餐最为有名。只是在1947年国共合作军事调停谈判时期，中共派团常驻北京，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当时的北京饭店经理曾从泰丰楼饭庄请来几位厨师，专为中共代表做中餐。而现在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中餐宴会，仅凭北京饭店一己之力是难以承担的。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有“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从哪里入手操办国宴呢？余心清和当时北京饭店经理王韧、副经理沈平多次商议后决定，先引淮扬菜系入北京饭店，因淮扬口味适中，菜肴面点皆全，南北方人都易于接受。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余心清就曾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朱殿荣、王杜昆、杨启荣、王斌、孙久富等几位身怀绝技的名厨，承办了上百人的中餐宴会，那次烹制的菜肴得到了与宴者们的好评。

举办一场大型国宴，如同演奏一部大型交响乐，又如同一场大规模战役，需要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没有一位总指挥是不行的。大型宴会的总指挥行话叫“宴会总管”，如今称“宴会设计师”。担纲“开国第一宴”“宴会总管”的是北京饭店的郑连富，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宴会设计师”专业称号的人。

虽说解放前郑师傅也担任过不少大型宴会的主管，有着丰富的宴会设计经验，但如今能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执掌“开国第一宴”，郑连富内心既兴奋又感到有压力。他从宴会的餐桌如何摆，上菜的路线如何走，主宾进出的通道留多宽，哪道菜何时上，如何美化餐厅，都做了极其周到细致的思考。

执掌“开国第一宴”的总厨师长朱殿荣，做了几十年的菜，能在“开国第一宴”上做烹饪总理，让他感到无比幸运和喜悦。那些天，朱师傅心里乐呵呵的，可嘴上却没工夫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为了办好开国盛宴，北京饭店上下总动员，作了大量精心准备。首

先在保证卫生安全的前提下，所有宴会原料都经过了严格检疫，肉取哪个部位的，菜用哪个地方的，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工作，都是在警卫部门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的。

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绝大多数、各民主党派的领袖、社会知名人士聚集到北京饭店，宴会现场的保卫工作，被提到了一个很高位置。除了包括此前已派到北京饭店的部分便衣队队员在内的原有警卫力量外，又临时从别处增调了人员，一些平时在别处担任警卫工作的便衣队队员此刻也被抽调了过来。

10月1日晚七点整。

在欢快的迎宾乐曲伴奏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外贵宾们步入了宴会大厅，还有在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以及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会聚一堂，整个宴会大厅洋溢着一派喜庆欢快的气氛。

许多在场的饭店老服务员颇有感慨：过去，能光顾这一最高规格豪华大宴会厅的，大都是洋人、达官显贵和豪商巨贾。服务员们眼里看的最多是那些妖冶的西方女郎、西装革履的外国绅士、洋大亨、洋武官，还有穿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身着官服的国民党高官要员。

而今天前来参加宴会的，除了军政首长、外国宾客，还有许多朴实的农民，刚毅的战士，强壮的工人，看到这些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和战士，服务员们感到分外亲切，他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来到宴会现场负责安全保卫的便衣保卫队队员，一部分就隐身于在宾客中穿梭往来忙碌的服务员中间，但他们除了要像其他服务员一样端酒上菜外，还要时刻警惕地观察着出席宴会首长和外宾们身边的动静。

驾驶战鹰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和保卫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也来参加宴会了。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作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等，他们应朱德总司令的特别邀请，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来北京饭店赴宴了。他们的威武装扮，在大宴会厅内引起了众多宾客们的格外关注。

宴会正式开始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接下来，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举杯祝酒。随之，宴会大厅的气氛进入了高潮。宾朋们也纷纷相互举酒庆贺。

这时，只见朱总司令迈着稳健的大步朝飞行员们走去，他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酒杯，举杯向飞行员们祝贺。祝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接受检阅和保卫开国大典的双重重任。

因为就在当年的5月，国民党的飞机还突袭轰炸了北京南苑机场，因此，为了保证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庆典指挥部决定接受检阅的战斗机全部携弹起飞。这样，战斗机编队在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时，不仅是接受检阅，还时刻准备着与来犯的国民党飞机作战，保卫新中国开国庆典活动。

在开国盛典上肩负双重特殊使命带弹参加检阅飞行，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完全是特殊历史年代，特殊环境下所实施的一项空中特殊保卫措施。

朱德总司令看见飞行员们格外高兴，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都共同亲历了历史性的一幕。我们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军队，今后就翻开新的篇章了。"

朱老总还幽默地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军种，我就当一个军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陆、海、空三军。从今开始，我就是三军的总司令了！"

在场的飞行员和嘉宾们听后，都发出了畅快的笑声。

宴会开始上菜了，服务员们快捷地来回穿梭，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有条不紊地摆上了宴席。

"开国第一宴"的菜谱是由时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亲自策划、布置，由杨绍德具体安排落实的。既考虑了赴宴嘉宾的口味，也考虑了时令原料的采购以及厨师们擅长的菜肴。这个值得载入历史的"开国第一宴"菜谱如下：

冷菜四种：五香鱼、油淋鸡、炝黄瓜、肴肉。

头道菜：燕菜汤。

热菜八种：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

第二道和第三道热菜之间上四种点心，咸点有：菜肉烧麦、春卷；甜点有：豆沙包、千层油糕。

在宴会幕后的厨房里，几位身手不凡的大厨正各显神通。总厨师长朱殿荣14岁师从名厨，精通各式淮扬菜技法，“红烧狮子头”、“烧四宝”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孙久富号称“孙快手”，以制作面点为特长，他做的“淮扬汤包”、“火腿江米烧麦”软糯鲜香，满兜汤汁；“黄桥烧饼”、“萝卜丝烧饼”、“冬菜肉末烧饼”、“焖炉烧饼”等“烧饼”类面点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以服务员身份出现在“开国第一宴”担负警卫职责的便衣队队员，虽然主要心思都集中于宴会的安全，但当他们从几位有美食家之誉的民主人士桌边走过时，还是听到了他们对宴会菜肴的高度评议：“好！味道极佳，真可谓上品。”“依我之见，这道菜可称为‘神品’。”

小高不想去当“店小二”/邓小平大度地说“战士没错”/“我爸爸是林彪，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周恩来拦住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自从1949年8月中共领袖和中央核心机关搬入城内以后，原来在香山和颐和园的警卫重心，就开始转向城内。开国大典举行之后没几天，在颐和园北宫门以摊贩身份从事警卫工作的便衣队员高福禄，就接到了队部的新安排：进城，到北京饭店从事安全保卫工作。

推荐小高去北京饭店工作的，就是时任便衣保卫队副指导员、同时兼北京饭店副经理的沈平。小高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哥1938年就满怀爱国热情奔赴延安，并加入了共产党。他经过陕北公学和延安自然科学大学的学习，之后服从革命需要，成为中共保卫工作部门的一员，曾先后

任延安保安处科员、中共热河省公安厅侦查科长、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情报站长、中央交际处保卫科长等职，工作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便衣队刚入北平重点是负责香山一带的安全警卫，后由于建国的筹备和许多会议都在城内进行，一些便衣队队员便被分派到城内工作。北京饭店是当时公开的政务和外交活动集中的地点，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出入频繁，因此急需配备有知识、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干部参与饭店高层管理，以保证住在那里和到那里活动的高层领导人士的安全。

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沈平，由于符合条件被安排到北京饭店担任副经理。几年后，由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需要，沈平脱离了安全保卫岗位，调至外交部工作，先后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驻日内瓦总领事、驻英国代办处参赞、外交部欧美司领导小组组长、亚洲司司长、驻意大利大使等职。这自然是后话了。

当“开国”基业初奠，沈平敏锐地意识到，未来北京饭店的保卫任务会越来越繁重，而眼下饭店的保卫也面临尽快适应和平环境，改变过去战争环境中一些保卫方法等问题，需要及早充实和培养自己的保卫干部。他想到了便衣保卫队的队员高福禄，他年轻，受过一些文化教育，接受新事物快，人也聪明灵活，想调他到北京饭店工作。于是，沈平把自己的想法跟队长高富有说了。


50年代初在北京饭店工作的高福禄

而当高富有找高福禄谈调动问题时，小高却表现出了有点不情愿：“刚进北京就当了小摊贩，这会儿又要去当‘店小二’，那还怎么上前线，去打仗？”他内心一直在渴

望着能上战场。但小高心里也十分清楚，服从革命需要，是一个战士的天职，没等高富有做说服工作，他自己就想通了，很快去北京饭店报到了。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去，就在饭店干了几十年。其实跟小高谈工作调动高富有自己也没曾想到，他自己后来也担负起饭店的领导工作，先是在六国饭店，后来又到了友谊宾馆。

到北京饭店后，高福禄先是在办公室任保卫干事。这个干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饭店大门内开设一个问讯窗口，在窗口值班的他，看到有哪位中央首长或高级民主人士进来，就及时出去迎候，以免发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或意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礼宾迎接。当然，那时在门口守卫更重要的职责是保证首长安全，同时要防范坏人混入。

北京饭店那时由人民解放军公安纵队一个连负责执勤警卫，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仍按战争年代的那一套规矩行事，端着大枪，态度生硬地拦住每一位客人，查看证件后，再动作机械刻板地护送进门，有如押送犯人，这让一些宾客特别是民主人士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对这类不懂礼貌礼节的行为，有的客人多次投诉告状。这些情况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他过问，饭店遂决定采取改进措施，设问讯处由保卫干事负责辨认首长和贵宾，负责迎接引领事宜，而执勤警卫则听从保卫干事的指挥调动。

别看北京饭店门口的问讯处只是个小窗口，却让初来的保卫干事高福禄接触和经历了不少难忘的人和事，也让他对一些首长的个性品格有了更多细微的了解。

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兼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来到北京饭店开会。

利用会议的间隙，邓小平也像外来客似的，蛮有兴致地去饭店附近闻名遐迩的王府井和东安市场逛了逛。他不喜欢兴师动众摆首长的谱，也想给自己一点自由，就来了个单身出行，没带一个随身警卫。

可没想到，逛完了街，乘兴而归时却惹了麻烦。北京饭店门前的执勤警卫不认识邓小平，再看他个子不高，穿一件斜纹布衣，也不像个大首长的样子，身边没带警卫，还没带证件，就拦住了他，不让他进去。

执勤警卫问："你找谁？"邓小平语气平常地回答："我是邓小平，我不是找人的，没什么事，让我进去吧。"

谁知，这个北方的年轻战士居然不知道鼎鼎有名的二野首长邓小平是何许人也，仍然坚持着不放他进去。

正在邓小平有些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时，办完事刚回到问讯处值班的高福禄看见了门口发生的一幕。

高福禄赶忙从问讯处走出来，迎了上去："邓政委，实在抱歉啊，这是新来的战士，还不认识您，快请您进去吧。"

邓小平也大度地说："没关系的，这个战士做的没错，不要责备他。"说完就快步走进饭店去了。

与二野并没有什么联系的高福禄怎么会认识邓小平呢？原来还是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曾经到山西太行山解放区参加了一次抗日群英大会。当时还是个小学生的儿童团员高福禄，在摆满缴获日本枪炮的学校操场上接受了八路军129师首长邓小平的检阅。正是在那次检阅中，让小小的高福禄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位个子不高的首长的模样。没想到数年之后，首长与儿童团员的初次相见，使他能够为在北京饭店门前遭遇尴尬的邓小平解了围。

"我有个同事，原来也是保卫队的，后来到武汉公安分局任局长，出门还带着警卫，显自己的派头，耀武扬威的，其实没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越是高级的干部，越不愿意警卫跟着，越不摆架子。"高福禄回忆此事时这样说。

还有一次，当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也来北京饭店参加会议。适逢周末，林彪还带着女儿豆豆和儿子老虎来饭店玩。当时的林老虎穿了一身红毛衣，天真多于调皮，他缠着常在饭店大堂里转悠的高叔叔一起玩。玩熟了，林老虎用很信任的口气对高福禄说："叔叔，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高福禄故意逗他说："不知道。"

"我爸爸是林彪，你可别告诉别人啊。人家知道了就一定要他带警卫员了，他不愿意出去老有警卫叔叔跟着的。"天真的林老虎一番话，

道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党内高级领导人外出多是轻车简从，不习惯带警卫的。

然而，人与人各异，事情也不尽相同。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召开一个全国公安系统的厅局长会议，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从会见大厅里出来，边说边往外走着。

这时，有一个安徽省公安厅的厅长，披着一件大衣，醉醺醺地从北京饭店大门口走进来，执勤警卫看他那副样子，就提醒他不要再过去了，说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就要出来了。

可这位公安厅长根本不听劝，那天他为了去赴老战友宴请，不仅耽误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还喝得晕晕乎乎的，不管不顾地直劲儿往里闯，正好和迎面出来的周恩来碰了个对面。

照理说，一般人看见首长过来都会主动避让一下，可这位喝多了的厅长却衣衫不整、一摇一晃地径直往前走。

周恩来一见就拦住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参加全国公安会议的。"他硬邦邦地答道。

"开公安会议也不能这么不讲礼貌啊！"周恩来有些生气了。

这时，北京饭店警卫科干部王宝顺赶忙过来，喝住了这位厅长，要他站住。

公安厅长这时才一下子清醒过来了，呆呆地站在那里，接受周恩来的批评。

周恩来当即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找了来，严肃地对他说："你们开公安会议的干部怎么这么不讲礼貌，我看要拿出两天开会时间，专门整顿文明礼貌作风。"

事后，那位挨了周恩来批评的公安厅长也给公安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虽然他检讨了自己犯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和组织上的任何处分；但同时仍对北京饭店警卫科的干部阻拦他耿耿于怀。在这位厅长眼里，一个饭店保卫人员怎能对厅长大声呵斥呢！他还在电话中说以后再也不住北京饭店了。

北京饭店员工既是服务员，也是安全保卫者/中央首长到外地也从北京饭店调服务员随同/饭店里中央五大书记的餐饮用具都编了号/周恩来举目四顾，发现大堂沙发没有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内还没有几家高档次的大饭店，北京饭店是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国务和外交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也是外国贵宾来京下榻的第一选择，因而在国内国际颇具影响，曾号称“中国第一饭店”。

到如今，北京饭店已是一座颇有历史的百年老店。北京饭店的历史，可追溯到1900年。那一年，邦扎和佩拉蒂两位法国人在如今的苏州胡同处开办了一家3间门脸的小酒馆。第二年，这家小酒馆迁到了如今东单菜市场的旁边，正式挂起了北京饭店的招牌。

1903年时，一个意大利人卢苏买下了北京饭店的经营权。两年后，卢苏筹资在王府井南口盖起了一座五层红砖楼，北京饭店



50年代扩建的北京饭店

遂迁新址。1907年，卢苏又把北京饭店转卖给了中法实业银行，饭店由此交给法国人经营并扩建。1915年，为使饭店保持世界豪华水平，经营者再次进行了大规模装修，新客房全部配有暖气、私人浴室及可冲式卫生间，装修竣工的北京饭店被当时媒体称为“北京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

1917年，北京饭店旧楼边又建起一座7层法式洋楼（即今北京饭店B座），建筑外形选取了17世纪的法式建筑格调，建筑内部则突出了法式豪华、浪漫的古典风格。新饭店拥有200间客房，两部奥的斯牌升降电梯可将客人直送至7层酒吧和可供宾客跳舞娱乐的室外花园。饭店被誉为“远东唯一豪华酒店”，亦成为来京中外贵宾的下榻首选。

1940年后，北京饭店被日本人占据，饭店又将一些客房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新装修。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饭店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经营。

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北京饭店迎来了新的生机，跨入了大发展时期。 1954年，北京饭店在拆除1917年前旧楼基础上，扩建起一座七层新楼（即今北京饭店C座）。新楼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宴会厅大门前，装饰有12根古色古香的大圆柱和五盏造型奇特的大型宫灯，把新楼前厅装点得金碧辉煌。

1974年，一座14层高的新楼又在北京饭店东侧落成（今北京饭店A座），成为当时首都北京最高的建筑。它为刚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和中国外交事业立下了功劳。

1989年，北京饭店再度“焕发青春”。一幢富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贵宾楼”在北京饭店西侧拔地而起（今北京饭店D座），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结晶”，成为近年来诸多访华外国元首、首脑人物的下榻之地。“贵宾楼”为北京饭店的历史再谱新章。

2000年后，北京饭店再次扩建，于B座楼后面又增添了一个以商务套房和康乐设施为主体的E座，为北京饭店建筑大家族中再添新员。

可以说，从南河沿南口至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近半里长空间，由五座不同历史时代建造的建筑所连结起来的北京饭店建筑群，仿如百年中华

历史的一个浓缩和见证。

本章所记述的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在北京饭店的事情，自70年代后至今的建筑变革，只是顺带说一说。

正是由于建国初期的北京饭店承担着特别重要的国家使命，因此这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也显得愈来愈重要。饭店也由此补充了不少特殊的工作人员。他们看似普通职工、服务员，每天从事着平凡的饭店管理、端茶上菜、客房清扫等具体工作，但其实人人都身兼两职，既是服务员，又是安全警卫员。

当时北京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制度体系，采取的是专业保卫人员和群众性安全保卫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实施了保卫工作职业化、措施化，做到了不露痕迹。对中央、政府的各级要员和外国政要、首脑来饭店活动也都有一套严格的安全警卫措施和检查制度。

虽说饭店之外有公安部、中央警卫局，饭店内也有保卫科，但北京饭店从总经理到科长、班长，厨师、服务员，包括电工、水工、制冷工等，人人都是警卫员，每个员工从进饭店的第一天起，最先接受的就是安全保卫教育。

周恩来曾经专门作过指示，北京饭店有四大任务：卫生、服务、安全、经济。在这四项任务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卫生是第二位，服务和经济收入这两项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

50年代初进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小王记得最清楚，当时饭店领导反复向他们强调："安全保卫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群众。要以服务面貌出现，内紧外松。谁搞神秘化，谁就搞不好安全保卫。"

北京饭店的员工既是服务员，又是安全保卫者，一切要对中央首长负责，首先要确保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如遇敌特分子掏枪行凶，贴身服务员是一定要上去为首长挡子弹的，每个服务员都被教育要做好这种牺牲的精神准备。

在当时的北京饭店内部，为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都编了服务代号，毛泽东是一号，刘少奇是二号，周恩来是三号。当年北京饭店餐厅科科长王之书说，他曾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为"三号"首长服务的。



建国初期的周恩来与民主党派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首长到外地考察、访问、检查工作，出于安全卫生考虑，都要从北京饭店抽调服务人员跟随，带上首长专用的暖壶、茶杯、餐具、饮用水等，以免到了一些偏僻地方，没有安全检验、消毒设施。

那时的北京饭店，对中央五大书记、书记处等领导人的餐饮用品，都要在用具下面写上编号，专人专用。首长走到哪里，他们的用品就装专用箱带到哪里，随时取用，方便安全。遗憾的是，这些为首长准备的专用餐饮用具和专用箱子，都在“文革”当中丢失了。

在北京饭店内，凡餐食宴会需用的食品，都要经过化验，留下样品，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好有个证据。开始是用土办法，水和每

道食品先要由警卫人员品尝口验，没问题后才能上桌。后来，上级为北京饭店专派了食品安全方面的苏联专家，制定出了一套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和方法，就不用要警卫人员品尝的那套土办法了。

刚到北京饭店不久的高福禄，年轻、热情，工作积极性颇高，他每天都在饭店门口和大堂里不停歇地巡回转悠，每时每刻都在警惕着一切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

这天，他在大堂里站了一会儿，看到大堂中央摆放的沙发，时常有人来坐一坐，或是等着与住宿的客人见面，或是把这里当作与人接洽、聊天的场所。

高福禄忽然警惕起来，感到在这里放置沙发是个不安全隐患：一是遮挡了大堂观察的视线；二是容易给混进来搞破坏的人提供滞留、窥测的方便。

于是，小高就生出一个念头：把沙发搬走，让大堂显得更敞亮、更一目了然。他把想法告诉了另一位保卫干事小史，二人一拍即合，且说干就干，找来几个服务员帮忙，一起搬沙发。有些老服务员感觉这样做不符合饭店的行业老规矩，但戴着军管会袖标的保卫干事下令了，哪有不服从之理，于是就按吩咐行事，把大堂里的沙发搬走了。

望着搬走了沙发后的大堂，小高这才感觉敞亮多了，也有一种更安全的感觉，心里不免为自己构思的小改进洋洋得意。

搬走沙发后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北京饭店理发。理完了发，他没有马上离开，在饭店里转了转，正好在大堂里遇见赛福鼎从会议厅出来。赛福鼎一见周恩来，就请他去给正在北京饭店开会学习的政协委员们讲讲话。周恩来摆摆手说："没准备，就不讲了。"

这时，周恩来想起正好有些事情要跟赛福鼎说说，就准备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可他们举目四顾，发现沙发没有了，只好站在那里简单说了几句就分手了。

在门口值班的小高送周恩来出了饭店大门，心里也感到稍事放松：总理今天在饭店一切安全顺利，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情。正准备返身回值班室，却见周恩来从车上下来，又向饭店走来。小高以为周恩来又有什

么事情要回来办，赶忙迎上前去。

周恩来并不认识新来的高福禄，但他的卫士长何谦认识小高，就告诉总理，小高是从高富有队长那里派过来的人。

周恩来对小高说："你们经理呢？大堂沙发搬到哪里去了？"

小高看周恩来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不像是要表扬这件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沙发是为饭店客人准备的，沙发搬走了，大堂空空荡荡的，连个临时坐一坐的地方都没有，像个什么样子？"周恩来又说。

从小高的神态中，周恩来感到这事大概跟小高有关，同时猜到了搬走沙发的用意，就说："小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好事都让你们给办坏了。保卫工作也得走群众路线嘛。告诉你们经理，赶快把沙发搬回来。"

小高低头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总理的批评。等周恩来走后，小高和几个同事赶快把沙发又搬回了大堂。

事后，小高向饭店领导和公安部有关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公安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专门就安全保卫工作如何群众化、职业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措施。从此以后，群众化和职业化就成为新中国保卫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

一个外国记者突然闯到毛泽东餐桌前/汪东兴把宴会指挥部人员全部留下进行查问/苏联部长从"酱爆肉丁"里吃出螺钉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饭店对保卫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到了初来乍到的工作人员想象不到的地步。

高福禄有一位老乡，就在北京饭店对面大楼里的煤炭工业部上班，是部里的保卫处处长。他得知高福禄调到北京饭店工作了，就抽空来饭店看他。

闲聊中老乡听小高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经常来北京饭

店参加会议或宴会。他就真诚地恳求小高说："我一直想亲眼见见毛主席，做梦都在想。就看一眼也行。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小高非常理解同乡的心情，觉得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者想看伟大领袖，不应该成什么问题，就一口答应下来，说："这事我能办到，下次等毛主席来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你一下，你过来看就是了。"

后来有一天，毛泽东来北京饭店，在这里主持欢迎一个东欧国家代表团的宴会。高福禄得知消息后，随即给他的老乡打了个电话，约他来饭店见见毛主席。

事后，高福禄带老乡到饭店看毛主席的事，被饭店的领导知道了，对他提出了批评。

"我知道他的情况，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国家机关保卫干部。" 高福禄感到有点委屈，为自己进行辩解。

"那也是不允许的。把无关的人带入饭店，就是违反了我们的保卫工作纪律！"饭店领导说得斩钉截铁。

从此，高福禄严守这条纪律，再也不敢把熟人朋友随便带进饭店了。安全保卫工作的纪律就是这么严肃硬性，不徇私情。

有一次，一个全国性的群英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后，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出席大会的代表。

宴会大厅的中央餐桌，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餐位。专负责为"一号首长"毛泽东服务的服务员小刘正忙碌着，他一面要摆放、收拾毛泽东面前的菜碟、餐具，一面还要百倍警惕地观察四周环境，时刻护卫"一号"首长的安全。

这时，一名前来参加大会采访的外国记者，从他坐的餐桌席位上起身后，快步朝主桌奔来。有几位便衣警卫人员对他进行劝拦，但他依然径直向毛泽东坐的位置上跑过来。

小王见此情景，也赶忙挺身示意他停下来。没想到这位执著的外国记者毫不理会，硬是大步抢到了毛泽东面前，举着一个小日记本和一支铅笔，请毛泽东为他签名。

只见毛泽东礼貌地从桌前站起身来，接过这位外国记者的铅笔，在

他的小日记本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字。那位记者见毛泽东为他签了名，接过本子，竟兴奋得当众跳了起来，然后如获至宝地捧着本子离开了。

等在场的便衣警卫人员聚集过来，这个突发事件已结束了。这让在场的工作人员着实是大大吃惊了一场，好在毛泽东的安全没发生任何意外。

大家本以为，这个宴会当中的意外插曲就这样过去了。可谁知宴会刚结束，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上衣的前襟下摆上沾上了菜汤的油污，认为是专为“一号”服务的小刘服务中不慎弄到毛泽东身上的。

这下可惹了大祸，汪东兴当即把宴会指挥部的人员全部留下进行查问。最后，他要当时为毛泽东服务的小刘认真做检查。

小刘说汤不是他洒的，感到很委屈。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写了检查。后来，还是同在主桌服务的小王向汪东兴报告了他看到的实情，为小刘解了围。

小王说：当时他见那个外国记者上来签字、照相，想到回避镜头的工作纪律，就有意闪开了。但他看到毛主席站起身来签字时，不小心把面前的菜汤盆碰洒了，沾污在衣服上。但当时毛主席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这个记者身上，并未马上察觉，所以就过去了。汪东兴听了小王的叙述，才没有对这件事情继续追究下去。

还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一个苏联代表团。出席的一位苏联部长在吃酱爆肉丁这道菜时，吃出了一颗弹子大小的螺钉，这位苏联部长倒没有声张，就把小螺钉放在了菜盘子的旁边。服务员在撤盘子的时候看到了，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领导作了汇报。如果是一般的饭店，也许客人没有挑剔也就应付过去了。但是在北京饭店，发生这样的事是绝对不会打马虎眼的，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恩来对这个事故非常重视，亲自指示要外交部、公安部、北京公安局、市政府、市外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因为这直接关

系到外宾的人身安全和国家的对外形象问题。

北京饭店餐厅组王组长参加了这一事故的调查。他们经过了四天四夜紧张的调查工作。最后，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是烹制酱爆肉丁这道菜时，用了北京老字号“六必居”酱园厂生产的甜面酱。生产这种甜面酱时用的是木桶式酱缸，木酱桶经过太阳烤晒，板条松了，原来固定板条的螺钉也就松了，掉下来混在了甜面酱里面。

后来，联合调查组将事故的原因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个报告。周恩来看后批示道：北京饭店是党中央的一个要害部门，工作要认真，抓紧抓紧再抓紧，过细过细再过细，丝毫松懈不得。

从此以后，北京饭店的食品检验制度更加严格了：凡宴会用大米、白面都要用罗筛过筛，面酱等配料也要过筛，蔬菜、肉食等皆有更为细致严格的检验措施，真是做到了近乎万无一失。

巴基斯坦大使嫌给他的电报送晚了/毛泽东携家人乘坐的电梯突然出了故障/周恩来生气地问：“谁在这里当经理啊？”

外事无小事。这是如今从事外事、外交工作人员最常引用、最为熟悉的一句话。许多人知道这句话是周恩来最早说的，但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就说不出所以然了。

据当年在北京饭店工作的高福禄回忆，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亲耳听到周恩来总理对北京饭店经理讲了“外事无小事”这句话，而引发周恩来讲这句话的那件事，也正与他有关。

那一天夜晚，已担任北京饭店办公室主任的高福禄正好在北京饭店值班。夜里12点时，饭店收发室收到了一份从国外打来的电报，是发给住在北京饭店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洛桑先生的。

收发室的值班员向高主任报告了这事，随后请示说：“客人现在已经休息了，是马上给他送去，还是等天亮后再送给他。”

高福禄问：“是加急电报吗？”

值班员回答："是一封普通电报。"

"那就明天一早送吧。免得影响客人休息。"高福禄自作了主张。

第二天清晨6点，服务员将电报交给了洛桑大使。大使接过电报，向服务员表示了感谢。

谁知在事情过去了四五天后，外交部忽然给北京饭店打来电话追问此事。电话说接到巴基斯坦大使向外交部的反映，北京饭店耽误了发给他的电报。巴基斯坦大使说：这封电报从巴基斯坦发到北京用了6个小时，可是从饭店收发室送到他手上也用了6个小时。

外交部后来又派专人调查此事，并要求北京饭店处分直接经办人，以挽回国际影响。高福禄当即向外交部来人解释说："收发员向我报告收到电报，我考虑到客人正在休息，不便打搅，这才没叫立即送电报。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当时的北京饭店经理认为，一封普通电报，没有连夜急送，也是事出有因，似乎不能就因这事随便处分属下员工。

正好这时，周恩来总理来北京饭店理发。经理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并对周恩来说："实在要处分的话，就处分我这个经理吧。"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主动承担责任，不处分下属是对的。但就这件事来说，你确实负有责任。你没有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外事教育。外交上的事不可按一般常理来处理。今后你要多多告诉员工：外事无小事。"

周恩来总理还高屋建瓴地耐心指导经理说："你这个经理，要学会'闲'，让手下的人忙起来，这不是要你去搞官僚主义，而是要你多腾出一点时间去考虑大问题。领导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陷入事务主义，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后来，高福禄和经理以及收发室的值班员一道，直接向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道了歉，妥善解决了这一外事问题。

北京饭店虽说是全国一流的高档饭店，但在解放初期，受当时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制约，偶尔发生的设备故障，曾给中央首长的安全造成困扰。

1950年，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之夜。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带着妻子女儿等一行人，来到北京饭店的顶楼观看焰火。那个时候，北京饭店的七层顶楼也算是京城内的制高点之一了。

毛泽东等到来前，北京饭店的领导接到通知，赶紧进行了一些布置和准备，还专派了服务人员，在电梯里等候服务。

晚上8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北京饭店。经理马上陪同毛泽东等人登上了电梯。没想到，电梯刚刚启动，就不动弹了，不知发生了什么故障。只见开电梯的年轻服务员神色紧张，一个劲儿摆弄按钮，脑门上的汗立即就渗出来了。可是，电梯还是不听指挥，始终没有动静。经理一看不行，只好请毛泽东先下了电梯，改走楼梯上去。

他们刚爬上了三层，电梯服务员又追上来报告，说电梯又能正常运行了。于是经理又请毛泽东从三层上了电梯，一直开到了七楼顶层。

经理后来回忆说：那次，毛主席的心情不错。电梯出现故障



便衣队员高福禄（二排中）和北京饭店同事们

后，他不仅没有显露不悦之色，还幽默地对我们说，那我们就来运动运动吧，跟着大家一起爬楼梯。倒是跟在后面的江青，脸色有点不好看，但她看毛主席都没说什么，也就没有作声。

还有一次，是在建国不久的1952年。

严冬腊月里，北京饭店的暖气却烧得一点也不热。正逢中央政府要在北京饭店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外国专家举行一次盛大招待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不少高级民主人士都将前来参加宴会。

宴会之前，公安部有关部门照例专程来北京饭店检查相关安全设施和警卫部署，检查人员感到宴会大厅内的温度不够，有些凉意，就特地给周恩来总理打了电话，提醒他赴宴时注意多穿一件衣服，以免受冻感冒。

周恩来听电话后，立即想到这是个重要的宴会，北京饭店怎么连暖气也烧不热呀？当天下午，当他踏进北京饭店的大门后，果然没有温暖的感觉，倒有几分凉意袭来。他生气地大声问："北京饭店，谁在这里当经理啊？"

正好国务院一位局长陪在周恩来身边，他也不清楚北京饭店有一位罗瑞卿亲自任命的李新在这里当经理，就凭印象信口说道："北京饭店好像现在还没有经理呢，只有一位副经理。"

"只有副经理怎么行，再派一个经理吧，加强领导嘛。"周恩来顺口说道。

从那以后，李新就成了饭店的副经理。直到他调任前，办公室主任高福禄为他整理档案材料，才发现了罗瑞卿部长正式给他签发的北京饭店经理的任命书。

高福禄不解地问："你是名正言顺的经理，为何不解释清楚呢。"

李新半幽默半淡定地说："总理说我是副经理，我就是副经理嘛。我当时要解释说我是经理，可能连副经理也当不上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李新调到了北京新桥饭店当的是副经理。再后来，又到了民族饭店当的还是副经理，再也没有当经理。

尤金大使的欢迎晚宴上灯光突然熄灭/宴会总管郑连富巧妙解释“卍”字符/堂堂北京饭店连一套大型冷藏设备也没有

北京饭店里每次举行大型宴会，对于员工来说，都如同经历一场紧张的战斗。各个环节的工作要紧密配合，生怕发生一点差错，带来不好的国际影响。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准什么时候宴会中就出现突发问题。每到这时，宴会的服务人员就必须急中生智，巧妙地救场化解，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和损失。



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中）和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阿尔希波夫（右）

苏联第二任驻华大使尤金先生到北京赴任时，外交部为欢迎尤金，特地在外交部街举行了一次欢迎晚宴。宴会的全部食品准备、烹饪和全场的服务，都由北京饭店来承担。

当晚，宴会正在进行当中，忽然全场的灯光一下黑了，原来是停电了。外宾们不知是怎么回事，议论纷纷，宴会大厅内外也出现了一些骚动，大大影响了宴会的气氛。

恰好这时，有备而来的北京饭店员工为晚宴准备了不少蜡烛台，在场的服务员们就把一个一个蜡烛高台端了出来，摆上了每张餐桌并一一燃亮。瞬间，宴会大厅映照在数百根蜡烛荧光之中，烘托出了格外优雅温和的气息，主宾间在橙黄的烛光中频频举杯换盏，犹如一个独特的祥和友好的烛光晚宴。

苏联外宾们并不知此中内情，还以为是宴会刻意安排的程序，熄灯燃蜡烛呢，继而纷纷赞叹，中国人举办的晚宴，很有西方的情调啊。听到外宾们这样的议论，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们相顾会心一笑。

那次停电事故的发生，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宴会等高层活动的用电安全，要求各大高档涉外宾馆饭店都要采取改进措施，搞两套保险电路。一旦突遇停电事故，后备电路能马上启动，保证外交等重要国务活动不受影响。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阿尔巴尼亚贵宾。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已上完毕，最后一道上的是西点奶油蛋糕。雪白的奶油上雕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卍”字符，意喻“吉祥如意”。巧合的是，这个“卍”字符形，与德国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徽章符号相似，阿尔巴尼亚外宾看不懂中国传统的“卍”字符，倒联想起了二战时期侵占过阿尔巴尼亚的德国法西斯。

周恩来看出了阿尔巴尼亚客人脸上疑惑不悦的表情，便马上向他们解释说：这个“卍”字符是我们中国传统用来表示“祝福吉祥”的，没有别的意思。

担任宴会总管的郑连富师傅当时也在现场，他急中生智，上前与周恩来总理配合，向外宾们解释道：“如果说这个中国‘卍’字符，有点

接近希特勒法西斯的符号，那么把这块蛋糕吃掉，也就等于把德国法西斯消灭掉了。”

外宾听了郑师傅的话都拍手称好，宴会的气氛随之又活跃起来。

后来，周恩来还当着外交部许多官员的面表扬了郑连富师傅，夸他很有外交家的风度，灵活应变。周恩来还说：“你们这些外交家有没有郑师傅这样的水平，能在关键时刻维护国家的面子和荣誉啊？”

说起来也许令今天的人难以置信，建国初期的北京饭店，几乎每天都要举办大小宴会多场，但整个饭店连一套大型冷藏设备也没有，仅有的几只美国进口的小冰箱，只能存放一点卤水菜。而几百人的大型宴会，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那么多凉菜、肉食、备料等等的冷藏保鲜，只能靠饭店员工们自己动脑动手，齐心协力来解决。

隆冬时节，饭店员工们就到北海、后海这些有河塘的地方取冰，然后锯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方冰，放在冰窖里储存。到了第二年夏季，就把大冰块从冰窖拉到北京饭店的地下室内，一块冰放在一层木架上，层层摞上去，然后把一盘盘制作好的冷菜放在冰块上保鲜。

那时，尽管条件简陋，工作强度大，加班加点多，但饭店员工们都是经过战争考验和经过严格挑选的，也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以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中央首长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工作，精益求精，在实践中还有不少发明创造。比如最初举办宴会，只按中餐习惯，在每位客人面前摆一个小酒盅，装三钱白酒，再大型的宴会也是如此。后来餐厅服务人员发现，西餐宴会要摆大小酒杯多个，不仅可喝各式酒水，晶莹透亮的玻璃酒杯，也为宴会餐桌增添了几分喜庆味道。相比之下，中餐单调的酒杯摆法就难以烘托气氛。

后来，北京饭店的餐厅服务人员就在实践中创新使用了中餐宴会的三套杯摆法，宴席上每位客人面前摆三套杯，一个玻璃酒杯，喝啤酒或饮料，一个中号酒杯，喝红白葡萄酒，还有一个小玻璃酒盅，喝烈性白酒。这样的宴会酒具摆放，既满足了客人宴饮的需要，又增添了宴会酒席的气氛。

对于一些大型冷餐会、鸡尾酒会的餐食，北京饭店也作了不少革新

与改进，把不少中餐菜品引进到了这种西餐形式当中。比如炸小丸子是中餐菜肴，插上牙签食用，就能够中餐西吃。类似的中西餐合璧和中餐西吃等的改革与创新，在北京饭店还有许多。

正由于北京饭店是全国一流涉外饭店的排头老大，这里的许多创新和方法自然也很快在行业饭店甚至全国饭店流行开来。以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陆续兴建起来的新桥饭店、友谊宾馆、人民大会堂、民族饭店、钓鱼台等等，都纷纷效仿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成了北京甚至全国饭店行业的标杆和榜样。

周恩来思妙招巧驱苍蝇/周恩来示意服务员立即离开/自掏腰包60元在北京饭店客房休息了一小时/周恩来这才知道中了谢添的计

在北京饭店工作多年的服务人员，经常要为高级首长们提供贴身服务，因此也就有了近距离观察中央和国家高层领导们的机会。长此以往，对一些领导人的性情、风格，以及处事为人等也有了许多真切、细微的了解。从而也能比常人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他们的悉心关爱，并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亲近之情。

有一次，周恩来宴请波兰大使和夫人。宴会特别安排了几道西式菜品，其中有一道“莫斯科烤鱼”，将烤鱼装在一个精美的银质盘子里，非常考究。按照礼节，菜端上来后，要先给客人尝菜，于是在场的服务员小王就把“莫斯科烤鱼”先端到大使夫人面前，让她第一个品尝。细心的周恩来看到大使夫人穿着一件短袖连衣裙，两只胳膊都裸露着，就提醒小王说：“你要注意一点，刚烤的鱼很烫，小心别烫着夫人。”周恩来就是这么细致入微地关照客人。

还有一年夏天，在某国大使馆举行一个宴会，宴会中烹制了一道“油焖大虾”的菜。那时天很热，外面的苍蝇也挺多，一开门，苍蝇就飞了进来。



周恩来在招待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的宴会上

这时服务员小刘注意到，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上了主餐桌。小刘心里很着急，可又不敢打，也不好哄赶，生怕影响了主桌上中外嘉宾们的情绪。

正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他走过去悄声对小刘说："你把吃完的虾皮放在主桌后面的小台子上，这样就能把苍蝇吸引过去了。"

小刘随即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去做了，果然把苍蝇引到了小台子上，小刘遂把苍蝇"击毙"了。这一来，既没有影响宴会的举行，也没有惊动中外客人。小刘对总理的细心和机敏更加钦佩。

在外交宴会场合中，周恩来从来都是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的。他总是非常注意着装和礼节，一般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三接头皮鞋，再热的天也从不穿短袖衣衫、凉鞋赴宴。

宴会当中，周恩来很讲究餐饮礼仪。他能把牙签夹放在小拇指上，一边用刀叉吃着菜肴，一边还不妨碍随时从小拇指上取用牙签，举止文雅，而又方便适用。

而有一次宴会，周恩来和刚到场的外宾见面握了手，服务员恰巧递上了一条小毛巾，请周恩来擦手。服务员也许是无意识的，只是在履行正常的服务程序。可周恩来却没有接这条毛巾擦手，而是示意服务员立即离开。

周恩来觉得，刚和客人握了手，就去擦手，可能会引起客人发生误会或疑义，好像嫌人家的手脏似的，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一条小毛巾，一个小动作，周恩来对外交场合的礼貌、礼仪就是考虑得这么细致。

有一年夏天，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在该国的大使馆宴请周恩来总理，餐饮招待事宜是由北京饭店负责。

那天，大使夫人特意提出要亲自为中国贵宾做两道本国菜。做菜时，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也在旁观看，只见大使夫人拿过几个西红柿，放在胳膊上用劲摩擦了几下，然后切碎，拌上一些调味料，弄成“烂乎乎”的一团，就盛在盘子里端出来，请周恩来总理品尝。看了制作全过程的服务员，都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心想这怎么吃呀？

一向注重礼节的周恩来，对大使夫人亲自做的菜，理所当然地不会拒绝品尝。周恩来客气地接过大使夫人的菜盘，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又专注地听大使在旁边介绍了这道菜的典故和特点，然后就大口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还一面夸赞这道异域风情的菜有特色，大使夫人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在场的服务员推想，周总理并不一定喜欢吃这个菜，想趁机把这道菜早点撤下来。可周恩来却把这道菜摆在了自己面前，不时地品尝几口，以显示对大使夫人厨艺的赞美，使服务员无从下手撤菜。周恩来就

是这样细致入微地、从不忽略细微小节地、完美地体现着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一视同仁精神。

据北京饭店熟悉内情的服务员说，周恩来本人的酒量其实不小。但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和身体健康，保健医生经常提醒他要控制酒量，不能多喝。

在许多外交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在服务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很得体地向外宾敬酒，应对自如。而在一些朋友般的联谊、聚会场合，周恩来却非常潇洒放开，有时忘记了医生的嘱咐，喝得随意而尽兴。

有一年，在北京香山附近的饭店，周恩来举办宴会，专门招待国内文艺界、电影界代表人士。那一天，秦怡、张瑞芳、赵丹、白杨等诸多电影明星都出席了，宴会的气氛轻松欢快。周恩来活跃在文艺人士中间，显得格外高兴，与演员们谈笑风生，对酒欢歌，为了喝得尽兴，周恩来那天特意亲选上国酒茅台。

眼见得，一瓶茅台酒就快喝光了。周恩来正喝在兴头上，一点没有自我约束。在场专盯“三号”的服务员小王看在眼里，有点为首长担心了，怕他喝多了伤害身体。

于是，小王就找来演员谢添，悄声央求他说：“您能不能去找总理要点酒喝？或把总理手上的茅台酒换下来。保健医生交代过，不允许他多喝酒的。”

“可我这个小酒杯，也就能装三钱酒，要也要不了多少啊。”谢添一脸无奈的表情。

忽然，他转念一想，“要么，我干脆拿一个圆筒玻璃杯，用手挡住下半截儿，去找总理要酒喝。”看着谢添真肯帮忙的样子，小王满心高兴。

于是，谢添走到了周恩来面前，说：“总理，您喝的茅台，我喝的泸州大曲，能不能也让我品尝一下您的酒呢？”

周恩来点点头，马上就给谢添倒起茅台酒来。没想到，谢添的酒杯这么深，咕咚咕咚倒下去了不少，周恩来这才知道中了谢添的计，这是想让自己少喝点酒。

尽管如此，那一天周恩来格外高兴，酒还是喝多了，略微有了一点醉意。

事后，饭店的一位经理把周恩来喝的那个茅台酒酒瓶保存起来，还特意让谢添在酒瓶上写了字“周总理喝过的酒瓶”。

在北京饭店，有关周恩来的故事特别多，几乎每个老职工心里都藏着几段和周恩来有关的故事。大家称周恩来总理是北京饭店的名誉总经理。

在临近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的确去北京饭店很频繁，几乎每周要去三至四次，除了参加宴会、会议，周末还去跳舞、理发。周恩来对北京饭店的事情管得多管得细致，他在北京饭店员工中的威信也是特别地高。

成元功说：“总理最后要来查账的。”/服务人员就发现高岗不太高兴了/一直等到周恩来走了，这位首长才出来/朱师傅给周恩来总理理了最后一次发/周恩来问饭店的几位老师傅到哪去了

周恩来总理对外宾很讲礼仪，对自己却要求甚严，不讲私人情面。

北京饭店的一位老员工说，他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掏腰包宴请外国元首，但是他却亲历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自己掏钱请西哈努克夫妇吃饭的事情。

那次是在北京饭店的中七楼，周恩来一共宴请了三桌。出席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宴会的气氛亲切友好，主宾间就像熟识的老朋友一样。

宴会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来找宴会科要算账交钱。他怕饭店不肯按实际消费收钱，特意把内账文员找来，一道菜一道菜地核算。饭店方面说：就按成本价收吧。成元功说：“不行。总理最后要来查账的。”

结果，那次就按成本价加30%的利润收取了宴会费用。当时北京饭店对外餐饮的利润是45%，而一位国家总理宴请外国贵宾只做这样的优惠，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周恩来当年对自己就是这么严格，没有丝毫含糊。

1954年，北京饭店C座新楼盖起来后，周恩来到新楼办事，间歇时在一间客房里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出来后，他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付费。这间客房那时一天的价格是160元，周恩来用了一个小时，就交了60元。工作人员说："总理交代了，我们不敢不交。"而北京饭店对这个钱也不敢不收，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周恩来查下来，大家都过不了关。由此可见周恩来律己之严，再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平日里，周恩来有时到北京饭店办事，赶上吃饭的时间，就在这里吃顿非常简单的便饭。

有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时，没来得及吃中午饭。服务员小王就给他端来了一碗面条，还外加了两个小菜：一小盘拌豆芽，一小盘煮花生米。他是想让总理吃得可口些。

周恩来看看，对小王说："这两个菜，我没要，你怎么端上来了。"

小王知道周恩来对这些事向来是很认真的，就赶快把两个小菜往下端。刚要走，周恩来又把他叫了回来，说："这么一大碗面，你还是跟我一块吃吧。"于是，周恩来就和小王合吃了一碗面。"这就是大国总理周恩来的一顿工作午餐。"小王回忆说。

建国初期，每逢周末，周恩来只要没有公务，有时会去北京饭店跳跳舞，娱乐放松一下。周恩来的乐感不错，交际舞跳得标准而潇洒，许多年轻姑娘甚至排起队，争着要和周恩来总理跳上一曲，她们也都以能当一次周总理的舞伴为荣。

舞会上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即周恩来常常在跳一个舞曲的过程中就换好几回舞伴。他很体谅舞伴们的心情和愿望，采取这样的方式使大家不用等候太长的时间。

周恩来每次到北京饭店跳舞，从来没有固定的座位。当一曲跳完，

音乐停下来，他就就近坐下来，和周围的干部、工作人员谈话、聊天。

每当这时，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都要随时盯位、服务。周恩来坐到哪里，茶水就端到哪里。后来，服务员也学聪明起来，他们事先跟舞会的乐队指挥打了招呼，请指挥看到总理跳到了相对固定的位置时，就停止演奏。这样，周恩来就能回到原位置上休息，也方便了服务员为他续茶水，递毛巾。

有一个周末，周恩来又来跳舞了。一支舞曲完毕，他就近在茶几旁坐下来休息，身边正好坐了四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她们一见总理来了，显得有几分拘谨。

周恩来热情招呼她们说："来，我请你们一起吃冰激凌。"

周恩来的和蔼亲切使几个姑娘露出轻松的笑容，服务员马上按周恩来的吩咐，给他和身边四个姑娘每人上了一份冰激凌，姑娘们边吃边和总理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样子很开心。

舞会结束后，周恩来没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五份冰激凌的钱都记在他的账上，日后从他个人工资中取出支付给北京饭店。

那段时间，经常去北京饭店跳舞的还有朱德、刘少奇、高岗等中央领导人。高岗那时还不大为普通群众熟悉，舞姿也不够娴熟优雅，因此，主动请他跳舞的姑娘们相对少些。

几次下来，服务员们就发现高岗有点不高兴了。结果他就不再来北京饭店了，干脆转移到东交民巷8号院的记协礼堂另搞一摊舞会。北京饭店奉命每次都派去一些女舞伴陪首长跳舞，并派出服务员全程服务，让这位中央政府副主席感觉不失面子。

除了频繁的大小宴会和会议，周末去跳跳舞之外，周恩来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是每周三去北京饭店理发，这似乎成了他生活中不成条文的规律。因此，北京饭店理发室的师傅们，和周恩来成了老熟人。

一开始，周恩来去理发时，并没有固定的师傅专门为他服务。但经常是老师傅才敢上手。

有一次，周恩来突然发问："你们年轻人怎么不给我理呀？"

一个年轻理发员说："怕技术不好，不敢理。"

“多练练，技术不就好了嘛。”于是，周恩来特意让这个年轻理发员给他理。

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给总理理发，心里紧张，手也哆嗦。

周恩来说：“你给我刮刮胡子吧。”他刮的时候，手仍在哆嗦。周恩来感觉到了，就说：“你怎么哆嗦呢？”

“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年轻人说：“怕技术不过硬。”

“技术不过硬可以练，但思想要先过硬啊。害怕怎么行呢？”周恩来鼓励道。

后来，理发室又扩充了一间贵宾理发室，可以从地下室直接进入。有一次，一位部委领导也来这里，进了贵宾室理发。不一会儿，周恩来也来了，大家让他去贵宾室理，他没有答应，仍在普通理发室理。

在贵宾室里边理发的这位领导见此不好意思了，躲在里面半天不敢出来。他说：“总理都不进贵宾室理发，我怎么好意思呢。”一直等到周恩来理完发走了，这位首长才出来。

后来，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交代安排下，周恩来的理发师才逐渐固定为朱师傅。

朱师傅理发确实有点绝活。有时周恩来从外地回来，非常疲劳。朱师傅就一边给周恩来按摩一边理发，周恩来感到很舒服有时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40分钟，朱师傅手一直不停，直到感觉周恩来睡得差不多了，才停下手来。他一停，周恩来也就醒过来了。

理发时，周恩来常嘱咐朱师傅说：“你要把技术好好传授给年轻人啊！让他们都能有所提高。”

朱师傅就这样一直担任为周恩来理发的工作，直到周恩来去世。在周恩来最后的告别仪式前，仍然是朱师傅拿着理发工具到了北京医院，给周恩来总理理了最后一次发。

在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们眼里，周恩来既像北京饭店的当家人，又像一位要求严格，体贴关怀入微的特别家长。

有一年夏天，北京饭店领导为了搞好卫生，提高服务标准和质量，特别要求餐厅、理发室、客房的每一位员工为首长服务时，都一定要带上口罩，以免接触中传染病菌。

那以后不久，周恩来正好来到饭店理发。他看到师傅们每人都捂着一个大口罩，又闷又很别扭的样子，就问："天这么热，捂着口罩干嘛？"

"为了保障首长的健康，不传染病菌，饭店要求这样做的。"师傅们回答。

"你们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嘛，如果有了毛病，怎么还能来工作、服务呢？"

经周恩来这么一提醒，饭店领导才改变了这一不太人性化的主意和措施。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开会休息时，去了设在楼内的公共卫生间，发现里面没有备擦手毛巾。周恩来出来后便问："为什么卫生间里不放毛巾？"

警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口说："有些司机常来用毛巾，用得脏乎乎的，所以就不放了。"

周恩来不同意地说："这不是理由。司机怎么不能用啊，司机就不是人呐！你们不愿意勤清洗，还强调理由，这不行。服务就得讲细节，不能讲条件。"

饭店领导得知周恩来过问了此事，感觉这样做的确欠妥当，赶快改正了过来，为卫生间配备了新的擦手毛巾，并且注意勤更换。

周恩来不仅平日里对服务员关怀备至，当政治运动来临时，周恩来更是注意谨慎地保护北京饭店的员工们。

1955年初，从批判胡风"错误的文艺路线"开始，逐渐上升为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即全国城乡，包括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持续一年多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北京饭店也同全国一样，卷入到了这场“肃反”运动中。一些解放前就在北京饭店工作的留用服务员，成了这次“肃反”的清理对象。不少这样的老员工在运动中遭到了批判、斗争，被强令交代问题。有的人甚至被逐出饭店，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一时间，饭店留下的老员工寥寥无几，当举行大型宴会的时候，前去服务的全是一水根正苗红的年轻服务员。

就在这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那天的宴会大厅内灯火通明，地板上的电线横七竖八，那是为拍摄新闻纪录影片需要照明临时拉的电线。

当宴会进行到尾声时，要为全场宾客上一道甜食冰激凌。有一位新来饭店的姓苏的年轻服务员，热情高干劲大，别人两手端一个托盘，他却一人端两个托盘，上面摆满了玻璃酒杯盛着的冰激凌。

小苏心里光想着快跑快送，却没注意脚下，结果一下子被地板上杂乱的电线绊倒，摔了个大马趴，托盘上的冰激凌全都扣在了地板上。

小苏的失手、摔跤闹出很大的动静，让许多在场宾客大为惊异，大家的目光都投向摔倒在地的服务员。周恩来自然也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他马上问现场的宴会领班：“你们饭店的郑师傅、骆师傅和一些老服务员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几次宴会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这里全都是年轻服务员怎么行？为什么不让老师傅来带一带呀？”

宴会结束后，正在宴会厅外边的办公室主任高福禄看到周恩来走了出来。周恩来见到高福禄，又向他询问起几位老师傅的去向。

“我听说，他们都去了肃反学习班，在那里交代问题呢。”高福禄因患病刚来上班，就把自己听说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生气地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快让他们回来吧。”

“听说他们有一些海外关系，解放前还伺候过蒋介石、张勋这些反动派的大官。”高福禄补充道。

周恩来听到这些更生气了：“你们这儿的厨师、服务员，哪个过去

是为贫下中农做饭、服务的呢？他们正是因为给这些大官服务，才学到了高超的手艺。你想想，如果只是做普通老百姓的粗茶淡饭，怎么会掌握如此精深的手艺呢？他们也是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不要让他们在外边再耽误时间了，快让他们回来投入工作吧。”

有了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郑师傅、骆师傅等几位身怀绝技的老师傅，才结束了“肃反”学习班的交代，又调回到北京饭店工作。

二　离京出行中的警卫

毛泽东坐上美国送给老蒋的专列/天津铁路线上发现了一枚手榴弹/毛泽东冻得缩拢双手直哈热气/毛泽东忽然感到头晕目眩大汗淋漓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计划，最早在1947年初就提出了。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的形势和苏联方面的原因，几次推延。而到了三大战役结束，筹划政治协商建国大计又提上日程，毛泽东仍无法抽身出访。访苏的计划就这么一直拖延下来，直到新中国诞生的庆典完成。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这次出访意义重大，访问中要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直接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问题。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大秘书陈伯达、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也陪同毛泽东一道前往。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等也在专列上，负责送毛泽东安全出境。便衣保卫队也奉命派出四人小组，负责专列毛泽东车厢的安全护卫。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公安部中央纵队司令员吴烈，也乘压道车护送专列至天津。

组成如此高规格的护卫团队，绝非事出无因。

就在毛泽东即将出访前夕，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电台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报告了毛泽东即将出访苏联的情报。通过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大头目毛人凤直接指挥，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进行暗杀活动的计划。

密电被北京市公安局截获，并迅速汇报到党中央的最高层。毛泽东亲自在公安部的报告上做出批示：在我回国之前，一定要镇压这伙反革命。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对他俩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帝国主义曾以暗杀共产党领袖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如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就先后遇刺……如今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由于面对的是暗藏、潜伏敌特分子、地方土匪势力等多方面威胁和安全隐患，又是在无法确切把握危险方向的情况下，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人海战术，通过沿途密布警卫线，以确保毛泽东出行的万无一失。

公安中央纵队、北京纠察总队、北京市公安总队等担负了首都城内行车路线与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的护路警卫任务。警卫部队（总队）首长率领各级指挥员查看地形、划分警卫地段，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道口、车站都明确分工、实行包干负责。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路两端制高点，构成了严密的警戒长廊。警卫部队与铁路职工和公安干警密切配合，对铁路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排除路基及铁轨两侧一切危险物。

毛泽东出行的前一天，专列及沿线警卫工作已全部就绪。北京前门车站周围严密布岗，沿线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而且提前六七个小时就布控到位了。身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



北京公安总队队员留影

市市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六职的聂荣臻也亲自检查了专列和铁路线的警卫。

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经东北的满洲里，沿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这辆编号为9002的专列，由前卫车、主车、后卫车组成。专列内部做了细致的装修，车厢内设有办公室、卧室、卫生间、客厅，还有秘书室、工作人员室。

上车后的毛泽东四下打量着车厢，问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这列车是哪里生产的？"

滕代远回答说："这辆车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专列。老蒋一次也没有坐过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据说宋美龄曾乘坐过一次。"

毛泽东和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后，每停靠一站，安全护送人员都要下车检查。经过天津时，铁路上报告在铁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

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马上下车去调查处理此事。

车上的气氛随即显得有些紧张，联系到公安部门前日截获的有关暗杀中共领袖的情报，负责护卫毛泽东出访的警卫人员都捏着一把汗。在截获敌特情报后，公安部门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曾建议改变访苏时间，后由于多种因素制约不便再作变更，毛泽东决定按原计划出行。

而刚刚走出京门，就遭遇了险情，这着实让所有公安警卫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对日后漫长行程中的防范工作更添担忧。罗瑞卿下车调查突发险情后，专列在李克农等的护送下继续前行。后来经严格排查，查出放手榴弹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铁路系统内部立即又做了一番紧急检查，结果在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了一个炸药包，并及时予以排除。

东北的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温常常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专列行进到长春时，车上的暖气管道被冻裂了。车厢内温度骤然下降，寒气袭人。长春火车站专门调来了一台火车头，对着专列喷射热蒸汽，为把专列烘得暖和一些，但并不怎么有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内心焦急，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不便让列车在车站久停进行修理。

没有暖气的专列随即又上路了，喘着粗气缓慢地翻越大兴安岭。由于海拔增高，气温也越来越低。车过大兴安岭时，外面已是零下三四十度，车厢内的温度也降到了5摄氏度，毛泽东冻得有点受不了，一个劲儿地搓手跺脚。

“这火车怎么搞的？不是车厢冷就是跑不动，真比老牛拉车还慢。还说是战利品，美国出产的，我看也不灵呀！”毛泽东开始抱怨起来。

随身警卫赶快给毛泽东添加衣服，披上斗篷。毛泽东还不知道车厢内的温度急剧下降是因为列车的暖气管道冻坏了，对警卫说：“你去问问怎么回事。”

汪东兴出去了解情况后回来报告：“主席，是不是感觉车厢里太冷了？恐怕还得忍受一会儿，列车的暖气管冻坏了。”

“怎么搞的，老出事，滕代远哪里去了？”毛泽东问。

“滕部长正在想办法，他在长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还没解决

好。”警卫在旁插话说。

毛泽东把冰凉的双手缩拢到嘴边，哈了一口热气，不无幽默地说：“噢，是这么回事，看来美国人搞的东西也不灵啊！”

“他们这东西在咱们东北根本不能用，可能在南方还行。”汪东兴这样说。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铁道部部长也没想到？看来，你们对美国货还没有搞明白，还有点迷信洋货啊。”

毛泽东的专列在博克图小站停了半个小时，修理暖气管。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对身边的警卫说：“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我历来不信，有些人还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



1949年12月6日至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行时，在专列上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送行者交谈

暖气管道还是没修好。汪东兴上车来，无可奈何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打了个手势，说："那就赶快走吧。车都冻坏了，我也准备冻成冰棍喽。"

就这样，毛泽东在严寒和极低的温度下冻了半个下午和一整夜。

12月9日，专列终于驶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在这里，毛泽东换乘了苏联的宽轨列车。这是苏联领导人所乘坐的专列，设施豪华，车厢内有浴室、卫生间、餐厅，还专门为毛泽东安排了一位配餐的营养师。

专列进入了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列车停靠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等依次上车，他们是专程到边境来迎接毛泽东一行的。

苏方还在车站上安排了仪仗队，请毛泽东下车检阅。主人的盛情难却，毛泽东只好客随主便，下车检阅了仪仗队，并与前来迎送的苏联副外长和当地党政领导人握手、拥抱。

此后，专列继续沿西伯利亚铁道西行，每到一个大站，必有当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出面迎送。显然，这一切都是莫斯科精心安排的，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友好和尊重。

尽管路途遥远，毛泽东的心情始终比较放松。沿途靠站时，他经常走出车厢，到月台上散散步，消减疲劳。但当专列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在下车散步时，忽然感到头晕目眩，大汗淋漓。随行人员赶忙把他扶回了车厢休息。此后靠站时，毛泽东就不再去月台上散步了。

周恩来安顿好后即来到毛泽东住地/孔祥惠等在毛泽东到达前赶到满洲里/除了你自己，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得到迅速处理

经过10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了莫斯科雅罗斯拉

夫车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迎候。

专列停稳之后，前来欢迎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人首先登上专列，对毛泽东表示欢迎和慰问。因天气特别寒冷，苏方只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便在莫洛托夫等人陪同下，驱车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当晚6点，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苏联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在会见厅门口恭候毛泽东。这种高规格的礼仪也是一次破例，因为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客人的，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和毛泽东的尊重，才作了这样的安排。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寿辰纪念活动。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祝寿大会上，斯大林陪同毛泽东一道步入会场，并安排毛泽东在主席台中央就座。在13个外国代表团中，毛泽东被安排首先发表致辞，期间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在苏联参加斯大林70寿辰大会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1950年1月2日，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斯大林终于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约。当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要周恩来尽快动身来莫斯科，签署协议。

在等待周恩来到达期间，毛泽东赴苏联各地参观。他先后拜谒了列宁墓，到列宁格勒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到波罗的海远瞻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塔得要塞等地方，领略了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风采。

1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安顿好后，很快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共同商议如何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之事。

1月22日，中苏双方重开会谈。23日，中苏双方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经过反复商讨努力，双方最终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同时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

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随着条约协定的达成，毛泽东访苏的目标基本实现。2月14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条约签字仪式，仪式后，中苏双方还举行了招待和答谢宴会。此后的2月17日，毛泽东告别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返程途中，列车每经过一个大站，毛泽东一行就下来参观一些工厂、学校，直到2月26日，抵达中苏边界的终点站——奥特堡尔。在离开苏联边境之际，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致谢，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也向毛泽东转交了苏联方面赠送的礼品，负责毛泽东一行安全保卫任务的苏方安全人员至此也完成了使命，全部返回。

火车到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后，毛泽东换乘上中国的列车。跨过国境线回到中国这一端，已完成了出访要务赴苏目的基本实现的毛泽东显得十分轻松。然而，执行保卫任务的中方警卫人员却丝毫没有轻松感，反而更紧张起来。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由于毛泽东归国的消息已在国内公开，这等于毛泽东在国内的行程完全曝光在外，这无形中给公安警卫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为了确保毛泽东返京行程的安全，和出国时一样，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部布置了警戒。这么长的路线，必须动员沿途所经各地的驻军和地方公安警力，各自严守一段。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也再次担负起京津路段沿线的警戒，2000多名官兵在刘辉山师长和张廷桢政委的亲自带领下，按时完成了部署。

而在警卫部队严密布岗之前好几天，便衣保卫队的孔祥惠等四名队员就接到命令，从北京赶到了满洲里，在那里等候随专列护卫毛泽东回京。临行前，四名队员都武装了一身皮大衣、皮鞋、皮帽子，好应付东北的酷雪严寒。

孔祥惠他们到达满洲里时，毛泽东回国后将要乘坐的专列已停靠在车站待命。他们上车做好安全检查，并轮流昼夜把守车厢，防止发生意外。

另外，还有中央警卫师一个连也与孔祥惠等同时赶到，他们也将部署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担负警卫任务。

孔祥惠和三名队友在满洲里等候了三天。这三天里，他们并不轻松，哪里也不敢去，更何况外面还下着大雪。他们四人食宿都在火车上，每天照规定下车数次检查专列的安全状况。他们像铁路工人那样，拿着锤子在车身上下敲敲打打，察看车底下有什么异常情况。东北的三月仍然寒气逼人，特别是早晨检查时，他们感觉自己的鼻子都快冻掉了。

那时，便衣队员警惕性极高，连火车司机给车加水时，他们也要紧跟在一边查看全过程。孔祥惠说："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领导跟我们就是那样交代的，除了相信你自己之外，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 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就是他们这次执行任务必须不折不扣严守的原则。

其实，护送毛泽东专列安全返回北京面临的巨大压力比之出行时丝毫未减。公安部门从刚破获的北平潜伏电台案特务口中得知，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奉毛人凤之命谋划了一系列刺杀行动，如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在哈尔滨车站预埋定时炸弹等等，妄图复制一起与当年日本人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相似的阴谋。

当孔祥惠等四人在车站守候到第四天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的火车驶进了满洲里。在与苏方作了象征性地交接后，毛泽东登上了早已整装待发的专列，列车随之徐徐启动。

从满洲里到北京途中，毛泽东在哈尔滨、长春都稍事休息，并会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之后，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向北京方向行驶。孔祥惠等便衣队队员，护卫着毛泽东所在的车厢前后两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觉。然而当他们把目光投向沿线的路段、桥梁、路口、车站等处时，便可以看到各地驻军和公安纵队战士在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达到了几步一岗，步步为营的地步。

后来他们听说，公安纵队的各级干部为沿线的安全，在专列通过前曾分头检查，以防疏漏，还与铁路局和地方公安局密切配合，对沿途可疑分子进行监控和必要的处置。3月3日和4日，就在专列很快将通过京津路段

时，现场警卫部队又对路段内铁路桥梁、道钉、枕木等作了反复检查。

有些战士在检查桥梁时，担心桥下埋藏炸弹，不畏寒冷，一次一次下到水里，反复排查。负责车站执勤的战士，每通过一列火车，就要对铁道路基进行一次检查，唯恐发生丝毫遗漏，他们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甚至做好了宁愿炸弹炸伤自己，也要坚决保卫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安全的决心。

正由于警卫部队的严密警卫和排查，这期间发生的个别敌特分子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被警卫官兵们及时发现，迅速处理。

3月4日晚22时，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北京。孔祥惠等便衣队队员终于完成了随车护卫毛泽东的任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至此，蒋介石、毛人凤等人妄图借毛泽东访问苏联往返之机进行刺杀的阴谋也彻底破灭了。

警卫把市长当成了“车夫”/黄敬说：市长就是听差的/午夜里，政府大楼外响起枪声

1950年3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大姐应邀前去天津出差。便衣保卫队安排队员马春田跟随蔡大姐赴天津担任随行护卫任务。

那天，蔡畅大姐和她的机要秘书以及小马一行，乘坐火车前往天津。一路上，小马就坐在蔡大姐对面的边座上。因为这次出行乘坐的是普通列车，又是在硬座车厢，人员嘈杂，而随行警卫只有小马一人，故而他内心不免有点紧张。他随时随刻注意观察着车厢内外和座位前后乘客的情况和动向，唯恐发生什么意外。

当年的火车走得慢，大约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天津站。下车后，看到天津市政府来人接站，小马的心才放了下来。随后，汽车把蔡畅一行送到了天津市政府交际处大楼住下。

第二天早晨，小马早早起来，坐在楼上蔡畅房间外面的沙发上守卫

着。8点多钟，来了一位男同志，身穿黑呢子制服，外面还披了一件黑呢子大衣，随意而不失风度。

他走上楼来，就要去推蔡大姐的房门。小马见情况，赶快起身拦住来人，并询问他的姓名。那人也不报自己的姓名，就说："我来找蔡畅大姐有事的。"

小马也就公事公办地告诉来人："请你在沙发上坐等一会儿，首长还没起床呢。"

那人很听话，随之坐在沙发上等起来。等候中那人不时地低头看看手表，又几次要小马前去催问。大约快9点钟时，小马才去敲了敲蔡畅的房门。

蔡畅出得门来，小马立即报告说："首长，外边有人想要见您。"蔡畅正梳理着头发，边梳边说："谁呀，请他进来吧。"

那人一进门，便像老熟人似的对蔡畅说："大姐，咱今儿早晨去'狗不理'吃包子，怎样？"

"好啊！"蔡大姐痛快地答应了。

听到蔡畅答应要去"狗不理"包子店，小马立刻给天津警卫处打了电话，请他们提前去布置那里的警卫。

不一会儿工夫，蔡大姐便和那位男同志一块儿走下楼来，坐上了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蔡大姐和机要秘书坐在后排座，小马坐副驾驶座，那位男同志则坐在了驾驶座上。

男同志熟练地发动了红色轿车，后边的随卫汽车也跟了上来。小马感觉这位男同志的车技很高，车开得飞快，不一会儿工夫，后边的随卫汽车就有点跟不上趟了。

小马很负责任地提醒身边那位驾车"司机"说："同志，你的车能不能开得慢一点？"

"怎么了？""司机"有点不解的样子。

"后边的随卫车都跟不上了。"小马说。

"那好，就听你的。""司机"很爽快地答应着，并把车速降了下来。

很快，汽车就开到了“狗不理”包子店，蔡畅在那位同志陪同下，轻松快意地品尝了天津“狗不理”包子。

返回住处后，蔡畅问小马：“你知道刚才为咱们开车的人是谁吗？”

小马说：“我不知道，那人不是司机嘛？”

蔡畅告诉小马：“你说的这个‘司机’呀，就是咱们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长黄敬。”

小马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竟然错把市长当成了开车司机。这次接触让小马感到，黄敬市长为人和气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说话风趣，还会开车。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他在过去还真是不曾见到过，是个有些与众不同的人。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下午，黄敬市长又来交际处，接蔡畅去市委作报告。这次依然是黄敬驾驶汽车，小马坐旁边，蔡畅坐后排。

那一天，马路上的汽车很多，再加行人、自行车，显得拥挤不堪。为了不误开会时间，只见黄市长驾车在马路上左穿右插，顺行不畅时，甚至还开上了逆行道。

小马看着黄市长这样开车紧张了起来，生怕出现意外，就说：“黄市长，逆行太危险了，还是开顺行车吧。”


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

谁知黄敬却不太在意地说：“我这个车子，谁都认识，会避让的，没有问题！”

黄敬市长的话，让小马觉得这位市长的确与众不同。他工作起来潇洒自如，与这座城市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只是拿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的城市交通管理实在不够严格，连市长都逆行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呢。

果然一路没出任何问题，黄敬把汽车顺利开到了报告会场，他还亲自主持了那场为妇女干部举行的报告大会。

短短的几次工作接触，小马对这位不太寻常的天津市长产生了许多好奇感。在逗留天津的日子里，他从蔡畅大姐那里，从天津干部口中，对这位黄敬市长有了较多的了解，也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趣闻轶事。

黄敬，原名俞启威，祖籍浙江绍兴，出身官僚富家，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于1932年入党，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后被捕入狱。1935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黄敬接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此后赴延安参加全国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1942年担任了中共冀鲁豫党委书记，1948年任中共北方局委员，1949年1月天津解放，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



黄敬（左）在天津解放庆功会上与战士们亲切交谈

当时，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人有三位：天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敬；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人称“三黄”。其中最年轻的是黄敬，只有37岁。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气，和部下关系融洽，打成了一片。

有一次，市委机要科长张学文正在办公室，黄敬忽然推门进来，无拘无束地冲着张学文说：“你怎么这么瘦啊！”边说边用手去卡张学文的脖子，开玩笑地说：“我都能掐死你啦！（意思是说他的脖子太细了。）”

市长的举动也逗乐了张学文，他笑着说：“掐死了，我就不活了。”

“不活了怎么成？还得革命呐！”黄敬依然嘻嘻哈哈。黄市长的乐和劲儿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办公室里发出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市委召开会议。中间休息时，黄敬就跑到了伙房，几个炊事员正忙活着做饭，见黄市长进来，也毫无拘谨，就像看见老相识一样，热情地和黄敬打着招呼。黄敬见案板上摆了一盆肉，也不管在场的人，走过去从盆里拈了一小块肉，放得嘴里，吃得很香，然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伙房。几位炊事员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黄市长拈肉吃的样子。

小马还听说，黄敬在天津有句名言：“市长就是听差的。”这绝不是口头说说，而是时时刻刻都在这样做。

有一天，黄敬听一位工人反映说，他工作在河东区一个单位，每天上班都要绕经某军用仓库的一大圈铁丝网，走许多冤枉路。“有这等事嘛？”黄敬思索了一阵后，随即拍板决定：“开一条路。”

他找来军用仓库主管方共同商议，制订出了开路方案。几天后，工程便启动，位于河东的军用物资仓库被从中间拦腰劈开，辟出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后来还开通了无轨电车，工人们上下班方便多了。

就因为这件事，天津的工人们说他“真是为我们工人阶级当差的”。他们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位为工人办实事的市长。

后来，体察民情的黄敬看到许多工人的住房条件很差，每逢雨天，他就夜不能寐，想着许多工人兄弟家庭还挤在“外面大雨，棚里小雨”的窝棚里盼天明，就痛下决心给工人们解决住房问题。

尽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建设资金极为困难，黄敬仍是竭尽全力，上下筹措，很快在天津盖起了61万平方米，5万余间房屋的工人新村，让当时天津的17万工人及其家眷告别了棚铺陋屋，迁入了简易新居。这工人新村后来被称作是天津的第一批“经济适用房”。

在这个名为“中山门新村”的工人新村开工典礼上，黄敬怀着诚恳和愧疚的心情说：“师傅们，政府本想为你们盖正规的住宅，建设楼房，可现在资金困难，政府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先盖些简易平房，暂时解决大家的居住困难。我请大家理解和放心，我也向工人师傅们保证，最多十年，我们会在这里新建正规的住宅区，盖起真正的工人新村！”

虽然黄敬不久后就调离了天津，出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后于1958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愿望没能如期实现。但黄敬为民务实的形象和人格魅力却深深印在了天津人民心里。

小马那次顺利完成了赴天津执行警卫的任务，平安回到北京。但事后他听天津的警卫同行们说，天津的敌特分子的地下活动相当猖獗，市政府是攻击破坏的主要目标，甚至黄敬市长也是敌特暗杀的对象。他感觉自己的天津之行平平安安，没出任何意外真是很幸运。

就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已是午夜时分，天津市政府交际处大楼礼堂内仍灯火通明。天津市政府为来访的苏联代表团举办的欢迎宴会和文艺晚会还在进行，黄敬市长和市政府的几位领导都在楼内作陪。

当大楼外面的流动哨兵巡逻到大楼后院汽车库附近时，发现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朝市政府交际处大楼走来。“站住，什么人？”当那个人走到距离自己10米左右时，哨兵突然发问。

那个人不吱声，拔出手枪，朝哨兵开了一枪，扭头就跑。哨兵左腿中枪负伤，流血不止，倒在了地上。交际处大楼内听到了枪响，警卫战士迅速追出来，黄敬也持手枪从大楼内出来。

后来，经天津市公安局严密侦查，那个武装特务速被捕获，他所属的“反共救国团”也被一举捣毁。据那个特务交代，“反共救国团”密谋的计划是炸毁天津市政府交际处大楼，暗杀黄敬。没想到爆炸、暗杀计划尚未实施，他们就落入了法网。

周恩来卫士成元功突然出现在包厢/让邓颖超特别操心记挂的一件事情/邓颖超喜欢独自玩一副特别的骨牌/小伙子们的心事都叫孙维世挖了出来

那是1951年隆冬，共和国刚刚成立两年多。新中国的青年、妇女、工会等组织已经陆续与国际的和各国的相应组织建立起了联系。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于此时应邀赴当时的东德柏林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六次执委会。她将搭乘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到满洲里，再经莫斯科转道前往柏林。

根据上级的安排，便衣队分队长张文健带四名便衣队队员，随行护送邓颖超到满洲里。临出发前，领导一再对他们强调："要提高警惕，要保护好邓大姐的绝对安全。"

出发那天，张文健带便衣队队员先来到前门火车站，车站站长向他们作详细交代说："邓大姐乘坐的是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她的包厢是在列车的第二节，这辆列车从北京到满洲里区间是由中方管理，过了满洲里到莫斯科这段路就归苏联方面管了，邓大姐到满洲里后要换乘苏联方面安排的列车。"

几个便衣队队员到列车包厢里查看后商定，车厢两头各放一个固定哨位，把好前后两个门，邓大姐在车上活动或下车散步时，由张文健和邓颖超的随身警卫员负责。便衣警卫人员的休息处，就安排在紧挨包厢两头的第一个房间，几个人轮换休息。

当一切刚刚安排就绪，邓颖超和全国妇联的送行人员就到车站了。大家依依惜别，祝邓大姐出访成功。

列车开动后，分队长张文健即向邓颖超报到，随后介绍了和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几名便衣队队员，邓颖超也介绍了与她同行的人员，全国妇联国际部的戚云、俄文翻译孙维世以及英文打字员张莉和随身警卫。

邓颖超和缓地说："大家互相认识了能方便工作，我们要一起生活一

个星期呢！”

火车刚开出车站不久，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突然出现在了邓颖超的包厢内，这让大家都感觉很意外。原来他是来请邓颖超、戚云、孙维世等到后面临时加挂的一节公事车厢上去的，他说：“总理正在那儿等你们呢，他要到天津后才返回去。”

成元功的出现，确实让邓颖超她们感到意外和惊喜。孙维世带几分顽皮笑着说：“这一定是爸爸独巨匠心的安排。”

对于政府部门出访国外的代表团，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通常总是要事先听取相关的汇报并做些指示的。

而这次邓颖超出国，周恩来因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听取她们的出访汇报。直到邓颖超临行前，细心的周恩来才想出了一



建国初期的邓颖超和周恩来

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在国际列车上加挂一节公事车，这样就能在火车上和邓颖超她们谈一谈了，借此也可以送她们一程。

邓大姐一行来到了后面加挂的公事车厢，一见周恩来就故意打趣说："我以为你轻视我们妇女工作，不和我们谈哩。"

"谁敢轻视咱两亿五千万全国妇女同胞的代表啊？我有意这样安排，是想让你出乎意料地高兴一下，借此机会，也是为你们送一程。" 周恩来哈哈一笑说道。

嘴不饶人的孙维世马上说："爸爸，你说给我们送行，我和戚云阿姨哪里担当得起？你分明是来给妈妈送行的，拉上我们做陪衬啊。妈妈，你说是不是呀？"

邓颖超假装板着脸对孙维世说："维世，你这张嘴巴，真该让人管教管教了，恩来百忙中来听我们汇报，你还不谢谢他。"

"是。"孙维世马上站起来，行了个少先队队礼，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

短暂而欢快的送行很快就结束了。

邓颖超乘坐的国际列车离开了天津站，继续向东北方向驶去。从车厢向外望去，到处是白雪皑皑，天寒地冻。车厢里却烧了很足的暖气，温暖如春。

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中德之间没有直通航线，乘坐飞机是不可能的，所以，邓颖超的赴德之行，只能选择乘坐耗时的长途火车。从北京到满洲里，要走5天5夜，从满洲里到莫斯科又要走7天，前后约摸半个月后才能抵达东柏林，这将是一次长路漫漫、任重道远的旅程。

在旅途中，邓颖超和戚云反复讨论了周恩来对于这次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议的原则意见，再三推敲了向国际妇联执委会的汇报材料，还几番议论了如何利用这次会议广交各国妇女朋友。

要在火车上度过许多天，这期间让邓颖超特别操心记挂的一件事情，就是她随身带着一笔重金，共有一万美元。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外汇尤为珍贵。经周恩来特别批准后，想方设法才筹措来这笔美元。邓颖超将它带到东柏林，是作为中国妇联交给国际妇联组织的会费。

对于这笔来之不易的美金，邓颖超一路都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一旦有事离开车厢，就叮嘱孙维世为之看管。

长期以来，邓颖超养成了很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早晨起床后，先在车厢里锻炼活动一下，做做“八段锦”，打打太极拳，锻炼一下身体。上午、下午的整块时间，她就看看书和文件，停车时她有时会到站台上走动走动。吃饭前后，特别是晚上，她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天或打打扑克。

便衣队队员们发现，邓颖超有时候喜欢独自一人玩玩骨牌。她玩的那副骨牌挺特别，一面是骨制的，一面是竹制的，那个装骨牌的小木匣子呈长方形，一边木框已坏了，用了一根绳子捆绑着。

有一次，张文健看见邓颖超正一人蛮有兴致地玩着骨牌，就上前说：“邓大姐，你这个骨牌匣子都破了，回北京后我请人给您做一个新的，把这旧的换下来怎样？”

“不要，不要，还能用的。”邓颖超回答着，眼里流露出对这副骨牌和木匣子很是珍视的神情。

这让张文健感到，这副骨牌和这个小木匣子，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来历。在张文健的一再追问下，邓颖超告诉他，这副骨牌是她母亲生前留给她的。“每逢出远门，我都要带着它，有空时就拿出来玩玩‘过关’游戏，玩着的时候就会回忆母亲的一些往事，回忆起我和母亲患难与共的那些岁月。”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自立自强、教女有方的革命母亲。1875年，她生于湖南长沙，很小就随家人到广西。杨振德14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她在29岁时嫁给了时任南宁镇台武官的邓庭忠。第二年，她生下一女取名邓文淑，就是后来的邓颖超。

邓颖超三四岁时，父亲被陷害充军新疆，不久就去世了。母亲没有被飞来的横祸压垮，她不靠别人的怜悯施舍，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韧闯出了一条谋生之路。1910年她先在天津育婴堂任医生，后又到北方著名进步人士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当教员。9岁的邓颖超就在这所学校读的书。杨振德在学校研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思想倾向革命。

邓颖超自幼年就把母亲作为楷模，在母亲的教育熏陶下，少年邓颖超忧国忧民，思想激进。1919年5月4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时，正在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很快和郭隆真、刘清杨等联合各界妇女成立了女子爱国同志会。担任会长的邓颖超时常走上街头慷慨陈词，揭露反动政府对外的软弱，抗议列强对中华的不平等待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和邓颖超参加了长征，杨振德留在赣南苏区，被敌人逮捕。在国民党的监狱、法庭上，她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和政治操守。当敌人让她写信给女儿、女婿，劝他们脱离共产党时，她干脆地回答说："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我也不会干这卑鄙的勾当！""如果你们一定要加罪于我，那就请杀我头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母亲才被释放出来，回到延安和女儿女婿重新团聚。在延安，她不顾年迈体弱，仍坚持为延安的同志们诊病开药，直至1940年冬，在延安病逝。

在追悼会上，邓颖超、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等许多人为邓母送了花圈，并致以祭文："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毋息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追随革命，不畏风霜。关心国事，无日或忘。"

这篇祭文，对邓颖超母亲杨振德一生"追随革命，不畏风霜"的品格和精神给予很高褒扬。

在这趟列车上担任护卫邓颖超一行任务的几名便衣队队员，当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都还没有结婚。按理说，便衣队队员多都是从军校和部队中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们之所以至今未婚，是因为所肩负的特殊使命，需要他们暂时舍弃和约束儿女私情。

便衣保卫队在建屏县黄泥村集训时，中央社会部领导给全体队员规定了严格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两年之内不准谈恋爱。从今天看来，这样的规定有点过于苛刻和不近人情，但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便衣卫士们选择了

以革命利益为重。

尽管便衣队也发生过个别人因为想回家结婚，不辞而别开了小差的事件，但绝大多数队员都能严格遵守铁的纪律。

同在一个车厢的孙维世，和几个便衣警卫的年龄相差无几。性格热情活泼的她，马上就和小伙子们熟悉起来，她和他们一起聊天，问这问那，没聊几次，小伙子们的个人心事就都叫她给挖了出来。

那时便衣队不准恋爱不准结婚的纪律刚刚解除，张文健也开始寻思着找爱人的事了。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才合适？建立家庭后，肯定会面对不少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心事，都不时在张文健的脑子里打转转。

张文健在聊天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心事，很快就被眼快嘴快的孙维世传到了邓颖超那里。

有一次，邓颖超在车厢里见到了正在值班的张文健，就叫他坐下来聊聊。邓颖超先问了他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张文健一一如实相告。随后邓颖超又问："是不是在考虑婚姻大事啊？"张文健点了点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过，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影响工作和学习。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为此要深入了解对方，也让对方了解你，双方都认为合适后，再办理结婚手续。结婚后夫妇间仍要互敬、互爱、互帮、互学，还要共同承担家务，决不能搞大男子主义。希望你们能处理好自己的婚姻大事，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邓颖超的话，说得张文健心里热乎乎的。这时的他感到，面前的邓颖超，已不是他们护卫的首长，而是一位慈祥和蔼的母亲，她时刻关切着儿女们的成长。

一回到休息间，张文健就把邓颖超的话转述给了几位便衣队队员，大家对邓大姐的关怀都感到很温暖。干好工作、完成好任务的决心也更强烈了。

列车如期到达了满洲里。等候多时的当地交际处郑处长已经做好了一切行程安排，他请邓颖超一行在满洲里休息两天，等待苏联方面的列车前来接应。

当邓颖超等人走下了列车，郑处长为她和随行工作人员照了一张大合影。圆满完成了护卫任务的张文健等几名便衣警卫，恋恋不舍地把邓颖超送上了汽车。

握别时，邓颖超表扬张文健等便衣队队员工作做得不错，叮嘱他们在回北京的路上好好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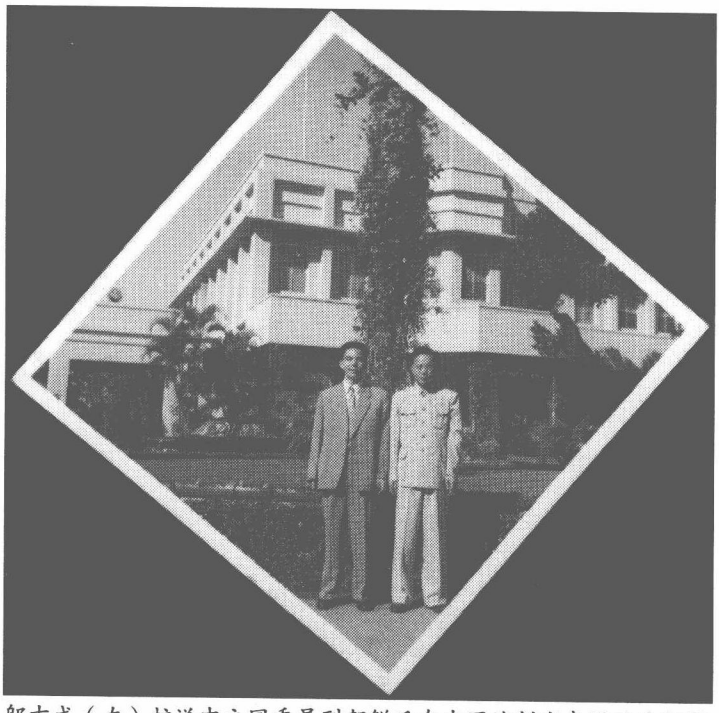
刘伟对邬吉成说：你负责护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委员/两国战俘遣返委员会成员的任务/距离平壤20多公里外的一个秘密地下指挥部/“前不久，我们代表团就有一个同志被杀害了。”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与朝鲜人民军浴血苦战，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军予以沉重的打击。到了1953年，打打谈谈拖了两年有余的谈判，才进入实质阶段，并最终签订了朝鲜北、南停战协议及一些相关的协议。

为了停战后随即展开的战俘遣返工作，谈判双方议定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协议条文，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这五个未参与朝鲜战事的国家，各指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负责并保证战俘在停战以后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

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派出的委员，先经过苏联进入中国，在中国稍事停留后，再赴朝鲜开城板门店北、南军事分界线。根据协议的相关条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员从中国到朝鲜开城的交通工具、生活供应、安全保卫等事项，均由中国方面负责。护送委员赴朝的整体工作安排事宜，由国防部的外事局负责，而交通和途中安全保卫的事，由公安部八局所属的政治保卫队具体办理。

一天，公安部八局局长刘伟，把邬吉成找去交代任务：“局里决定，派你负责护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赴朝的任务。你要组织好交通部门的乘务人员，做好沿途运行和生活安排，还要通知铁路



邬吉成（左）护送中立国委员到朝鲜后在中国谈判代表团驻地留影

沿线各省市的公安部门，协助你搞好警卫工作。到朝鲜后，与有关方面交接。”

一切安排妥当后，邬吉成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几个人，陪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从北京出发。他们经辽宁省沈阳市到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在朝鲜的新义州，马上和朝鲜方面接上了头，继而直趋平壤。

在平壤，朝鲜人民军保卫部的一位大校，接待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和邬吉成一行。大校陪同他们参观了平壤，一起登上了平壤的最高峰凤凰山。晚上，大校又领邬吉成一行前往距离平壤20多公里外的一个秘密的地下指挥部参观。

这个地下指挥部的设施建筑规模很大，也很漂亮。里面有宴会厅，有会议室，有办公室及休息室等。7点时分，朝鲜方面在这里设宴并演出文艺节目，招待波、捷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邬吉成和

国防部外事局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有金日成出席的这一活动。这是邬吉成第一次与朝鲜年轻的人民领袖见面，邬吉成在距离他不远的位置看着他，当时邬吉成怎么也不曾想到，在几年以后的日子里，他会成为金日成访华期间的中方卫士长，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十分亲近的关系。

逗留一天后，邬吉成又护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遣返委员会成员乘火车过大同江，到达了靠在军事分界线北边的朝鲜中部名城开城。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国方面的代表团就驻扎在开城西边的山坳里。因为战争刚刚停息，路上到处是弹坑，满眼的断墙残壁，火车走走停停，行进迟缓艰难。但不管怎么说，邬吉成终于把波、捷两国委员安全送达这里，护送任务算是圆满地完成了。

开城是座历史颇为悠久的老城，有古城墙和古建筑，以及别墅宅院。许多古旧的建筑是中式的，上面挂有匾和楹联，都是用汉字写的。由于战争的缘故，城内变得清冷寥落，昔日的繁华只能凭借想象了。

据说开城本是个盛产高丽参的地方，但此刻采参行业也因战争而衰败。邬吉成在这里听到一个笑话，说是中国志愿军的一个班在这一带挖工事，结果挖出很大的一棵高丽参，就煮着吃了。谁知吃了以后，个个都闹得直上火鼻子流血。

让邬吉成意想不到的是在开城，他遇到了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刘万邦。他俩都是晋绥军区贺龙的麾下，一起调到延安从事警卫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还一起担当过朱老总的警卫。刘万邦是随李克农率领的中国谈判代表团来的，专门负责代表团的保卫工作。

刘万邦告诉邬吉成："这里是军事分界线，要时时注意警惕。对面那边经常搞小动作，派特务潜入到这边来，进行骚扰和破坏。前不久，我们代表团就有一个同志被杀害了。"邬吉成还和刘万邦一起，到了那个被害的同志的墓地做了祭拜。

在刘万邦的引导下，邬吉成还到军事分界线的最前沿走了走，观看了志愿军用火箭炮在20几分钟内全歼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某高地。在开城，邬吉成还远远地眺望了一个战俘营，亲眼看到了被俘的美军和李承晚政府军。

从开城返回时，邬吉成又经过平壤。离开时，火车刚刚开出站，就听轰隆一声巨响，把他乘坐的火车车厢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幸亏没有伤着人。邬吉成当时很奇怪，战争已经结束了，哪来的炸弹爆炸声。后来才知道是联合国军飞机投下的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此刻不知怎么被碰响了。战火已经平息了，但危险还潜伏在朝鲜的土地上。

此后，邬吉成因为类似的护送任务，又去了两次朝鲜。在第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的许多部队，就开始帮助朝鲜搞重整家园的建设了。几次身临其境，目睹志愿军在朝鲜的景况，使邬吉成感慨良多："我们流了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牺牲在那里，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帮助朝鲜搞经济恢复和建设，有史以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步呢？我们的毛主席还要求我们的官兵，必须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

是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他们的确为驱逐日本的关东军进行了战斗，但他们在事前与美、英做了一笔侵损中国权益的交易，并且在中国占领的区域内，也留下了将那里的机械设备和物资拆运回苏联，毁坏百姓财产，奸污中国妇女等狼藉的声名和抹不去的污点。

三　护卫在开国领袖身边

特殊的登山队/聂荣臻说："我在前面给大家开道！"/彭老总打破了沉寂，情绪有些激动/朱总司令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

1949年的金秋十月，是一个阳光明丽的日子。

参加完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朱德总司令和各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共高级将领们相继来到了北京颐和园。

革命胜利后，老战友们再度相见，感到分外亲切。大家走上前来，一一向朱德总司令行军礼致意。

朱德一面和老战友们握手，一面招呼大家来搞一次攀登万寿山的比赛活动。上任不久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马上风趣地说："好啊，我当尽地主之谊，在前面给大家开道！"

说着便甩开双手，精神抖擞地走到前面去了。朱德和众将领们也紧随其后，排成了一字队形，向万寿山顶攀去。

万寿山为北京燕山余脉，高约60米，前临昆明湖。乾隆十五年（1750）为庆祝皇太后60寿辰，这座山就改名为万寿山了。

万寿山上的建筑群依山而筑，多为英法联军烧毁后慈禧时期重新建造的。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

上山只有一条曲折的石阶路，其中几处坡势有点陡峭，爬起来是要费

一点体力的。

向上爬了一小段坡后，邓小平对身边的刘伯承、陈毅等叹道："你们看，朱老总年过六旬，但身体还这么健朗，爬起山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也不一定能追得上他呀！"刘伯承、陈毅点头表示赞同。

这支威风凛凛的"爬山队"队员，皆是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统帅和将领。他们的名字威震八方，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崇敬，也为敌对势力恐惧和仇恨。

北京解放前夕，美蒋特务机关曾在颐和园一带潜伏了大批特务，他们企图寻机暗杀中共的高层领导和军队首长。

受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便衣保卫队自半年前驻扎颐和园后，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已挖出了暗藏在颐和园员工队伍中的10余名特务分子，而是否还有隐藏更深的敌特分子没挖出来，谁也难以断定。

因此几位军队最高指挥者们到来这天，驻扎在颐和园的便衣队队员几乎全员出动，为这支特殊的爬山队保驾。便衣队队员们深感责任重大，他们散布在几位"爬山运动员"的前后左右，不敢有一点疏忽大意。

"爬山运动员"们兴致勃勃地继续向上攀爬，年长的朱德老当益壮，步履敏捷地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头，后面的"队员"们也相衔跟进，一路谈笑风生，气氛格外轻松。

这番情景让人很难想象得出，他们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统帅，日寇和国民党百万大军就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他们才是真正的开国元勋。

他们登上佛香阁，走过排云殿、宝云阁铜殿，很快就攀上了万寿山山顶。在山顶，他们先观赏了"智慧海"殿前的宗教牌坊。这砖石结构的牌坊，表面用五色琉璃瓦件装饰。牌坊的正、背面石额上分别刻着："众香界，祇树林；智慧海，吉祥云。"

"智慧海"是一座高数十米的佛殿，大殿不用一根承重的梁柱，因此又俗称无梁殿。大殿屋顶用五色琉璃装饰，四壁嵌有琉璃制作的无量寿佛像1110尊，姿态栩栩如生。这些皆为清乾隆时期（1736–1795）的文物建筑。而令人惋惜的是，智慧海的无量寿佛像在1900年时，遭到了八国联军

的严重破坏和摧残，不少佛像已是缺头断臂，残损不全了。

从万寿山顶下来，开国元勋们一路来到后山和后湖。这里除了眺远斋、妙觉寺等小殿阁外，别有一番江南秀色。湖水静谧，垂柳依依，绿影倒映，只是湖畔曾经伫立的一些精美江南建筑都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焚烧殆尽，秀色中的疮痍给人心中增添了几许苍凉。只有那座高16米，下为汉白玉须弥座，上以七彩琉璃砖瓦镶砌的八面七级多宝塔，完整而未遭劫难，屹立在绿树丛中，格外醒目。

在下山的路上，朱老总不由得触景生情，感慨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但近百年来，却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长期过着受压迫受屈辱的生活！"他停下脚步，指了指路边残存的一些文物建筑对大家说："这就是历史的见证！"

其他几位开国元勋紧跟朱总司令身后，受他的情绪感染，沉默无言。

这时，彭老总突然打破了沉寂，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今天，我们虽已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努力奋斗，将历史给予我们祖国的耻辱彻底洗刷干净，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随侍在前后左右的便衣队队员们，听着几位开国元勋们的交谈，深受教益，在情境交融中，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得到了升华。

仁者乐山，1950年初春的一天，对山岭充满无限深情的朱德总司令，又去位于延庆的八达岭攀登长城。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满昌，接到指示带自己的分队为朱老总巡路护卫。

八达岭是明朝修建的万里长城最为气势雄伟的一段，海拔1000多米，距北京城内50多公里。这里山势险要，也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门户。

当时从北京城内去往八达岭还没有高等级公路，偏僻的山区还时有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特务土匪出没，干一些拦路抢劫、袭扰村镇、纵火伤人的勾当。因此，在这一路实施警戒护卫还是十分必要的。

凌晨时分，便衣队队员就身着便装，怀揣手枪，顶着初春的微寒，骑着自行车向八达岭方向一路搜索前进了。沿途警卫部队也放出了流动哨，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便衣队又在形势险要、地形复杂的地方设置岗哨。

领袖身边特殊卫队（下篇）

偏偏天公不作美，天放亮后西北风越刮越大，黄沙遮天蔽日。刘满昌和几个队员在风中拼命地蹬着自行车前进。也许用力过大，只听刘满昌突然喊了一声："糟糕！"原来他的自行车脚蹬子被蹬掉了一只。

幸好他们已骑到了八达岭脚下的青龙桥车站，这里距离八达岭长城只有一公里的路程了。刘满昌和便衣队队员顾不上休息，放下伤残的自行车，继续向八达岭方向行进。

当便衣队刚刚将山上山下的警卫岗哨布置好，朱总司令乘坐的汽车已经开到了山下。

尽管天空阴沉沉的，能见度很低，风沙刮来时眼睛都难以睁开。但朱总司令的登山兴致丝毫未受影响，他一走出汽车，就将棉大衣脱掉，交给了随行的警卫人员，然后快步向八达岭长城走去。他身边的年轻人也随之紧跟着他往上走。

朱老总神态轻松自然地走着，便衣队队员不远不近地散布在他的周围。这是他们第二次担负朱总司令登山的护卫了，但今天的天气恶劣，地形地貌也比颐和园万寿山复杂得多，因此每个队员都不敢掉以轻心。

登上八达岭长城的高处，朱德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了望远镜。在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之间，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蜿蜒起伏。

朱总司令瞭望了许久，才转过身来。他对几个年轻的便衣队队员说："你们看，咱们祖国的山河如此壮丽，这是经过了近百年前仆后继的斗争，才从帝国主义列强的手中回到人民怀抱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牢牢地保卫她！"

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道："今天，我们在狂风里爬长城，是一次有意义的练兵！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已被赶跑了，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卷土重来。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为军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练兵，保卫祖国！"

其实，朱总司令说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党中央及其部队进城后，逐渐脱离了战争环境，特别是在军队中，普遍地滋长了一种和平麻痹思想和轻敌情绪。朱德当时正在思虑，如何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使人民解放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大战略课题。

回到山下，目送朱总司令离开后，刘满昌才忽然想起了自己那辆蹬坏了一个脚蹬子的自行车。怎么办？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修车的地方，队员们虽想帮他，却也无能为力。

呼啸的北风依然刮个不停，刘满昌忽然想到，回去的路正好顺风，是不是可以借助风力骑回去呢？于是，他骗腿儿骑上了自行车。果然，风推车行，回程的50多公里路，竟然没费多少劲就骑到了家。

微服的陈云很难让人想到他的身份/陈云连点头说:“好，好，我服从。”/卫士长第三次来请刘满昌/谁降低了陈云同志的就餐标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向社会开放后的颐和园是中共领袖们时常前去休闲游览的去处。

1950年夏季的一天，北京的颐和园内，绿荫翳地，清风习习，树上的鸟鸣婉转悦耳，湖里的荷花吐蕊竞俏，清香袭人。

负责颐和园内安全保卫的便衣队分队长刘满昌又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要来颐和园游园休息，便衣队要做好保驾护卫的工作。

陈云乘坐的轿车在颐和园的一个侧门停下，刘满昌立即上前去迎接，和首长打招呼。这时他才发现，跟随陈云一同来的，只有他在东北时期的老卫士长。

“陈云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政务院副总理，为什么出行只有一个人跟随呢？”刘满昌觉得这事有点不合常理，心中不面生出几分疑惑。

陈云的卫士长似乎看出了刘满昌内心的疑惑，悄声向他解释说：“陈云同志不让很多人跟他外出，认为那样反而目标大。他说外面公开贴挂的陈云头像与他本人并不太相像，因此只要缩小目标，就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不至于扰民。”


建国初期的陈云和邓小平

刘满昌再次打量了一下陈云的装束，只见他身穿一件普通工作人员的棉布服装，非常朴素。如果不注意的话，是很难从装束上把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联系到一起的。

刘满昌向陈云报告说："首长，颐和园对外开放以来，游人很多，情况复杂。为了首长的安全，请首长一定要按照我们划定的路线走！"陈云随和地说："好！好！我服从就是。"

陈云在颐和园游览的路线，也是毛泽东、周总理、朱德等领导同志们来时走过的路线。在这条线上，有便衣队队员们分头守卫，他们扮装成各种社会角色，或在合法职业的掩护下，分散在园内的各个暗哨上。所以，这条线路被便衣队队员们称为"安全线"。

陈云很细致地边走边看，从仁寿殿、知春亭、长廊、谐趣园到后山及后湖，一路游览过去。陈云的兴致很高，一边看，一边向几个跟随着他的年轻队员讲说着清王朝的兴衰历史。

"清王朝统治中国293年，有康熙、雍正、乾隆134年国力强盛、财政富裕的鼎盛时期，又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丧权辱国的近半个世纪，这是清王朝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在这一时期落后于西方近100年，颐和园见证了这段历史。"

中午，刘满昌将陈云带到了听鹂馆，这里是专供中央领导和国际友人就餐的地方，安全和卫生都没有问题。1949年3月便衣保卫队的一个区队进驻颐和园后，挖出了园内潜伏的特务，对园内这座高档餐厅进行了整顿，充实了一些便衣警卫力量，使之成为设备先

进，服务一流，安全舒适的就餐地。

陈云被安排在听鹂馆后院一间餐厅进餐。便衣队队员们则聚在另外一个房间，有说有笑也准备吃饭。忽然，陈云的卫士长匆匆走来，他把刘满昌拉到一边，对他说："陈云同志请你去陪他吃饭。"

"什么！你在开玩笑吧？"刘满昌看着卫士长，一脸惊讶。

"不，陈云同志是请你过去吃饭。"卫士长认真地说。

刘满昌想：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自己是个普通军人，刚满20岁的年轻人，跟陈云同志坐一起吃饭成何体统？再说，陈云同志万一要问起什么问题，自己回答不上来，或说错了，怎么办？还是不去的好。

于是，他向陈云的卫士长解释说："首长的盛情我很感激，不说你也清楚，咱们干警卫的是不准离开岗位的。我陪他去吃饭，这里发生了问题谁负责？请你一定代我向陈云同志解释解释。"

卫士长转身出去了，可没过一会儿就又回来叫刘满昌，刘满昌又将他说服了。但是卫士长很快又第三次返回来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你的话我都向首长报告了，这次你自己向他解释去好了。"刘满昌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卫士长去了。

后院餐厅内，只有陈云一人端坐在桌旁，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他见刘满昌进来了，立即伸出手来和他亲切握手，对他说："我们一起吃顿饭，就一会儿工夫。再说，那边还有很多同志警卫着嘛，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陈云一番话和随和的态度，拉近了他和一个便衣队队员之间的距离，刘满昌紧张、不安的心情随之平静下来。

接着，陈云又与刘满昌拉开了家常，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何时参军？何时入党？都读过什么学校等等，刘满昌一一作了回答。

陈云听后点点头说："我们之间的职务不同，这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说着，陈云拿起筷子，递到刘满昌手里，并催促他赶快吃饭。刘满昌这才抬眼向餐桌上看了一眼，见餐桌上只有几盘水饺和几个盛酱油、醋、

蒜泥的小碟，此外别无他物。

刘满昌感到奇怪！一位分管财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颐和园高档餐馆就餐，吃的竟是很平常的家常便饭。餐桌上不但没有酒，而且根本没有炒菜。本来，中央领导在此用餐是有规定标准的。可陈云在这里用餐的标准，和普通警卫人员几乎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按标准给领导做菜？难道是陈云自己把标准降低了？刘满昌觉得作为警卫人员，出于对首长负责，是有必要搞清楚的。

他随即向陈云问道："首长，您这里为什么没有上菜，是谁降低了您的就餐标准？"

陈云解释说："水饺，是中国人的上等好饭。过去中国老百姓长期受战乱之苦，逢年过节也不一定能吃得上一顿饺子呢。现在我们能吃上水饺已经不错了，再要菜岂不是浪费嘛！"

"再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现在还处在恢复时期，要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最近又提出了'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号召。我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更应该带头节约才是。"陈云耐心地给刘满昌做起了工作。

吃过饭，刘满昌请服务员撤走碗筷，端上茶来。陈云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侵略战争，后是蒋介石发动的三年内战。中国人民为革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的革命事业离开人民的支援，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去搞革命如此，今后搞建设也是如此。"

陈云的这一番话，以及他严以律己和胜利不忘人民，不忘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高尚情操，给刘满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道卡车撞上了骑车人/一场事故被焦队长快速平息/朱德说："炮是'战争之神'。"

新中国成立后，每当中共领袖们外出，随卫他们身边，就成为便衣队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1950年的一个冬日，朱德总司令驱车前往驻扎在北京德胜门外的炮兵部队视察检阅。

便衣保卫队派出一个分队，在指导员焦万有的带领下，乘一辆缴获来的美国军用卡车，在朱德乘的车前面开道护卫。

那一时期，朱总司令正在集中考虑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即如何尽快实现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1950年9月，朱德在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卫正在进行的和平建设。"这个讲话，在中共历史文献中，是较早提出解放军必须实现现代化这一议题的。

朱德还特别强调说："在向现代化、正规化前进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要继承和



朱德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陆海空三军部队

发扬优良传统，保持高度的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在总结以往建军经验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学术、国防科技和治军的方法，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头脑。他当年的这些认识，对于今天来说仍不失其意义。

还是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就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和炮兵。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亲自抓了空军、海军等军种的组建，还对炮兵的建设倾注了许多心血。他下令从陆军抽调一些优秀干部充实到炮兵部队，还多次视察炮兵部队的装备和实战训练情况。

那天，朱总司令一行的车队刚行至新街口大街时，突然有一辆自行车闯到路中间来，开道的美式军用卡车来不及刹车，一下把自行车撞倒了。幸好，骑车人敏捷地跳下了车，没有受伤。

这时，街头市民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辆汽车看见骑自行车的人怎么也不鸣喇叭？要撞人了怎么也不赶紧踩刹车？懂不懂交通规则呀？"

卡车司机赶忙下车解释说："这卡车是刚从前线缴获来的战利品，还来不及检修，喇叭、刹车都不灵……"

要说，事故的发生确实有点客观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说，司机和便衣队队员们都是刚从农村进城的"土八路"，还真是不怎么懂得大城市的交通规则。

这时，便衣队指导员焦万有走下了汽车。他想，按照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损害了群众利益就要赔偿。现在咱已经把老百姓的自行车撞坏了，就一定要赔偿的。

再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朱总司令的汽车就跟在后面，如果事故拖延不决，很可能会危及首长的安全，因此必须马上处理好这起事故。

焦万有急忙从自己衣兜里掏钱，可钱都掏出来了还不足2元。这点钱怎么够？于是他又叫了几个便衣队队员一起凑凑。大家也纷纷把衣兜里的钱往外掏，总共凑了20元。

那个时候，国家机关还实行供给制，每个便衣队队员每月供给35斤小米，除此外只发很少的津贴费。20元钱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个小数了。

那骑车人先是被吓得面色如土，这时才清醒过来。他看着车上这些身穿制服的政府人员一起为自己凑钱，内心也受了感动，这事儿在解放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的。

当焦万有把刚凑齐的钱递给骑车人，要他作修车之用时，他连连说："不用……用不了这么多钱的。"

便衣队队员的举动，很快缓和了现场刚刚还有点紧张的空气，围观群众的抱怨声也消失了。一位修车师傅走上前来，看了看骑车人，又将撞坏的自行车扶起来，慷慨地说："人没伤着，车坏得也不严重，修车的活我包了，不要钱，同志们把钱收起来吧！"

焦万有还是拉着骑车人安慰说："这钱你一定收下，除了修车外，再请医生给检查检查，需要就买点药。钱不够再去找我们。"说着把钱硬塞到了骑车人手里。接着，他又回头对那位热心的修车师傅说："谢谢您了，请多辛苦，帮他把车修好。"

"放心，这活包在我身上了，保您满意。"修车师傅爽快应承着。

这时围观的群众也渐渐散去。一场事故很快就平息了。

焦万有迅速果断的处理，使围观的人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便散开了，没有给后面朱总司令乘坐的汽车带来什么影响。车队再次启动，向德胜门外的目的地进发。

到了炮兵部队，朱总司令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详细询问了部队建设和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朱总司令对陈锡联说："有人说，大炮是'战争之神'，这话是有道理的。现代战争，仍然要高度重视大炮的使用。"

在陈锡联向总司令汇报了部队的训练和新装备情况后，朱总司令在陈锡联陪同下乘车检阅了威武的炮兵队伍，随后又观看了炮兵战士的实战演练。

检阅完毕，朱总司令回到了休息室，便衣队队员特意为他送上了一条热毛巾。朱老总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又和陈锡联聊起了炮兵建设。他说："我们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要加速实现国防的现代化！炮兵在解放战争攻坚战中是立了大功的，现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

设，你们也要捷足先登，起带头作用呀！”

陈锡联听后说：“总司令关心我们炮兵，我们一定积极努力，绝不辜负总司令的期望！”

这时，朱老总又像想起了什么，回头来问焦万有：“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呀？”焦万有如实地将路上撞车赔钱的事报告了。总司令听后点点头说：“这事你处理得好！既保护了群众利益，又维护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要教育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光荣传统，这个永远不能丢！”

时间已近中午，陈锡联请朱总司令留在部队用餐。朱总司令却一脸严肃地说：“我来检阅部队，是为了给大家鼓舞士气的。如果在你们这里吃饭，不是要给部队增加许多不必要的开销，给指战员带来不好的影响吗？现在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我们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严禁一切不合理的开支。”

朱总司令谢绝了部队的一再挽留，带着随身警卫和便衣保卫队一班人马踏上返回城里的路。

那一年，是朱德总司令格外忙碌的一年。他到各部队、兵种视察、指导工作，解决问题，竭尽全力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从1950年9月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任务提出，到1951年9月，经过一年的努力，新中国现代化国防军建设已初具规模。

看到这一情景，朱德非常高兴：“我们建立了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工兵部队、防空部队、铁道兵部队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有了这样复杂的军兵种和大量使用复杂的战斗器材，这就是向现代化迈进了。”

第一批女飞行员驾机掠过中南海/毛泽东走出房间，抬头仰视蓝天/便衣队员颇感有几分不自在/“你们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只当表演员啊。”

1952年的3月8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一清早，便衣保卫队一分队便奉命出发，护卫朱德总司令和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大姐前往西苑飞机场，他们要在那里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飞行典礼仪式。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万里蓝天白云，正是飞行的好天气。

自建国伊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对人民空军的建设和航空人才的培养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还特别指出："建设空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家务大小，困难多少，我们非好好地办不可。"

在1949年至1950年的一年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批阅的有关空军和举办航校的请示、报告就有49件之多。



1952年3月8日，朱德、邓颖超、李德全等观看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飞行表演

全国的六所新航校仅用了50多天就建立起来，1949年12月，这六所航校陆续开学招生。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领导还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而在1950年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决定培养一批新中国的女飞行员，于是，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亲自指挥下，从全国选调女飞行学员。1951年4月，第一批从空军预科总队及华东军政大学选调的55名女飞行学员，被集中到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女飞行学员们在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器材短缺，训练飞机不足的环境下，以“为妇女争气，为祖国争光”为口号，克服重重困难，用了7个月的时间，学习和掌握了航空理论，完成了飞行训练，全部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运输航空兵部队。

翻开中国的航空历史，从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自制飞机试飞成功开始，旧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培养的女飞行员仅有20人，其中大都是旅居欧、美的华侨。

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妇女飞向蓝天铺平了道路。当第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女飞行员们接到了要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赴首都北京，举行飞行典礼并接受军队最高层领导检阅的命令时，个个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她们要用最完美的空中飞行向党和人民进行汇报。

此时，西苑机场上的女飞行员们已经列队待发。在队伍中间，有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14名女飞行员，还有空中女领航员、空中女通信员和空中女机械员等41人。

11时45分，随着三颗绿色信号弹升空，女飞行员们启动里—2型飞机滑向跑道。紧接着，一架接一架银鹰腾空而起，直冲云霄。机长秦桂芳由于技术精湛，被安排驾驶最后一架飞机压阵，要保持好机组队形对尾机驾驶的技术要求最高。

6架银鹰的飞行路线是从西苑上空向南再向东飞行，经卢沟桥、三河、通县，再折回头以单机跟进的队形通过天安门的上空。

那天，正在菊香书屋工作的毛泽东，在飞机掠过中南海的时候走出房

间。他抬头仰视蓝天，然后大手一挥，高兴地对在场的几位领导说："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呢。"

站在西苑阅兵台上的朱德、邓颖超、萧华、刘亚楼等领导人，也手搭凉棚，聚精会神地向天空凝望。7000多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5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夫人，还有一批中外记者，到现场观看了飞行表演。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喝彩声。

飞行表演结束后，女飞行员们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下了飞机，列队来到检阅台，向朱总司令、邓颖超和军队首长们致敬。朱总司令笑容满面地和她们一一握手，连连称赞："你们的表演很精彩，谢谢你们！"

这时，全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总司令和女兵们共同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

接下来，刘亚楼司令员站起身，在话筒前做了个手势，高声宣布："请朱总司令讲话！"

刚才还是欢声鼎沸的会场，刹那间安静起来。担负安保任务的便衣队队员们，此时才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下现场，他们发现除了台上几位陪同朱总司令等检阅的军队首长外，全场几乎成了"女性的海洋"，只有他们少数便衣队队员，夹在庞大的"娘子军"中，显得格外孤单，这让他们颇感有几分不自在。

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对第一批女飞行员成功驾机飞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妇女占中国人口的半数。在旧社会，妇女不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且还受大男子主义的压迫。所以毛主席说，广大的妇女站起来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之时……你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和男同志一样驾驶飞机飞上天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空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你们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邓颖超在随后的讲话中说："今天第一批女飞行员飞行典礼的成功举行，再一次雄辩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中国男子能办到的事，中国妇女也一定能够办到！"

女飞行员戚木木，是位来自浙江金华的姑娘，是从华东军政大学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航校学习飞行的。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标兵并受到嘉奖。她作为第一批女飞行员的代表在发言中激动地说：“是伟大的共产党把我们培养成了女飞行员，是人民给了我们无穷力量。只有在新中国，妇女才有广阔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在北京首飞典礼的成功，通过记者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人民群众也为此欢欣鼓舞。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参加首飞典礼的女飞行员们。

在现场，毛泽东非常关切地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些女娃儿都成器了吗？”

“成器了！她们都能单独执行飞行任务。”刘亚楼回答。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还用湖南家乡话对大家说：“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只当表演员啊。”



邓颖超和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

四　参与破获重大案件

毛泽东限期侦破“北平潜伏台”大案/顺藤摸瓜就能抓住狐狸的尾巴/聚餐中“0409”好像发现了什么,迅速离开了御膳厅/曹纯之仰头看见《牡丹图》,顿时发现可疑之处/李克农给毛人凤发去一封“劝降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市正式改称北京市。在一片欢呼声中，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1949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的监听电台截获了一份发往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总台的密电，发报代号为“0409”。经技术人员破译，密电内容是发报者窃取到的有关毛泽东即将出访苏联的情报。

中央军委将这一重要情报迅速上报党中央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马上责成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领导侦破此案。

周恩来在部署任务时说：“毛主席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主席对这一案件非常关注，批示说要‘在他出访苏联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破案时间对于我们是很紧迫的。”

杨奇清和公安部其他领导感到，既然敌特和台湾方面已掌握了毛泽东访苏的动向，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采取破坏行动，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希望出访时间能有所推延。

但由于苏联方面已经为毛泽东的出访做出了大量安排，所以出访不宜再行改变。因此周恩来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高度重视，尽快侦破此案，给党和人民一个最好的交代。

杨奇清领受了这一重要任务后，马上组织了一个侦破指挥部。将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的侦查力量集中起来，统一由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等指挥。公安部调查研究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具体负责外线侦查力量的调遣，收集每天侦查进展情况向指挥中心汇报。原便衣保卫队调入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队员们，也领命加入到了这一案件侦破的行列中。

在案情分析时，大家感到这个案件的侦破难度很大，时间紧，任务重不说，最令人头疼的是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指挥部当时所能掌握的，仅有一份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0409”的代号。

两天过去了，曹纯之调动公安部的“机械化部队”——电讯监听台，到处搜寻潜伏敌台地点，李广祥和冯基平也带人分头去北京市户籍簿上查找与本案有关的可疑人。但并未发现更多的线索。

总指挥杨奇清不免有些着急了，他连夜召集大家开会分析。有人说：“从潜特能够较快而准确地发出中央领导人的动态情报，以及军委监听台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个潜伏电台应该就在北京……”

曹纯之忽然想到，今年年初抓获的国民党华北督导组少将组长傅家骏曾交代过，北京解放前夕，毛人凤亲自布置过一个神秘的北平独立潜伏台，采用的是被美蒋称为“万能台”的一种新形式，直接受毛本人指挥，这个潜伏台至今仍未被摧毁。

杨奇清点头说：“既然这个潜伏台活动嚣张，就一定离不开活动经费。而且由海外汇款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我们要采取侦查手段，找到特务经费的收款人，再从那里打开缺口，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抓住潜伏电台的狐狸尾巴了。”

“噢，有道理！”研究至此，大家眼前一亮，破案的思路理出来了。

杨奇清见大家统一了认识，果断作出决定：“现在我们兵分两路，曹纯之带一组人，迅速摸清潜伏电台特务经费的收款人，并利用一切条件向纵深插入。李广祥、苏玉涵，你们带侦测台和搜索机，实施24小时全天候监控，要尽快测出敌台的准确方位。”

李广祥、苏玉涵带领技术人员，调集了四台测向机和三部搜索机同时

展开搜索。杨奇清甚至将一部电台架到自己家中，亲自上机侦测。

曹纯之带了几个侦查员分头去北京的各银行、钱庄、邮局查找境外汇款，整整奔波了一天，结果是一无所获。

晚上，曹纯之向杨奇清汇报后，显得有点焦急。杨奇清想了想说："这个侦查方向应该没错。但敌人也不傻，既要不暴露自己，又要取款方便，因此汇款很可能汇到北京周边的某个城市。"

曹纯之一听开了窍，"我明白了！"

第二天，曹纯之带上几名侦查员，去了天津。他们很快在天津市黑龙江路银行，查到了一笔从香港汇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款，取款人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计爱琳，并看到了取款的手章印记。

这笔款为何不直接汇去北京而要汇到天津转取呢？而且近期又有一笔汇款汇到，现在还未取走，数额比前几次多出好几倍，这个户头让人生疑。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是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为董事长，集社会游资、广征海外侨胞投资的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还查到，计爱琳的真名计采楠。为了进一步查清计采楠的真面目，公安部决定派一名侦查员打入新桥贸易公司，从公司内部了解计采楠的情况。

几天后，新桥贸易总公司新来了一位"年轻职员"，他很得司徒美堂欣赏，很快被安排做了司徒美堂的交际秘书。"年轻职员"很快了解到，计采楠是新桥公司的股东之一，她不在公司担任实际职务，但新桥公司有个孟姓职员，是计采楠的姘夫，经常到计采楠家与之私会。于是曹纯之派人通过跟踪孟某，很快查到了计采楠的住址——和平门外虎坊桥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并在这个院内建立了特情，对计家人的活动、电话进行监视、监听。

不久，特情报告说，听到计采楠与同住院内的亲戚吵架，亲戚被逼急了曾声称："你们的钱哪里来的我还不知道，我要是报告了，谁也活不了。"由此初步推测，计采楠就是"0409"特务经费的收取、保管人。于是，公安部把计采楠作为重点侦查控制对象，力求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0409"。

可就在这要紧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在秘密跟踪计采楠和与她有来往的人员时，侦查员暴露了身份。那天，一个乡下打扮的老头儿从计采楠家出来，坐三轮车离开。一名侦查员骑上自行车跟踪时，不小心把手枪柄上的红缨露在了衣服外面，被老头儿发现了。

杨奇清得知后，马上采取了措施，撤换了这个侦查员。

此时，公安部电讯监听台又截获了一份敌台密码电报，内容是因“0409”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重要战略情报立了大功，特给予“0409”通令嘉奖，“0409”由中尉台长越级晋升为少校台长，并发给奖金银元300元。签署这份电报的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0409”受到嘉奖后，发往台湾的秘密情报频率更高了。

一天，公安部从电话侦听中获悉，计采楠通知和她有联系的人员相互转告，于某月某日到北海公园漪澜堂御膳餐厅聚餐，庆祝“0409”嘉奖晋职。

那一天，公安部也派了十多个侦查员到北海公园，以各色游人身份在漪澜堂御膳餐厅内外守候。

计采楠一伙人聚餐时，有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好像发现了什么意外，走到计采楠身边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漪澜堂御膳餐厅。

侦查员们经过分析，推断此人可能就是“0409”，于是马上跟踪过去。那人出了北海后门，有意兜了半天圈子才坐三轮车到了北城豆角胡同33号院。

李广祥立即派人查对计采楠的户口，发现她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现住在北城豆角胡同，而监听电台发现并截获“0409”密电的发报区域，就在豆角胡同一带。

在缴获敌特档案的查阅中，侦查人员看到了计兆祥的名字，他于1948年从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北平特警学校毕业，而特警培训内容就有潜伏、搜集情报、收发电报、密写通信和爆破、焚烧、暗杀、投毒等。

与此同时，侦查员以电业局职工身份，通过查电表发现计兆祥家每天的用电量比同院的人家多出好几倍，隐蔽在计家院内的特情还用测电表测出，计兆祥家夜晚用电量激增且室内灯光忽明忽暗，这与监听台收到的敌台

发报时间正相吻合。据此可以确定，潜伏敌台就在计兆祥居住的房间内。

由于杨奇清要参与毛泽东访苏后回国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北平潜伏台”的侦破工作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代为领导。1950年2月初，李克农召集办案会议。他在会上指示说：“这个案件目前已基本侦查清楚，这是一个集台长、报务、译电、情报于一人的所谓‘万能台’，主犯就是计兆祥。具体抓捕主犯的时间，由李广祥根据案件进展决定。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毛主席访苏回国之前破获此案。”

1950年2月26日早晨7点35分，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在两地分头行动，逮捕了计兆祥、计采楠（计兆祥二姐）、吴兰（计兆祥之妻）等人。

那天一早，成润之奉命率队抓捕计兆祥。但他在计家只搜出了一台整流器，而没有发现电台。曹纯之闻讯后带人风驰电掣地赶到了计兆祥的家。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找不出电台，这次行动就意味着失败。

曹纯之在计家巡视了一圈，锐利的目光搜索着每一个可疑角落。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目光却仍在不停地搜索四周……当曹纯之将头靠在沙发上，仰头看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幅圆形的《牡丹图》。他越看越觉得这幅图画有点别扭，直觉告诉他图后有文章。

侦查员辛立学推开《牡丹图》后，一个黑洞露了出来。两名侦查员钻进去不久，取出了一台美制SSTI—E型25瓦电台，一支美式左轮手枪，一沓情报底稿和写在《古文观止》上的密码。

在罪证面前，计兆祥目光呆滞，汗珠从脑门上滚落下来。

“你是不是代号0409？”曹纯之问。

“是……是……”计兆祥回答。

第二天，李克农亲自来到了侦破潜伏电台案的指挥中心。在李克农的指示下，计兆祥用他曾经使用的电台，给在台湾的保密局长毛人凤发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

毛人凤先生：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被

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员就是你新提升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3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访问苏联返回北京的当天，计兆祥在羁押处向办案人员交代了他的罪行。

计兆祥，又名计旭，时24岁，北京人。1948年初，自北平特警学校毕业后，曾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军第一总队司令部中尉报务员，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平区中尉报务员。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夕，他受绥靖总队华北第一大队队长陈恭澍（军统特务）之命潜伏，充任该总队北平潜伏台台长，从事情报活动。

1949年1月，计兆祥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号密设电台。2月开始与南京绥靖总队通报。4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改归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被任命为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台长。在一年间，计兆祥共发报200多次，收发文稿3万余字。

正是由于计兆祥提供的有关南苑机场的详细情报，致使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轰炸了该机场，炸毁我空军飞机4架，死伤24人。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至此，震动北平一时的“潜伏万能电台案”彻底告结。

美特务机构给李安东一门迫击炮/美国新闻处被视为国际间谍窝点/三个人盯一个人，却被人给甩了/警察对闯红灯的行为给予默契配合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个喜庆日子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例举行了隆重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同庆。

而当时除了中央高层和公安部门以外，一般人很难知晓，就在这个

国庆节到来的前几天，公安部、北京市公安、便衣队和警卫等部门密切配合，刚刚破获了一起国际间谍图谋炮击天安门的重大案件。这起大案的主犯即是受美国特务机关指使的意大利间谍李安东和日本籍特务山口隆一。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成功破获的第一起危害重大的国际间谍案件。

对于一个新兴红色政权的问世和初创，国内国际的敌对势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极尽其能事对之进行攻击和破坏，以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对于这一点，中共的安全保卫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不过在建国前夕，我公安安全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国民党残部余渣和军统安插的潜伏特务，地方反动会道门恶势力。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被国际敌对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千方百计地加以扼杀和破坏，安全保卫的工作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北京解放前夕，美国在华特务机关就安排了大批间谍、特务在北京潜伏，并为他们配备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和武器弹药，妄图伺机刺探中共政权高层情报，从事破坏活动。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a Riva）就是潜伏下来的间谍组织头目之一，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

为了武装李安东的间谍组织，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美国特务机关将一门STOKES82迫击炮和炮弹掩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谓“救济物资”中交给了李安东。李安东把这个“重型武器”化整为零，分别藏在自己和另外一个间谍分子马迪儒的家里，并一直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让它派上用场。

1950年1月的一天，李安东把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籍特务山口隆一，找到其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乙17号院的家里。

李安东告诉山口隆一，他这里存有一门迫击炮，可以“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山口隆一开始还觉得这样干有点冒险，但李安东非常坚决。他对山口隆一说：“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代价。”山口隆一遂决定和李安东一起冒险。

俩人经过密谋，草拟了一份计划报告，要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时，炮击天安门城楼，谋杀毛泽东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这个预谋计划先寄到了特务组织“日本东京日洲株式会社”，又由

该会社递交给在日本东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他们在计划中宣称，要进行一次大的“挑战”。

这一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间谍机构的批准。1950年5月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便开始进行炮轰天安门行动的具体准备。

按照计划，将由山口隆一开炮。为此，山口隆一多次跑到天安门广场，测量广场周围的地形，将测量结果绘制成地图，图上还清晰标出了炮击目标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所站的位置。

而就在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躲在暗室里密谋策划、紧锣密鼓地布置实施时，他们却没有料到，这一阴谋计划早已在我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和掌握之中。

由罗瑞卿将军执掌的公安部，几乎是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成立起来的，至此运行还不到一年。1949年初成立的便衣保卫队，此时也被统一纳入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系统。



建国初期的罗瑞卿（左二）、杨奇清（左三）、吴烈（左一）、邹衍（左四）四位公安战线领导合影

战斗在新中国安全保卫特殊战线的高级指挥员们密切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敌对势力的蠢蠢欲动。1950年7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全国第一次公安侦查工作会议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美国在驻华周围一些国家的使馆中，秘密派遣了不少间谍特务，他们与在大陆的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的侦查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会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立即做了布置："将全国各地搜索到的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迅速集中到公安部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处侦查科统一办理。"

很快，来自各地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就集中到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科长曹纯之的案头。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涉及坐落于北京东四三条的一个美方机构——美国新闻处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有不少长期居住在北平、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侨民，经常出入于这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二战期间就曾充当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新闻处"被中国公安部门视为国际间谍在中国活动的一个重要窝点，因此，侦查追踪经常出入于此的可疑外国人，从中发现间谍活动的蛛丝马迹，就成为公安部侦查人员的重要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公安部侦查人员发现，经常出入于"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行迹可疑，他频繁往来于美国新闻处和英国驻华代办处之间，与二者的联系非常密切。

当时的英国政府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双方的首都互设代办处，但在外交上，英国仍与美国以及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关系。因此，在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英国代办处实际还充当了为美国代理在中国事务的角色。

李安东被列入了重点侦查对象。在数名外线侦查员的严密跟踪下，很快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人员线索，这其中就有意大利人哲立、日

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这几个人随即成为公安部侦查人员的重点监视对象。

此时，已从便衣保卫队统一合并到公安部一局（政治保卫局）的李瑞祥，也受命参加到了这场重大国际间谍案件的追踪破获工作之中，他跟踪的对象，就是意大利人哲立。

李瑞祥记得，哲立是个意大利古玩商。身高1.75米左右，约40多岁，身材消瘦，背有点弓，常穿一件土黄色上衣，有时也穿夹克衫和短裤，手臂和小腿上毛乎乎的，走路和骑自行车的速度并不快。

哲立当时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南河沿往西，南池子向东的官豆腐房15号院内的西厢房，这个宅院的主人是某国家驻华使馆的一秘。

领导当时给李瑞祥等几个侦查员布置的任务是：监视哲立每次外出到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接触，还要弄清楚所接触的线索人的身份、特征、住址等。同时在跟踪中切勿暴露自己，不可惊动对象，如遇不利情况可果断放弃，再寻战机。


便衣队员李瑞祥

李瑞祥在第一次执行跟踪盯梢任务时，内心感到十分紧张，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七上八下。跟踪途中，他老是在琢磨，万一哲立突然调头走过来怎么办？万一他钻进商场、餐厅怎么办？究竟离他多远跟踪，才能既不丢梢，又不暴露自己？

由于经验不足，对周边的胡同、环境也不够熟悉，李瑞祥在跟踪中有好几次跟丢了梢。

一次，哲立进了东安市场的森隆餐厅，当时市场内人流不大，怕引起哲立注意，李瑞祥没敢立即跟进餐厅。等了两分钟

后，他决定跟进去，就向另外两个侦查员打了个手势，要他们继续在门外守候。可当李瑞祥拉开餐厅大门进去时，正碰上哲立推门出来，俩人撞了个满怀。李瑞祥一惊，没敢露半点声色，就硬着头皮继续往店里走，到服务台和服务员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后，才从餐厅出来。

出门一看，外面的两个侦查员还在原地未动。他着急地问："对象呢？"

两人回答说："没看见啊。"

原来，两个侦查员以为，李瑞祥进入店内，一旦对象出来，他也会马上跟出来，没想到他会和对象在门口撞上，因怕暴露身份，不能立即跟出来。几个侦查员再四下张望寻找，哪里还有哲立的踪影。三人跟一人，还给跟丢了。

还有一天，上午11点半，哲立到了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商店逛游。他一进店就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这说明他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由于店里的顾客少，李瑞祥他们没敢跟进店，也没敢在店门口守候，只能在离商店较远的路口分头守候。到下午3点半时，仍没看到哲立从商店走出来，就觉得不对头。几个人分头去找，商店里已没了人影，哲立早已不知道从哪个出口或小道溜走了。

李瑞祥他们连饭也没顾上吃，急忙赶回南河沿哲立的住处门口蹲守监视。正当几个侦查员轮换在附近面铺子吃面时，跟踪对象出现了，他们赶忙放下面碗，跟踪到大华电影院。在电影院外守候到了晚上八点多钟，直到哲立出来，又跟踪他回到官豆腐房15号的家中。

"当时的跟踪盯梢工作很艰苦，精神紧张，身体疲惫，有时一蹲守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丢梢、漏梢。"李瑞祥回忆道。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们及时总结，"吃一堑，长一智"，并利用工作空隙，走街串巷，调查胡同的长短宽窄，哪条能拐弯，哪条胡同是死胡同。对跟踪对象常去的商店、市场，也摸熟周围环境，使侦查跟踪工作更主动。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公安侦查工作的条件还十分原始、简陋。侦

查员没有什么通讯设施，互相间的联络常常只能靠打手势和对暗语等。跟踪盯人时，常常出现以自行车、三轮车去追摩托车、汽车的情况。

在跟踪李安东、山口隆一这两个间谍犯时，常常是他们俩人骑着摩托车在市内马路上疾驰，而侦查员则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穷追不舍。犹如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解放军靠两条腿行军作战，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的四轮汽车一样。当时的长安街上，时常会出现一辆摩托车急驶而过，后面就有好几辆捷克、三枪、飞利浦牌自行车在后面猛追的奇景。

有一次追踪山口隆一时，他骑的摩托车一下冲过了王府井南口，侦查员许瑞骑自行车追到路口时，交通民警却变换了手势，大喊“站住！”还要下岗去拦截自行车。

许瑞一看要跟丢摩托车，一下急红了眼，一加速也冲过了路口。趁交警一愣神的工夫，后面的几辆自行车也一溜烟冲了过去。交警见状，冲着这几个闯路人愣了好久，半晌回不过神儿来。

也许是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打这以后，在长安街执勤的交警一看到有自行车在撵前面的摩托车，便不再打停止手势，默契地让侦查员的自行车顺利通过路口。侦查员们常常一气直追，从东单到西单，一路追下来，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跟踪回来一放下自行车，人都站不起来了。

侦查员们就是以这种拼命精神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摸清和掌握了敌特的大量情况，最终在国庆节前夕破获了这起重大的国际间谍案。

公安人员感觉到信中另有含义/草图上一条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彭真说：“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某使馆一秘见哲立被捕大发雷霆/由于紧张，开门时李瑞祥的枪走了火

就在外线侦查员严密监视李安东等嫌疑人时，侦查科长曹纯之也在抓紧寻找破案的重要线索。他从与外国侨民和外国使馆工作人员接触密切的人中，发现了一个在东交民巷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侦查员随即对她展

开跟踪侦查，随即发现山口隆一刚交给她一个信封，要她代为邮寄。

9月26日清早，当这个伊拉克女人到东单国际邮局，准备将信通过航空快件邮递时，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将信截获。

截获的这封信件内容简洁：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从字面上看，这封信似乎是一封普通的购销通知信。但仔细一分析，公安人员感觉到内中另有含义。

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还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一看信笺里面，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广场地形草图，草图上画出了一条清晰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狄飞看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将信件和草图拍照后，立即向公安部一局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就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把山口隆一信中的几个关键词一联系，顿时感到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山口隆一信中说“10月1日发货”，他要“发”的是什么“货”？把“发货”与10月1日这个非同一般的日子一联系，再与所附草图上指向天安门的抛物线一联系，那么所谓“既定计划”……大家都不敢再往下想了。“十一”是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这一天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军民共同欢庆盛大节日。此刻已是9月26日，天安门正处在危险中，这是一个危及党和国家的领袖生命安全的阴谋。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得正确，后果不堪设想。时不我待，李国祥迅速将已掌握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做了汇报。

彭真听了汇报，看了复制的天安门草图，也认同李国祥等的分析："这很可能是图谋炮轰天安门，谋害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破坏中国国庆庆祝活动的政治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正准备离开，彭真又交代说："要严格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新中国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听李国祥转述了"彭真要求国庆前破案"的指示后，迅速把京、津、冀、沈阳等地的优秀公安侦查人员调集到公安部，并迅速展开破案行动。

9月27日清晨7时，侦查处长李国祥准时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国际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斯纳、哲立等间谍分子。

侦查科长曹纯之随即将公安部的侦查人员与前来支援参战的各兄弟部门人员进行了分工，并宣布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斯纳；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



李安东等绘制的天安门城楼草图

行动开始后，最先被逮捕的是甘斯纳。甘斯纳早上提着皮箱刚要



逮捕李安东

出门，被适时赶到的侦查员拦住了去路。

抓捕山口隆一时，他正在东交民巷魏智的法文图书馆里。当时他还对亮出手铐的侦查员叫嚷说："我抗议！我们进行的是正当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直到侦查员拿出了那张他画的草图，他才老实了。

抓捕哲立的，正是对其进行跟踪的李瑞祥等人。他们于当晚9点，来到官豆腐房15号院。郑惠卿敲门后，房主的佣人开门探出头来向外张望，李瑞祥等3个便衣侦查员趁机一拥而入。

当时哲立正在西厢房内，坐在桌子边吃着面包。郑惠卿左手上前开门，右手举枪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哲立一见这阵势，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被戴上手铐的哲立口里嘟囔说："只是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他随后被带上了在门外等候的汽车。

这时，作为房主的某使馆一秘从内院急匆匆走出来，见哲立被带走，他大发雷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我院内抓人？"

郑惠卿回答："我们是公安部的，哲立是国际间谍，我们是执行公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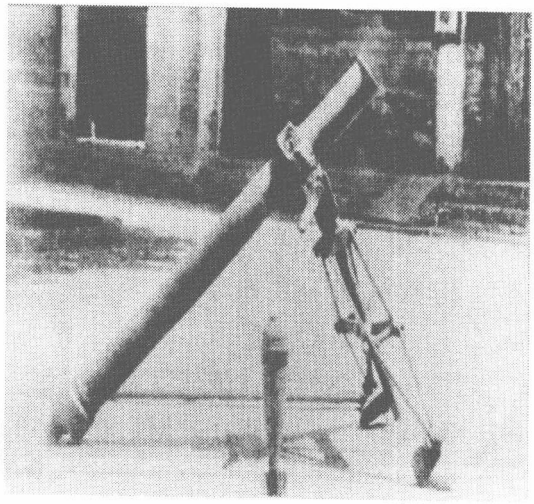
但那位一秘并不听侦查员的解释，给外交部有关部门打了电话。10分钟后，外交部来人将一秘请走。当从外交部返回时，一秘对守候在院子里的几位侦查员态度变得客气多了。

在逮捕哲立后，李瑞祥等几名便衣侦查员仍然留在院内蹲守。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凡来此找哲立的人，不管什么身份，只准进，不准出，不能漏掉一个与本案有关的嫌疑人。

在蹲守的第三天夜晚11点多，李瑞祥听到大门外有声音，但辨别不出是什么声，就到西厢房屋里叫出另一名侦查员，两人都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好像是有人敲门。

李瑞祥右手持枪，左手猛地去拉门。然而由于紧张，还没等把门拉开，他却不小心扣动了手枪扳机。"啪"的一声枪响，把某使馆一秘和院子里的人都给惊动了，而门外却什么人也没有，闹了一场虚惊。

逮捕李安东的行动也很顺利。他家住在北京甘雨胡同17号院，



在李安东住处起获的准备炮轰天安门的迫击炮

一组侦查人员封锁了胡同后，侦查人员装扮成的李安东家佣人，里应外合，诱使李安东开了门。

公安干警向错愕中的李安东宣告道："李安东，你违犯了中国法律，阴谋搞武装行动，现奉命逮捕你！"李安东老实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然后被戴上手铐，押上了囚车。

侦查员们搜查了李安东的住所，当即起获了小型迫击炮一门，手枪两支，迫击炮炮弹、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头和引信等各种武器零部件273件，烈性毒药两包。此外，还搜出包括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政府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住址、汽车牌号等资料在内的情报卡片和情报底稿一千多件，这其中也包括山口隆一绘制的那张炮轰天安门的示意图。

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G-2(情报处)的，他们谋划在国庆一周年当天，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混乱。

一个策划了半年之久的阴谋以破产告终。除前面提到的李安东、山口隆一、甘斯纳、哲立以外，还抓获了间谍分子马迪儒（意大利人，潜伏身份：天主教易县地区紫衣主教）、魏智（法国人，潜伏身份：法文图书馆经理），以及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

国庆一周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充满了喜庆气氛。而李瑞祥等参加了这场破案大战的便衣侦查员们，回想起那些紧张、劳累、艰苦的日日夜夜，感到无比的欣慰，他们用实际行动，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了党和国家的领袖。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对李安东等7名罪犯进行了审判。

至此，人们才弄清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一伙国际间谍分子的真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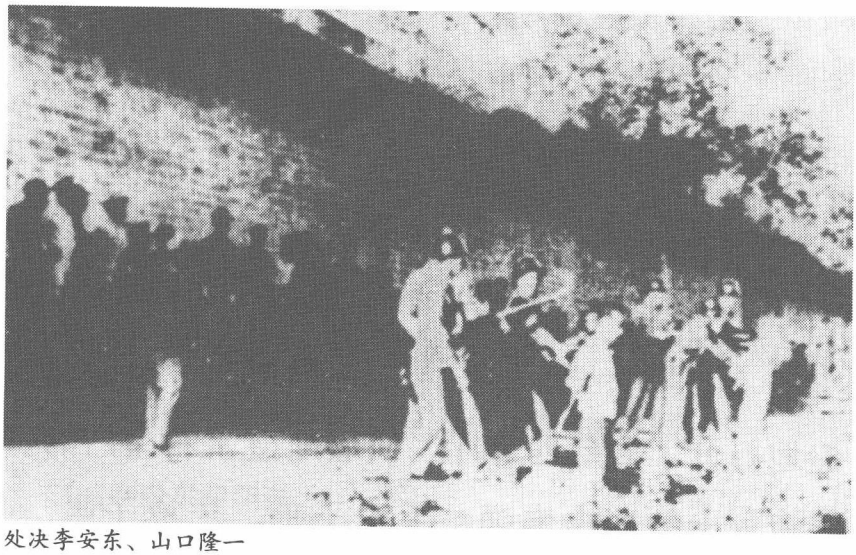
李安东，1896年生于中国上海，10岁时随其家人回到意大利，成年后进入意大利空军学校读书。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潮已经兴起，李安东在学校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教育，成为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信徒。

1919年，23岁的李安东从空军学校毕业后，参加了意大利政府的“航空使节团”重返中国。当他重新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已经从当年那个会讲一口流利汉语的稚童，变成一个担负法西斯主义秘密使命的间谍分子了。

“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同侵华日军特务机关“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勾结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北京时事报》的记者，流窜于华北各地，为日军搜集大量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为积极反共，李安东投身到美国脚下。

1948年11月11日，李安东写信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信中说：“从几年来我们多次的交换政见中，我相信你能证明我一贯的反共主张。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广大的重要性，或许只能用战争去解决。我很愿意为反共阵营公认的盟主美国效劳。”北京解放前夕，李安东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为掩护来到北京，建立间谍组织，开展间谍破坏活动。

山口隆一，1938年受日本海军部委派来到中国，化名刘逸，担任日伪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专门搜集有关华北沿海的



处决李安东、山口隆一

船舶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1946年1月，山口隆一加入美国特务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受该局委派，两个月后，他成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情报机关的少校研究员。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在即，山口隆一接受长期潜伏任务，在位于东交民巷的法文图书馆里当起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目录编辑员。

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将大量有关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全国政协代表的姓名、简历、住址、汽车牌号等信息情报，通过美国情报网，传送到了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

审判席上，作为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的罗瑞卿当众宣读了对7名罪犯的起诉书。起诉书长达24页，列举了李安东等人的大量犯罪事实。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对7名罪犯进行宣判：

被告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儒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甘斯纳和哲立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宣判之后，李安东、山口隆一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处决外国间谍。

五　执行特殊任务

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保密任务/他被毛泽东誉为红色“福尔摩斯”/识破受命刺杀毛泽东的假新四军旅长/既然上级认定有“中统特务集团”，就必须尽全力把它挖出来

1951年4月，便衣保卫队队员孔祥惠，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派他去广州，看管刚刚被拘禁的大叛徒大特务，时为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陈泊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执行这个任务是高度保密的，他和其他队员离京赴粤时，家里人都不知晓他的去向，只知道他在出差执行任务，其他一概不知。

孔祥惠也只能把情况向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汇报，对其他人一概不能透露。在广州执行特殊任务的日子里，孔祥惠等感到日子很难挨，为了绝对保密，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但他知道这就是执行任务，因此也就硬着头皮扛下来了。直到半年之后，陈泊、陈坤被送往东北监狱看押，孔祥惠和他的战友才得以从广州返回北京。但他们当时并不知晓，他们所经历的，正是建国之初公安部门内部发生的一起重大冤案。

这“二陈”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这一冤案又缘何而起呢？“二陈”之一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琼海的一个渔民之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琼海的地下斗争中，陈泊担任过交通员、侦查员，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28年5月，海南的革命

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往海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后，他就任马来西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李被捕后经不起酷刑拷打，叛变投敌，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陈泊受命刺杀李锦标，但在住所装置炸弹时，不慎引爆炸弹。等陈泊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因左手被炸伤，做了截肢手术。警方等他苏醒后即在病房里进行审讯，陈泊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扔进住所的炸弹炸伤的，要求警方查清投弹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案件拖了很久也没有结果，马来西亚当局遂将他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境。几经辗转，他于1939年10月到延安，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卫处侦查科科长。

1939年，陈泊通过情报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派遣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身份进入边区，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的情况。陈泊布置人员，当这个记者一入边区就将其抓获。

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级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一一汇报。

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六个县进行探查。回来后，他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同时，张贴布告公布这些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活动。

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此人在审讯中承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陈泊遂与之彻夜长谈。

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绝密的特务组织，人员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

陈兴林在特训班连任了1到9期的教官。1941年底，国民党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潜伏在延安的特务里应外合。陈兴林因为熟悉到延安潜伏的学员，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他被捕后愿意投诚，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他听说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后，分外思念在家乡的母亲和妻子，提出给他三天时间回庆阳探亲。

保卫处对是否答应陈兴林的要求产生了激烈争论，多数人怕他一去不返。但陈泊认为他会回来，中央社会部也支持陈泊的意见。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货币，还送他一些食品和布料，让他感动得流泪。三天后，他果然如期返回。

在延安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陈兴林从与会的人中指认出了36名特务。保卫部门对这些特务实施逮捕后，又通过突审挖出20多名潜伏特务。让保卫部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很大，潜伏程度很深，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还有个别人已钻进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部门。

由陈泊一手破获的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引起轰动。毛泽东闻之赞叹道：“当为奇功，奇功！”又说：“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当时在场的康生回答道：“我们马上就研究，准备由布鲁同志担任保卫处处长。”毛泽东表示同意：“那好嘛，这就叫有功必赏。”

陈泊在延安保卫部门的另一让人钦佩的杰作，是及时洞察出军统特务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1943年6月上旬，在吴旗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特务虽被歼灭，但这引起陈泊的警觉。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

召开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有重大特嫌的人员。

当时保卫处每天要抄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日常活动的安排，陈泊都认真阅看。一天，他看到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光。

陈泊记下田守光的名字，找中央军委保卫部钱益民部长询问相关的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光报到的材料，上面记录田旅长是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再进入边区的。田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介绍信丢失。陈泊提出给晋西北的兵站去电，查证田的踪迹。

当天下午晋西北的兵站回电，称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经过之事。陈泊立即提议审查田守光，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接见。“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光，从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陈泊对钱益民说。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查出这个田守光旅长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当年3月，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等人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与日军遭遇时全部战死。军统特务获知死者身份，电告重庆军统总部。经戴笠亲自策划，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寻机刺杀毛泽东，这个冒牌的田旅长也是其中之一。

冒牌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将得到毛泽东接见，没想到被陈泊识破。此案告破，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名声更大了。

抗战胜利后，陈泊到东北，任哈尔滨市与宾县公安局局长。1949年6月，陈泊随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进驻南昌，任省公安厅厅长。9月，人民解放军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知道“红色福尔摩斯”陈泊，到广东后几次致电

陈正人，请江西省“割爱”，要陈泊到广东。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最后同意放人。陈泊到广州后，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由于国民党在广州布下了大量潜伏特务，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花城广州的治安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潜伏在广州的特务、盗匪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新生政权立足未稳，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有时一日竟发生抢劫案100多起。

因此，广东省委书记叶剑英指示：必须迅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广州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局面。

当时广州公安警力严重缺乏，南下干部又不懂广东方言，情况不熟。身为广东人的陈泊，与原为中共香港情报系统负责人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密切配合，立即组建了3个武装便衣队展开工作。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除了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外，广州市公安局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了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

在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铺开后，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除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广州市公安局的工作十分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谁也不曾料想，在南国都市大展身手，工作正干得有声有色的陈泊，突然遭遇了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亲自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

在被囚禁了一段时间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孩子，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这一事件也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大案件。

二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二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一直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作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部长口出，还能再做什么质疑？

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二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二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部队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是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的坚决去执行任务。既然上级认定有"中统特务集团"，

就必须尽全力把它挖出来。

当“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便怒火腾烧，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逼供，迫使这些“犯人”就范，指证“二陈”。经过广东省公安厅如此这般两个月审讯，最终挖出一个有224名成员的“中统特务集团”。这些人都被押往北京，由公安部审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陈”案。

然而此后两年多，所谓“中统特务集团”案始终难以结案。“二陈”的罪名改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陈泊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和重病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61年，被关押了10年的陈泊被释放出狱。但不久后又被送到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继续改造。1972年2月，陈泊在劳改农场凄然长逝，时年63岁。直到1982年，“二陈”案才得到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为“二陈”举办追悼大会。“二陈”案，成为新中国公安史上极其惨痛的教训之一。



广州市公安总队队员合影

一身穿狐皮大衣的人在众犯中颇为抢眼/两名旧政府留用人员被从宽当庭释放/宋副部长被奸商王万发拉下了水/苏德奎色迷心窍，为女演员四处觅“龙肉”/苏德魁突然高喊：“我还有重大问题向党坦白交代。”

1951年隆冬的一天，北风呼啸，天空飘着雪花。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劳动剧场，舞台上方悬挂着一条醒目的大字横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贪污犯大会”。台下坐满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职工万余人，全场内外秩序井然。

自1950年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

但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手段获得利润，而是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抵制和削弱国营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连。

因此，党中央在当年的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即“三反”“五反”运动。

在1952年的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

“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第二天，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至此，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内的这场审判贪污犯的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

几名便衣保卫队队员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现场，他们胸前佩戴着“大会工作人员”字样的红色布条，衣服内掖着手枪，奉命保卫参加大会的几位中央领导人。

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几位领导人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林伯渠、沈钧儒虽都已是高龄，但坐在主席台上仍然精神矍铄。

作为这次大会审判长的沈钧儒先生，在审判前特意走到几名便衣队队员面前，和他们亲切握手致意。

沈钧儒是一位出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他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1941年他倡议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审判大会由这样一位威望厚重的民主人士主理，气氛显得格外严肃和庄重。

大会开始后，身穿警服的法警将10名贪污案犯一一带上台来。这10名贪污犯中，除一名身穿囚衣、戴着刑具外，其他案犯都身着日常服装，其中有几人还穿着呢制服、呢大衣，还有一人竟穿着一身狐皮大衣，在众犯中颇为抢眼。

这些穿便服的人，在案发前都是中央或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还带着领导的派头，以致便衣队队员在他们被押上台前误认为是出席会议的首长。

案犯中有几个人显然并不服罪。他们挺胸抬头，毫无惧怕感。原来这几名案犯是从前线调到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不久的军队干部。他们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进了大城市，特别是手中有了权力之后，经不起和平环境下花花世界的影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蜕化变质，吃喝嫖赌，贪污挥霍，致使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

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次全会上曾经预言的："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受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这些人感到情况不妙，互相订立攻守同盟，捂住盖子，隐藏罪证，企图阻挡运动的开展。

然而广大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通过检举揭发，使这些贪污、腐败、变质分子没了藏身之地。但有的人自恃对革命有功，流过血、拼过命，总认为吃喝、贪污算不了什么，党和政府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运动起来后，他们又抱着侥幸过关的心理，软磨硬顶，拒不坦白交代，直至被押上了审判台，还在台上硬充好汉。

开庭后，审判长沈钧儒首先宣布，将台上两名犯有贪污罪，但已彻底坦白交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免于起诉，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到台下的群众当中去。这两人激动不已，竟忘了戴上自己的帽子，就急忙跑下台去。因为罪犯在受审时要强制摘帽，法警随后把帽子送给了他们。

事后，他们对采访记者说：和我们一起受审的，都是贪污万元以上的大贪污犯，犯有杀头之罪。可这些人大都是立过赫赫战功的高级干部，只有我们二人是旧政府的留用人员。所以当时心想，我们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万万没有想到，审判长当场宣布对我们免于起诉，这简直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至法警催促我们下台才如梦方醒。这事说明，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真正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接下来大会起诉的，是那个身穿狐皮大衣的人，他当时35岁，是老红军，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某部团长。在一次对日军作战中，被敌人打断了肠子，后来医生为他接上了一段狗肠子才保住性命。



审判贪污犯大会现场

案发前，“狐皮大衣”担任中央某部负责经济工作的副部长兼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职高权重。他被大奸商王万发盯中，千方百计拉他下水。起初王万发几次派人送重金收买，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王万发仍不甘心，细心调查了“狐皮大衣”的革命经历和个人特点。经过一番分析后王万发认为，他对赤裸裸的金钱诱惑有所警惕，而从他肚子里的那段狗肠子上作文章，也许有戏。

一天，王万发来到“狐皮大衣”的办公室登门拜访，他假惺惺地说，部长为革命劳苦功高，今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正需要您这样的老干部来领导，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听说您的肚子里……

见其不语，王万发又继续说：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我们和您是朋友关系。您是领导经济工作的大干部，我们应该亲密合作，

发展经济！但您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愿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为您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保证让您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去领导革命工作。

别有用心的谋划和一番甜言蜜语，从“狐皮大衣”身上打开了缺口，这位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革命，一步步被拉下了水。王万发不断地请他吃高级饭店，进舞厅跳舞，大把的钞票在享受中随意挥霍。

有了与“狐皮大衣”的“合作”，奸商王万发便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起来，他大搞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搅乱市场，低价收，高价出，从中牟取暴利，给建国初期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狐皮大衣”为奸商密传经济情报，对奸商纵容包庇，枉法不究，事实上已成为不法资本家在共产党政府内的内奸和代理人。其本人也从一个革命领导干部，蜕化堕落为一个吃、喝、嫖、赌、贪赃枉法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

公诉人最后说：“罪犯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本应严惩，但念其曾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作过突出贡献，建议法庭量刑时为其留条生路。”最后，“狐皮大衣”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接着，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对案犯苏德魁提起公诉。苏德魁身材低矮，一副大麻脸，身穿灰色棉囚服，由于个头矮，囚服的袖口、裤筒还挽上了好几层。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原公安部行政处长，借赴东北购运木材的工作之便，大肆进行贪污盗窃活动，肆意挥霍浪费。他每到哈尔滨，都要住最豪华的宾馆，坐最高级的轿车，酒席上要有歌手舞女伴宴。出席作陪的一些地方干部都被这位北京来的大员派头十足、出手慷慨所折服。因为常跟着他吃喝玩乐，得了许多实惠，不少人对苏心生感激，甚至恬媚地直呼“苏处长万岁”。

苏德魁不仅在东北胡作非为，并将恶行带到了北京，在犯罪泥淖中越陷越深。一天，他坐车去长安大戏院看戏，看到一位正走红的旦角女演员，戏唱得好，模样也生得俊俏，心中不禁生出邪念。他走到后台，邀这位女演员一起外出“玩玩”。

女演员提出必须要200大洋，为让这个其貌不扬的人知难而退。不料苏德魁当场从文件包里抽出几叠钱来，放在她面前。女演员便随苏到前门外一家豪华旅馆寻欢作乐。

此后，在金钱诱使下女演员多次陪苏德魁鬼混，为了得到苏的撑腰帮扶，尽施迷人魅力，弄得苏神魂颠倒。为博得这位女演员欢心，苏德魁挥金如土，以山珍海味、穿金戴银等奢华方式供她享用着。女演员却越发不满足，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吃“龙肉”，而鬼迷心窍的苏德魁为求千金一笑，竟真的四处去寻觅“龙肉”。

当时国家经济还在艰难的复苏期，党和国家领导者与广大人民都在艰苦奋斗，可苏德魁却利用手中特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实施贪污盗窃活动。

“三反”运动开始后，苏德魁的贪污腐败问题很快被揭发出来。苏德魁原是国民党起义军官，后因作战勇敢得以被重用，解放战争中升任旅长。进城后，苏德魁当官有了权，在旧军队曾沾染的一些恶习复发蔓延。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他堕落成为一个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腐败变质分子。

在审判大会上，苏德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两名武装警察将苏德魁推上刑车，即将开赴刑场时，苏突然回转身来高声大喊：“慢！我还有重大问题向党坦白交代。”这是苏为了求生实施的缓兵之计，监刑警官告诉他为时已晚，苏德魁不再吭气低头赴刑。

审判大会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表演讲。

他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得到了彻底解放。因此，我们的新国家绝对不允许再有新的官僚、新的资本家和贪污腐败分子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不管他们官有多高，权有多大，有一个铲除一个，有多少铲除多少！

他还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根除后患。当然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运动，就一劳永逸，但运动可以锻炼人民的意志，提高人民的警惕，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坚决地批

判、揭发、斗争，除恶务尽！

在现场执行任务的便衣队队员们，听了林伯渠的讲话，联想到刚刚审判的几个由战争时期的英雄蜕化演变为腐败分子、人民敌人的人，感觉是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党课。

三天三夜未眠，捕捉到敌台重要情报/把朱德为他削苹果的事当作吹嘘资本/毛泽东亲自对他宣布了三条处理意见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既下决心清理掉一批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更不失时机地重点帮助和教育了一批党的干部。便衣保卫队员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亲眼看到这样的事实。

1951年末，为了帮助军委的一位年轻干部改正错误，朱德总司令曾亲自找这位干部来谈话。

这位年轻干部名叫赵明，当时还不到30岁，却已担任着军委某部部长的要职。在进城并被委以重任之后，青年得志的赵明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大讲排场，铺张浪费。在解放初期经济条件依然艰苦的条件下，他召开大会要在主席台上洒香水，登台讲话要先奏军乐，在部队和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赵明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纠正，依然我行我素。

那天，朱德特意把赵明找来，像过去一样，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削苹果给他吃。但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要他在运动中深刻检讨，痛改前非。看得出，朱德内心还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干部赵明充满喜爱之情的。

在朱德和赵明之间，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朱德总司令准备率八路军一部，配合整编重建后的新四军一部，组织一次对日军的作战。但当时苦于得不到敌人兵力部署和动态方面的准确情报，迟迟无法下最后的决心实施作战。

当时，年仅18岁的赵明，由于业务技能精湛，担任了八路军总部电台

台长。他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休息，终于从敌方电台中捕捉到了重要军事情报，从而使得我军能果断出兵，取得了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战役结束后，朱德总司令为了嘉奖为这次战役胜利立下大功的年轻台长，亲自将一位德国友人赠给他的狐皮大衣送给了赵明。

从此，赵明在朱德总司令等领导的亲切关怀鼓励下，工作愈发努力，很快受到提拔重用，全国解放时，他已升任为军委最年轻的部长之一。

可在那天赵明见了朱德总司令之后，不但没有认真领会总司令对他的批评教育，反省错误；反而把朱总司令为他削苹果的事当作了资本到处吹嘘，甚至还出言不逊，张狂地指斥几位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深的副部长“工作无建树，摆老资格，妒贤忌能，专爱打小报告”。引起几位副部长和部门干部们的义愤，他们将赵明的所作所为如实向上面做了报告。

毛泽东过问了此事，在派人查证核实后，亲自把赵明找去，严肃地向他宣布说：“现在，对你有三条决定：第一，撤了你的职；第二，反省三年；第三，认识错误，改好了再安排工作。”毛泽东告诉赵明：“你的问题性质严重，是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实例，要通报全党全军。”

赵明听了毛泽东当场宣布的处分决定，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回到单位，他就瘫倒在床，不吃不喝，闭门整整睡了一天。但他内心并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而是怨天尤人，埋怨党组织不念他的功劳，对他处分不公；怨恨几位副部长对他公报私仇，落井下石。

第二天，他起床后赌气似的将墙上挂的多年立功的奖状全部摘下，把警卫员、秘书、公务员、司机等全部赶走，自己端着饭碗到大伙房去吃大灶。有人不解地问：“部长，你为什么不去吃小灶？”赵明心怀不满地发牢骚说：“毛主席撤了我的职，成了普通一兵，还怎么吃小灶！”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天津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北京也召开了十大贪污犯的公审大会，并当场处决了公安部的处长苏德魁。这些案例对赵明的触动很深，这时他才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他想，若不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及早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处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至此他才真正感到悔恨了，对毛

泽东、朱德等领袖对他的及时批评教育心生感激。

一天，赵明专门来到了朱总司令办公室，真诚地向总司令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赵明说着说着，竟像个孩子似的痛哭了起来，总司令对有了认识的赵明进行了安慰。

总司令既严肃又关怀地对赵明说："人犯错误往往是不自觉的，但认识和改正错误往往又是痛苦和不容易的。你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城后官做大了，没有重视学习和改造世界观，因而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最后朱总司令又鼓励他说，跌倒了没关系，要勇敢地爬起来。你还很年轻，犯了错误不可怕，怕的是犯了错误不改。你一定要好好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作为今后进步的动力。

赵明诚恳地听着朱总司令的悉心教诲，心里也渐明朗起来。他站起身来说："报告总司令，您和主席对我的批评教育，我都想通了，记住了，今后我一定改正错误，请党继续考验我！"

朱总司令仍用他那慈爱、关怀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对他的思想认识感到由衷高兴。总司令也跟着站了起来，拍着赵明的肩膀说："我和主席都相信你会改正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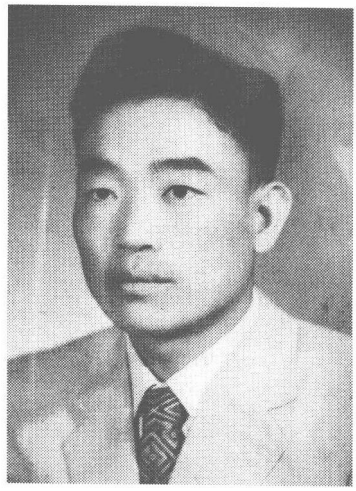
说完，朱德吩咐身边的警卫员，用自己的汽车把赵明送了回去。

六　在外交活动与国际会议中

便衣警卫成了外交使团的三等秘书/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紧急约见正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以洛甫担任为适宜/组成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高规格的代表团

新中国成立以后，便衣保卫队大部分人员都陆续调到了北京城内，当了几个月西直门派出所所长的李福贵，也回到了便衣队新队部所在的裱褙胡同。

1950年2月中旬，李福贵突然得到命令，要他到刚从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任上紧急调到北京的张闻天处，担任警卫、勤务工作。他到了张闻天那里，才知道张闻天马上要出使联合国，他也将随同前往，而且给了他一个新头衔，使团的三等秘书。紧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拍照片、办护照、置办出国服装。



李福贵为准备赴联合国执行任务拍的正装照片

这事不仅对李福贵来说感到突然，对张闻天来说，也是异常地突然。在1950年1月19日，正在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任上的张闻天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派他担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就登出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给联合国的照会和张闻天的简历。

已经在媒体上对外公布了任命，而当事者本人还一无所知，这种事情在中共党内还是非常罕见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来在1950年1月7日凌晨1时，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紧急约见了正在苏联进行访问的毛泽东，向他建议说，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名义，给联合国安理会发一个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中国发了这个声明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仍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因为在此前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力量。苏联在中国声明后的动作，可视为苏联对美国声明的反应。毛泽东当即向维辛斯基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

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即照会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由他们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政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并希采纳照办为荷。"

在这之后，安理会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问题争论激烈起来。苏联支持新中国政府的声明，英、美、法等多数国家反对。为了使斗争朝着利于新中国的方面发展，毛泽东同意苏方1月13日晚向他提出的建议，向联合国去电告知新中国政府将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以代替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当晚10点，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告以此议，提出"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因为，周恩来此刻正在乘火车赴莫斯科的途中。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电告后，即与在京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商量，

提名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做首席代表人选。毛泽东闻讯后立即于1月18日下午4时半，同车行至斯维德洛夫斯克的周恩来通电话商量。毛泽东觉得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作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张闻天担任为适宜。这是恰当的，早在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依照美、苏、英三国首脑雅尔塔协议拟于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时，中共中央就曾经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后因中共七大召开，改派了董必武。

毛泽东、周恩来通话后，即致电给国内，该电报全文如下：

少奇同志：

（一）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他已到斯维德洛夫斯克，廿日下午五时可达莫斯科），觉得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作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二）据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三）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十九日邀集政席〈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四）因恩来即到莫斯科，故照会用李克农名义。（五）此照会和上次照会一样，于发出电报后，并分送在京苏捷波英法荷等国外交人员。（六）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七）办理情形望告。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半

根据毛泽东电报的指示，中国政府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名义，致电联合国，这份致电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

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正因为这事起因突然，议决仓促，所以没有来得及跟张闻天打招呼，在事先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以致他是先从广播中听到了自己新的任命，然后才见到中央发给他本人的任命电报。张闻天当时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张闻天在接到任命电报后，曾向刘少奇提出意见，希望改派别人，但没有被采纳。

张闻天于2月14日抵达北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他一家和随行干部接到中南海，先在颐年堂暂住。没多久，中央办公厅找了三处住房让张闻天挑选一处安家。这其中有一处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是当过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的著名建筑学家朱启钤的公馆。张闻天嫌这处院落太大、房子太多，选定景山后街甲1号，是个有一座二层小楼的院子，即安家于景山后街甲 1 号。

朱启钤的公馆后来成了赴联合国代表团人员的大本营，从外地调来的

人员就在这里吃住。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斟酌，组成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高规格的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副团长是李一氓；代表团的各组织负责人有耿飙、孟用潜、冀朝鼎、刘贯一、刘英、刘彬、钱三强、王铁崖，还有陈叔亮、陈忠经、郑森禹等共四十余人。这年春节一过，张闻天便开始了赴联合国的紧张准备。

不料，代表团刚组建起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利用苏联缺席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机会，操纵安理会通过了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反对北朝鲜“侵略”。在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美国还于6月27日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9月15日，美军又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很快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逼。为保家卫国，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

形势的突变，使得新中国的代表团能否去联合国与朝鲜战争连在了一起，显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去不成联合国了。张闻天较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放缓了原来准备尽快出国安排，让还没有离开原工作岗位的耿飙、钱三强、王铁崖等人继续原来的工作，不必到代表团上班。

进入1951年，代表团在短期内不可能去联合国的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因此没有必要继续窝着那么多干部。当年3月，经中央批准，代表团解散，所有干部另行分配。

代表团解散后，周恩来找张闻天谈新工作安排，说中央有两个工作由他选择：一是去中央准备成立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主管后来中联部、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机构的工作；一是接替因病回国休息的王稼祥去苏联当大使。张闻天考虑既然要做外交工作，最好还是到外交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就选择了去苏联。

在代表团从组建到解散的近一年时间里，李福贵就一直跟在张闻天身边，担负警卫和勤务工作。他也住在景山后街甲1号院，白天陪着张闻天到外交部上班，晚上回来，就和张闻天的小儿子同住一个屋子。李福贵说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也时常到外交部上班。

1951年4月，张闻天去苏联赴大使任，李福贵就又回到政治保卫队，再度负责起外宾的保卫工作。此刻的外宾，主要是苏联的专家，李福贵曾

在较长的时间里，担当苏联专家组组长邦达列夫的卫士。

百废待兴之中，举办亚太国际和平会议，谈何容易？/为参会代表筹建的和平宾馆，两个月内拔地而起/一位高级起义将领忘带了证件，与门卫发生了争执/刘队长没心思学跳舞，脑子里的安全弦时刻紧绷着/周恩来及时指示说：“外宾警卫，要‘内紧外松’。”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对于今天来说，大小国际会议在北京和中国各大城市频繁举行，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时光回溯到50多年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日子里，要举办一个有几十个国家数百位代表参加的盛大国际会议，谈何容易？

那时，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中，美国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还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给中国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障碍。与此同时，在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遭到殖民主义的镇压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局部战争也在扩大。这一切使得中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面临着严重威胁。召开这样一次大型国际和平会议，不仅可以使中国新生的红色政权得以稳固，也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进程。

自新中国诞生第二天起，即1949年10月2日，中国就组建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1951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就提出了要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建议，同年10月做出决定，这次大会在北京举行。

1952年3月21日，由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了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此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和平人士普遍响应，并于同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筹备会议。中国的筹委会随之成立，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了筹委会主席。

作为会议东道国的中国，自此担负起了筹备会议的重任。包括准备大会会场，安排参会代表的接待食宿，保证会议的物资供应，调集各种语言的翻译、工作人员参加服务，与各国筹委会进行密切联系，安排部署会议、住宿、活动各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等等。

由于那时北京还没有一个适合举办如此大规模国际会议的会场，中共中央就决定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能容纳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了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

作为参会代表的下榻饭店，虽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北京饭店，但仍不能满足全部参会的外国会议代表团的住宿需求。于是，北京市政府做出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为接待工商界人士兴建的一座高层建筑，着手改建为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高层大楼。在当时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相当紧缺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全力支持，经过工人、专家和技术人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一座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的高层豪华“和平宾馆”，在两个月内就奇迹般地拔地而起，成为王府井一带引人注目的建筑。

随着大会日期的日益临近，各项会议准备也显得愈发忙碌起来。大会筹备委员会，下设了会议组、总务组、新闻组、警卫组等各个职能部门。尤其是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筹备中的重中之重。

有关领导指出，一定要保证会议和出席会议代表的绝对安全。公安中央纵队、警卫师、便衣保卫队等中央和国家安全保卫部门都抽调了大批安保人员，在大会召开之前数日，就进入了宾馆、饭店、会场等重要警卫保护地区，进入了严密紧张的警戒状态。

当时已划归公安部八局的政治保卫队四队，负责在代表驻地和平宾馆执行保卫任务，分队长刘满昌奉命带领着四队一分队，提前一周就进驻了和平宾馆。从1951年就负责苏联专家警卫的李福贵，也带了一队政保队员进驻了和平宾馆。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如期在中南海怀仁堂

隆重召开。怀仁堂入口处，布置了一面巨幅屏风，上面用中、英、俄、西四种文字写着“和平万岁”。主席台上悬挂着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画作两旁竖立着参加会议的37个国家的国旗。

出席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44位正式代表。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十分庞大，有40人之多。团长为宋庆龄，副团长郭沫若，还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学术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和宗教界领袖人物。李德全、罗隆基、萧三、冀朝鼎、陈翰笙、蔡楚生、钱三强、金仲华、老舍、钱端升、梅兰芳、华罗庚、许广平、曹禺、赵忠尧、刘良模、王芸生、周培源、赵朴初等诸多名人都在代表之列。还有三位特邀来宾，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抗日名将蔡廷锴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审判二次大战战犯的大律师梅汝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都给



1952年10月，宋庆龄率包括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代表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前排右起：郭沫若、宋庆龄、彭真、马寅初、陈叔通。

会议发来了贺电。会议由宋庆龄致开幕词，她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做了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的演讲。她满怀激动地将这次会议和1933年她在上海参加的保卫和平国际会议做了对比。

她说："那时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而且准备以它为基地向中国全面进攻。而今天这次会议，中国已经赶跑了列强，独立屹立在世界东方。"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广大人民来说，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郭沫若也在大会上做了《团结一心，保卫和平》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及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等12项和平决议。

负责代表驻地警卫的便衣队队员，有不少是从前方部队调来补充的新手，他们虽经历了战争考验，政治上绝对可靠，但对于从事重大国际会议的安保工作却没有经验，也缺少从事这项特殊工作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如丰富的社会知识、地理环境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反应快捷、灵活处置的能力，但当时时间仓促的情况下，也未及对他们进行便衣警卫的专业培训。队员们只好边干边学，这期间也不可避免地闹出了一些误会和不快。

那一天，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满昌正在和平宾馆带班，忽然看到宾馆前门，由队员担任的门卫正和一位首长发生争执，就急忙跑了过去。

原来这位首长因没有带会议出席证，而被门卫挡驾了。首长本想拿工作证件代替，一进了之。没想到门卫根本不看，而是严格按照上级的交代，只认出席证，不认其他。

首长有些着急，干脆就往里走。门卫一见哪里肯放，硬是拦住了去路，还把他拉了出来。这时首长身后的警卫员急了，赶紧制止门卫说：

"这是我们首长，你怎么能随便拉扯他呢！"

"不拉他，他就进去了！没有出席证是不能进的。"门卫也蛮有理由。

首长急得满头大汗，可面对不讲情面的门卫战士却无能为力。警卫员在旁埋怨说："我说坐汽车来，你却说要给公家节省汽油，一定要走着来，结果惹了麻烦吧，人家不让你进！"

这时，首长见穿着工作人员制服的便衣队分队长刘满昌走过来，就一边把手中的证件递给他看，一边着急地说："我是来开会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要在会上讲话呢。可这个同志硬是不让我进，给他证件也不看！"

"啊，是胡乔木同志啊！"刘满昌连忙将证件还给了首长，然后表示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这位门卫同志是刚从四野调来的，不认识首长，您快请进吧！"

胡乔木听了这话，才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表，也顾不得多说什么，就匆匆走进了和平宾馆。

望着胡乔木已进去的背影，分队长指着担任门卫的队员狠狠批评说："他有证件，你为什么不看看，还将他拉回来？ 你知道吗？他是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

这个年轻门卫，也是刚参加便衣队工作的新队员听了刘满昌的话，这才如梦方醒，后悔莫及。幸好乔木大度，未对门卫追究，这件事才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其后，又有一天，一位参会代表，也是有名的起义国民党高级将领要进和平宾馆，因为忘记了带证件，门卫就请他到传达室去登记。

他扫了一眼登记簿后，十分不满地大发脾气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是共产党的政策，你们为什么把我弄到小黑屋里来审查！"

后来，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开会时就把意见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批给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要他查处。

结果当班的门卫老冯被停职检查了。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老冯照章办事让其履行登记手续没有错，然而这是周总理亲自批示查处的，对便衣警卫工作是一个警示，因此必须认真照办。

那次会议期间，刘满昌是单独带队执行任务，因此格外小心翼翼，一丝不苟，生怕意外造成损失，也有辱便衣队的使命。



便衣队员护卫外国访华代表团游览长城

本来性格活泼、爱说爱动的他，在和平宾馆执行保卫任务期间，思想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不敢有半点懈怠。战友们都说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明显地深沉起来。

宾馆每周末都举办舞会。华丽的舞厅，优美的音乐，男男女女，翩翩起舞，是十分诱人的娱乐方式，不少队员迷上了跳舞，休息时几乎场场不落。分队长刘满昌却不敢对舞会着迷，他有时被战友们强拉硬拽进了舞厅，但跳不了几步就出来了，倒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保卫任务的压力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放松，脑子里那根安全“弦”，时刻都在紧绷着，怎么能有心思泡在轻歌曼舞之中呢。

幸好上级后来又调来了一位副分队长孟继武。老孟老成干练的性格，和刘满昌正好是个互补，工作起来也轻松多了。

便衣队员邬吉成，当时分在亚太和平会议的东南亚组，这个组的外宾来自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组长是武衡，这个组的外宾的安全、生活、交通、翻译及相关情况反映，都由他总负责。

对于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的外宾警卫，邬吉成也毫无经验，他们多是按照以往保卫重要首长的工作模式，给重要外宾派一个警卫员，外宾走到哪，警卫就跟到哪。特别是一些贫苦出身的警卫员，过去一直在农村根据地打仗，根本没有接触过外宾，更没有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和外宾接触时总显得比较僵硬。一些来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宾，对此也非常不适应，甚至反感，有时甚至直言指责身边的安全警卫人员，是监视他们活动的便衣警察。

这些情况也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及时指示说："外宾警卫，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不露痕迹，要做到'内紧外松'。"

公安警卫部门马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警卫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逐渐得到外宾的认可。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随之成为尔后外事外宾保卫工作遵循的重要准则。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结束后，参会的各国代表还分三路，乘专列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便衣警卫人员，也随团出行，以保证外宾在访问期间的安全。

亚太和平会议的圆满成功，实现了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也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典范。同时也为中国后来举办国际性会议探索了经验。

邬吉成觉得穿破裤子陪外宾有点损伤国体/便衣队员的"洋泾浜"俄语闹出了大误会/见邬吉成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他十分惊讶

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苏联一些援华大工程的上马，来华的苏联专家渐渐多了起来。改编到政治保卫队的便衣警卫的任务，就又增加了外宾和专家的安全保障和护送等内容。可以说正是由此产生了一项新的保卫工作——外宾警卫，而且从此以后，这成为便衣警卫工作的重要一环。

对苏联专家的警卫，多是接送往来，到各地参观，还有就是护送机要人员在中苏两国间的往返。邬吉成曾几次护送那些携带文件的苏联机要人员，从北京到边境城市满洲里或绥芬河。那时车行缓慢，往返一趟通常需要十多天，便衣队队员们戏称这是“跑单帮”。经历过战争的苏联机要人员，对如影随形的警卫并没有显示出不习惯。

那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是苏军军官，军衔高的有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在一起的时候，邬吉成等就跟他们学习了一些俄语，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简单的词句。就用掌握的只言片语，加上用手比画，相互间进行交流。

最初一段时间，毕竟掌握的词汇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闹了一些笑话。例如在接待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时候，误会还闹得挺大。

那次，邬吉成和同事李树田护送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车上无论是苏军的演员，还是中国的人员，闻讯无不感到悲痛。

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所以当苏军的一位军官反反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因为他也学会了几个中文词汇，便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由于那时的外宾主要是苏联的，又鉴于语言误会的出现，有关方面便请了教师，向经常与外宾打交道的干部们，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语。像汽车、走路、你好、再见等等。

就这样，邬吉成也学会了吃饭是“古萨依契”、军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类“洋泾浜”俄语。但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接触由稀

疏到消逝，学的那点东西又全都还给老师了。

1953年2月，邬吉成第一次尝试护卫西方来宾的工作，护卫对象是文幼章夫妇。文先生是加拿大的和平友好人士，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从小是在中国的四川长大的，能讲一口很好的蜀味汉语。他们是到访新中国比较早的西方客人，如若在华行程安全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将影响新中国的声誉。

邬吉成把他们夫妇护送到了上海，和他们一同被安排住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陪着来宾的除了邬吉成以外，还有刚从美国回国在世界和平大会工作的翻译虞艺佩。上海市还配了一名翻译小姐刘德曾，一名警卫员朱家来。

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单，作为警卫官的邬吉成，也只有一身外穿的服装。而一到上海，不小心就把那条唯一的裤子弄破了，穿着破了的裤子陪外宾，实在有点损伤国体，可邬吉成还是第一次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时间逛街。

翻译虞大姐见邬吉成一时很为难的样子，就主动提出把自己的一条裤子借给邬吉成穿。那时男女的裤子是有区别的，穿着很别扭，可除此也无他法，邬吉成只好将就穿着女裤陪同外宾了。

文幼章在上海有许多熟人朋友，还有他的学生，在上海几乎天天有活动。他们夫妇还拜访了在上海的一些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如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耀宗等。

吴耀宗是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两位宗教团体代表之一，他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曾多次参加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座谈会，亲耳听周副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志气，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要把基督教徒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中有位吴耀宗先生，吴先生是个思想家，他有能力把基督教的事情办好。"

结束在上海的访问后，文幼章一行人又去了安徽。在蚌埠，邬吉成陪他们看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还参观了监狱、劳改所。每天的参观访问活动，文先生都要记录报道，还要拍下他和人谈话会面的场景。

因为有时候文幼章无法自己给自己拍照，就让邬吉成帮他拍。就是在



邬吉成（左）和他的保卫对象路易·艾黎

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参观的日子里，邬吉成还学会了一门技术——照相，那时用的是120的照相机。

亚太和会开完了，会议机构撤销，但还有一些外国的友好人士，有的长住，有的就留在了中国。像日本的西园寺公一、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还有美国、英国的人士，他们被归属到一个称作综合组的机构接待管理。

这些留在中国的友好人士，也是需要给予保卫的，当时邬吉成就被指派保卫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曾在中国的西北甘肃一带活动，热衷贫困地区普及教育的事业，所以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带西北口音的中国话。据说他深得那一带中国老百姓的爱戴，认下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

路易·艾黎的中文水平很高，能读文言文的古书，所以有空闲就喜欢逛旧书摊。琉璃厂、大栅栏等凡是有古旧书店书摊的地方，他就一趟一趟地跑，购买古旧图书，特别是古体诗词方面的书籍。他后来的工作，就是将所见所闻写下来；或者把中国的古诗词、文言古文译成白话文，对外报道和介绍中国的现实及传统文化。

有时，他见邬吉成没什么事，就说："你也来和我一起译

吧？”邬吉成自知自己的水平，就推脱说：“我对古体诗词一窍不通，哪能干这个呀。”他却认真地鼓励说：“能翻译多少算多少，翻译错了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学习嘛。”

没有办法，邬吉成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他尽自己所能，翻译了一通了事。路易·艾黎看了发现他翻译的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就一一指出来，还满怀关爱地对邬吉成说：“你还年轻，应该抓紧学习，掌握知识，特别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邬吉成和路易·艾黎相处的时间不算很长，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他的言谈举止给了邬吉成许多教益。后来邬吉成回到了部队，有时还抽空去看望路易·艾黎。有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邬吉成在天安门观礼台值勤，与路易·艾黎在观礼台上相逢。他看见邬吉成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显得十分惊讶，这才知道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

周恩来的突然出现，让大家感到惊讶/国宴上，为周恩来斟酒有专人负责/苏驻军司令大为恼火，要撕掉中尉翻译的领章/周恩来特意给中尉翻译敬了一杯酒

由于来华的苏联专家日渐增多，对外宾的警卫任务也日渐加重。为了更快适应这种外事警卫变化新情况的需求，从1950年春始，便衣保卫队决定轮流派队员去接受外交服务的专业培训。

一天，便衣队领导找分队长刘满昌谈话说：“我们已和外交部门商谈好，决定派你带领几位同志去国际俱乐部，学习外宾招待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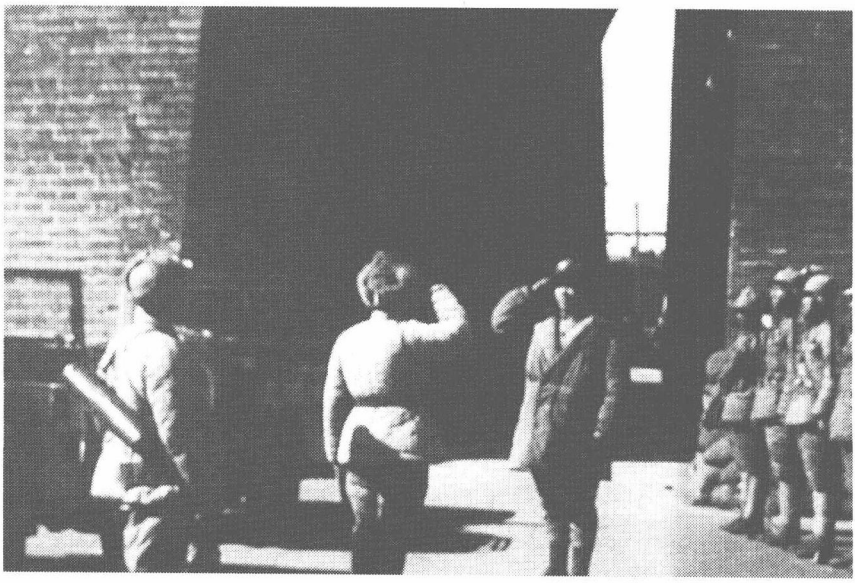
一提起北京国际俱乐部，许多读者会认为是指位于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其实建国初期的老国际俱乐部，是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大街8号的。

北京东交民巷（旧称：东江米巷）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被划定为专用外国使馆区的。使馆区内设立了外国兵营，由各国驻军保护其使馆，中国人不得在区内居住。其实早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后，于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已允许西方各国公使驻京。此后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就纷纷在这一带购地建馆了。

《辛丑条约》还划定了使馆区的范围：东至海岱门（今崇文门）大街、西至前门内兵部街、南至南城根、北至东长安街。整个东交民巷地区内除了各国公使馆和住宅外，还有银行、邮政局、洋行、医院、饭店、俱乐部等建筑设施。馆区内原有的翰林院、銮驾库、王公府第、祠堂、民宅等都被外国公使馆占做馆址或辟为兵营操场。每个使馆都有自己的围墙，整个地区外围又筑起高墙，墙上建炮台碉堡，墙外掘壕沟为隔离带，各出入通道架设铁栅栏门，由外国士兵荷枪把守。自从民国定都南京以后，大使馆迁出。但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及北洋政府的首都和北方第一繁华之地，外国领事馆和不少机构还是常驻北京。

1949年，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京城，据说部队还特意途经东交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西直门

民巷一带，意在向世人郑重宣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被废除了，中国人民从此从屈辱中站起来了。

其后不久，外国驻军一一撤离东交民巷。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新中国逐步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的驻华使馆基本上沿用东交民巷一带的使馆旧址，而担任警卫的不再是耀武扬威的外国军人或海军陆战队，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的战士了。

与东交民巷交错的“台基厂”街道，是因为此地的确有这么个工厂，因这个厂而得名。早年明朝兴建故宫，因为工程浩大而且对材料、工艺要求高，专门设立了负责将石料加工成台基的台基厂。

台基厂大街8号，由于原来就具有俱乐部的功能，解放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外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文娱康乐场所，定名为北京国际俱乐部。这里也自然成了中国政府总理和外事人员工作活动的中心。

高墙内的俱乐部是个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建筑群，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俱乐部大院，中间是花坛，花坛外围一圈摆的是夹竹桃和无花果的盆景。正面主体建筑是个三层欧式洋楼，坐东朝西，精致小巧，建筑年代已无从查考。花坛右侧是游泳池和网球场，网球场东面是苗圃花房。那些爬满藤蔓的竹篱笆围绕的苗圃花房以及那拱形园门颇似莎士比亚笔下描写的仲夏夜花园。

主楼的地下室别有洞天，设有台球室和保龄球馆，主楼一层是供应精美中西餐的餐厅和配有高脚凳的酒吧。沿着铺紫红色地毯的“Y”形宽阔回转楼梯到达二层，可见装饰有典雅吊灯壁灯的小舞厅兼电影厅。建国初，国际俱乐部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周总理也偶尔来跳舞。为舞会伴奏的爵士乐队演奏水平很高又富有情调。

刘满昌带着四个队员来到了国际俱乐部，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培训之中，因为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遭遇过因不懂礼宾、接待知识所带来的尴尬，有时甚至不能参与接待外宾或根本无法进入外事接待现场。

因此这次能有机会到国际俱乐部接受培训，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培训一些规范的礼仪接待知识外，如基本站姿、走姿，见客礼貌，上

茶、上菜、递烟、递毛巾等，还进行了专业知识的培训，特别是对于英语口语培训，大家更是热情投入，星期天也不休息，拿着英语课本又念又背，不知疲倦地加紧学习。仅短短一个月的突击学习，就掌握了不少英语日常用语和基本会话。

有一天，国际俱乐部的李经理通知参加培训的便衣队队员们说："今天，外交部的领导同志要来视察，特别要检查你们学习的实际收获。大家马上去做好准备，为领导们做一次实地操作汇报！"

几个便衣队队员马上去换好了一身招待服装，白衣黑裤，配黑皮鞋，显得格外精神干练。他们在宴会厅里摆开了阵势，几位经验丰富的师傅则退到了幕后，给学员当起了助手。

只见几位年轻队员来往穿梭，快步如风，从铺桌布、叠餐巾花、摆放刀叉勺到端酒上菜、送饮料等，干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

忽然从观看席的领导中站起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微笑着，连连点头说："我看可以！"边说边向几位表演的队员走来。

"啊！周总理什么时候来的？"大家都感到有些惊讶。

没想到周恩来总理还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服务人员的操作。随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周恩来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然后挨个问了姓名、年龄，又亲切地对大家说："共和国建立以来，同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外宾服务是政府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努力做好。我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有热情好客的传统，这个传统应在外宾服务工作中体现出来。你们是共和国的第一批肩负警卫任务的外宾服务员，任务光荣而艰巨。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能够圆满地胜任组织上交给你们的使命！"

不久，便衣队队员们结束了学习培训，返回工作岗位。大家很快把学到的外事服务知识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之中。

随着外事接待活动的日益频繁，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外宾招待宴会一场接着一场，几乎很难找到喘息的机会。每场宴会，非常讲究礼仪的周恩来都要代表新中国政府亲自为邀请来访的外国首脑宾客们敬酒，而如此天天饮酒，不免会给周恩来的身体带来影响和负担。

负责宴会安全保卫工作的老段把便衣队分队长刘满昌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略带几分神秘地说："现在周总理举行的外宾宴会非常多，而总理又不能多喝色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既在外宾宴会的场合不失礼节，又能保证周总理的身体不受损害，我们特意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专门配制出一种同样色泽的果汁来代替色酒。这就需要一个专人去为总理斟酒，斟酒时还要特别机警灵活，绝不能让在场的外宾看出任何破绽，不然就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老段顿了顿又严肃地说："经过和外交部有关领导研究，指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刘满昌一听，顿时感到这个任务的分量不轻，责任重大。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完成组织任务义不容辞！他立即站起身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逢举行外宾国宴，刘满昌便担负起了在宴会上专门给周恩来斟酒的任务。

当时的宴会用酒，多为外国色酒，有美国威士忌、英国白兰地、法国香槟等。饭店师傅们则根据这些洋酒的色泽，用果汁配制成同样色泽的"果酒"，完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一般宾客是根本无法辨认出来的。

刘满昌经常是手持两瓶"一真一假"的洋酒，适时地出现在周恩来身边。当宴会敬酒开始时，周恩来总要亲切地招呼服务员小刘过来，因为他清楚，只有小刘手里才有他要喝的"酒"，而"服务员"刘满昌也能神态自若，动作规范地为总理斟上"酒"，每次斟酒都完成得很顺利，没有出过任何纰漏和差错。

宴会，实际上是周恩来展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又一舞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歧视封锁，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不予以承认，还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的态度，周恩来利用一切外交手段，为扩大新中国的对外影响打开一条通道。

在许多宴会、冷餐会的场合，周恩来和驻华外交使节、来访外国首脑们边吃边谈，气氛无拘无束，轻松活泼。周恩来总是手握酒杯，迈着轻快的



1955年周恩来宴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步子，在宾客之间穿行敬酒，兴高采烈地与客人们举盏碰杯，带头干杯。

周恩来说："这不是吃吃喝喝，而是利用这样的场合宣传自己，了解对方，广泛结交朋友。"而往往是在宴会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在周恩来彬彬有礼的主持敬酒下，不少宴会都能收到一些外交会谈所达不到的奇效，圆满的宴会，也就是一次特殊圆满的外交攻势。

周总理本来懂得英、俄等几国语言，但在正式外交场合和中外会谈中，为维护国家尊严，他总是通过翻译人员来进行翻译。

一次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慰问驻在旅顺大连的苏军。在周恩来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苏军一位中尉翻译在翻译周恩来的讲话时，有一处翻译错了。中方代表团一位俄文翻译听出来了，当场为之作了纠正。

这件事，不仅使周恩来感到意外，也使在场的苏驻军司令大为恼火，他马上走过去，要撕掉这位中尉的肩章和领章。宴会厅里的

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起来。

周恩来见状忙上前劝阻说："两国语言要作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我讲的不够完善，致使翻译有些误会。"

尔后他又缓慢地重述了自己刚才讲的那段话，让中尉翻译再仔细听了一遍，这次他准确无误地翻译了出来。

周恩来讲完后，又同在场的苏军将领、官员们举酒干杯。他还特意走到那位中尉翻译面前，和他一道干杯。

苏驻军司令和其他将领看到这一情景，都为周恩来平易、亲切、一视同仁的态度所感染，那位中尉翻译更是深受感动，他举着酒杯久久不愿放下，眼里含满了泪水。

翠明庄，住满了毛泽东邀请的国际宾客/一个外宾说："你看，便衣警察，腰里还别着手枪呢！"/两个年轻翻译搭上了老李的车，终于在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

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北京到处春光明媚，鸟语花香，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彩旗飞舞，花团锦簇，一派节日盛装。

一天早上，便衣队分队长刘满昌奉命带领自己的分队，迎着朝霞前往翠明庄饭店，去保卫前来参加"五一"观礼的各国贵宾。

这时，各国的宾客已陆续来到翠明庄。

翠明庄饭店位于东华门外，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三层灰色楼房，围以绿琉璃瓦顶，灰砖墙。1946年1月13日至1947年2月21日之间，这里曾经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住所。

为了打破国际上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广交朋友，毛泽东亲自指示全国总工会，在"五一"节前夕，邀请有关国家的工会组织派团前来参加中国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活动，增进与各国人民和工会组织的友谊。

为做好外宾接待工作，特别由全国总工会、外交部、公安部、妇联、

青年团等单位联合组成了活动筹委会，下设新闻、秘书、警卫、翻译等办事机构。

1952年的“五一”节，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邀请外宾最多的一次。北京各家大饭店，如北京饭店、国际饭店都住满了外宾，仅翠明庄就接待了13个国家工会派来的代表，刘满昌被任命为翠明庄饭店的警卫组组长，在警卫处贾处长的统一指挥下，负责翠明庄所邀外宾的安全保卫。为工作方便，筹委会还专给警卫组派来了一男一女两位翻译，配备了一部轿车。

全国总工会负责组织活动的同志热情地和警卫组长刘满昌打招呼，并彼此交换了一些情况。刘满昌借此了解到，住在翠明庄的外宾不仅涉及国家多，人员亦很复杂。其中有些国家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友好，如巴基斯坦工会就受到了政府的阻挠，经过激烈的斗争才派出了一个代表；而在印度代表团中，居然混有间谍分子，企图乘机来中国刺探情报，后来这个间谍被代表团成员当众揭露出来，不得已灰溜溜地返回了印度。

刘满昌以往虽执行过多次外宾安全警卫任务，但这次活动的规模大，人员情况复杂，也让他感到了格外的压力。特别是他这次带的队员基本都是新手，没有执行过外宾警卫任务，而且还因力量不足，临时从仪仗队和其他部队调来一些人员补充。由这样一支队伍来执行如此复杂的外宾保卫任务，确实有一定难度。

对于新队员来说，执行外宾警卫任务的第一关，就是要习惯脱掉军装，穿着便服。他们平日穿惯了军装，猛然穿起便服，走起路来都很不自然，还要暗带手枪，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懂点外语和礼宾常识，这就是工作的新要求，必须学会和适应。

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为了能圆满完成任务，刘满昌带领队员开展了战前练兵活动，首先由两位翻译教外语，请大会礼宾司人员讲礼宾知识。他将分队拆编为四个警卫小组，各司其责，分工合作，队员们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紧学习练兵，每天起早贪黑，忙着背外语，学习业务知识。

由于队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热情细致，赢得了外宾们的赞许，

许多队员不仅是保卫外宾安全的卫士，还成了他们身边不可缺少的生活顾问，很多外宾每次外出都要请队员陪伴。为了表示谢意，他们纷纷向队员赠送望远镜、手表等礼品。

由于工作的紧张劳累，刘满昌病了，发了40度的高烧，连续烧了10余天，嘴上烧起了一个个大水泡，几天都不能进食。筹委会派来大夫要送他去住院治疗，但他感觉现在正是工作最需要自己的时刻，不能轻伤下火线，就一直坚持着。大夫只好每天上门来给他打针治疗，他则带兵坚守自己的岗位。

正当翠明庄的外宾安全警卫工作看似一帆风顺地进行之时，不料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天，一位外宾从楼上居高临下望去，正好看见一个身穿便服的门卫正在饭店后门执勤，就对身边的一位中国女翻译说：

“你看，那里有便衣警察，腰里还别着手枪呢！”

“我看也有点像！”女翻译随声附和说。

这番话顿时引来了不少好奇的外宾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很感诧异。

有人说：“想不到解放后的新中国也还在搞便衣特务这一套！”

门卫的身份暴露，这对安全警卫工作来说是个大事，这不但给后续的工作带来麻烦，还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贾处长听说后很生气，立即将警卫组长叫来严厉批评，还要把这个门卫撤换掉。

刘满昌了解了详情，阻拦道：“这也不完全是门卫的错，后门的环境特殊，门里是个小院，再往里走就是厨房了，炊事员常在院里劈柴、洗菜，与门卫执勤很不协调。

刘满昌建议说，如果让后门的门卫换上炊事员服装，一边帮厨房干活，一边执行任务，这样既可以隐蔽身份，又能密切军民关系，岂不一举两得。

贾处长听了，认为这个办法可行，立即吩咐警卫小组长照样执行。

事后，曾挨了批评的警卫小组长高兴地找刘满昌说：“这个法子真灵，队员们轮流帮厨房干活，有说有笑，大受厨师欢迎！此后也再没发现



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　　林杨 摄

门卫暴露身份的问题。”

一眨眼工夫，“五一”节就到了。“五一”当天，毛泽东和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城楼和各国贵宾一起检阅游行队伍，警卫组一早起来就紧张地检查车辆，准备早饭后就带外宾去天安门广场观礼。

刚要出发，只见两位翻译缠了过来，也要求跟着车队去广场。刘满昌给他俩解释说：“这次翻译没有任务，车早已安排好，每个车的人员也固定了！恐怕这次不行了！”

“请您再想想办法，我们也想去看毛主席！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以后就再不会有机会了！”两个年轻翻译恳切地请求着，说到激动处竟失声哭了起来。

刘满昌也被两个年轻人的心情所感动，这时，他忽然想到警卫组还闲着一部车呢，就对翻译小宋说：“快去把司机老李找来！”

小宋立刻明白了刘满昌的意思，破涕为笑，连蹦带跳地去找老李了。

一会儿，司机老李来了，他40岁左右，是个老北京。他见到刘满昌问道："刘队长，您找我？"

"是的，车况怎么样？"

"好着呐，任谁的车出问题，咱们这车也不会出问题！"

"那好，你快去准备，跟外宾车队出发！"

听了刘满昌的吩咐，两个年轻翻译兴高采烈地跟着老李走了。

"五一"节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红旗招展，歌声飞扬。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与矗立在广场的马、恩、列、斯、孙中山先生画像交相辉映，海浪般的人群欢呼着、雀跃着，期待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现。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来到了天安门，他们先在城楼上的大会客厅对各国贵宾的到来表示盛情欢迎。容光焕发的毛泽东对贵宾们说："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往来。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中国，欢迎大家到各地走走看看，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而且热情好客的。"

各国贵宾对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报以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之后，毛泽东邀请贵宾们一起来到天安门的观礼台前，观看群众游行。

一队队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群众团体的游行队伍，簇拥着表达共和国繁荣昌盛、和平幸福的标语牌，载歌载舞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那热烈壮观的场面，给观礼的外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内发展如此迅速，人民的精神面貌如此振奋高昂，感到既惊奇又羡慕。

"五一"观礼结束后，许多外国朋友都要求留下来继续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新兴中国的发展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两位年轻翻译和司机因如愿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内心感到无比幸福激动。在返回途中，几个人始终兴奋地谈论不休，翻译小宋说："想不到毛主席就从我眼前走了过去，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情景真是让人永远难忘！"大家一路有说有笑，沉浸在幸福之中。

印尼工会代表团为海员大罢工展览深受感染/被热茶烫了的印尼团长从沙发上蹦起来/年轻卫士和翻译住进了毛主席的房间

保卫“五一”观礼外国代表团安全的任务刚刚完成，刘满昌正准备带人返回便衣保卫队，突然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派他负责护送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

那天，刘满昌和翻译小薛来到外交部接受任务。一位负责人交代说，你们两人一个党员、一个团员，印尼代表团就由你们两人负责陪同。接着向他俩介绍了印尼的国情及印尼共产党的基本状况。

那位负责人说：“印尼共产党有几十万党员，但他们没有武装力量，只搞议会斗争，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次我们特意安排他们去天津参观中国海员大罢工展览，希望能对他们今后重视武装斗争有所启迪。”

分手前，那位负责人叮嘱说：“中央已事先通知各地做好接待印尼代表团的各项准备，你们只要做好沿途安全保卫工作就可以了。有事可随时同中央保持联系，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印尼工会代表团有10余名成员，都是印尼共产党员，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在一起能感到他们充满朝气。一路随团访问的，还有一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大家相处得欢愉而友好。

火车到了天津，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车站迎接。在海员大罢工展览馆，代表们仔细地观看着文物、照片等，边看边互相议论着。看得出，这个翔实、生动的展览让代表团成员们深受感染。一直到了休息室，代表们还在对展览的内容议论纷纷。

展览馆内的休息室，布置得简朴而整洁，宾主们坐在沙发上饮茶交谈。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手提茶壶，穿行在宾主中间斟茶续水。年轻姑娘看上去还不到20岁，大概是第一次面对这些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异国宾客，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动作也很拘谨。

由于过度紧张，她在续茶时不小心把很烫的茶水溅到了印尼代表团团长的手腕上。团长“哎呀”大叫一声，竟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他的突然动作让大家一惊，随后引起了团员们哄堂大笑。

这事让天津接待方的领导们感到异常紧张，他们觉得，这不仅有伤大雅，而且会影响到访问的友好而庄重的气氛，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国家或有险恶用心的人用来做文章。

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赶快找到了北京派来的刘满昌，把他拉到一边解释说：“这个女服务员才18岁，共青团员，是市委特意选来参加服务的，今天她有点紧张，发生了意外。”

刘满昌宽慰两位领导说：“不必太紧张，印尼和我们是友好国家，可请薛翻译代为向印尼代表团长解释和致歉就行了。”

正说着，只见薛翻译已陪着印尼代表团长走来了，小薛对两位天津市的领导说，团长说他烫得不厉害，没什么要紧，这是意外发生的小事情，请不要再责怪那位年轻服务员了。

市长一听忙说：“团长不责怪，我们心里就更感到过意不去了。看来我们还是对贵国的习俗风情缺少了解，如果今天要是按热带国家的习惯上些冷饮，团长不就可以免受这份罪了嘛。”这话让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们是朋友，请不必为这点小事儿不愉快！”印尼团长再次诚恳表态。

一场意外和紧张就在友好、谅解的氛围中得到了化解。

在天津市委、政府招待印尼贵宾的午宴上，在文艺家们精彩表演的晚会上，印中两国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再次达到了高潮。

印尼代表团在天津下榻的是一座富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二层建筑，红砖绿瓦，富丽堂皇。刘满昌和翻译小薛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茶几上摆放了鲜花水果，让两个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感到分外放松。特别是当他们听说这个房间恰好是毛主席来天津时曾经住过的，心情更是激动不已。

他俩情不自禁地在屋里喊着：“我们真有福气啊！”然后又高兴得抱在一起，在柔软的地毯上打起滚来。

当时的年轻人，对待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怀有这么纯真的感情。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也是在热情友好、高度警惕、处处谨慎之中一步步开展起来的。

印尼代表团在天津参观访问后又去了沈阳，然后又从沈阳到了抚顺，一路参观了不少著名文物景点和大型工矿企业，满载收获回到北京。刘满昌和翻译小薛为这次特别任务能比较圆满地完成感到十分欣慰。

回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赴外地参观访问的各国宾客，周恩来总理、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刘宁一等相关领导也出席作陪。

宴会上，毛泽东首先致辞，各国代表也发表讲话，畅叙他们的观感。印尼代表团代表发言说：新中国经济繁荣，国防强大，国泰民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理论的胜利，我们通过参观访问深受启发，回国后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深入学习研究。

巴基斯坦的代表说：“巴基斯坦的工运受到本国政府的压制，这次来华访问更是阻力重重，最终只派来了我一名代表。但我在中国亲眼目睹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和国家欣欣向荣的盛况，巴中是一山之隔的近邻，我将不遗余力致力于巴中友好。”

毛泽东最后举杯祝词说：“感谢各国和平使者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明天你们就要陆续回国了，也请你们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意带回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干杯！”

所有参加宴会的主宾共同举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端起酒杯，走到各国朋友中间一一敬酒。整个宴会的欢乐、友好气氛再一次达到了最高潮。

车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进行过重新检查/
一个年轻司机腿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
外宾的飞机起飞后，周恩来一脸怒容

大约在1950年中，创建于1949年初的便衣保卫队，被归并到公安部，

更名为政治保卫队，隶属公安部八局管理。1952年，隶属于公安部八局的政治保卫队，又改归中央警卫一师编制。在几次转变隶属关系过程中，原本的保卫队的队员根据工作不同需要，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担负着保卫中央领导、保卫来华在华外国贵宾等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初，在保卫工作职业化的口号下，许多便衣队和便衣警卫人员都被安排到了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宾服务的部门，如饭店、车队（后来成为首都汽车公司）等等，一方面是职业工作人员，一方面又从事对首长和外宾的安全保卫工作。

1956年的初春时节，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一些原便衣警卫人员，以饭店或车队管理者的身份，参与了这次重要的接待工作。

当时，国宾车队有26辆车，除了两辆吉斯、八辆吉姆是1956年通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购进的新车以外，其他的十几辆车都是1954年前拨过来的旧车，车况优劣不一。

为了完成好这次外事接待任务，国宾车队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严格的检修车辆，整理车容。为了保证车辆的万无一失，甚至连车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进行过重新检查。

那天，周恩来总理等亲自前往飞机场迎接，国宾车队也早在西郊机场等待着西哈努克亲王的专机。

当西哈努克携夫人走下专机舷梯时，少先队员向他献上了花环，他弯腰戴上花环后，起身向周围欢迎的人群合掌行礼。国宾车队的队长秦友海远远望着亲王，感觉他很年轻，神态亦很安详。

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坐国宾车队的车子，一直驶进那时的国宾馆——东交民巷8号。车队人员也跟着贵宾住进了国宾馆，以便于随时听候调遣。

西哈努克此次中国之行前后住了有近一个月时间。在北京，他除了会见中国领导人之外，还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

记得有一天，国宾车队送西哈努克亲王去游览八达岭长城，让作为队



西哈努克亲王来京访问

长的秦友海提心吊胆了一路。

当时的北京城外，路况十分糟糕，坑坑洼洼的，几乎没有像样的马路。特别是进入远郊山区后，路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汽车走过颠簸得厉害。司机要力保车子的平稳，更要小心再小心地注意不能让车颠得熄了火。

在车队返回时，秦友海的心更加悬了起来。他知道几天来不少司机都昼夜任务不断，睡眠不足，在来时的路上一经颠簸摇晃，许多人就直打瞌睡。现在又要颠簸回去，能确保不出交通意外吗？就这样秦友海一路不仅自己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子，还始终关注着整个车队其他车辆的的行驶情况。

当日落西山，国宾车队安全抵达了东交民巷8号时，秦友海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他去查看每辆车的车况，发现有一个年轻司机，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在仔细询问下得知，这位司机因连续加班出车，非常疲劳，他唯恐路上打瞌睡出事，每逢感觉要打盹，就在自己腿上掐一把，掐来掐去，就掐成了这个样子。

从八达岭长城返回的第二天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了国宾馆的车队宿舍，对司机们说："西哈努克亲王对你们的服务非常感谢，特意要我转送给你们一些小礼物。"

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个纸盒，司机们围过去一看，里面装了许多姿态各异的小铜佛。铜佛都戴着小尖帽，神态或悲或喜或在沉思，生动极了。大家收下了礼物，同时要那位负责人代大家向西哈努克亲王转达谢意。

记得在西哈努克亲王结束这次中国之旅启程回国那天，北京刮起了五六级大风，黄沙漫天，迷得人眼都睁不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领导和有关各部部长，照例前往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送行。

到机场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向周恩来总理等一一告别，然后登上了飞机。周恩来等在地面频频向客人挥手告别。

飞机螺旋桨转动起飞时，机翼下掀起了一股股更猛烈的风沙，直向送行的人们扑来。连一直守在机场边汽车上的车队司机们都强烈感到，车子仿佛要被那一股强风掀起来似的，只见送行的人们也被风沙刮得直往后退，有些人干脆躲进了机场边的汽车里。

飞机下，周恩来和张闻天等领导却仍在大风中稳稳站立着，一动没动。车队秦队长远远看到，周恩来、张闻天面带微笑，仍在向飞机舷窗后的客人挥手告别。这时飞机拉起，在人们的头顶上方盘旋了一圈，然后向南飞去。

送走飞机后，周恩来显得十分生气，一脸怒容，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国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

周恩来嗓门很高地说："难道你不知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吗？怎么客人还没走，你们倒都走了。风沙大，我和张部长也没有动嘛！外事工作、国

际礼仪，来不得半点儿含糊。你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从不轻易发脾气，而这次大发脾气，连车队秦友海队长和司机们都听到了。正是周恩来的这次大发脾气，给秦友海留下了至深印象，也使他进一步懂得了，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人格魅力。

从此后，秦友海常用这件事教育国宾车队的工作人员和司机，遵守外事纪律，恪守礼仪规范，真心实意地为宾客服务。

七　在与苏联如兄弟般的日子里

中方希望苏方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人来华/毛泽东从此对尤金刮目相看/未到3点钟，尤金已经又是一身大汗/赫鲁晓夫的任命大大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料

1950年2月，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有一次毛泽东与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见。交谈中，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视，斯大林主动向中国客人建议，把毛泽东所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恰好毛泽东也有此意，遂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方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同志来华，帮助完成文稿的编辑工作。

其时，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尤金就在座侧，毛泽东建议说，就请派尤金同志来华吧。斯大林果然同意了，答应派尤金赴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尤金是当时非常受斯大林信任的理论家，斯大林的一些哲学见解有时就是通过尤金传达出来的。例如斯大林对哲学界所公认的一个辩证法论点，即“对立面的统一”感到难于理解，斥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从此，在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就只剩下“对立面的斗争”一个辞条，并且以“同一性”的辞条代替了“统一性”。随后苏联的博士、副博士论文凡以“对立统一”为题目的一概取消作废，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文章中也都不提“对立统一”的概念。

尤金不仅在哲学界影响甚大，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方面亦举足

轻重。那时在国际共运史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南斯拉夫道路”、“富农路线”等说法，亦是由此公首创。

当年夏季，尤金衔斯大林之命来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与审稿工作。尤金原本对中国问题了解不多，但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研究后，增加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历史、理论、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东方文化也起了兴趣。

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看得入迷。他赞叹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理论家，视毛泽东为学术知音。欣喜之余，尤金经毛泽东同意，把毛泽东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被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权威理论家，国内外政界的很多政论文章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但他认真阅读了尤金推荐的毛泽东所著《矛盾论》、《实践论》，十分欣赏，将之交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予以公开发表，在苏联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闻此很高兴，专门给他的大秘书之一、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亦因此对尤金刮目相看。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尤金来华的使命却还没有完成。毛泽东专门给斯大林致电，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同时提议让这位理论家到中国的部分大中城市，给中共干部做政治理论报告和演讲。斯大林很爽快就回复同意，让尤金在华工作到年底。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全程陪同下，尤金到上海、杭州、广州、西安等地作报告，听报告的人大都是当地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他还在中南海举行了报告会。他写的《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论苏联逐步到社会主义》、《东欧和中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

这年年底，尤金要回苏联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还专门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交谈的主要话题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尤金告诉

毛泽东，他对《毛选》评价很高，认为有许多独到之处，俄文版的发行，肯定会引起轰动。只是这位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哲学家认为毛泽东生动、形象，具有大众特色的词句难登大雅之堂，也不利于外国读者领悟其义。

尤金回苏联仅过了半年，毛泽东就又邀请尤金来华工作。尤金愉快地答应了，还告知打算携带家眷来华长住。1951年7月，尤金携夫人季娜再次访华，他再次来华的任务有三：一是到东北、华北各地向党政干部作讲演；二是帮助中国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情况；三是审阅《毛选》的一些文章，指导翻译工作。

再次来到中国的尤金，受到超规格的接待，他们夫妇被安排在景山后街原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时期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这座寓所内有花园、小游泳池，环境幽静。便衣保卫队队员张文健，奉命担任尤金住地的保卫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负责重要外宾的警卫工作。

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张文健接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的通知：下午3点，毛主席要来看望尤金先生。张文健放下电话，马上请翻译杨志超把这一信息报告了尤金。

尤金听后十分喜悦，本来他刚用过了午餐，趁高兴之际，又要服务员拿来一瓶酒，和张文健、杨翻译等一起干杯，共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喝完酒后尤金说："我要洗澡更衣，恭候毛主席的到来。"

北京的7月，天似流火。那时还没有空调设备，寓所里也只能靠一只电扇和一盆冰块来去暑降温。在气温高达35度的三伏天，龙金依然很讲礼仪，身着西服，打着领带，脚蹬皮鞋。在等候的时间里，尤金一直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停地吸着烟，不时看看手表。结果还没有等到3点钟，他已经又是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尤金觉得他这副样子见毛泽东很不礼貌，于是他又一次到盥洗室洗澡，又换了一身衣服。

下午3点，毛泽东按时来到了尤金下榻的别墅。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毛泽东在距别墅门口十几米远的地方就下了汽车，步行向尤金的住地走来。张文健远远望见，毛泽东身材高大，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神态平和，步履矫健，他赶忙迎上前去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微笑着，向张文健

询问了尤金夫妇来这里后的生活情况。

当听张文健说尤金还在更衣，所以未能出来迎候时，毛泽东说："不要催，我在客厅等他好了。"

毛泽东在客厅落座后，对张文健和几位工作人员说："龙金是我们党中央请来的客人，也是我的客人，他是来帮助我们党工作的。你们要努力做好接待工作。为党中央接待好客人，就是为党中央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时，又换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尤金从卧室来到了客厅，他和毛泽东握手拥抱，互致问候。接下来，他和毛泽东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

他们交谈的话题十分广泛，从苏联革命一直谈到了中国革命。尤金还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其著作《矛盾论》在苏联发表的情况。尤金对毛泽东的这篇哲学著作赞赏有加，说他还专门撰写了文章推介这部著作，《矛盾论》一定会在苏联广泛传播的。

会见结束，送走了毛泽东的尤金仍沉浸在兴奋之中。他情不自禁地拉着张文健说："毛主席和我谈的非常好，我们讨论了哲学问题。他的谈话使我对中国革命又有了新认识。他希望我多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

这时，张文健的心情甚至比尤金还要激动。他是个来自晋察冀解放区的农民子弟，自1948年冬天从部队调到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后，一直担负着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重任。虽然在几次执行任务过程中，他都能远距离地看到毛主席，但他一直还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能在很近的距离看看毛主席。今天，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还面对面地和毛主席说了话。这时，张文健自己也在反复回忆着刚刚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尤金又对张文健说道："没想到，毛主席对我如此关心，他说，北京现在天气太热，要我和家人一起到山东去避避暑，我听了很受感动。"果然没过多久，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尤金夫妇就去了青岛。

可以说，作为斯大林特使的尤金，两次来华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隆重热情接待。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都亲自宴请了他们夫妇。江青

还奉毛泽东之命邀请尤金夫妇游览了颐和园、天坛等北京的风景名胜。

一时间，尤金在中国颇受欢迎的消息传到了苏联。1953年12月，尤金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接替前任库兹涅佐夫。这一任命很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料。尤金是个学者，既不懂多少外交，也不善于处理国事，这无异是秀才挂帅。赫鲁晓夫这样决策，就是出于尤金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的考虑，因为他认为同中方打交道，派毛泽东不熟悉的大使，办事不方便。据说，斯大林生前也曾说过：尤金既然为中国人所喜欢，就让他去做苏联驻华大使吧。

1953年12月14日，尤金到中国外交部拜会周恩来外长。第二天，他又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向毛泽东呈递国书。在给毛泽东的致颂词中，他表示：将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热情洋溢的致答词中说：中国一贯十分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从1953年到1959年，尤金的大使生涯持续了6年。

过黄河大桥时，一节公务车厢突然脱钩了/临时救场的翻译原来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想了想说：这可能不行

1950年春天，苏联青年代表团由中国青年团第一书记冯文彬陪同，到中国各地进行友好访问。便衣队区队长刘忠率领一支区分队，负责此行的安全保卫任务。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苏联代表团乘坐的这趟专列在途经河南的黄河大桥时，一节公务车厢突然脱钩了。刘忠他们发现情况后非常着急，连连抱怨说，怎么前不“脱”，后不“脱”，偏偏赶在大桥上“脱”呢？

刘忠不由分说，带着几位便衣队队员跳下车，进行紧急处理。可他们几个人使足全身劲儿，想把脱钩的车厢挂在一起，却怎么也扒不开、挂不上。

眼看前面的车厢缓缓开走了，只留下刘忠他们的这节公务车厢被甩了下来。这会儿，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前面或后边再有列车开来，来不及刹车的话，就会与这节车厢相撞，把这节车厢撞出轨道，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刘忠他们越想心里越慌，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现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不像今天可以用手机联络，根本无法快速通知铁路方面，提醒其他列车注意。正着急时，列车长从勤务车上过来了。他想了个土办法，找来了一些压炮，把它们搁在相隔滞留车厢前后一段的铁轨上，当火车车轮与之摩擦压炮就会爆响，引起火车司机注意。这是当时仅能想到的好办法了。

刘忠马上派了三名战士，沿附近铁道线搁放炮仗，隔一段距离搁一个。这样，一旦前后有火车来，压在炮仗上就会发出爆炸声，连压几个炮，就能引起火车司机的警觉了。

战士们刚刚搁完压炮，后面果真开来了一辆列车，火车司机听到了铁轨上接连发出了几声炮响，觉得有问题，就停下来看个究竟，这才发现前面有一节车厢滞留在大桥上，避免了两车相撞的意外险情。

这时，已开走的专列前车厢也觉察到后面一节车厢丢失了，倒退了回来，向脱钩落下的车厢迎了过来。列车人员发现脱钩车厢的挂钩出了问题，就迅速同有关方面联系协商，设法又调来了一节车厢，并将脱钩出问题的车厢拉开，险情这才算排除了。

苏联青年代表团乘坐的专列停留的第一站是河南省会郑州。车停郑州后，河南省党、政、军领导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车站隆重欢迎。苏方团长在欢迎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友好的演讲。可是因为没有讲稿，一时难住了随行的年轻翻译，她结结巴巴地翻译着，不时还“卡了壳”，憋得满脸通红，场面非常尴尬，弄得冯文彬等陪同领导脸上也很难堪。

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有一位英俊、潇洒，梳着分头的青年站了出来，他大方得体地向苏联客人示意，然后又流畅准确地将苏方团长的演讲翻译出来。在场的人们热烈鼓起掌来，既是为苏联客人热情洋溢的演讲，更为了这位青年人的及时救场和完美翻译。

欢迎仪式结束后，冯文彬等领导人特意走上前来，和这位青年人紧紧

握手表示谢意！在场的苏联客人也无不夸赞他翻译得很棒！

当时绝大多数现场的人都不知道这位青年人究竟是谁，更想不到他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此次毛岸英搭乘这趟列车，是受父亲的嘱托，代父亲回湖南韶山故乡，探望毛家亲友和故人的。

专列离开郑州后，继续向湖南进发。正在车上执勤的便衣队队员刘满昌和毛岸英在车厢里相遇，但彼此并不相识。举止文雅的毛岸英微笑着和刘满昌握手后，便坐下来与他攀谈起来。

闲谈间，刘满昌问："你贵姓，你也和我们一起去湖南、广州吗？""我姓毛。因为你们的车要到湖南，我父亲让我搭这趟车顺便到韶山故乡去探亲。"毛岸英答道。

刘满昌这才恍然大悟，"啊！你是毛岸英同志，失敬！失敬！你刚才那场翻译真棒，欢迎会圆满成功多亏了你。"

毛岸英谦虚地说："这没有什么，我去苏联留过学，俄语自然讲得熟练点。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有几年工作实践后，就会好起来。"

当火车快开到湖南时，不知道什么缘故，又出现了车厢脱钩事故。好在这次前面的车没开出多远，就及时发现了问题，很快慢慢将车倒回来，把脱了钩的车厢重新挂好，继续向前行驶。

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两次，引起刘忠和便衣队队员们的警惕，他们分析认为此事肯定是敌特分子蓄意破坏。后来铁道部对此事做了专门调查，经分析排除了敌特分子阴谋破坏的可能，认为是因列车制造技术等因素所造成的。

在湖南，苏联代表团一行前往韶山，瞻仰了毛泽东的故居。湖南省的文艺工作者还为欢迎苏联客人，在毛泽东故居演出了湖南花鼓戏等文艺节目。苏联朋友虽然听不懂演员的戏词，但精彩表演却博得了他们的喝彩。苏联朋友还即兴表演了芭蕾舞和俄罗斯民族歌舞，并用刚学的汉语演唱了中国民歌《东方红》。

列车即将离开韶山继续南下广州时，毛岸英和韶山的乡亲一起到车站来送行。在火车就要启动时，毛岸英走过来和刘满昌亲热握手，彼此好像已成了老朋友。

“祝你一路顺利！”毛岸英说。“谢谢！希望等我们从广州回来，你再坐这趟车，我们一起回北京。”刘满昌发出邀请。毛岸英想了想，说：“这可能不行，你们是公事，我是私事，老坐这样高级的车也不合适。”

“你也太讲原则了，毛主席不是批准你坐这趟车了吗？再说，你起的作用可比我们要大多了！”毛岸英微微一笑，“正因为我是主席的儿子，才更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呢。郑州车站那件事纯属偶然巧合，不能算是我的功劳呀。”

人民领袖的儿子和年轻警卫战士在韶山依依话别。刘满昌没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识却成了永诀。一年后，毛岸英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刘满昌后来经常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和毛岸英那段难忘的初识和话别。毛岸英的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精神，让一个便衣警卫战士难以忘怀。

苏联青年代表团专列遭遇土匪袭击/叶剑英对北京来的便衣队员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大家不明白邱局长为什么这样说

还有一次，也是护送苏联青年代表团到中国南方参观访问。代表团乘坐的专列沿着京广铁路向广州方向运行，刚进入广东地界不久，忽然从铁路路基两侧传来了一阵密集枪声，列车上几扇玻璃窗也被击碎了。

由于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深山里的土匪尚未剿灭干净，因此负责护送这趟专列的便衣队区队长王成义立刻警觉到：遭遇土匪袭击了。他从车窗向外看去，发现有十几个土匪隐藏在路旁灌木丛中，正用手枪、步枪向列车射击。他随即指挥车上的便衣队队员开枪还击。

王成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某部侦察参谋。他矫捷善战，有一套过硬的侦察本领。在当年的一次行动中，他和战友突然被日军发现，情况万分紧急，王成义沉着应对，迅速拔出双枪

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友转移。而当他准备后撤时，日军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猛然向他扑来，抓住了他的衣领，王成义急中生智，解开衣领，来了个金蝉脱壳，纵身跳下山坡，安全脱险。

眼前这场较量完全不同于当年，警卫人员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仅队员人多，有30余人，且居高临下，分布在列车不同位置，有利于向敌人射击。虽说便衣队员使用的都是手枪，但每个人都经过长期严格训练，枪法很准。

而那些土匪，一看就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阵容不整，打枪也是无目标地乱放一气。他们与列车上的便衣队队员刚一交火，跑在前面的几个土匪立即就被击中倒地。后面的土匪一见前面的兄弟已经栽倒了，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溃散而去。

列车枪战就这么快速地告终，队员们还感到有劲儿没使出来呢。王成义带队在列车内检查了一遍，除几扇车窗车门的玻璃被打碎外，并无人员伤亡。一场意外的土匪袭击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遇袭当天，专列到达了广州。刚刚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亲自乘车前来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

广州，这个中国南方最大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城市，气候温暖，四季鲜花盛开，因而又称之为“花城”。4月的广州城，一派春光明媚。

叶剑英新官上任，又是在自己刚解放的家乡接待苏联贵宾，喜悦心情自不必说。他按照广东习俗风情，设粤菜大宴隆重欢迎苏联客人。护送专列而来的便衣保卫队队员们也应邀参加了宴会，被待为上宾。

广州的粤菜宴席，确实味道鲜美，席间还有北方难得一见的珍禽异兽。大家正吃得有滋有味，忽然有人说：“这是蛇肉！你们吃出来了吗？”

“啊，还有蛇肉？”从北方来的年轻便衣队队员听说吃蛇肉都感到惊讶。这时他们才看清，一只大盘子里盛着一节节有鳞样纹路的肉段。因这道菜的味道特别鲜美，所以盘子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了。

叶剑英边吃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次苏联代表团来，我们准备请他们分头去广州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部队作几场报告会，介绍一下苏

联在建设社会主义当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接着他又关心地对在座便衣队队员们说：“你们一路辛苦了，又经历了一场意外土匪遭遇战，在广州期间的参观点和会场警卫就不用你们操心了，由广州的警卫部门负责。你们现在的任务，你们就是好好休息一下，让市公安局邱局长带你们到各处看看，顺便观赏一下广州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认真地说：“不过，有一点你们必须做到，就是把你们在北京和隐蔽敌人斗争的宝贵经验留下来，广州现在有大量暗藏的敌人在蓄意破坏我们的新生政权，制造事端，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制服他们，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区队长王成义忙站起身来，向叶剑英市长报告说：“老校长，请您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您也许还没认出来，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您在华北军大当校长时的学生呢。”

接着，王成义把在座的几位从华北军政大学抽调到便衣队的队员一一向老校长介绍。叶剑英高兴地和大家亲切握手，一边风趣地说：“咱们原来是一家人啊！”

当时华北军政大学学员有数千人，先是分散在农村驻地，后来到石家庄西兵营集中，为防敌机轰炸，学习训练也常是分散进行，因此军大校长不认识学生，也是很自然的事。

叶剑英鼓励队员们说：“你们离开军大后，又到西黄泥村学习了不少和城市暗藏敌人作斗争的本领，现在又在实际工作中实践运用，很有成就啊。”

老校长与学生在南国异地重逢，大家都感到分外亲切。

宴会之后的第二天，广州市公安局的邱局长便带北京来的便衣警卫们参观了位于白云山麓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凭吊了1911年3月在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72名烈士的英灵。

接着他们又游览了东西绵延约三公里的广州名山越秀山。大家聚集在越秀山上的明代建筑镇海楼上，凭楼远眺，珠江波光粼粼，帆影点点，广州秀色一览无余。

邱局长忽然遥指珠江水面的点点游船，有些忧虑地说道："别看这点点游船挺漂亮，可它们却和广州市的许多不安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家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邱局长便又介绍说："早在国民党时期，珠江上就有不少游船、画舫，表面上招揽游客，做水上游览生意，其实船上隐匿了不少流氓霸匪，四处寻机做黑道生意。他们一旦发现有钱的阔佬上船，便伺机强行捆绑，搜刮全部财物，然后将人载至深水处，沉人江底。如今广州刚刚解放，这些黑道生意人中，有的又被国民党潜伏特务收买利用，不断在珠江上制造抢劫财物、杀人沉江的案件，极大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以珠江为掩护，活动猖獗，作案后即可从水上逃遁，给我公安部门的追捕也增加了难度。"

王成义听了邱局长的介绍后，感到珠江游船的作案情况与杭州西湖有些相似，于是就将自己了解的杭州西湖改造游船，变不安定因素为安定的经验，向邱局长作了简单介绍。邱局长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一再询问，还说晚上抽时间再和王成义详谈。

游览休息时，邱局长又吩咐拿来了新鲜的荔枝，请大家吃。王成义和不少队员还是第一次品尝广东荔枝，这美味甘甜的滋味让他们食之难忘。

王成义笑说："当年的唐明皇为博杨贵妃一笑，命人飞马传递荔枝，这才有了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绝句。如今虽有了火车飞机，但要想吃到真正新鲜的广东荔枝，也并非易事。这不，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才品尝到'妃子笑'。"

几天后，当苏联青年代表团结束了参观访问，即将离开广州返京前，叶剑英市长又召集便衣警卫人员开会。

叶剑英说："从目前局势看，迅速肃清国民党残余和土匪特务分子，维护社会秩序，是把好祖国南大门广州的头等大事。非常感谢北京来的同志为我们广州带来了安全便衣保卫工作经验，邱局长已连夜赶制了一个治理珠江游船的行动方案，再请大家提些意见。"

叶剑英市长最后还向王成义区队长交代说："苏联青年代表团返程时，给你们加派一个排兵力，随车警卫，加强防范，一切听从你们的统一

指挥，全程护送苏联代表团到北京。我们还准备在铁路沿线的险要地段和重要关隘加强警卫力量，一旦发现敌人袭击，就坚决彻底消灭，绝对保证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安全。”

正是由于有叶剑英市长周密细致的安排，苏联青年代表团一行乘坐的专列在经过广东路段时没有再发生意外，安全顺利返回北京。

巴贝舍夫仰面躺在地毯上，停止了呼吸/罗瑞卿部长亲赴现场，仔细勘察篱笆围墙/最终中方以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巴贝舍夫是自杀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互助同盟缔约，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中国进入了以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苏联专家的需求量激增。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由此，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虽早在1950年，周恩来主持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并组建了“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管理苏联专家的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1953年9月后又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等专门管理机构，但随着苏联来华专家数量的激增，专家的管理工作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局面，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由于沟通、联系的欠缺，有的苏联专家已来到北京，但中国接待方根本没有接到通知；还有的单位缺乏事前的计划、资料等准备工作，以致专家来后无法发挥作用。

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被安排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所属的几个宾馆、招待所住宿接待。公安部也对这些来华苏联专家的安全进行了警卫工作部署。在每个负责接待专家的宾馆招待所都安排了安全警卫干部。

此时，便衣保卫队已经隶属于公安部八局改编为政治保卫队，原便衣



周恩来与苏联专家和夫人们在一起

队分队长李广仁编制在五处三科，他被派到接待苏联专家的北郊招待所，在这里任警卫科副科长。

李广仁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54年5月中旬的一天。临近中午时分，他正在办公室办公，只见招待所7号楼的服务组长张庆玉神色紧张地前来报告说："705房间出事了！"

"怎么回事？"李广仁追问道。

张庆玉详述说："上午服务员去打扫卫生时，发现房门打不开，从门上玻璃窗向里面一看，发现室内床上有一大片血迹，没有看见住在这个房间的巴贝舍夫专家的踪影。"

接到报告后，李广仁迅速带人赶到了现场。这时705房间的门还是锁着的，李广仁赶快找来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进门后他们发现，巴贝舍夫仰面躺在地毯上，双目圆睁，呼吸停止，人已死亡。

经保卫人员的粗略观察，巴贝舍夫脖颈右侧和右手腕处有刀划痕，床单上溅有大片血迹，写字台上的台灯还亮着，屋内的物品摆放整齐，现场没有搏斗过的痕迹。

看完案发现场，警卫科长李广仁当即决定：第一，严格保密，

要求在场人员不要将情况泄露出去；第二，保护好现场，不经同意，任何人不得进入现场；第三，在场的服务人员都要留守岗位，等待调查，暂时不得离开。李广仁随即向上级领导报告了这一突发案件。

当天下午1点，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马永臣大队长，率领刑侦人员、法医等进入事发现场勘察，他们还带来了一条最好的警犬以便进行鉴别追踪。

稍后，公安部治安局的苏联刑侦专家也不期而至。在他看完现场后，中方人员即向他征询意见，他不置可否地说："我相信中国同志会得出正确结论的。"说罢，就匆匆离现场而去。

下午3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来到了北郊招待所，亲临705房间查看。他仔细地检查了现场，又详细询问现场侦查员发现了哪些有价值的痕迹和线索。

一个侦查员报告说："我们用警犬对现场进行了反复识别，警犬没有嗅出死尸以外的其他陌生气味儿，我看有可能是自杀。"

罗瑞卿部长显然并不赞成这样过早地对案情下结论。他只是"嗯"了一声，说道："我们要取得确凿有力的证据和合乎逻辑的分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警犬的识别反应，只可作为参考。"

这时又有一位侦查员补充报告说："刚才部里的苏联专家来过了现场，他对案情也没有明确表态。"

"办案要靠我们自己！"罗瑞卿明确地指出。

然后，罗瑞卿转身走出房间，对楼道内正在等候指示的各部门人员问道："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李广仁先愣了一下，赶快走上前去："报告罗部长，我是八局五处三科副科长李广仁，这里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

罗瑞卿马上向李广仁提出了一系列讯问。如7号楼服务员的政治表现如何，楼内夜间值班的情况如何，驻地警卫部队及周围治安情况如何等。

李广仁一一作了回答。

罗瑞卿部长听完后若有所思地说："走，领我去查看一下你们的围墙。"

李广仁当即领罗瑞卿及随身警卫秘书等人，到了招待所的南门，沿着西墙内侧向北检查。

北郊专家招待所的围墙，当时是用两米高、指头般粗细的竹竿编织起来的竹篱笆墙。也就是俗话说的“挡君子，不挡小人”的围墙，只可作屏障，并不能阻止犯罪分子进入。安全护卫由中央警卫师一个警卫排担负，招待所的门口和院内共设有四个哨位。

罗瑞卿部长边查看边对李广仁说：“我看看篱笆墙头上的蜘蛛网丝有没有被越墙者弄断的痕迹，你检查地面有没有翻墙者留下的脚印。”

就这样，他们沿着200多米的围墙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查看过程中，罗瑞卿一再对跟在他身边的人员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做起，注意查究蛛丝马迹般的线索，任何粗心大意都是不行的。”

查看完毕，罗瑞卿又指示说：“这个地区比较偏僻，要尽快建立一个派出所，把社会治安管起来，内部的保卫工作也要重视，狠抓预防，经常检查，要多设想可能会发生的案件和事故。时刻提高警惕。”

在后来长达一个多月的案情侦破中，中苏双方也曾多次交换意见。开始时苏方开始一直坚持是“他杀”，并提出三条理由，进而要求中方捉拿凶手。

中国公安刑侦部门，通过现场严密侦查，提取指纹、毛发、血液，以及对尸体的解剖等技术鉴定措施，并特邀国内知名法医、痕迹专家进行缜密论证后，否定了“他杀”的推测，以充分的证据做出了巴贝舍夫是自杀的结论。苏方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也接受了这一结论，同意巴贝舍夫是自杀。

一件令人紧张焦虑的“苏联专家暴死案”就这样告结了。

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领导指挥下，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显示了中国公安刑侦部门的破案能力，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罗瑞卿部长深入现场、周密思考、严格细致的作风，也给当时李广仁这样的年轻基层警卫干部留下了至深印象。

马林科夫对他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你能接受这一任务/“总顾问回国时，让高富有去送。”周恩来亲自点将/阿尔希波夫.说有东西忘在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多次访苏，寻求援助，为此，中国方面以优厚待遇，聘请了不少苏联和东欧专家。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财政拮据，经济困难，外国专家为新中国迅速改变这种现状的确付出了很多心血，并在与中国人民并肩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兄弟般友谊。

对这些来华的外国专家，中国方面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为此，周总理曾亲自命令，把便衣保卫队队长高富有调到政务院招待处工作，重点负责外国专家的安全保卫。招待处接受着来自公安部和政务院的双重领导。

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聘请的外国专家数量迅速增加，专家招待处就扩编为国务院的外国专家局，高富有遂被任命为外专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保卫处处长。

记得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周总理在东交民巷国际饭店（原六国饭店）宴请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苏联派驻中国援华项目专家组的第一任总顾问、总负责人阿尔希波夫也和许多苏联专家一道参加了宴会。

阿尔希波夫先后在中国工作了8年，他以其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身体力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一位忠实朋友。直至20世纪90年代，他还为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数次来华，再续苏中昔日友谊。

阿尔希波夫1907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0年2月，他受苏联领袖斯大林的委派，来中国担任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右)一行

在阿尔希波夫来华之前，苏共中央书记兼干部管理局局长马林科夫曾找他谈话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你能接受这一任务，担任苏联在华专家总负责人。"

临行前，斯大林又亲自接见了阿尔希波夫，并对他说："中国刚刚获得解放，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先进技术，需要各方面的专家。我们既已承担了这一责任，就应该以诚恳、热忱的态度，把先进技术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一定要以生命来做保证，维护好苏中友好关系。"

最后，斯大林还一再叮嘱阿尔希波夫："要尊重中国同志，要告诫苏联专家们，切不可高傲自大。"

1950年2月，阿尔希波夫初到中国北京，中国方面安排他住在东交民巷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院内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外观古色古香，内部全部是西式装修，生活、工作设施齐全。

阿尔希波夫刚到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分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等便会见了他。接下来，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三天外国专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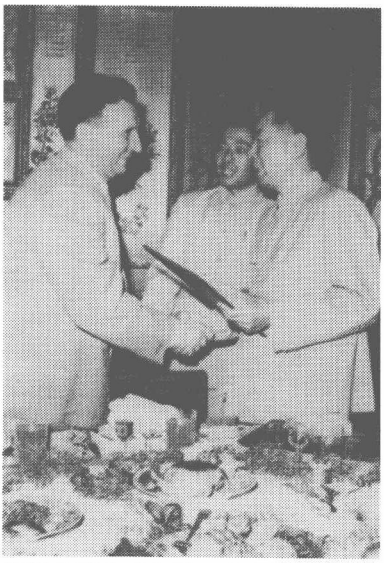
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阿尔希波夫与先期到达的苏联专家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听取了中国有关领导对中国国内经济恢复建设方面的情况介绍，对中国国情和经济现状加深了理解。

此后，阿尔希波夫便以其成熟、干练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挑起苏联专家总负责的重任，并在援华工程实施过程中做了大量沟通、协调和组织等实际工作。

在他的倡议下，中苏双方还形成了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的制度，定期处理和解决有关苏联专家方面的困难与问题，这个有效制度一直坚持到了1958年阿尔希波夫离任回国。

阿尔希波夫在初步掌握了中国经济情况后，又深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进行了考察。他先来到东北三省的重工业地区调查现状。在鞍山这座大型钢城，他看到的是经过战争摧残后的一副惨状。厂房倒塌，高炉停滞，废弃的钢铁掩埋在丛生的杂草中……

“鞍钢的设备太陈旧、落后了！必须改变现状。尽管你们国家现在资金极为短缺，但鞍钢可以利用现有物资，进口少量必需的机器设备，修复


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宴请阿尔希波夫


陈云会见阿尔希波夫

一座高炉，就投产一座，加快鞍钢的恢复投产速度。”这是阿尔希波夫在调查思考后，对鞍钢建设提出的中肯意见。同时，阿尔希波夫还为鞍钢制定了进口先进自动化设备和选送技术工人到苏联培训的计划。

此后，阿尔希波夫先后三次去鞍钢，帮助鞍钢恢复和重建。同时他还考察了东北许多大型重工企业，将破败的抚顺铝厂列为苏联援华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很快实现了抚顺铝厂的改建扩建工程。

阿尔希波夫还对中国的公路、铁路、桥梁建设非常关心。他曾与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的苏联专家组长桥梁专家西林共同探讨大桥的建设问题，对一桥飞架于长江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现实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在中国工作的8年中，阿尔希波夫视察工矿企业，指导重大建设工程，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他的辛勤努力和奔波中，一座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一批批掌握了现代操作技术和现代管理的工人和干部迅速成长。阿尔希波夫投身和见证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发展，并与中国领导人、科技人员和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富有记得，1951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宴会刚一结束，周恩来就马上找到政务院几位负责专家工作的赖祖烈、张行言、高富有交代说：“阿尔希波夫总顾问要回国述职、休假一段时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次回国，你们一定要送他到东北满洲里的国界处。一路要保证绝对安全，生活上要照顾好，沿途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最后，周恩来还强调说：“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阿尔希波夫同志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为他挂专列。”

“总顾问回国时，让高富有去送。”周恩来亲自点了将。

周恩来对阿尔希波夫行止的周到关心，不仅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更反映了他对维护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看重。

由于从北京至满洲里，几乎穿越大半个东北，路途遥远，车速缓慢，要三至四天才能到达。当时铁路沿线的服务设施尚不健全，因此安全保卫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行前高富有特别组织了一个八人护送小组，高富有为总负责

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有段张巨，卫士长董其昌和一名卫士；翻译是位女同志叫张忆伟；服务人员三名，一名管理员，一名采购员，一名厨师。

护送组对一路所需的生活用品做了充分准备，采购了足够的烧鸡、火腿、茶肠、面包、牛奶、水果、新鲜蔬菜等，保证旅途中的需要。一路上，厨师尽可能为阿尔希波夫及夫人叶卡捷林娜和两个儿子做些可口的俄式西餐，阿尔希波夫一家对中方的照顾非常满意。

专列自驶出北京前门火车站后，沿途经过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站时，都有当地领导和工矿企业的负责人上车来看望阿尔希波夫夫妇，并与他们依依话别。

为排遣漫长旅途中的寂寞，让阿尔希波夫一家旅途愉快，高富有绞尽了脑汁，千方百计找话题，和阿尔希波夫一家交谈解闷。

高富有向阿尔希波夫讲述了自己从一个苦孩子成长起来的个人经历。他先在家乡当苏维埃副主席，参军后跟随彭老总部队西征，后去延安参加了大生产和整风运动，并成为一名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手枪连连长，1949年3月跟随党中央进入了北平城。

阿尔希波夫饶有兴致地听高富有讲述个人经历，然后也把自己的传奇经历讲给高富有听。当时一路经常陪阿尔希波夫一家聊天的还有卫士长董其昌和翻译张忆伟。

张忆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个俄罗斯名字，叫瓦丽娅，是个混血儿。她原在苏联专家集中下榻的国际饭店当俄语播音员，播报中国报刊新闻，做同声传译。由于工作认真，为人热情，深得苏联专家喜爱。

除了聊天外，大家还在一起打扑克、下棋。后来，高富有还教阿尔希波夫一家玩起了一种中国民间的“划拳”游戏。时间在欢快的叫声、笑声中度过，大家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第四天，阿尔希波夫一家乘坐的专列终于驶达满洲里火车站，这里即是中苏两国的边界线了。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家的心情都是沉甸甸的。阿尔希波夫那个一向喜好欢蹦乱跳的小儿子鲍里斯，也变得沉默起来。

张忆伟与叶卡捷林娜吻别时伤心地哭了。“瓦丽娅，不哭，好姑

娘……”在一旁的阿尔希波夫见这样劝慰了几句依然不见什么效果，遂转换用诙谐的口吻对张忆伟说：“要么，我们把你装在箱子里带到苏联去好了。”顿时把张忆伟逗得破涕为笑。

这时，阿尔希波夫走过来，与一直陪伴他的高富有和董其昌告别。他伸出一只大手，拍拍董其昌的肩膀，又与高富有紧紧拥抱。三位男子汉这时再也难以控制别情，一起落下了热泪。对这次难忘的分别，高富有有一段感人的记述：

“瞧你，还是男子汉呢！”夫人叶卡捷林娜悄悄把手绢塞给丈夫。

终于，服务人员把行李从中国专列上搬到了苏联的车厢上，并彬彬有礼地询问：

“请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忘在车厢里了？”

“啊，对了，忘了一件东西。” 阿尔希波夫同志低头默默自言自语，但他并没有行动。

“什么东西？我去取！”手脚利索热情的瓦丽娅立刻要返回车厢。

“不用，不用了，你取不回来了！” 阿尔希波夫同志眼睛再次湿润了。

“他把自己的心，一半留给中国了！”最了解丈夫的叶卡捷林娜轻轻地说。

“最了解我的，还是我的爱妻叶卡捷林娜。” 阿尔希波夫同志爱抚地吻了吻妻子，然后挽上她的手臂，慢慢向自己的国家的领土大步迈去，步伐那么沉重、深情。

终于迈出中国的国界，踏入自己国家的领土，阿尔希波夫同志携夫人又转过身来，用温柔的、盈满泪珠的目光，挥手向护送他的八位中国同志、朋友、兄弟告别，向中国这片充满友情的热土告别。

“同志们，请相信我，我们会在中国再见面的！”这句饱含深情的话，冲过边界，回荡在中国大地上，使我们天天期盼着。

——高富有、高英著《共和国元勋轶事》

赖祖烈堵在周总理卫生间门口呈文/专家们住进了当时有点过于豪奢的宾馆/一辆载着苏联专家的车在魏公村附近撞到了树上/周恩来又给高富有加了一个新头衔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随着建设的需要，向中国派遣的苏联专家数量越来越多，其中在北京的数量最大，他们分散在几家宾馆住宿，但管理比较散乱，还出现了上文中叙述的专家自杀事件。

此后，为了保证外国专家的绝对安全和生活方便，刚成立不久的外国专家局就提出拟建一座融吃、住、生活服务、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大型宾馆，满足外国专家的工作、生活需求。

宾馆的位置就选在当时西郊农业研究所马路对面的一片沙滩荒地上，是由刚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建筑设计师张镈先生设计的，建成后正式命名为友谊宾馆。宾馆的建筑外观采用的是民族风格，翠绿琉璃瓦大屋顶，显得富丽堂皇。主楼配楼，合围成一个有假山、流水、亭台楼阁的庭院式宾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宾馆建筑群内还包括一个大剧院、百货商店、图书阅览、邮电通讯、银行、门诊部等，还有游泳、排球、网球、羽毛球、篮球、台球等运动设施。后来还建了一所九年一贯制的“苏联学校”，为外国专家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子女在华读书提供了方便。

友谊宾馆的建设工程当时由外专局局长张行言、副局长赖祖烈和保卫处处长高富有主要负责，赖祖烈因为同时还是中央特别会计室主任，有经常接触周恩来的便利，因此报批工程指标的事就由他来办。

周恩来那时工作特别繁忙，一般很难抓到合适的报批机会，为了能尽快报批动工，赖祖烈确实动了脑筋。有一天，他趁周恩来刚起床，正在洗漱、刮胡子的机会，就带上工程设计项目、材料报表等站在了总理的卫生间门口等。

“老赖有事？”周恩来边刮胡子边问。

“总理，这是友谊宾馆建筑工程报告及图纸，请您批示！”赖祖烈赶快呈上报告，并作了简单汇报。

周恩来很快即签批了这项工程的报告。随后，友谊宾馆工程便上马开始兴建。

在友谊宾馆竣工后，专家们住进了这座在当时而言是有点过于豪奢的宾馆。考虑到苏联专家的工作方便和交通安全，友谊宾馆专门组建了一个友谊汽车公司。接送专家上下班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由宾馆自己的车队全部承担起来。

在友谊宾馆车队最鼎盛时期，共配备有大小车辆2000多台，是当时北京市内最大的汽车公司，其规模比之先前专为外交国务活动服务而成立的首都汽车公司还要庞大。车队的服务对象是在北京工作的3000多位外国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在“苏联学校”上学的学生等四五千人。

每当首都有重大活动时，如国庆观礼、五一游园，或到某个饭店出席国宴等，友谊汽车公司车队的车辆便排成了长龙，一辆接一辆地接连驶出友谊宾馆大门，甚至出现前卫车已经到达了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后卫车还没能开出友谊宾馆大门的情况。

如此庞大的车队，在组建之初，由于各种规范制度尚未健全，因而在运行、管理、调度过程中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还闹出了一场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的大事故。

有一天，给苏联专家开车的轿车司机张某某，在出车经过魏公村的时候，突然撞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结果造成了乘车的三位苏联专家，一人骨折，两位受轻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交通事故很快就与政治扯上了关系，因为事关中苏两国的关系和友谊问题。

因此，周恩来总理立即听取了汇报，随后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亲自赶赴北京医院，探视受伤的苏联专家。在探视之后，周恩来责成有关部门马上组成调查小组，调查肇事原因，并当即点名由安全保卫工作经验丰富的原便衣保卫队队长、现任友谊宾馆办公室主任高富有做调查小组组长。

周恩来极为严肃地对调查小组提出了三点指示：一、立即查清事故原

因；二、探视慰问并安排好受伤专家的一切善后事宜；三、调查和处理的结果要马上向他本人汇报。

经过一番调查，事情的经过很快就清楚了。轿车司机张某某，因头天家属来队探亲，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从友谊宾馆出发，送苏联专家去东郊的和平里劳动部上班，放下专家后他去理了发，在理发时就困得睡着了。然后，他又从劳动部接专家回友谊宾馆，途中再次打起了瞌睡，结果导致方向盘失控撞到了树上。

高富有的调查认为，这纯粹是因疲劳驾驶酿成的事故，而没有什么故意破坏等政治因素在其中。这位司机也是贫苦农民出身，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平日工作勤恳，也很尊重苏联专家，发生事故实属偶然。

调查小组将调查结果向总理做了如实汇报，但在那个时期在中苏特殊关系的背景下，对这位司机的处理有些过于严厉，走了司法程序，判了司机三年徒刑。刑满后又将那位司机调到了外地。

出了这样的事情，车队的管理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个直接关系到苏联专家的生命安全。当时的友谊汽车公司有2000多名职工，其中有近一半是从部队复员转业的司机，他们到了地方，思想有些松懈，有些人摆资格，不服从领导，加之公司制度不健全，管理有疏漏，长此以往还会出问题。

于是，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高富有去嘛，他带过部队，熟悉安全保卫，知道怎样领导好这批人。"结果高富有在局办公室主任，人事处、保卫处处长等职务之上，又加了友谊汽车公司经理一职。

高富有上任后，很快在公司之下编组了6个车队，一个修理厂，全部按军事化管理。同时重点强调一条铁的纪律：不管任何人，任何事，绝不准许开快车。在繁华路段，车速要限制在45公里以下。在制定了规章之后，高富有还派管理干部实施暗查，对违反规定的司机，不留情面地予以教育和物质处罚。经过严格的管束，友谊汽车公司的运行逐渐走入正轨。

司机们遵守规范了，但有些乘车的外国专家却对严格的安全措施产生了意见，他们嫌司机开车太慢，耽误时间。有的专家干脆不坐车了，自己走着上班，甚至称友谊汽车公司是慢车公司。

为了使外国专家能理解和配合工作，友谊汽车公司想了许多办法，还专门召开了专家组长会议。向专家们耐心说明道理：北京的道路狭窄，人多车杂，为了保证安全，必须限制车速。

从那以后，尽管外国专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出车的任务也日益繁重，但友谊汽车公司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交通事故，有效地保证了外国专家们的乘车安全。

欢迎伏罗希洛夫的车队有200辆轿车/欢迎队伍突然失控，人群一下把毛泽东的敞篷汽车团团围住/秦队长立刻精神紧张起来/“对呀，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再次附和道

1957年那一年，适逢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毛泽东决定将第二次亲赴苏联，参加有关“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这一年自然也成了中苏两国之间密切关系，发展友谊的特殊之年。

在这一年的仲春4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将要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届时都将亲自到北京南苑机场迎接苏联贵宾。

伏罗希洛夫是苏共元老级功勋领导人。1881年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曾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遭到监禁和流放。

“十月革命”后他出任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与捷尔任斯基共同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内战期间他曾任红军第十军司令、察里津前线司令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

1953至1960年，伏罗希洛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一生中共荣获过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国家荣

誉奖章，于1969年病逝。

伏罗希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一书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了。"因此他在苏联有"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等称号。

为了迎接这位苏联国家领导人来访，顺利完成这次高规格的国事接待活动任务，国宾车队决定由秦队长带领队里的一批有经验的司机杨希凯、赵成龙、张金英、李敬才等完成贵宾在华出行乘车任务。

早在苏联贵宾来华前一个月，秦队长就带着几位司机开始了车辆安全检查、维护保养等各项准备。

4月15日这天，国宾车队一共出动了200多辆轿车，执行这次重要交通接待任务。那一天，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欢迎群众数万人都到了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到来。

下午三点，当伏罗希洛夫乘坐的专机飞抵北京时，南苑机场上彩旗招展，鼓乐齐鸣。前来迎接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挥舞着花束彩绸，欢声雷动。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挥帽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并缓步走下舷梯，踏上舷梯下的红地毯。

毛泽东迎上前去，和伏罗希洛夫主席热烈握手。"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毛泽东热情他说。

伏罗希洛夫风趣地回答说："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送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他随后与前来欢迎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发表致辞之后，伏罗希洛夫也致了答辞。然后，他们一同登上了主车。

主车是一辆绿色的敞篷轿车，两位国家领导人可以乘车接受沿途群众队伍的夹道欢迎。紧跟在主车后面的，是一辆辆乘坐苏联代表团成员和中国领导人的轿车车队。

3点55分，国宾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南苑机场，一路向中南海驶去。整个车队200余辆汽车首尾相接，整齐壮观，在密密层层的夹道欢迎人群中缓慢行驶。沿途锣鼓喧天，人群挥舞着中苏两国国旗，欢呼“中苏友好万岁！”人们还欢歌载舞，演奏着各式乐器，许多身穿鲜艳服装的年轻姑娘把无数花瓣洒向中苏两国的领袖们。

车队从永定门进入城内。当时的北京城还有着厚厚的城墙和城门。前门大街上还有有轨电车“叮当叮当”地在轨道上跑。车队过了棋盘街，穿过前门的牌楼、正阳门，进入了城中心地带。

这时道路两边欢迎的人群更多了。到了天安门广场，有几万群众拥在广场和观礼台上，金水桥的栏杆前也挤满了人。

当伏罗希洛夫和毛泽东的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时，人们还放飞了千百只彩色气球，气球带着写有“中苏两国友谊长存”的巨幅标语在空中飘动。忽然，欢迎队伍失控了，人群一下子涌了上来，把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汽车团团围住。

人们一面向两位领袖身上洒着花瓣，一面争相拥上去和他们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

手。伏罗希洛夫把洒在自己身上的花瓣捧起，又洒向人群，人群欢呼着“毛主席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热烈气氛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的敞篷汽车被欢迎群众足足围堵了有一刻钟，随车警卫和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武装警卫们用身体拼命围挡，但怎么也挡不住越来越多围上来的群众。

秦队长在车队最后面压阵，开始并不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听说车队被欢迎的人群堵住的消息，他立刻精神紧张起来。他急切地想了解前面情况，但同时又怕后面的车队也被人群冲断，那就更不好办了。整个车队只好依次停了下来，等待前面快快解围，一时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敞篷汽车被围堵时，毛泽东一面站在车上向群众招手，一面示意大家让开一条路。可人群早已失去了控制，只是忘情地围着汽车高呼“万岁”，还不停地抛洒花瓣。车被围得动不了窝，连毛泽东也有些急了，高声喊道：“不要洒了，不要洒了。”可他的声音，被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万岁”声淹没了。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当这天武装警卫最高指挥的北京军区司令杨成武都下了汽车，亲自指挥着疏散人群。警卫战士手挽手拉起了一道人墙，保护着毛泽东的汽车一点点向前移动。好一会儿工夫，围观的群众才缓慢向两边退去。一场意外惊险总算解除了。

当国宾车队驶进了庄严的新华门时，天色已近黄昏。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华，就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旁边的勤政殿院内下榻。

在这次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当中，人们注意到了时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的身影。其实他是刚接到中央的通知，从上海赶来参加迎接和接待苏联贵宾的。

5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伏罗希洛夫到访举行盛大国宴。在宴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赞扬伏罗希洛夫“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

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席间，当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敬酒时，伏罗希洛夫面含微笑对毛泽东说：“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个人崇拜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毛主席幽默地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伏罗希洛夫动情地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对呀，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再次附和道。

陈毅也出席了这个盛大的宴会，周恩来把他带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介绍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来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向苏联同志首先披露了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人事决定。

“不，我是来辅助周总理工作的。我将在周总理领导之下工作。”陈毅赶紧谦逊地解释道。

毛泽东也转过头来对伏罗希洛夫强调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得很好的同志。”

在这不久后，陈毅接替周恩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事就对外发布了。

也就是在1957年的访问中，伏罗希洛夫得知了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还没有一架专用飞机。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和盛情，伏罗希洛夫回国后，亲自精选了一架伊尔14型飞机，以国家的名义赠送给了周恩来。

此后，这架伊尔14型678号飞机就成了中国第一架政府专机。周总理曾经乘坐这架飞机出访过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等许多国家，也乘坐它巡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架专机还接送过不少来访的外国首脑，如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乘坐这架飞机考察出访。

这架具有历史意义的飞机，直到1993年才在太原机场退役。如今这架

飞机被珍藏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衣队、政治保卫队的建制撤销了，因此我们的故事也到这里告一段落。然而便衣警卫制度、便衣警卫工作仍一直延续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领袖身边特殊卫队
作者=王凡
页数=314
SS号=12557858
出版日期=2009.8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尺寸=16开
原书定价=36.00
参考文献格式=王凡，刘东平著．领袖身边特殊卫队．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08．
内容提要=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人民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层等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党和国家领导层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这支便衣保卫队的大多成员早已人白发暮年，还有不少人已然告别了人世。　　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便衣保卫队的真实故事，将永远暨存于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之中。